

崑山圖書館藏

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

總校訂者 李雲漢

著者：李國邦、呂芳上、吳啓明、  
陳三井、葉明德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

總校訂：李雲漢

著者：李國祁、呂芳上、蘇啓明  
陳三井、葉明德







# 序

中華民族是一個注重歷史的民族，透過歷史來鑑古知今，承先啓後，造就了世界上僅有的歷史文化民族。而在中國歷史上，「士」是主要的推動者。特別是在一個轉變的時局裡，「士」的理想與奮鬥，往往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近代中國在列強交相入侵的情勢中，憂患意識深植於中國有識的愛國青年；數百年孤寂的迎頭趕上西潮，與世界各國一爭長短的民族感情也在當代青年中覺醒、反思，尋找突破時空的限制，期望將古老的中國建設成現代化的國家。從傳統知識分子的憂患使命，激發為當代青年改寫歷史的自覺。近代中國青年的一連串運動中，可印證出古老的中華民族有一顆熱烈澎湃的心。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在多元社會與價值體系中，青年運動應是理想與其在現實環境中的定位。要使中國的未來有希望，青年運動的本身應該是理性的建設，其本質應該是強烈的愛國心，其方向也應該是繼承青年先進愛國的歷史，以建設現代化的中國為目標，以發揚中國歷史文化為期許。

本會有鑑於近代中國青年的共同期望，特聘請國內歷史學家，共同規劃出版本書，以作為當代青年們的參考，共同為中國寫歷史，為歷史作見證，共同努力使國家邁向現代化的坦途。在此



要特別感謝撰稿的學者們，編輯上若有疏漏，尚祈讀者惠示高見，俾作改進。

莊懷義 謹序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卅日

刊



# 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 目錄

- 壹 辛亥革命前後／1
- 愛國青年爲創建中華民國而團結奮鬥 李國祁
- 一 前言／3
- 二 國父 中山先生創組清末的中國青年革命運動／3
- 三 近代中國青年的第一次團結——同盟會的成立／24
- 四 中國青年與辛亥革命／43
- 五 結論／64
- 貳 五四時代／79
- 自覺與自救的澎湃浪潮 呂芳上
- 一 劇變的時代／81
- 二 「五四」序幕／83
- 三 學生的「五四」／91
- 四 文化的「五四」／104
- 五 「五四」後學運的動向／110



六 結論／120

參 從北伐到抗戰／141

——統一禦侮過程中的壯烈行動

蘇啓明

一 中國國民黨改組與全國青年大團結／143

二 反帝風潮中的青年運動／146

三 北伐戰爭期間的青年運動／152

四 九一八國難期間的青年運動／164

五 日侵華北與青年救亡運動／171

六 對日抗戰期間的青年運動／180

七 青年運動的逆流、結果與教訓／197

肆 反共救國的新里程／229

——自由地區青年運動的發展

陳三井

一 前言／231

二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立與發展／231

三 青年自覺運動／242

四 保衛釣魚台運動／246

五 保釣後的青年運動／268



伍 爭取自由民主的新時代／283

——大陸學運的回顧與展望

葉明德

一 前言／285

二 一九五七年大陸學運／286

三 「文革」時期大陸學運（一九六六～七六）／298

四 七〇年代大陸學運／332

五 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341

六 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350

七 結語／371







# 一、前言

## 第壹篇

### 辛亥革命前後

——**愛國青年爲創建中華民國而團結奮鬥**

二、國父 中山先生創組清末的中國青年革命運動

五、如蒙周知，近代中國具有現代性的革命運動實肇基於國父 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一五）。其時中國有起青年的精神，其時我國有起青年的精神。



□著者簡介□

李國祁，廣東人，西德漢堡大學哲學博士。原任師範大學歷史所所長文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教務長，現任師範大學教授。著有「中國早期鐵路經營」、「張之洞外交政策」、「中國現代史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民國史論集」。



# 一、前言

青年創造時代，時代考驗青年，這是歷史事實的寫照，也是古今中外至理名言。清季由於西風的東漸，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家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更由於民族主義的驅使，中國青年發出其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怒吼，為拯救國家民族，及致力中國現代化的努力，而精誠團結，倡導革命，決心推翻滿清政權。由甲午戰後至清帝國的滅亡，中國青年拋頭顱、灑熱血，以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蹟，寫下了辛亥革命運動史，推翻數千年的王朝政治，締造了史無前例的中華民國，為國家民族帶來嶄新的契機。一部清季的革命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清末中國青年運動史。本文將以國父中山先生創組清末的中國青年革命運動、近代中國青年的第一次大團結——同盟會的成立、中國青年與辛亥革命三主題，來討論一八八五至一九一一年間的我國青年運動，並盼更進一步的分析此時期我國有志青年的抱負及青年運動的特徵。

## 二、國父 中山先生創組清末的中國青年革命運動

如衆周知，近代中國具有現代性的革命運動實倡導於國父 中山先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綜觀國父二十歲以前之歷史，可知其少年時代因具有下列的特徵，故能孕育出終生矢志革



命，爲中國的現代化而努力奮鬥。

1. 就家世及幼年生活言，國父先世因避亂輾轉南遷，至粵定居<sup>①</sup>，再加以出生鄉間，幼年時目睹清吏的苛擾，又常聆太平天國軼事，故具有強烈之國家民族意識，憤恨滿人的異族統治，隱然有拯救國家民族，改善小民生計之心<sup>②</sup>。決意不攻讀制藝，博取科舉功名，躋身人士紳階級。亦因此能跳出傳統的束縛，立其開創新局的契機。

2. 十四歲以後往澳門乘輪赴檀香山就讀美校，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慕西學窮天地之想，景仰華盛頓、林肯諸民主偉人勳榮，渴望中國早日覺醒，創建爲民主國家<sup>③</sup>。

此種具有國家民族意識，不受傳統局限，瞭解西方民主政治之長，及渴望改善國人之民生經濟，正是當時中國如欲致力富強，躋身於現代化的國際社會，所必須講求的。故在當時的環境中，中山先生少年時代的生涯，已使他較其他在我國國內社會成長的青少年，更具有適合世界潮流的現代性。在清季我國知識青年的覺醒上，他也遠較其他諸人爲早，甚至可以說是一位時代的先驅者。這些都是使他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在整個方向上，甚爲正確的。

國父於二十歲時起，即糾合青年同志，從事革命運動。而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前，可以說是他影響清季的青年革命運動最爲突出時期。茲爲討論方便起見，將其由中法戰後至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期的青年革命運動，分爲前後兩期，以庚子事變（一九〇〇）作爲分野，來加以分述。



## 甲、前期（中法戰後至庚子拳亂時期，一八八五——一九〇〇）

此時期是國父初從事革命及青年運動時期，其倡導此一運動的宗旨，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亦即要民族與民權兩者兼顧。他所成立的中心組織是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在檀香山所創立的興中會。他團聚同志，推展運動所採用的方法，是以少數就讀香港及旅居國外的中國青年爲核心，利用粵人鄉土意識，透過會黨等秘密會社組織，於南方策動革命。

在中法戰後國父立志團結青年從事革命覆滿時，他已由檀香山返國<sup>④</sup>。初在香港中央書院復學，卒業後往廣州入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醫科學校習醫。當時他所結識的志士首推其小同鄉陸皓東。陸氏亦翠亨村人，小於國父兩歲，自幼兩人即爲玩伴，於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曾與國父共毀鄉間神像，力圖破除迷信，因而無法於鄉間立足，乃往上海學習電報，而國父則赴香港讀書。其次則是鄭士良與尤烈。鄭士良名安，號弼臣，廣東惠陽人，生於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長於國父三歲。初卒業於德國教會禮賢會學校，於一八八六年入博濟醫院附設醫科學校讀書，與國父爲同學，國父欽服其救亡計畫，士良亦欣賞國父之恢弘氣度及救國救民之大志，故志同道合，結爲密友。士良與秘密會社三合會關係甚深，國父受其影響，早期革命亦甚注意聯絡會黨<sup>⑤</sup>。

尤烈名季博，字令季，別字少紉，號吳興季子，廣東順德人。生於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長於國父一歲。聰穎過人，讀書過目強記，十歲受業於陸南朗，陸富愛國思想，尤烈受其



影響，亦富愛國志節。中法戰後就讀於廣州算學館，因只族人尤裕堂是博濟畢業生，得結識國父及鄭士良，共以革命覆滿拯救中國為理想<sup>⑥</sup>。

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國父轉入香港西醫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讀書，復結識楊鶴齡、陳少白、王孟琴、何隆簡、楊迺安、關景良等。時尤烈亦轉入該校就讀，國父與陳、楊、尤往來最密，倡言革命，時人稱之為「四大寇」。陳少白原名聞韶，又名白，字夔石，粵新會人，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生，小於國父三歲，其結識國父是牧師區鳳墀介紹，並因國父介紹，轉學就讀香港西醫書院<sup>⑦</sup>，與國父感情友好，曾結拜為兄弟<sup>⑧</sup>。

楊鶴齡與國父小同鄉，亦翠亨村人，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生，小於國父兩歲<sup>⑨</sup>。父業商，家庭富有，性不羈，喜談諧，與國父相識甚早，與尤烈曾在廣州算學館同學。時隨父游學香港，其香港祖業楊耀記距香港西醫書院不遠，國父與尤烈、陳少白等常至楊處相聚，並假之為集會場所，高談革命。日後國父於廣州行醫，秘密作革命活動，經濟拮据時，楊常全力資助。及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香港興中會成立，鶴齡亦宣誓加入為會員<sup>⑩</sup>。

由上述國父最初從事革命運動時所結識的青年志士各簡歷，我們大體上可得如下的結論：

（一）他透過同學的關係，來集結有志於革命的青年志士，所以他的革命運動，是一種青年運動。而且他所集結的同志，大多年齡相仿，如鄭士良、尤烈長於國父一至三歲，而陳少白、陸皓東、楊鶴齡小於國父二至三歲，可視為是一種同年齡的青年結合。



(二)此時國父所結合的青年同志，均為學習自然科學者，此時由於國父本人亦是習自然科學醫學的關係，因此此種結合含有相當的業緣結合性質。而且學自然科學者，由於所學科目的關係，得風氣之先，接觸西方文化較早，對西方的進步瞭解亦較深。故於國勢凌替，異族統治，感受強烈，能較早奮起有志於革命。

(三)所結合諸人中，未曾有取得科舉功名者，顯然國父由於並非士紳家庭出身，與士紳階層的來往不甚密切。而況此時我國出身於士紳階層的青年，因清廷的敗徵尚未完全暴露，真正有志於革命者不多。

(四)國父所集結的同志均為粵人，故其最初所從事的青年革命運動，仍是利用中國傳統的社會結合關係——地緣，具有濃厚的地域性色彩。

(五)此時國父團聚羣眾的方法，已開始注意及利用會黨。鄭士良固與三合會關係深厚，而國父及其他諸人因受鄭士良及曾任林則徐幕府的鄭安影響，亦認為會黨既以覆清為宗旨，其組織又極嚴密，勢力更甚廣大，深入社會各階層，會眾復深具冒險犯難之精神，可與之結合為一體<sup>⑪</sup>。由此可知，國父在倡導青年革命運動時，即無中國士大夫的階級意識，他是要團結社會中各階層的力量，來共同覆滿。

(六)至少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以前，國父雖不滿清廷的異族統治，主張革命覆滿，但其革命的理論，尚未能完全形成。

由光緒十七年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四年夏）是國父倡議重農桑、禁鴉



片、興文教與籍行醫聯絡同志，準備革命時期。在此四年間，國父發表改革農政專文，力主用西法講求農桑樹藝，及上書李鴻章，建議為政當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外，仍不斷結識青年志士，聯絡會黨，推廣其青年革命運動。此時期內他所結識的青年志士，計有楊衢雲、謝纘泰、程奎光等。其中以楊衢雲、程奎光為重要。蓋楊衢雲福建海澄人，出生於香港，長於國父六歲（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生），時於香港與謝纘泰等創立輔仁文社，擔任社長<sup>⑫</sup>。彼之參加國父的革命運動，代表國父所從事的青年革命運動於此時（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已漸打破廣東的地域局限，而且在年齡的階層上，亦加以擴大（時楊氏已卅有三）。再則楊氏係學英文出身，與過去國父的交往幾全為攻讀自然科學者，亦有所不同。楊衢雲活動能力甚強，日後興中會香港總會成立時，擔任首任會長，乙未之役失敗後，雖與國父失和，然所到之處如越南、新加坡、南非等地，常能設立興中會分會<sup>⑬</sup>。

程奎光為程璧光之弟，與國父同鄉，廣東香山縣人，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國父於廣州開設東西藥局，日與鄭士良、陸皓東、尤烈、陳少白諸人在廣雅書局之南園杭風軒秘密集會，奎光亦常參加，國父以其兄璧光為海軍人才，盼彼能影響之參加革命。乙未之役奎光與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等均遇難，世稱「四烈士」<sup>⑭</sup>。

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至庚子拳亂（一九〇〇）時期，是國父的青年革命運動真正進入起事行動時期，在此時期內最值得注意者，是國父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根據馮自由的記載，國父之所以能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主要得力於曾在檀香山讀書，同學故舊甚多，更得力於其兄孫德彰的支持。德彰除變產捐助外，更親自移書各親友，為國父先容<sup>⑮</sup>。史扶鄰（Harold Z. Schiffin）並認為當時參與創組興中會的重要份子如何寬、鄧蔭南都與孫德彰有深厚關係。何寬係孫德彰存款銀行的經理，鄧蔭南則是商人兼營農場，是三合會中活躍份子，亦與孫德彰關係密切，而當時參加興中會的諸人大多是廣東香山縣的華僑<sup>⑯</sup>。可知此時國父團聚羣衆的方法，仍是依靠地緣與血緣。在職業上他們大多是商人、店員、農民及工匠，真正屬於知識份子者極少<sup>⑰</sup>。在年齡上則打破青年的限制。如鄧蔭南，道光廿六年（一八四六）生，時已年五十<sup>⑱</sup>。然則不可否認的，仍是以青年為其主體。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的宗旨，根據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錄存的該會規章來看，主要是以中國將面臨亡國滅種之禍作號召，故明白表示，中國積弱，強鄰環伺，而當前政治仍因循苟且，粉飾虛張，致豆剖瓜分，迫在眉睫。號召志士集衆興中，共濟時艱，莫我中夏<sup>⑲</sup>。顯然具有強烈之民族意識。至於民權思想，根據史扶鄰的說法，是受夏威夷變成共和國的影響<sup>⑳</sup>。故於誓詞中作：「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sup>㉑</sup>」。要民族與民權同時兼顧。亦即自此時起，國父已注意及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中民族、民權共生的現象，因此他的青年革命運動亦要兩者兼顧，同時解決。

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初僅有會衆二十餘人，但及次年（一八九五），已增加至百餘人，而且共募得會費及股份銀一千三百餘元，國父乃返歸香港，一面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



、楊鶴齡、區鳳墀等創設興中會總部，陸皓東規劃在廣東起事，一面擬將興中會推廣發展至其他各地。至庚子時期，興中會除香港總會及檀香山分會外，另外於廣州、台灣、日本、橫濱、英屬南非，設有分會。根據史扶鄰對乙未之役以前之興中會會員統計，其中絕大多數為廣東人，而且國父的同鄉佔幾近半數，非廣東籍者僅祇兩人，一是福建的楊衢雲，尚出生於香港；另一是在廣東當兵的湖南人<sup>②②</sup>。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此時期內國父推展青年革命運動的方法始終是以地緣的結合關係為主。造成此一現象的根本原因，並非是國父本人有強烈的鄉土意識，而是地緣結合關係是此時我國社會的主要結合關係，國父生長於廣東，其活動範圍在廣東、香港及檀香山，均是粵人居絕大多數的地區，自然會產生此一結果。

就會員的身份而言，此時興中會會員中以商人居多數，約佔四五%，而在商人之中包括富商及小商人，並非是小商人才參加此一運動的。除商人外，工人數目亦甚可觀，約佔二五·五%，至於知識份子（包括醫生、學生、牧師、教師、銀行家、新聞記者、軍事人員及其他白領工作者）僅佔一八·三%。會黨八·五%，農人最少，佔二·六%<sup>②③</sup>。由此可以了解，國父當時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一開始即是包含社會各階層的全民運動，而且其中是以商人為最多，與中國傳統的革命運動以農民為主體，頗不相同。商人在傳統觀念中被認為是重利輕義，於拋頭顱灑熱血之革命運動，往往有所顧忌，不肯勇往直前。而國父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一開始之所以與傳統的革命運動情況有此不同，乃在於其最初活動之處，無論是檀香山或香港，均在洋人歧視華人之統治下，營商的華人，因居於城鎮，與洋人接觸多，於此感受最深，期望中國能夠強大，亦最



殷切，故而願參加革命。近代原是重商的時代，由興中會成立後的會員出身情況，可以了解，它是有相當現代性的。

知識份子雖在興中會成立之初，不居多數，但却是此一青年革命運動的推動者，亦是此一革命運動的領導階層。除國父本人外，爲陸皓東、尤烈、楊衢雲、鄭士良、謝纘泰等，他們多是學自然科學的新知識份子，而且年齡甚輕，年齡較長者爲楊衢雲，亦不過卅六歲。其他如鄧蔭南雖年近五十，究竟是少數。

在興中會組成份子中，另一值得注意之事實是：具有科舉功名者，僅一人，即朱淇，他是諸生出身。而其兄朱湘却是乙未之役洩謀者<sup>②④</sup>。當時朱淇中文根柢較深，故對滿檄文及安民布告均是由他起草。由此可以瞭解，乙未之役時期國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是與當時中國本土，社會領導階層的主流，傳統知識份子關係不深，它是以年青的新知識份子爲其骨幹的。這也是何以國父的革命運動在庚子以前，難與康有爲所領導的維新改革運動相抗衡的重要原因之一。蓋我國新學的興起，雖在甲午戰後，但新知識份子勢力的壯大，仍是須待庚子拳亂以後。在此之前，不過是其萌芽開始成長時期而已。

興中會成立之後，在革命運動上，中山先生採取因地因時制宜的方法，以香港、廣州兩地爲核心，用不同的方式，從事革命起事的準備。香港是商業城市，英人對一切商業活動管制較鬆，故國父在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設立在名稱上類似商行的乾亨行，作爲興中會的總部，掩護其革命活動<sup>②⑤</sup>。在廣州由於甲午戰役我國啓發民智運動的興起，各地有識士紳組織學會，作教育羣衆



，振興實業的努力，國父因而亦創設農學會，手訂章程，與縉紳相交往，暗中佈署其革命行動<sup>②6</sup>。

此時期國父所從事的青年革命運動有一項極值得注意的特色，是極注重文宣工作，以組織文教社團，從事文教活動，來結交青年知識份子，擴大組織，推動革命運動。此與太平天國等以秘密宗教作為團聚羣衆，宣傳革命，有根本上的不同。在興中會未成立前，楊衢雲等已創辦有輔仁文社，以文教活動來宣傳革命，興中會成立後，則復在香港聯絡律師何啓及德臣西報（China Mail）主筆黎德（Thomas H. Reid）、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主筆鄧肯（Chesney Duncan）在各報撰文鼓吹革命<sup>②7</sup>。在廣州國父所創設的農學會，亦從事相類似工作，撰刊緣起書，倡無民非士，無士非民，以士興農之說，廣徵同志，傳佈反滿革命思想<sup>②8</sup>。甚至乙未之役失敗後，國父亦在檀香山擴組中西擴論會及練兵會，並以隆記報為機關，仍然是藉研究學術、交換新知、尚武及發佈新聞，為招納同志，推廣革命運動的手段<sup>②9</sup>。光緒廿五年（一八九九）更命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sup>③0</sup>。因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山先生所推動的青年革命運動，一開始即能注重與當時的時代新潮流相結合，與新知識份子及傳播新知結合成不可分的關係，甚至可以說是以具有新知與求新精神為其重要基礎的。才會形成新知識份子愈多，新知愈普及，其運動的勢力亦愈大，而且時間愈晚，此一特徵亦愈為顯著。

就另一方面言，國父所創組的青年革命運動組織——興中會，雖以地緣結合關係及新知識份子為其骨幹，但國父本人在思想觀念上，是始終希望他的革命運動能網羅我國社會各方面及各地區



人士，使其具有全民運動的特色。故興中會在性質上不具有任何排他性。檀香山興中會成立之初，其組成份子已包含士、農、工、商、社會各階層人士，香港興中會在章程中亦曾明言：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sup>③①</sup>。故對於國內大多數的舊知識份子以及其他地區的革命運動。國父亦投注相當的關懷，戊戌變法失敗後，更主動的積極的聯絡新黨人，希望舉國青年志士能夠團結一致，共為締造現代化的新中國而努力。因此在一八九八至九九年間，一再與梁啟超等在東京晤談，並專函介紹梁啟超予檀香山諸友好，致而為維新黨人所欺，使康、梁的保皇會得立足於檀香山，甚至日漸取代興中會勢力<sup>③②</sup>。但是國父的這種恢弘的胸襟，以及興中會無排他性的特質，終於在庚子以後發揮出深厚的力量來，才能為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的成立，帶來其生機。

爲了使革命運動能結合各方面的力量，爲衆周知，國父對革命運動與秘密會黨的關係，是十分看重的。在興中會成立之前，他已注意及秘密會黨在革命運動中所能發生的效用。興中會最初在檀香山的成立，也是與當地華人社會秘密會黨——洪門有相當關係，鄧蔭南即是當地三合會中的領導人物，故在興中會初期組成份子中，秘密會黨份子有十三人之多，佔八·五%。此後他的策畫革命，推展運動，始終要與秘密會黨相結合，無論是乙未之役或庚子惠州之役，會黨始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sup>③③</sup>。根據國父個人的看法，洪門創設於明朝遺老，以反清復明爲宗旨，與其革命有相當脗合之處，故可資爲用。秘密會黨捨生赴義，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最能固結團體，雖不爲士大夫所齒，然最合羣衆心理，發常人之感情，惜海外會黨因處於他國自由政府之下，政治



意味全失<sup>③④</sup>。因此他要重新灌輸其革命意識，推動哥老會與三合會的聯合，共組興漢會，並擔任會長，親擬：「萬象陰霾打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四句歌謠，作為各地志士聯絡舉義的暗號<sup>③⑤</sup>。充份證明，他所推展的青年革命運動，是要與社會下層結為一體的，此與維新黨人祇注重士紳階層的意念，有所不同。

興中會成立後至庚子時期，中山先生所策畫的革命起義，前後共有兩次，即乙未廣州之役與庚子惠州之役。另有史堅如謀炸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德壽，雖均未能成功，但青年志士的拋頭顱、灑熱血，慷慨激昂，從容就義，已為日後的青年及革命運動，樹立良好的楷模。那就是：愛國知識青年具有冒險犯難、身先士卒，不怕死、不畏難的精神，使整個運動充滿了不顧身家性命，壯烈為理想而奮鬥犧牲的可歌可泣事蹟。於是國父所倡導的青年革命運動逐漸為中外社會所認同，故日後中山先生說：「皓東沉勇，堅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敗而犧牲。元良沮喪，國士淪亡，誠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死者之模範。每一念及，仰止無窮。」又說：「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sup>③⑥</sup>。」

就思想理論言，興中會成立後至庚子事變時期，中山先生的青年革命運動理論體系業已大體建立。在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如前所述，他已標榜出中國的革命必須民族與民權兼顧，故以驅



除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衆政府」，作爲誓詞。次年香港興中會成立，復將誓詞加以修正，改恢復中國爲恢復中華，使其在民族主義上的理論更爲確定，那就是要建立民族國家。此一看法是爲當時主張革命之青年所接受的，例如黃詠商（襄）之所以參加興中會，即是認爲：「物極必反，漢族已有否極泰來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順天應人，此正其時。」因此建議將香港興中會機關命名爲「乾亨」，取其「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義<sup>37</sup>。乙未廣州之役失敗後陸皓東被捕，於供詞亦說：「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覆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sup>38</sup>。」國父所主張的民族主義理論，在當時最能打動人心，富有強大的號召力。

至於民權理論，國父於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答覆日人官崎寅藏之訪問時曾表示：「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並進一步指出，共和革命，可免去割據及互爭雄長之紛擾。他所憧憬的共和，是美國式的聯邦共和政治<sup>39</sup>。這個時期國人對共和政治，特別是美國的聯邦共和政治了解不多。鴉片戰後如徐繼畲的瀛環志略、梁廷枏的海國四說，均曾簡略介紹美國，兼帶述及其聯邦共和政體，而後馮桂芬、王韜、鄭觀應、何啓、胡禮恆等亦均於著作中表示議會政治優於君主專制政體。大體上一般知識份子對美式的聯邦共和僅有極爲粗略模糊的了解，而香港及檀香山華人則不然，了解較爲深刻。故庚子拳亂時，香港興中會曾由港督卜力（Henry Blake）之拉攏，擬與粵督李鴻章商談合作，各省獨立自



治，在南京或漢口建立中央政府，並設議會，制訂憲法，行民選元首制。爲此該會並擬具治平章程六條<sup>④</sup>。

一八九六年中山先生在倫敦爲清使館所拘，脫險後考察歐洲政治，瞭解僅民族、民權兩項政治主張，仍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故歐洲各國有社會革命發生。他爲一勞永逸計，決心將民生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提出，一併解決。使當時他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在思想理論上，得以建立其體系——三民主義。

## 乙、後期（庚子拳亂至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時期（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五）

庚子拳亂以後，由於我國內外形勢的劇變，使中山先生與中國的青年運動，產生更處密切的關係。就外在的形勢言，由於清政府支持義和團，致義和團的勢力大盛於華北、東北，造成前所未有的動亂，終而引起八國聯軍。辛丑和約不僅使舉國財政陷於絕境，而且北京至天津地區不得駐兵，清政府完全置於列強的軍事監督之下，中國已是國不成國的局面，較甲午之役僅失敗於日本，情況更爲嚴重。就內在的形勢言，甲午戰後的啓發民智與興辦新式學校的運動至此已獲初步成果。國人，特別是滿腔熱血的青年，在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下，日益覺醒，憤恨清政府的愚昧無知，顛預無能，漢民族主義思想因而高漲。覆滿已漸成爲中國青年的時代思潮。在如此情況下，有志於拯救國家民族的青年志士，或遊學於國外，特別是日本，或在國內的通都大邑，作各種反滿革命的活動，整個情勢頗有助於中山先生的中國青年革命運動。中山先生遂能僅以興中會爲



組織，香港、廣東及檀香山為活動空間，走向全國，成為全國的青年所景仰的導師與革命領袖。

中山先生自一八九八年以後，由於香港禁止其入境，即經常寓居日本橫濱。庚子惠州之役以後與我國的留日青年學生，開始有較多的接觸，亦深刻認識，他所領導的青年革命運動必須與其他各省的青年志士結為一體，方能發揮出宏偉的力量來。國父在日本較早所接觸的其他省份重要留學生，是章太炎與秦力山。章太炎是浙江的名士，小於國父兩歲，同治七年冬（一八六九）年生。國父於一八九九年在東京時務報經梁啟超介紹結識之<sup>④①</sup>，最初無甚往來，一九〇二年之後方關係日益深厚。秦力山湖南長沙人，師事譚嗣同，曾入南學會，一八九七年（光緒廿三年）遊學日本，庚子時返國參與唐才常起事，被推為安徽後軍統領，以自立軍名義在大通起事，失敗後復往日本，與同志戡翼翬、沈翔雲、王寵惠等創辦國民報月刊，鼓吹革命。其赴橫濱謁見國父時，年僅廿四歲<sup>④②</sup>。由於章、秦的關係，國父遂與東京我國留學生有密切往來。

國父晚至庚子以後方與留日學生有較多接觸，史扶鄰在其書中認為，是由於國父非士紳家庭出身，致與士紳家庭出身之留學生間有其隔閡<sup>④③</sup>。其實並非為此。根據近人的研究，可知是因日本政府懼清使的抗議，曾透過犬養毅、宮崎寅藏等，要求國父「慎交通往來」<sup>④④</sup>，再加以倫敦蒙難後，國父因清廷的通緝，行動亦甚謹慎。何況此時他正忙於在粵的起事準備。因而與東京的中國同學較少接觸。使彼等誤以為國父是：「驍桀難近」、「其迹甚秘」，甚至產生若干反感。但既與國父接觸後，乃發現國父為人豁達大度，平易近人，無佗獷狀，而且學識淵博，見解超人。於是視為革命領袖，青年導師，願追隨左右。宋教仁所撰程家榷革命大事略中曾說：



「前大總統孫文，僑居橫濱，其迹甚秘。君百計求之，不克一見。香山有鄭可平者，設成衣店於築地，藉製校服與其友善。可平固三合會會員，君告以意，可平允為謀之。越半年，始得轉輾相握手。孫文為君言民族民權民生之理，及五權分立暨以鐵路建國之道，君聞所未聞，以為可達其志，請畢生以事斯語，曰：欲樹黨全國以傳播之<sup>(45)</sup>。」

吳敬恆在自述中亦曾說，他在一八九八年以前即曾聽到孫文之名，總以為不過是江洋大盜者流。一九〇〇年惠州之役以後，對國父印象開始轉好，由洪秀全第二升至若劉秀、鄧禹等，甚至於一九〇二年鈕永建約其往見孫先生時，他仍懷疑國父是否識字。但及鈕永建謁國父歸來，告知國父氣度的溫文儒雅，認為是其平生所僅見者，方逐漸改變其觀念<sup>(46)</sup>。日後成為國父的忠實信徒。

章太炎在他的致汪康年函及自訂年譜中對與國父的結識，亦曾有很好的描述。在致汪康年函中曾說：「興公（孫先生）亦在橫濱，自署中山樵，嘗一見之，聆其議論，謂不瓜分不足以恢復。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謂卓識。惜其人閃爍不恆，非有實際，蓋不能為張角、王仙蘭也<sup>(47)</sup>。」顯然最初章氏對中山先生印象好壞參半。但及一九〇二年春章氏再往日本，得晤中山先生，兩人因而結交。章太炎在其自訂年譜中稱：「時孫逸仙方在橫濱，湖南秦遯力山者，故唐才常黨，事敗東走，卓如（梁啟超）不禮焉，往謁逸仙。與語，大恍。余亦素悉逸仙事，偕力山就之。逸仙導余入中和堂，奏軍樂，延義從百餘人會飲，酬酢極歡，自是始言交<sup>(48)</sup>。」章太炎是極端的種族主義者，對國父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一項，最初頗有懷疑。兩人曾討論土地及建都問題



，國父明白告知，貧富不均是革命的潛因，土地屬自然物，與工商業不同，不是因人力而造成。地主強佔天下土地，其財富屬不勞而獲者多，故應制訂法律，平均地權，不致耕種者，不得占有農田。人民可擁有住宅附近土地，但以十畝為限，農民所有農田，每人最多應以二十畝為限。章太炎對之極表贊同，並根據國父的意見，設計平均地權辦法<sup>④9</sup>。

由上述的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國父當時最令日本中國留學青年所佩服的，仍是他的三民主義革命理論。而在其三民主義理論中，民族主義，是最能為大家接受，幾乎覆滿建立民族國家，已是每個有識青年的心聲。民權主義也能為多數留日學生所理解，蓋既要覆滿，勢必走向民主，君主專制所有之缺點，已為大家所共見。祇有民生主義，多數人均不理解。再加以他們絕大多數出身士紳家庭，家中擁有相當田產，平均地權，違害及個人利益，因此每不能接受。不僅現在如此，甚至同盟會成立後，仍有不少青年志士對此不表同意，致而湖北的共進會擅改平均地權為平均人權。國父為此亦費盡口舌，仍難全獲知識青年予以贊同。

關於建都問題，國父當時的看法是：「謀本部，則武昌；謀藩服，則西安；謀大洲，則伊犁。」而他所最看重的，仍是武昌。認為可以長江及鐵路與四方聯絡，有南京的優點，而無南京的缺點。章太炎對此亦表同意<sup>⑤0</sup>。

章太炎與秦力山對國父的認同，於國父在日本留學生中領袖地位的建立，有很大的影響。蓋章氏為國學大師，以他的聲望能對國父欽佩，自然引起其他人的認同，秦氏自大通之役後，在東京留學生中聲望亦極高，秦氏對國父的欽佩尤甚於章氏。故在兩人交口相讚下，國父在日本中國



留學生界中的聲望與日俱增。

就國父本身而言，其之所以在日本能為青年志士所認同，亦在於他積極參與留學生的各種救國活動，但絕不以青年導師革命領袖自居。在庚子以前，他接受日本友人犬養毅及官崎寅藏的建議，決心與維新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合作，甚至主動訪晤梁啟超，並為函介紹梁啟超予檀香山興中會同志，致為梁等所趁，使維新黨人襲取檀香山興中會勢力。庚子以後則全力協助廣東留學生成立廣東獨立協會。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章太炎在東京成立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國父於該會籌備期間，力予協助，開會時亦親率橫濱華僑十餘人至東京參加。及該會為日本警方所禁，國父並在橫濱補列紀念儀式。香港興中會之中國日報亦刊載該會宣言書。此後國父撰文常引用類似章太炎的看法，稱：「漢人失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sup>⑤1</sup>！」當時任何有志於革命之留學生請謁國父，討論中國問題，國父必接見之，娓娓將其救國救民的看法，剴切予以說明。故每十日必至東京與中國留學生相聚。留學生中有傑出人物，國父甚至主動親予訪晤，例如其於一九〇五年的結識黃興，即是如此<sup>⑤2</sup>。由於國父的坦蕩誠摯親切的態度，遂使留學生對國父的觀感完全改變，由排拒懷疑而變為景仰與認同。

東京的留日學生之所以逐漸視國父為青年導師與革命領袖，除因國父對新中國的締造，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外，亦在於國父是當時革命的導倡人，不僅能坐而言，亦能起而行，甚至屢敗屢戰，為革命而奮鬥不懈。陳天華在同盟會成立時，即曾撰文言：

「至於孫君所言，驟聽似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孫君則行之而後言，此其所以



異也。況孫君於十餘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見及此而實行之，得不謂為世間之豪傑乎」，「孫君為一造時勢之英雄，則吾所敢必也。」「或者謂余曰，人不可失自尊心，孫君英雄，吾獨非英雄乎，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吾以崇拜民族之故，因而崇拜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是日之歡迎孫君者，余敢斷言，其非失自尊心，而出於愛國之熱忱<sup>53</sup>。」

由此可看出，當時日本中國留學界對中山先生的崇拜，以及之所以崇拜他的原因。要而言之，庚子以後日本中國留學生生劇增，這些留學青年由於在日本廣泛接觸到西方的新思想，而且親身感受日本因模倣西方政經文化日益富強，中國却因滿清的顛預無能，面臨亡國滅種之禍，因此他們熱血沸騰的要覆滿、要革命，但是他們本身並無多少實際經驗，亦無有系統的思想看法，祇是憑藉著一股熱情衝動，他們所需要的是完整的救國理論與高瞻遠矚的領導人，而中山先生正是具有此一條件者，況其為人坦蕩豁達大度，有親切誠懇君子風範，於是自然的被奉為導師，尊為領袖。

大約在一九〇三年（光緒廿九年）時，國父的領袖地位已漸為主革命的留學生所認同。當時各省留學生常往訪國父者，有程家檉、劉成禺、馬君武、李書城、胡毅生、楊守仁、廖仲愷、何香凝等數十人，日後大都成為革命黨人中重要份子。時國父了解日本我國留學生組織紛雜，不夠團結，因此委託彼等「物識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此對日後同盟會的成立，據國父自稱，發生相當影響<sup>54</sup>。大約即自此時起，國父對工作的策畫，不再拘限於興中會，處處以全國整體觀念為中心，開始有意組織全國聯合性團體。時為組訓在日的留學青年，他成立秘密軍事學



校，聘日本著名軍事家日野熊藏主持課務，所收學生在人學之初，必須宣誓國父所擬的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sup>55</sup>。」此一誓詞係與中會之誓詞加以擴大，增加平均地權一項，使民族、民權、民生三者兼備，日後並成爲同盟會誓詞。秘密軍事學校課程以八個月爲期，注重兵型學與非洲波耳人抗英所用之散兵戰法及以少擊衆之夜戰法。該校成立之初，有胡毅生等十四人人學。外間稱該校爲東京的梁山泊<sup>56</sup>。

當時使國父最感困難者，一在於經費拮据，一在於如何在歐美宣傳革命，使歐美地區華人亦能團結一致爲革命而努力。故於一九〇三年九月下旬離日赴美，並擬轉赴歐洲。國父在美停留逾一年，遍歷美國東西部大城，除募款演說並印發鄒容革命軍一萬餘冊宣傳革命外，曾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希望能因彼個人的加入洪門，而使秘密會社份子熱烈獻身革命。並改革致公堂章程；在火奴魯魯創組中華革命軍，參加者須宣誓，誓詞與東京所辦秘密軍校入學誓詞相同。由此可看出，國父所要從事的青年革命運動，始終是要結合整個中國各階層的青年爲一體，絕不僅限於某一階層，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惜因維新黨人的阻撓，收效不宏，此次真正加入國父革命行列者不多。

一九〇五年元月，國父應歐洲中國留學生之邀抵倫敦。親訪當時在倫敦之吳稚暉，從此兩人結交。吳長於國父一歲，其爲人談諧善謔，不輕易服人。故在日本時不肯與國父相晤，及此次結識國父，對國父欽服備至，認爲國父度量自然寬宏，待人誠懇，不念舊惡，舉止是不能形容的偉大<sup>57</sup>。遂而成爲國父信徒。



國父在歐陸與中國留學生有三次重要聚會，一在北京布魯塞爾，一在柏林，另一在巴黎。其中又以布魯塞爾一次最爲重要。此次會談中雙方意見並不一致，其中留德學生朱和中等反對革命注重會黨，主以知識份子爲領導，運動新軍。蓋時北京中國留學生中以鄂籍居多數，了解駐鄂新軍中頗有具革命思想者。而朱和中與吳祿貞正擬從更換新軍腦筋著手。吳祿貞已自日本學陸軍回鄂，充任將弁學堂總教習、護軍全軍總教習、武普通學堂會辦等職，具有相當影響力。國父則認爲：「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於會黨則解釋其中亦有學問不錯者，如陸皓東、史堅如，並告知現正改革會黨如致公會章程，雙方爲此討論三日夜，最後中山先生接受朱和中諸人觀點，決心會黨、知識份子（特別是留學生）及新軍三者分頭並進，雙方看法乃得整合，旋又因宣誓問題，留學生中有持異議者，國父則告知宣誓之意義所在，朱和中首先表示願意宣誓，使問題迎刃而解<sup>58</sup>。一時宣誓加入革命團體者達三十餘人，誓詞內容仍與秘密軍事學校入學誓詞相同。國父亦手書相同誓詞交由彼等收執。在北京國父並曾抽暇往訪共產第二國際書記處負責人 Huysmans 等，告知自己革命綱領<sup>59</sup>。

柏林會談係朱和中返柏林後與劉家佺代爲安排者。柏林中國留學生中滿人甚多，進行甚爲秘密，晤談中薛仙舟反對平均地權，馬德潤則不贊成五權憲法，建議以德國憲法爲藍本，經國父再三解釋，再則德國憲法所行者係君主立憲，而且在君主立憲中屬君權甚爲強大者，亦不爲其他諸人贊同，未能構成阻力，在柏林加盟之留學生共約二十餘人<sup>60</sup>。

巴黎之晤談較爲簡單，蓋留法學生聞知北京及柏林情形後，主革命者情緒振奮，故由留比同



學胡秉柯加以聯絡，成立革命團體，加盟者約十餘人。唯不幸發生王發科、王相楚（留德）、湯薌銘、向國華（留法）四人竊取盟約，向清使館告密事件，幸清駐法公使孫寶琦未曾深究，故未發生重大影響<sup>⑥1</sup>。

國父在歐洲與留學生的結盟，對於日後青年革命運動的發展極為重要。蓋由於歐洲加盟的留學生全力支持，並致函日本中國留學生，特別是兩湖地區的留學生，才會使日後國父返抵日本，更為彼等所崇敬，而予以盛大歡迎，一切以國父之命是從。同時歐洲的這種結盟方式成爲一種模式，加以擴大，遂乃有同盟會的組成。再則國父接受歐洲留學生的建議，利用新軍，發展革命組織於新軍之中，對日後辛亥革命成功，亦發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要而言之，自與歐洲中國留學生結盟後，國父在中國青年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已完全確定，透過艱辛的努力，他已將有識的知識青年導引集結於革命覆滿的旗幟之下，日後所要進行的祇是如何發展有形的組織，實際在各地發動革命。

### 三、近代中國青年的第一次團結——同盟會的成立

如前所述，早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國父已以地緣（同鄉）及業緣（同學）的方法，結合同志，從事革命運動。但就全國的多數情況而言，知識青年的真正覺醒，與甲午戰敗有不可分的關係。甲午戰敗是中國敗於素來加以輕視的日本，而且其賠款之多與割地之重要，均是清代以來所



沒有的，故舉國上下均視爲奇恥大辱，而且即在此時，各國報紙中國將被瓜分之說，甚囂塵上，再加以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輸入，於是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已遍佈於有識青年及士紳腦海之中。乙未年（一八九五）恰是人京會試之年，於是在康有爲、梁啓超等人領導下，發生各省在京應試舉人上書請拒中日合約之事，史稱公車上書，可視爲知識份子在近代第一次大規模因國事而舉行的集體請願行動。由於這些應試舉人並不是均如梁啓超如此年輕者（時梁僅二十二歲），故僅可將之視爲知識份子或有識士紳的集體行動，殊難稱之爲青年運動。但自此有識知識份子及士紳日益自覺，由於他們認定中國的積弱在於貧與愚，因此他們除積極的要求清廷作種種政治改革外，亦分別在地方推行啓發民智運動。於是組織學會，創辦報紙雜誌，甚至成立閱報處，介紹新知，討論振興實業及救國之道，以及興辦各式新式學堂，蔚成風氣，成爲此一時代的重要表徵。唯在此遍及全國的廣大運動中，其領導人物則爲康有爲、梁啓超等，亦即日後被稱之爲維新黨人者。康、梁等之所以能成爲此一運動的領導人物，實在於此一運動是一士紳運動，康有爲（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廣東南海人）自甲午戰爭前在萬木草堂講學時起，即著新學僞經考，倡六經皆孔子所作，意在托古改制，並以進化觀念及三世之義，奠定其政治改革理論，而以講學作爲宣傳其政治主張結納同志之手段。由於康氏出身士紳家庭，其本人有舉人功名，甲午戰後並中進士，國學造詣極深，其思想理論均自儒家學說中找尋根據，於是年青有志於改革的科舉之士，多景然相從。其弟子中最著名者則爲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梁廣東新會人，世代書香門第，十七歲即中舉，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受業康有爲於萬木草堂，棄訓詁詞章之學，改習陸王



心學、史學及西學。梁氏長於文才，筆下常帶感情，追隨其師康有為，於甲午戰後初領導公車上書，後共創強學會，次年後與汪康年等創辦時務報，倡言民權。光緒廿三年（一八九七）發起不纏足會，創辦大同譯書局、女學堂，並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故無論組織學會，創辦報紙，興辦學堂，康、梁雖非創始人，但却頗得風氣之先，遂乃造成在政治上他們是維新黨人的領袖，在社會運動上他們也是衆望所歸，具有強大影響力人士。當時多數愛國青年，由於受國家面臨亡國滅種之禍的外在刺激，以及康、梁等士紳的號召，於是亦以參與維新運動爲榮。致而甲午戰後除少數如中山先生、陳少白等人外，大多數在國內的青年，在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認同康、梁。他們所從事的救國救民活動，每與維新的士紳運動合而爲一。例如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雖在少年時代受其外祖父朱有虔影響，及閱讀明清之際大儒顧炎武、王船山等著作及清初東華錄諸史書的關係，具有民族主義思想<sup>62</sup>，但此時却受康、梁維新黨人看法影響，希冀滿漢合作，共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於一八九七年發表「變法箴言」，一八九九年著「客帝論」，主張以改革來挽救革命。相信古時既可用異國之材爲客卿，今日自可承認滿清的統治爲「客帝」來共禦外侮<sup>63</sup>。又如吳稚暉（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舉人，甲午戰後曾參加康、梁等所領導的公車上書，自稱原是溫和的維新黨人，後轉變爲劇烈的維新黨人，始終忘不了要扶持光緒皇帝<sup>64</sup>，並曾於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在北京攔瞿鴻禨乘輿，上革新政事摺<sup>65</sup>。再如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光緒十八年中二甲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午戰後任翰林院編修，最初亦認同康、梁，認爲戊戌變法的失敗在於未能先培養人才，因而特重啓發民智運



動，故辭職返鄉倡辦教育，先後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上海澄衷學堂代理經理及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等職<sup>⑥⑥</sup>。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甲午戰後至庚子時期（一八九五—一九〇〇），我國國內大多數青年所表現的特徵，約有下列諸點：

1. 由於他們大多數是科舉或士紳家庭出身，因此在觀念上認同康、梁的維新運動。
2. 在民族主義的思想，他們雖強烈的感受中國將有亡國滅種之禍，但仍視滿漢為一體，希冀在維持現政權——滿清的統治之情況下，努力改革，以求中國的富強。
3. 在政治改革的觀念上，他們雖了解民主政治的重要，但是所寄望的，祇是政治參與權的擴大，政治整個體制仍應以立憲政治為主體。
4. 在社會運動上，他們認定中國的問題在民衆的過於貧窮與新知的缺乏，因此獻身於振興實業及啓發民智運動，使新學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各地興起，此對日後新知識份子的培育，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5. 由於他們本身出身士紳家庭，或具有科舉功名，因此他們多參與或贊助當時的士紳運動，於是形成青年運動是與士紳運動合而為一的，甚至是隱藏於士紳運動之中的。

除此之外，當時不少有識青年士紳若干觀念上的轉變，亦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那就是：由於民族主義或富國強兵的思想驅使；他們開始注重女權：一、不僅如林紓、嚴復、梁啓超等大力提倡婦女不纏足，更因母健而後兒肥的觀念，注重婦女的健康與教育，女學因而快速興起。二、絕



不重文輕武，甚至已有人積極注重尚武。譚嗣同的注重技擊，與大刀王五折命相交，固是耳熟能詳之事。其他如吳祿貞（一八八〇—一九一一），十七歲中舉，棄文從武，入湖北武備學堂，學業冠羣，公費留學日本學軍事，入日本士官學校<sup>67</sup>。陳其采（一八八〇—一九五四），金陵同文館出身，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為清廷選派日本留學，亦入日本士官學校<sup>68</sup>。三、日益重商，視注重對外貿易，興辦各式企業，為國家求富的根本，因而不少士紳如張謇、湯壽潛等，絕意仕宦，專力從事企業經營，商人的社會地位因而較甲午戰前增高，各種商業組織也日益增多，商權亦因此抬頭，商人的民族意識開始覺醒。這些情況均對庚子以後的青年運動，產生重大的影響。

使國內多數青年在認同上，由維新黨走向革命的關鍵歷史事件中，是戊戌變法的失敗與庚子拳亂的發生。就戊戌變法失敗言，使青年開始認識慈禧太后及若干親貴的顛覆保守，阻礙進步，唯仍接受維新黨人的看法，對光緒帝寄予無限同情及希望。但不幸康、梁流亡海外，康有為在言論上雖仍然秉持其忠君的信念，唯個人的行為却表露出士大夫的缺點，注重享受，不能起而行。梁啟超則以其流暢充滿感情的文筆攻擊清廷，無形中為反滿革命作有力的宣傳。庚子義和團之亂既闖下八國聯軍的滔天大禍，而滿州親貴之愚昧無知，遂得暴露無遺。再加以滿漢之間原有民族的隔閡，漢人素有被統治的民族意識，士紳階級雖因其本身的利益及儒家忠君的思想，在太平天國之亂時期，視滿漢為一體。但在有識的漢人心目中，國家民族的利益並不能完全與滿漢一體觀念相整合。在滿州政權可以榮耀國家民族時，他們固可以滿漢一體的觀念，接受滿清統治，但在滿州政權無法滿足國家民族需要時，摒棄滿清政權，遂漸成為每個漢人的心聲<sup>69</sup>。故漢民族的自



覺是與國家的衰弱，滿清政權的無能息息相關的，何況新學的興起自歐西傳人近代的民族主義觀念。故自甲午戰後漢民族的覺醒，是與新學興起，外力的入侵，清廷的顛覆無能相激相盪，不斷增高。甚至維新黨人本身亦有此種族思想的矛盾，如譚嗣同一面用佛家的觀念主張衝決網羅，打破國家民族禮教等一切束縛，一面具有強烈的族類思想，認為異族人主中原，蹂躪漢人是極其慘痛，號召有識之士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驅使<sup>⑦⑩</sup>。梁啟超則略民族問題而不談，力倡國家主義之說<sup>⑦⑪</sup>。但是既談國家問題，自然會牽涉到民族意識，在民族國家的觀念下，其說何以能服人。甚至其本人一再攻訐清廷的無能，已隱然含有為漢民族主義助盛的成份。故在如此情況下，康、梁維新黨人的政治理論，遂不能滿足年青的新知識份子需要，他們基於民族主義的思想，很自然的走向革命。這在章太炎、秦力山、吳稚暉、蔡元培等諸人思想轉變，表現得最為真切。

章太炎目睹庚子拳亂之役的禍國，乃悟欲救中國，必須推翻滿清政府，結束少數民族對中國的統治。他深悔過去寫作「客帝論」，因此復撰「客帝匡謬」一文，表明自己的錯誤。此後並著「正仇滿論」，認為滿清專制是以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其政府係一賣國政府，若不推翻，中國將為帝國主義侵略滅亡<sup>⑦⑫</sup>。故於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在東京與馮自由、秦力山等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從此堅決反滿，而且被視為是種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者。

秦力山（一八七七—一九〇六）自大通起事失敗後逃亡日本，因不滿意康、梁的不能起而行，思想轉趨革命，與沈雲翔、王寵惠、張繼等合力創辦國民報，在創刊號中即表明：創是報之目的在：「冀明我國民當任之責，振我國同胞愛國之心，喚起國民之精神，講求國民之義務。」而



所載諸文多議論新穎，措詞激昂，極力宣傳革命排滿<sup>73</sup>。此後他不僅與國父交往，參與籌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更微行人皖，謀再度舉事，並痛斥康、梁的混騙華僑，並著有革命箴言廿四章，部份發表於緬甸仰光新報，對緬甸華僑的參加革命，深具影響<sup>74</sup>。

吳稚暉由於在北洋大學堂及南洋公學任教的關係，其思想日益改變，及因主張南洋公學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管理，意見與負責校務之張元濟相佐，乃自費留學日本，後因籌備廣東大學堂赴穗，目睹清廷腐敗，維新無望，再度率領學生胡漢民、朱執信等赴日讀書，因清駐日公使蔡鈞拒絕保送諸生入成城學堂，一度投水自殺。此後遂奉行其投水自殺時所留遺書之言：「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矢志革命<sup>75</sup>。

蔡元培係因從事新式教育而思想日趨激烈，走向革命。一九〇一年（光緒廿七年）與友人黃宗仰創辦愛國女學，後並當選中國教育會長，協助南洋公學退學學生成立愛國學社。一九〇三年（光緒廿九年）因俄人拒撤所佔東三省駐軍，在滬創辦俄事警聞日報<sup>76</sup>，並著「釋仇滿」，視滿清為君主專制，不事生產，享有特權，政治腐敗之象徵。認為仇滿是政略，亦為種族之爭<sup>77</sup>。

庚子以後由於國勢的凌替，清廷的無能，以及漢民族主義思想的高漲，既使無數我國青年思想轉趨激烈，走向革命，而他們所從事宣傳革命的方法，仍是本之於甲午戰爭以後士紳運動常用的，即創辦報刊雜誌，將介紹新知與宣傳革命思想同時並行。根據張玉法的統計，其創辦於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十二月的譯書彙編，就現存各期的內容言，主要在介紹西方各國革命理論，並於民族國家之說，譯有專文。創刊於一九〇一年的國民報，則重點在鼓吹革命，視革命為天



賦人權，其意義在政體制度的革新，不在王朝的更迭。創刊於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的湖南遊學譯編，其十二冊中，鼓吹民族革命者有十二篇，約佔七·四%。介紹西方革命史者有九篇，約佔六·二%。創刊於一九〇三年二月的湖北學生界，約有一五%與民族革命有關。於同一時期創刊的浙江潮，約有二二·六%是鼓吹民族革命及激發民族思想者，另有三·五%鼓吹民權思想者。創刊於一九〇三年四月的江蘇，其內容鼓吹民族革命及激發民族思想者，佔三〇·四%，激發民權思想者有二·〇八%<sup>78</sup>。由於這些報刊雜誌的鼓吹，更使革命思想如火如荼的展開，逐漸形成一種思潮，於是：青年必談革命，青年不談革命將為同儕所不齒。這種時尚初見之於東京中國留學生界，繼而擴張及全國各省，特別是通都大邑。於是新式學生成為培育反滿革命份子的溫床，新式學堂設立的愈多，培育的新知識份子勢力愈大，而革命反滿份子增加愈為快速。甲午戰後啓發民智運動，因而變成為青年革命的準備或培育運動，這不僅是清廷未能事先認識，甚至維新黨人亦始料未及。

就外在因素言，庚子以後的青年革命運動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展開，頗受一九〇三年（光緒廿九年），俄國拒撤東三省駐軍及一九〇五年（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影響。庚子拳亂時期俄人借機出兵佔領東三省，清廷屢與交涉，俄人始終不肯撤兵。後因一九〇二年英日簽訂同盟條約，共以保障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為宗旨，視俄國為假想敵，俄人被迫與我簽訂條約，分三期撤兵。使僅撤一期不肯再撤，於是在上海及東京形成拒阻俄事運動。在上海經中國教育會策動，於四月廿七日舉行拒俄大會。在東京中國留學生在鈕永建、程家榘等領導下，於四月廿九日召開留學生



大會，到會者逾五百人，鈕永建、汪榮寶、程家榘諸人相繼講演，衆皆泣下，旋議決組織拒俄義勇隊，欲以武力協助政府收復東三省。後改爲學生軍，推藍天蔚爲隊長，下分甲乙丙三區隊，每區隊轄有四分隊，並釐訂學生軍課程表，將於會館集體操練。復因日本政府干預，再改爲軍國民教育會，議訂會約，以體操名義時時講習。並派代表鈕永建等返國，一面與北洋大臣袁世凱等相洽，請求出兵助餉械拒俄，一面與上海諸地青年聯絡，展開活動<sup>79</sup>。時上海教育會及愛國學社等團體響應留日學生行動，亦編組義勇隊，北京學生亦有行動，組織東亞義勇隊、關東保衛軍、抗俄鐵血會，東北學生則有仇俄會。其他各省如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均有類似行動<sup>80</sup>，故一時之間迅速發展成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一般而言，拒俄運動原僅是單純的青年學生的救國運動，與反滿革命原無直接關係。但清廷由於此一運動逐漸擴大爲全國學生愛國運動，再加以國際因素，乃採壓制態度。恰於此時上海愛國學社因發行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章太炎爲之作序，蘇報爲文鼓吹之，於是清廷下令查禁蘇報，逮捕章太炎、鄒容及蘇報主筆錢允生、陳吉甫等，形成震撼一時之蘇報案，教育會及愛國學社之活動均受清廷政府制止，而東京留日學生的活動亦被視爲：「名爲拒俄，實則革命<sup>81</sup>。」因而造成青年學生對清廷之不滿，使此後之運動與反滿革命結爲一體。無論是國內或國外之我國青年，對清廷更不滿意，參加革命行列者遂與時俱增。故一九〇三年的拒俄運動是使青年革命運動普及全國各地的一項關鍵事件。

拒俄運動的另一項重大影響，則是使知識青年更增強其信心，要學習軍事，走入軍中，使允文允武成爲此一時期青年的一種理想。注重軍事在甲午戰後原有此一傾向，當時如吳祿貞、陳其



采、趙聲等，已開其端倪，一九〇三年的拒俄運動更是如此，並且進而具有軍國主義思想的傾向。因此留日學生在日政府出面干預下，成立軍國民教育會。根據黃福慶在其清末留日學生專著中的統計，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一年間，中國留日學生業已逾萬人，其中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間，接受預備教育後志願士官人聯隊者，計七二七人，入士官學校者六九〇人，共達一四一七人，佔留日學生總數至少在一四%左右。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者亦有六七三人，約佔留日學生數六·七%。此外尚有人成城振武非正式武備學校學生，其人數似應更超過上述之數。亦有人憲兵、經理、測量及海軍諸校者。故如將留日學生學習軍事之學生作佔全部留日學生總數三〇%估計，應是合理可信的<sup>⑧②</sup>。由此可以看出，學習現代軍事，成爲允文允武的現代青年，可以說是很多留日學生的一種共識。而他們之中最典型的人物可以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爲代表。黃氏於甲午戰後潛心新學，肄業兩湖書院，喜好地理及體操兩科，一九〇二年由湖北官費選派日本留學，入宏文書院速成師範科肄業，因蓄志反清革命，留心軍事技能的研習。課餘請日本退伍軍官講授策略，當時亦往士官聯隊參觀各種操練，每晨早起赴神樂坂武術會參加射擊比賽，槍法奇準。並與湖南同學創辦遊學譯叢，譯述日文書刊，介紹西洋社會政治學說及革命歷史，宣傳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一九〇三年於宏文書院領導學生組織土曜會，以軍國民革命相號召，鼓勵同學挺身殺敵，破壞現狀。拒俄運動起，參加拒俄義勇隊。及義勇隊改名軍國民教育會後，自認綜合運動員<sup>⑧③</sup>。

學習軍事走入軍中的留日青年學生共識，在另一方面亦是受有當時中日政府規定的鼓勵。日本



政府規定武備學校畢業生在日軍中任職，應授予相當我國守備之職位。因此日方認為我國畢業生返國於軍中工作，僅授予千總把總之職，似嫌過低，曾要求加以改善，清政府雖未同意，但亦有所調整，至少升遷遠較他人快速<sup>⑧4</sup>。庚子以後清廷積極編練新軍，大量任用留日學軍事學生任中、下級軍官。由此我們才可了解，為何新軍成立未久，即為革命黨人滲透，成為覆滿的主要力量。

一九〇五年的中美工約風潮在留日學生界影響力雖遠不及拒阻俄事運動，但在國內却是一廣大的抵制外貨運動，其意義在於使工人階級積極投入革命。當時因中美議訂新約，美方受國內排華勢力影響，拒允華工赴美，於是先在上海繼而全國各地——特別是閩、粵兩省，以學生及紳商為中堅，形成廣大抵制美貨運動<sup>⑧5</sup>。而各通都大邑工人在上海總商會所擬定五大抵制原則下：(一)包括機器在內，不用美貨；(二)貨運不用美輪；(三)不入美人學堂讀書；(四)不任美商行買辦通譯等職；(五)勸令美人所僱華僑車伕等罷工，羣起響應<sup>⑧6</sup>。可視為工人階級，特別是年輕的工人，大規模加入青年運動之始。此一運動之所以轉變為革命運動，其原因亦在於清政府採取高壓禁止之態度，致使參與運動者憤慨決心反清。例如寧波人陳壽衡曾憤慨陳詞：「我當路者即壓迫刑驅，亦無奈我同胞何，大丈夫處世求自盡是耳，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刀鋸鼎鑊在所不驚。」淮安士商亦表示：「即使政府媚外，將約私行畫押，而我全國同胞萬不承認，訂約自訂約，禁貨自禁貨，俾海外各國知中國有無用之政府，而有有用之國民<sup>⑧7</sup>。」

庚子以後我國的青年，特別是青年學生，因受高昂的民族主義思想驅使，羣起要救國反滿，



但除興中會外，他們並未能成立有效而團結的組織，甚至在最爲態度激昂的留日學生中，亦是如此。由於我國的社會結合關係當時主要在於血緣與地緣，血緣的結合關係祇能見之於家鄉，在外求學的青年間之結合，自無利用此種組織的可能，於是自然的就地緣結合廣泛加以利用。此由他們所辦的報紙雜誌每以地名如江蘇、浙江潮來命名，可以證明。但在這種地緣結合的關係上，由於實際情形的需要，自然更進一步的有志同道合超越地緣的社團出現。就東京留日學生而言，最早出現的此類團體，是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勵志會。當時留日學生不過百數十人，由戢冀翬、金邦平、章宗祥、吳振麟、吳祿貞、黎科、傅慈祥諸人發起組織該會，目的在聯絡感情，策勵志命<sup>88</sup>。最初並無反清與革命的意圖，內中急進份子、保守份子均有。迨唐才常於長江中游組織自立軍起事，急進份子戢冀翬、吳祿貞、黎科、傅慈祥、蒙承煜、鄭葆成等乃返國參與其事，黎、傅、蔡、鄭並因而殉難。該會乃逐漸走向激進。是年十二月並創辦譯書彙編，雖以翻譯明治維新著作，介紹新知，啓發民智爲主，但已逐漸倡言民權、宣傳革命，是留日學生最早自辦的雜誌<sup>89</sup>。

勵志會由於組成份子中有急進、保守之分。保守分子如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等因與官方接近，激進份子漸鄙其爲人，詆爲是官場的走狗。故於一九〇二年下半年由葉瀾、張繼、秦毓鎰、汪榮寶等發起另組新社團，命名爲青年會（或稱東京青年會，以民族主義爲宗旨，破壞主義爲目的，可視爲是留日學生較早成立的革命團體<sup>90</sup>。勵志會則由於分裂及腐化，終爲青年會所取代。青年會活動力極強，一九〇三年的拒阻俄事運動，青年會是主要的推動者，後因拒俄目的未達，被迫解散，會員大多成爲軍國民教育會重要份子。故軍國民教育會亦可視爲是由青年演變而



來。

在勵志會成立不久，馮自由、馮斯樂等於一九〇〇年夏在橫濱成立開智會，並出版會報「開智錄」，以發揮自由平等真理，創作歌謠談諧為主要内容。該會因當時興中會與康有為的保皇會合作時期，故其會報是以清議報為發行及印刷機構，後以該會宗旨究與保皇會不同，終而分手，其會報因而停刊<sup>91</sup>。

一九〇〇年冬秦力山因大通起事失敗，返回東京，與戢翼翬、沈雲翔及譯書彙編社同仁楊廷棟、王寵惠、張繼等，於一九〇一年五月組織國民會，並以所辦的國民報為機關報。此時在留日學生界中，康、梁保皇會所辦的清議報有相當影響力，但國民報創刊後，則則與清議報相對立，標榜革命仇滿，可視為是留日學生界大力鼓吹革命的最早自辦報刊<sup>92</sup>。

一九〇二年留日學生所成立的非地緣性社團，則有留學生會館及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留日學生會館創設於一九〇二年初，會址在神田駿河台，原是聯誼俱樂部性質，但革命反滿份子常是會中最活躍之領導人物，如會館開幕時，吳祿貞曾登台演說，喻為如同美國費城的獨立廳<sup>93</sup>。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如衆所周知是章太炎所倡辦的。章氏當時鼓吹種族革命，認為如欲種族革命，必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不可，故欲於明崇禎帝殉國日舉辦此項大規模紀念會，並得中山先生及梁啟超贊助。後梁因保皇關係，要求取消贊助名義，深為留日學生所不滿，維新黨人在留日學生界終於失勢，與此一事件有相當的關係<sup>94</sup>。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在當時留日學生界影響甚大。一時參加者達數百人，雖因日警方干預，未能舉行而流會，但自此倡言革命與反滿者在留日中國學生中已佔絕對優勢，而各項革命政治團體風起雲湧，紛紛成立，蔚成風氣。

一九〇三年是中國近代青年革命運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是年初東京留日學生劉成願，因中山先生鼓勵把握機會公開宣傳革命，故陰曆初一團拜時在會中演說排滿，揭開青年學生公然反滿的序幕<sup>95</sup>，四月底以後，並因拒俄事件，形成廣大壯闊的學生運動。六月初在國內上海發生蘇報案，章太炎、鄒容被捕，而且日後鄒容死於獄中。七月復有曾參加唐才常自立軍之沈蓋被捕，於獄中鞭捶而死。於是青年學生羣情激昂，非僅使拒俄運動與蘇報案合流，而且整個運動趨向於反滿革命。時鄒容之革命軍變成爲青年爭讀之書籍，而該書言詞激烈，敘事析理處處以民族主義思想立論，極具煽動力，對青年思想產生無比導引作用。故在這種影響下，國內乃出現興中會以外的另兩大革命團體——華興會與光復會。

華興會是以湘人爲主的革命團體。湖南由於戊戌變法前維新黨人曾在此推行新政的影響，青年學生思想日趨激烈。後胡元談在長沙成立明德學堂，黃興、吳祿貞、張繼、蘇玄瑛等皆曾於該校任教員，業已結合一批志同道合主張革命青年。一九〇三年六月初，黃興以東京國民教育會會員的關係，被推派回鄉實行革命。遂以留日歸國學生爲主體，成立華興會，推黃興爲會長，秦毓鎰爲副會長。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爲號召，主「奮起圖存，驅虜出關」。其領導人物多爲知識青年，但亦主張聯絡會黨及社會下層份子，並爲此成立同仇會，作爲運動機關<sup>96</sup>。故無論就



宗旨及其性質言，頗與中山先生所創立的興中會相近，這是何以日後能與國父及興中會合作，共組同盟會的一大原因。華興會組成份子雖以湖南人居多數，但亦不僅限於湖南人。根據張玉法的統計，其可知籍貫之會員共八十九人，其中湘人有五十三，佔五九·五五%，其他鄂人七，佔七·八七%，浙人三，佔三·三七%，閩、皖各二，各佔二·二五%，粵、川、贛、蘇、黔及直隸各一，共佔六·七四%，不詳者十六，佔一七·九八%<sup>97</sup>。可說是有突破地緣性結合的趨向。該會為推行革命起事起見，以劉揆一聯絡會黨及軍隊，周震麟聯絡各校學生及教師，陳天華、姚宏業赴江西運動清軍防營，萬聲揚、楊守仁負責與上海及東京之聯絡。黃興並成立華興公司於長沙，以興辦礦務為名，作半公開活動。另設東文講習所為運動總機關。其支機關則有作民譯社、黃漢會（專為運動清軍而設）及科學補習所（一九〇四年設於武昌）。

光復會在淵源上可視為起於一九〇二年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蓋自該會因日警干預未能在東京舉行後，章太炎返國，在上海與蔡元培、鄒容、吳稚暉等創立愛國學社，宣傳革命。而蘇報在章士釗等影響下，時以議論相附和。時章太炎、鄒容、張繼均以光復漢族為職志，結為昆弟之交。迨蘇報發生，鄒、章入獄，愛國學社瓦解，留日浙籍學生陶成章，原為一九〇〇年在杭州成立之浙會會員，因在日為清駐日公使偵知是浙省革命黨人，削其官費學籍。成章乃返浙聯絡會黨，並在上海與龔寶銓組織復古會，作為秘密機關。此外，在拒俄運動中，蔡元培等組織對俄同志會。而龔寶銓原為東京浙會會員，與王嘉榘、許壽棠等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任暗殺團團員。其來上海在成立暗殺團支部，俾與聯絡會黨及兩湖華興會工作分頭進行。故龔一面助陶成



章成立復古會，一面擴大組織，與蔡元培等相聯絡，共組光復會，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舉蔡元培為會長<sup>98</sup>。會員大多為江浙青年，其中尤以浙江份子最活躍。其革命方法亦視聯絡會黨為手段之一。故在革命宗旨及方法上，與興中會有相同之處。光復會與興中會及華興會在特色上有極大不同，即因蔡元培等創辦愛國女學的關係，會中有不少甚為活躍之女青年，秋瑾可視為代表人物。

國內在此時期既成立有華興會及光復會，由於當時國內外愛國青年聲息相通，聯絡密切，東京中國學生界自亦有屬於兩會會員者，華興會並在東京設有聯絡人，購買槍械，準備在湘起事。一九〇四年（光緒卅年）黃興等在湘謀起事失敗，與其他華興會員紛紛走避日本，目睹東京中國留日學生缺乏統一，乃謀聯絡各省革命青年，共組革命同志會，從事民族革命。在此之先，浙籍愛國青年因留日學生界地域觀念濃厚，難於合作，已有人在一九〇三年四月出版之浙江潮第三期投文，主張消除地域界限，聯合建立統一團體。浙江潮因而發表非省界社論，力主被除省界，並同鄉會而去之，成立中國本部統一會<sup>99</sup>。而湖北留日學生所刊行的湖北學生界並以大湖南北同盟會名義，登刊發行書刊廣告<sup>100</sup>。上海的蘇報則先刊載中國教學同盟總章，欲成立教學同盟總會及分會。後於五月間復載留日歸國學生發起中國學生同盟會，要求海內外全體學生入會。鄒容並以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為題，主效法俄學生風潮風靡全國，於各省、府、縣分別設立總部<sup>101</sup>。是年（一九〇三年）六月留日湖北學生創辦漢聲雜誌，贊同破除省界。江蘇留日學生所辦之江蘇第一期，亦刊文主各省以其愛本省之心愛中國<sup>102</sup>。



由以上這些事實可以看出自一九〇三年學生愛國運動蓬勃興起後，僅有以省籍為結合基礎的小社團，缺乏全國統一性的團體來領導推動，幾乎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因此組織全國性團體的呼聲此仆彼起，而程家榿、劉成顛為此主張聯合革命之說，陳天華在所撰猛回頭中建議，不如大家合作一個大黨<sup>103</sup>。迨華興會在湖南起事未能成功後，黃興等潛逃來日，既有相同看法，希望不分省內省外，分途運動，俾能造成燎原之勢，其時機已漸成熟。對宋教仁、陳天華、程家榿、田桐等不同省籍留日學生共辦「二十世紀之支那」，而黃興、宋教仁等湘籍留日學生亦與直隸學生姜登選、江蘇章梓、伍崇實、河南曾昭文、雲南羅佩金、唐繼堯等共一百餘人，組織革命同志會。及一九〇五年春國父在歐洲與我國留歐學生結盟，組織全國性的革命共同組織時機終於完全成熟，故及是年七月國父由歐返抵東京，僅經一個月的折衝籌議，中國同盟會却能迅速成立。

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春，中國留學在外的革命知識青年，雖均有必須成立全國性革命團體的共識，但一時間仍不能有此一組織的出現，主要仍在於缺少大家共同擁戴的偉大領袖。國父雖於一九〇二年以後已漸為東京中國留學生界所尊崇，唯由於他個人的赴美轉歐，使若干較晚活躍於日本留學生界的革命知識青年如黃興等未能有所結識。幸因程家榿與日人宮崎寅藏的極力為中山先生遊說拉攏，而歐洲中國留學生對孫先生又十分傾倒佩服，於是使黃興等亦漸能接受孫先生為大家共尊的革命領袖。程家榿籍隸安徽，與黃興、宋教仁相交甚深。程是留日學生中較早與中山先生有往來者，中山先生對程甚為器重，程則對中山先生崇拜備至。故聞知孫先生將於一九〇五年七月返抵日本，即與宮崎寅藏開始積極事先聯絡留日中國學生，安排與孫先生會晤<sup>104</sup>。



宮崎寅藏是孫生先的日本至交，最爲支持孫先生的革命。除積極奔走各方，爲孫先生宣傳革命外，並於一九〇一年著三十三年之夢，對孫先生頌揚稱讚不已。此書於一九〇二年刊行，暢銷日本，次年蘇報主筆章士釗以黃中黃的筆名節譯成中文，刊行時改名爲大革命家孫逸仙，並在序言中稱，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秦力山當時亦曾以秦鞏黃的筆名，爲該書作序，極力推崇孫先生的百折不回精神<sup>105</sup>。此一中文節譯本對孫先生在青年心目中領袖地位的奠定，有莫大的影響。宮崎與黃興相識亦久，黃對宮崎甚爲敬佩，故宮崎的推崇孫先生亦頗能影響黃興。

程家榿與宮崎寅藏原與黃興、宋教仁相約，俟孫先生抵日後，當爲介紹。而孫先生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抵日即訪宮崎，聞知黃興是此二、三年間留日學生中的非常人物，立即主動由宮崎陪同，前赴黃興寓所拜訪。時孫先生無論就年齡、地位、聲名言，均遠高於黃興，如此折節相交，遂使黃興在心理上已生好感，何況國父有深厚的革命經驗與完備之締造新中國的理論，故在黃興大力贊助下，組織中國同盟會及以孫先生爲領袖一事均得水到渠成。

孫先生在七月十九日與黃興的會談長達兩小時，主要爲組織革命大同盟一事。此後於七月廿八日後在二十世紀支那社與宋教仁相談，仍是討論彼此互相聯絡的辦法。故次日華興會在黃興寓所開會，討論與孫先生的合作辦法，時有劉揆一反對與中山先生合作，而陳天華主張以湖南團體與孫聯合，一時雖未完全決定，但與中山先生合作，似已成爲定論<sup>106</sup>。故次日（三十日）興中會、華興會及光復會（時重要人物不在日本）會員與其他主張革命學生七十餘人，齊集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內田良平寓所，舉行同盟會籌備會，議定會之名稱——中國同盟會



，宗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及盟書誓詞。並由孫先生領導舉行加盟儀式，且推定黃興、宋教仁、馬君武、汪兆銘、蔣尊簋等八人爲委員，起草同盟會章程<sup>⑩</sup>。

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宋教仁、黃興、程家檉、張繼等人安排下，中國留學生開歡迎孫先生大會，到會者逾千人。中山先生演說，稱今日民族主義一日千里，已成爲國人之共同要求，以是他亦爲諸君所歡迎。進而孫先生指出共和之必要，與其爲立憲而流血，何不直接了當的求之共和。孫先生演講完畢，程家檉繼起致詞，盼人人志孫先生之志，爲孫先生所爲，如此中國方可得救<sup>⑪</sup>。

此次歡迎會在東京中國留學生界真是盛況空前，陳天華紀錄其盛況稱，東京自有留學生以來，開會人數未有如今日之多而且整齊者。最初日警謹允三百人參加，後擴大允許至九百人。會場僅可容納一千人，繼至者有數百人無法進入，不少男女學生因無法進入聽講，憤憤不已，在門外喧吵，旋又開門納人不少。孫先生的聲望在留日青年學生心目中，至此達於極峯。

中國同盟會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百餘人，除會章外，並舉中山先生爲總理，孫先生亦當場指定黃興爲執行部庶務，在總理缺席時由黃興主持會務。另以華興會報刊二十世紀之支那，改名民報，作爲同盟會機關報。於是有意於革命的知識青年，終於在中山先生領導下，團結一致，建立其全國性的統一組織。這是我國近代史上青年的第一次大團結，而這一次的大團結已決定清帝國必將覆亡的命運，並爲締造民主共和國而催生。

茲根據張玉法在其著作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中分析，同盟會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間，共



有會員九四六人，就年齡言，已知者計三〇一人，其中十四至十九歲共廿二人，佔三〇一人中七·三一%；廿至廿九歲二二三人，佔七四·〇九%；三十至卅九歲五三人，佔一七·六一%；四十至四十四歲三人，佔〇·九九%。可知在已知人數中絕大多數為青年。此外史扶鄰在其著作中稱，至一九〇六年時，同盟會有會員一千人，其中在東京入會者約九百人（張玉法書中作八六三人），而絕大多數為學生，亦即是知識青年。諸此均可切實證明同盟會在成立之初是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就籍貫分佈言，張玉法書中作已知者九五五人，遍佈十七省。其中廣東籍最多一六一人，佔九五五人中一六·八六%，湖南次之，一五八人，佔一六·五四%，四川第三，一二七人，佔一三·三〇%，湖北一二四人，佔一二·九八%，安徽五九人，佔六·一八%，山西五五人，佔五·七六%，山東五三人，佔五·五五%，廣西四二人，佔四·五〇%江蘇三七人，佔三·八七%，直隸三五人，佔三·六六%，雲南二七人，佔二·八三%，福建二四人，佔二·五一%；浙江二二人，佔二·三〇%，河南、貴州各九人，各佔〇·九四%，江西八人，佔〇·八四%，陝西四人，佔〇·四二%。可知在地區上是極具有普遍性<sup>(109)</sup>。

## 四、中國青年與辛亥革命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由於組織的統一，革命形勢大為好轉，革命的力量亦因此快速增強。革命青年更熱血沸騰為覆滿及建立民主新中國而奉獻犧牲。首先在一九〇五年九月光復會會員吳樾



於北京以炸彈暗殺清廷派往各國考察憲政之滿漢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人，不幸僅使載澤、紹英受傷，而自身肢體破碎，竟以身殉。吳樾一八七八年生，安徽桐城人，初欲入上海廣方言館讀書，後以銜恨八國聯軍蹂躪我國，乃不入學，轉而熱心從事啓發民智工作，意存喚起民心，自辦兩江小學，直隸白話報。一九〇二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在校交友審慎，與陳天華、趙聲、張榕等相善，許爲生死交。曾參加楊篤生北方暗殺團，主中央革命。手撰暗殺時代稱：「善用兵者必分軍爲二隊，一曰戰兵，一曰援兵。」「暗殺者吾黨之戰兵也，復仇者吾黨之援兵也。」「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殺，後以復仇，此暗殺與復仇亦互相爲力互相爲功也<sup>(110)</sup>。」一九〇五年春鐵良等赴保定高等學堂視察，吳已典當衣物，購買手槍，欲謀刺殺。後因鐵良未至而罷，旋後謀與張榕混入宮禁，以圖大舉，因而返桐城，料理身後，與妻子訣別。臨行其妻曾有送別詩三章，激越悽楚。過蕪湖，晤趙聲，聲予炸彈兩枚，並作烈士詩四章，悲壯蒼涼。其所以必欲暗殺考察憲政大臣者，志在揭破清廷僞立憲及保皇黨人真相，俾切實喚醒國人。在行動前十日曾長函其留學日本友人，說明其行動宗旨：一、唯一原理民族建國主義；二、扶滿不足以救亡；三、滿州王室無立憲資格；四、滿政府對漢人苛待如奴僕；五、立憲不利於漢人；六、主張立憲者對國民行爲不忠。認爲立憲主義徒墮落漢人民族人格，污漢民族思想。痛恨漢人主張立憲者，決心貢獻其生命於漢族四萬萬同胞，雖死猶生<sup>(111)</sup>。由此可知，吳樾是真正民族主義與共和主義者。其本人當時雖非同盟會會員，但對同盟會及青年革命黨人，却發生無比的鼓舞作用。民報曾爲文稱：自秦漢降，吾族不武，荊軻、聶政之事幾於絕跡，而吳君獨能爲民族流血以死。嗚呼，



其壯烈不可及也<sup>⑪②</sup>。」吳樾殉難時年廿七歲。

繼吳樾而自殺犧牲者則爲陳天華。陳天華（一八七五—一九〇五）湖南新化人。一九〇三年春至日本留學，逢拒俄運動起，痛恨清廷之無能，曾血書數十幅郵寄內地各學校號召共起抗俄，本人並加入拒俄義勇隊。及華興會成立，爲華興會重要份子，曾與黃興等謀在湖南起事。一九〇四年以彈詞方式撰猛回頭，描述異族欺凌之慘劇，意在喚醒國人，字字血淚，其書與鄒容革命軍並稱於世。是年秋因黃興、劉揆一及哥老會馬福益聯絡鄂、皖、浙各省會黨起事有望，星夜趕返長沙，策畫佈署，擬於十月慈禧太后壽辰時，於萬壽宮埋炸彈，同時五路舉事。後不幸消息外洩，爲清官府所覺，乃潛赴上海，與張繼、仇亮、章士釗等在餘慶里開會，決定分途運動大江南北學界、軍界起義鄂、寧一帶，反清抗俄。適萬福華槍擊桂撫王之春未中，機關被獲，不得已重返日本，謀以全體留學生名義僞向清廷請願立憲，俾潛佈革命黨人於政界。旋因黃興、宋教仁及各同鄉會反對，未成事實。及國父創組中國同盟會。天華爲最主要支持者，亦爲同盟會重要發起人之一，並任會章起草委員。彼之自殺係因日政府以清廷之請，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生界不能團結一致，共同採取激烈手段以抗爭。時天華與秋瑾、田桐、宋教仁等主毅然歸國，另立學校，並實力從事革命活動。而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等反對，主忍辱負重，留日繼續求學。兩派爭論不已。日報朝日新聞復批評中國留學生放縱卑劣。天華因此憤而作絕命書，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八日，投海自殺<sup>⑪③</sup>。時年僅三十歲。

陳天華的自殺，對華興會、光復會革命青年產生極強烈刺激作用，故復有劉道一、徐錫麟、



秋瑾在湘、皖、浙的起事失敗，壯烈犧牲。另一方面對日後同盟會的內爭亦投下若干陰影。蓋當時主張忍辱負重繼續留日讀書者，多為粵籍學生，日後且為國父的親信。

劉道一（一八八四—一九〇六）湖南衡山人，曾於湘潭美教會所辦學校讀書三年，擅長英語。受兄劉揆一影響，傾心革命，並留學日本。華興會成立後與揆一返國，任醴陵中學監督，負責聯絡會黨與軍隊。因在醴陵曾奉黃興之命，聯絡會黨首領馬福益。議定十月十日起事，不幸事洩，馬去廣西，道一與黃興、揆一等則避禍上海。以父受連累入獄，曾返里營救。及萬福華謀刺桂撫王之春事起，黃興、張繼等於上海被捕，道一兄弟奔走保釋之。一九〇五年後與馬福益規畫洪江起事，不幸槍械為沅陵厘卡所獲，再度逃亡，輾轉赴日。並因馬福益被捕，深自內疚，更積極與革命志士聯絡，謀再舉，並參加同盟會。一九〇六年返湘運動軍隊，及與他省志士聯絡，擬在各省分別舉事。不幸因會黨姜守旦等先期於萍鄉、瀏陽發難，道一在長州被捕，以其自署鋤非子而論死罪，死時年僅廿二歲<sup>(114)</sup>。

徐錫麟（一八七三—一九〇七）浙江紹興人，秉性剛強，長於數字，一九〇一年（光緒廿七年）在紹興學堂任數學教師，為知府熊起蟠賞職，擢為該校副監督。一九〇三年應鄉試，中副榜，並赴日本大阪參觀博覽會，目睹東京中國留學生界激昂慷慨發動拒俄運動，深受感動，立志革命。與陶成章、龔寶銓、鈕永建諸人相訂交。返國後於次年在上海入光復會。在紹興成立分會，聯絡各地會黨，並倡體育會，以鍛鍊國民體格為己任，交結奇才力士。後因陶成章、蔡元培之介紹，得識秋瑾，兩人志同道合，共同秘密策畫革命。一九〇五年集資創辦大通師範，內設體育專



修科，注重兵式體操。欲以此培育團練，甚至軍事幹部，以爲行征兵制之準備。旋再赴日本，擬攻讀陸軍，因患近視不准入振武學堂返國，至安慶任皖武備學堂副辦，後兼巡警處會辦及巡警學堂堂校長。時秋瑾因日本頒訂取締留學生規則憤而返國，遂共同計畫分在皖、浙兩省起事。錫麟乃假巡警學堂畢業典禮起事，以人數甚少，力量不足而失敗被捕，剖腹挖心斬首死<sup>(115)</sup>，年卅四歲。

秋瑾（一八七五—一九〇七）亦浙江紹興人，唯因祖父仕宦福建，故生長於閩。後隨父於其湖南任所。幼敏悟，工詩文，能騎善飲，豪邁雄健有俠士之風，故號競雄及鑑湖女俠。其夫王廷鈞湖南富家子，夫婦以志趣不合而仳離。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起，瑾留心時事，有匡世之志，常閱讀新學書刊，議論時事。一九〇〇年目睹拳亂及八國聯軍，憤清廷之昏聩無能，乃於離婚後變賣粧奩首飾，於一九〇四年東度日本求學，結識革命志士，主革命必先團結力量，堅固組織。與劉道一等十人組織十人會，以反抗清廷，恢復中原爲宗旨。後又加入馮自由所組織之三合會橫濱分會，受封爲白紙扇（即軍師）。秋瑾因身爲中國婦女，故主張民族革命與女權運動同時進行。爲此曾創辦白話報，發表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一文，鼓吹婦女自立自愛，爭取男女平等。獻身革命。適日本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陳天華憤而投海死，氏悲憤激動，力倡不退學返國即不愛國之說。返國於上海與田桐、胡瑛等籌辦中國公學，以安置歸國之留學生，並作黨人活動機關。亦創辦中國女報，竭力提倡女權。因徐錫麟介紹加入光復會，積極籌備起事。曾與陳伯平配製炸彈，不慎爆炸爲巡警查究，以未得証據而幸免。一九〇六年冬劉道一擬在湘起事，各省志士謀加響應，瑾自願負責浙省軍事。次年返紹興，主持大通學堂，與徐錫麟議定皖、浙兩省同時



舉事。適錫麟在安慶發難失敗，瑾仍籌款積極準備在浙起事。不幸爲人事先告密被捕，受酷刑，拒供同黨，惟書「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字，從容就義<sup>①⑥</sup>年卅二。爲我國近代女青年樹立捨身救國的楷模。

當憤而返國之留學生拋頭顱灑熱血，全力推動革命起事之際，留居日本之青年革命志士亦並未意志消沉。他們以民報爲據點，與立憲派展開激烈的思想論戰。對國父於一九〇六年公開演說五權憲法，主參照西方民主制度及保持中國優良傳統，採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並以國民革命一詞來冠稱其所領導之革命運動。將革命程序分爲三期：軍法之治、約法之治與憲法之治。亦制訂軍政府宣言。同盟會會員汪精衛、胡漢民、章太炎等根據國父的理論，分別與梁啓超等展開論戰，使國民革命的理論益爲周延完整。

就革命行動言，國父當時主張在中國南方沿海及邊區進行，蓋對外交通方便易於獲取外援也。爲此他與黃興分別赴越南及南洋各地佈署，準備起事。故東京留學生爲日本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發生爭執時，兩人均不在日本。一九〇七年國父因所策畫之潮州黃岡、及惠州七女湖起事先後失敗，乃一意籌畫在桂、粵、滇邊與越南接壤處舉事，故有防城、欽廉、鎮南關、河口諸役，黃興、胡漢民、胡毅生、汪精衛均曾參預其事。黃興及國父並曾親自參戰。惜仍未獲得成功。於是光復會章太炎、陶成章等大加攻擊，使同盟會內部分裂，革命運動一度受其影響陷於低潮。

同盟會內部爭執的擴大，最早起因於黃興、宋教仁等對制定國旗的不滿，宋教仁爲此憤而辭去執行部內庶務部幹事一職，終因黃興的能識大體，有所讓步，方使問題解決<sup>①⑦</sup>。不久復發生日



政府應清延的要求，迫令國父離日，並餽贈贖儀五千元，國父子以接受。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田桐等深不以為然，憤而要求免去國父同盟會總理一職，以黃興繼任，幸黃興、劉揆一力排衆議，未能成爲事實<sup>①⑧</sup>。章、張、劉之所以反對國父，除上述事件外，亦因此時彼等在思想上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對無政府主義思想極其狂熱。劉師培曾辦天義報，以破壞固有社會，顛覆現有政府，抵抗強權，實行完全平等爲宗旨。彼與張繼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主覆滿後行無政府主義。章太炎、陶成章等均爲會員。一時參加者達五十人。該會曾譯述共產主義宣言。甚至劉師培認爲馬克斯之革命手段不夠激烈，極力推崇巴枯寧。時劉僅廿三歲。章太炎在社會主義講習會中亦先後發表國家論、人之根性惡等講演。一時間社會主義思想甚囂塵上。是年底劉師培返南京，突向清兩江總督自首，並獻破壞革命之策，充份反映出其性格之不夠穩定<sup>①⑨</sup>。

一九〇八年陶成章因向國父索巨款不成，轉而與章太炎相結，於南洋掀起倒孫風波，誣國父私用革命經費。幸因黃興、劉揆一、譚人鳳、吳稚暉的主持正義，未能得逞<sup>①⑩</sup>。但經如此內爭，再加上兩廣滇邊屢次起事失敗，青年革命運動的氣勢一度深受影響，興中會遭遇前所未有的打擊。所幸此時內外情勢發生轉變，使青年革命運動得以重振而能獲得成功。

就外在情勢言，庚子以後清廷爲因應美國所提之中國門戶開放政策，抵抗列強的侵略，決心開放路礦權，允各省紳商自辦路礦及其他工商企業。中國紳商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開始覺醒，於是經濟民族主義觀念大興，紛紛組公司，擬自列強手中收回路礦權自辦。並因此種經濟的自覺，帶動其擴大政治參與權的要求，致使立憲運動成爲日俄戰後紳商政治運動的主流，但因清廷缺



乏開放政權的誠意，立憲份子亦漸思想激烈，傾向革命。恰於此時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病故，清政府權力中樞枯萎，形成孤兒寡婦的局面，而一般滿州親貴昏聩不明政治趨向，反而更加保守，厲行重滿輕漢政策，故雖於一九〇九年允各省成立諮議局，但並不能滿足紳商開放政權要求，於是諮議局反而成爲要求組織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的主要機構，一再發動請願。其第三次請願被拒後，各省代表極其憤怒，即夕秘議各返本省向諮議局報告政治絕望，秘謀革命，即以各諮議局中同志作爲革命幹部，互相響應援助，俾起義獨立<sup>(121)</sup>。

此外青年革命黨人士在鄉梓利益上，與立憲份子看法相同，均主張以現代化的方法教育鄉人，建設鄉里。甚至共同組織各種服務鄉梓的社團，如福建的公益社、普明社、益聞社、救火會等。尤有甚者，亦合辦報紙，如閩省的建言報，即革命黨人林斯琛等與立憲派林長民、列崇祐所合辦。當時不少立憲份子由於亦醉心西學，或曾就讀新學，留學他國，在一般思想觀念上，與革命青年看法相近。更有不少是同窗好友。如浙江諮議局議長陳黻宸與章太炎早歲即爲至交好友，陳曾助章出亡台灣。而陳之學生如馬叙倫、湯爾和等均爲革命黨人。浙江諮議局議員如褚輔成、陳時夏等本身即是革命黨，由於陳黻宸的推薦獎掖，陳時夏得當選副議長，褚輔成則担任常駐議員。在另一方面諮議局既具有參議會的性質，成立後因立場不同，自然與地方官府形成對立，諸此在在助長革命的發展情勢，使青年革命運動得到強有力的呼應<sup>(122)</sup>。而且這種趨勢時間愈晚愈爲強烈，適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清廷採行鐵路國有政策，以強制的的方法收各民營築路權爲國有，違反紳商利益，遂使紳商全面轉而幫助革命，青年革命運動與紳商政治運動乃得合而爲一，革命時



機至此成熟。

就內在情勢言，一九〇八年河口之役失敗後，其他各地革命青年的起事仍然不斷，而且甚爲慷慨壯烈，遂使革命的士氣得以重振。其間著名者，則有熊成基安慶起事、廣州軍中之役、汪精衛等謀刺攝政王及三二九廣州之役。

熊成基的安慶起事發生於一九〇八年。安慶自徐錫麟任巡警處會辦後，新軍及巡警中革命黨人已建有相當勢力。一九〇七年徐錫麟起事倉卒，各同志多未及響應，故仍保有其力量。是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調安慶任馬營隊官。倪於南京時即加入同盟會，來皖後成爲團結軍中青年革命同志之領袖，時年僅廿三歲。曾謀於除夕起事，事洩倪走上海轉粵，依附好友趙聲（時趙聲任廣東陸軍小學堂監督），安慶軍中青年志士遂舉熊成基主持其事。熊氏（一八八六一一九〇九）江蘇江都人，南京炮兵速成學堂出身，曾任江南炮兵排長，來皖後旋由馬營調炮營，仍任隊官。與諸同志計畫於太湖秋操時在安慶起事，擬以馬炮兩營先取安慶，得手後以一軍塞集賢關險要，俾南京軍中同志響應，抵定江南。後以光緒與慈禧之病卒，機會難得，決提前舉事，於十一月十九日夜舉事，一時聲勢浩大，擁衆約千人，攻安慶城不下，爲江中清艦所迫，率衆走集賢關，改變計畫，擬取合肥，聯絡鳳穎會黨，進窺中原。惜進抵合肥城下時，終因清軍追擊，黨衆解體而失敗。同志范傳甲等十餘人先後被捕就義，成基走日本，研究軍事及製造炸彈方法，並加入同盟會，次年（一九〇九年）在哈爾濱作革命活動，以傳聞彼時刺殺載洵、薩鎮冰，爲友人父告密被捕斬首，臨刑時不肯下跪，仍高呼革命宗旨不已<sup>⑫</sup>。時年僅廿三歲。



廣州軍中之役前後共兩次，先後發生於一九〇八年及一九〇九年。初湖南萍瀏醴之役同志湘人譚馥於事敗後走廣州，因穗城巡防營士兵多湘籍會黨，因在營中創設保亞會，以反清為號召。而革命黨人在虎門陸軍速成學堂畢業者，多於營中任中下級官佐，聯絡士兵，與保亞會份子共圖革命。擬借光緒慈禧病故人心浮動機會起事，同盟會份子趙聲、鄒魯、朱執信等均參與其事。議定由巡防營發難，趙聲運動新軍，朱執信運動民軍響應，譚馥為廣納同志，仿唐才常富有票辦法，在軍中散布保亞票，事洩，譚馥、葛謙、嚴國豐、羅樹蒼等被捕處死。時葛謙年不滿卅十，國豐廿六，樹蒼廿四。清政府因巡防營中持有保亞票者人數極夥，多佔十之七八，雖逮捕二三百人，未敢盡誅，多從寬免究，革命黨人勢力未受重大影響<sup>⑫</sup>。

一九〇九年廣州新軍之役係倪映典發動者。一九〇七年黃岡之役以後，同盟會在香港設立機關，在粵策畫起事，由胡毅生、朱執信負責與廣州軍界聯絡，趙聲時任陸軍第一標統帶，為新軍中青年革命志士核心人物。欽廉之役以後，趙聲為清政府猜疑，不敢大肆活動。幸倪映典由皖來粵，任炮二營排長，經趙聲介紹，倪乃與胡、朱相結，欲借炮一營管帶苛嚴，部眾憤激，發生羣毆事件起事。經同盟會在港之南方支部策畫，由鄒魯聯絡巡防營，陳炯明、朱執信、古應芬等運動諮議局及學界、報界，朱執信、胡毅生運動民軍。姚雨平等運動新軍速成畢業隊官及其他下級軍官，徐維揚等運動新軍士兵。南方支部在胡漢民等主持下制定革命運動章程，訂於宣統元年正月初六日舉事。不幸於年初一發生軍警衝突，提前於初三起事。倪映典身懷手槍兩枝，突入新軍營壘，槍殺管帶齊汝漢，集眾進攻省城，並著藍袍手持青天白日滿地紅革命旗，騎馬往來督師，



不幸中彈死，年廿五。倪死後新軍仍猛攻不已，傷亡枕藉，終於潰敗，戰死者百餘人，被捕遇難者亦衆<sup>(125)</sup>。

汪精衛等謀刺攝政王載灃之事，發生於一九一〇年。早在一九〇七年，汪精衛已與劉思復（即李德山）於香港研製炸彈，以供刺殺滿清大臣之用。後劉思復在穗謀刺水師提督李準，製炸彈時不慎爆炸受傷，其刺殺清大員計畫一時中輟。適國父西南邊境起事失敗，陶成章、章太炎妄肆攻擊，同志沮喪，不少同盟會員竟然消沉，精衛憤慨不已，遂先不稟告中山先生，私赴香港，與黃復生、黎仲實、喻雲紀、曾醒、方君瑛、陳璧君七人組織暗殺團，擬藉刺殺滿清重臣來振奮同志士氣。國父曾加阻止，精衛不聽。時黃復生、喻雲紀研製安全炸彈，經試驗效果甚佳。初謀炸湖廣總督端方，以未能確知端方赴津所乘交通工具而罷。一九一〇年春精衛等抵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以爲掩護。時逢清廷派赴歐洲考察軍事大臣載洵、載濤返京，精衛等曾密攜炸彈至車站相候，以不識兩人恐誤傷他人，未敢下手。旋決心擒賊擒王，謀炸攝政王載灃，置炸彈於氏上朝必往之甘水橋下，安裝時爲人所見，事敗，精衛與復生被捕。精衛自草供詞，洋洋灑灑數千言，慷慨陳說非革命建立共和國無以救中國，一時衆人傳頌，精衛聲名大噪<sup>(126)</sup>。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三二九廣州之役是最可歌可泣足以振奮人心之革命起事。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之役失敗後，黃興於五月間曾上書國父，建議粵省革命仍應由廣州下手，並以運動軍隊爲主力，其辦法先刺殺提督李準，李準一死，清方必自相混亂，有機可趁。另亦當聯絡他省軍隊與會黨，於各省同志中選拔組織總機關人才，反對招聘外籍軍人及各種技師，以免引起清方注意



⑫<sup>27</sup>。是年十一月間國父在檳榔嶼召開會議，與黃興、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討論再行舉事辦法。時諸人於未來計畫頗感消沉，國父鼓勵再三，並以籌款自任，決定仍在廣州舉事，籌款十萬元，擇同志五百人爲先鋒，任發難之責。俟廣州得手後，由黃興統軍攻兩湖，趙聲率軍出江西趨南京。當場即募得款八千餘元。會後趙聲先返香港，設法維持新軍之役失敗後逃至港澳地區人員及機關。適黃興、胡漢民抵港後，即成立統籌部，黃興擔任部長，趙聲副之，積極籌畫起事。以姚雨平運動廣州新軍及巡防營，擬作爲主力。朱執信、胡毅生運動民軍，夏聲華聯絡巡警教練所學生，李海雲聯絡海軍，邱德明運動督署衛隊。另派譚人鳳携款二千元赴武昌，交居正及孫武，運動軍隊響應，罹熾揚赴惠州經營，（後改派嚴德明及鍾某）。懼先鋒隊五百人不足用，增爲八百人，以趙聲任總司令，黃興副之，分十路進攻。舉事日期定爲陰曆三月十五日，後以部份餉械未到，改爲三月廿八日，後因日本安南軍械仍難趕到，決定再延一日，即三二九舉事。迨三月十日發生溫生才刺殺廣州副都統署廣州將軍李琦事件，清方戒備森嚴，同志有主張再予改期者，黃興以改期無異解散，決心死拼清吏，以謝同志，堅持爲期舉事。臨時改進攻計畫爲四路，事先撰就絕筆書，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廿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親率隊攻提督府，終因陳炯明、姚雨平及胡毅生所部未能及時出動，戰至晚九時，而告失敗<sup>⑫<sup>28</sup></sup>。此役起難人數葬於黃花岡者計八十六人，黃興雖幸免於難，但亦傷斷兩指。

黃花岡之役之所以始終令人崇敬者，在於革命菁英，特別是青年志士，身先士卒，奮不顧身，爲革命而奉獻其寶貴生命。此次參加人數，原計畫分十路進攻時參加者爲八百人，後以改期部



份人員未能會集，亦有復行散去者，三二九之日隨黃興進攻者的一三〇人，其中大部份為青年。如以葬黃花岡之八十六人即其全部死難人數，則死難者佔總數一三〇人的六六·一五%，當三分之一，可知其死難之多，與舉事之慘烈。再就此死難八十六人分析，根據張玉法在其所著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的統計，就籍貫言，全來自華南及華中六個省份，其中廣東五十一人，佔八十六人之五九·三〇%，福建十九人，佔二二·〇九%，廣西七人，佔八·一四%，蘇、皖、川各三人，各佔三·四九%。就年齡而言，三〇至三九歲廿三人，佔二六·七四%，廿九歲以下四十二人，佔四八·八四%。就職業言，工人十七人，佔一九·七七%，商人六，佔六·九八%，農人十三人，佔一五·一二%，知識份子廿六人，佔三〇·二三%，軍人十四人，佔一六·二八%，技擊家三人，佔三·四九%，消防隊長一人，佔一·一六%，不詳六人，佔六·九八%<sup>(129)</sup>。可知以青年及知識份子人數最多。故日後將此次舉事之日定為青年節，視其舉事係以青年，特別是知識份子，為主導是極其正確的。尤值得注意者，過去舉事或以會黨，或以軍隊為主體，故青年革命志士雖是領導者，究難免有借取他力之嫌。而此次舉事完全依恃革命志士本身力量，軍隊及會黨雖參預其事，但因改期及陳炯明、姚雨平、胡毅生的延誤，真正投入戰鬥者不多，因而死難者亦少。於是過去誣革命黨人不肯身先士卒之說，乃一舉予以廓清。

就可歌可泣之悲壯事跡言，黃興於其自港赴穗前，即草就絕筆書，明示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sup>(130)</sup>。並身先士卒，携炸彈及兩手槍衝入總督署，於大堂內隔柱與守衛清軍相戰。後並於東轅門與提督李準及總督張鳴岐衛隊槍戰，傷右手，斷兩指，仍力戰不已，不知受傷。後以所部皆散，躲



人一洋貨店內，以雙槍擊斃敵軍數人。旋至河南徐宗漢家得以脫難，返港後憤事之不成，欲行暗殺清吏之計，以報死難諸同志，及爲左右所阻，曾欲投水自殺。

趙聲因與胡漢民率二百餘人後至，三月卅日方抵廣州。聞事敗，擬馳順德約民軍攻省，將渡至河南，遇同志知黃興避難女同志徐宗漢處，往見，相擁痛哭。返港後以壯志未酬，精英全失，又未能親執干戈，感憤下病劇，從此精神失常，酗酒狂歌，哭笑無常，後以罹盲腸炎，就醫過遲而卒。臨終前狂呼黃帝、岳武穆，又誦杜甫詩：「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並張目喃喃自語：「吾負死友，君等當爲死者雪恨」而卒<sup>⑬</sup>。年卅一。

林時爽，即林文，係贊同不可改期者，舉事時，左手執號筒，右手挾小鎗，身懷炸彈，隨黃興進攻督署。與何克夫、劉梅卿三四人競吹號角，勇往直前。途遇警察，皆槍殺之。至督署，見警衛隊，揚言：「我輩爲中國人吐氣，汝等亦中國人。」欲招降之。衛隊不悟，相與槍戰。及入署內，與黃興、朱執信等遍覓總督張鳴岐不得。後出東轅門，遇提督李準親兵，憶及趙聲曾言：「李準部下有同志，乃前行招撫。高呼：『我輩皆漢人，當同心協力，共除異族，恢復漢土。』」言未畢，冷彈中腦而亡<sup>⑭</sup>。年廿五。

方聲洞自幼機敏，事親至孝，胆識過人，尚氣節，重然諾，立志報國，夫婦留日時共同加入同盟會，三二九舉事前一日，親草絕筆書二封，一致其父，有「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爲身家計，亦不能於死中求生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之語，一致其姪，告知「如事敗身死，則吾之責已



盡，而吾姪則有無窮之責任在」，囑爲國家盡力善事親長。舉事時，隨黃興進攻督署，迨入內遍尋總督張鳴岐不獲，乃與黃興退出，轉戰至雙門底，遇巡防營，見無相應臂號，且舉槍相向，聲洞乃以手槍擊斃哨弁溫帶雄，防營還擊，方亦戰死。年廿六。事後黨人乃知此股巡防營官兵即爲響應舉事者。方聲洞竟以彼此誤會自相殘殺死<sup>(133)</sup>。

喻培倫，即喻雲紀，自與汪精衛、黃復生謀炸攝政王失敗，走香港，以醫藥術謀生，三二九之役負責運送槍械。時弟培棟亦欲參加，培倫拒之曰：「吾去，汝必留，俱死無爲，徒絕老親驩。於延期一事殊不以爲然，曾曰：「等死不如以身決之，諸公具四體，不如吾偏枯人也。蓋培倫在日嘗習化學及醫學藥科，以同志習射擊，多治銀藥，嘗以試銀藥傷臂也。舉事前兩日不眠不休，趕製炸彈。舉事時，臨陣擲以殲敵。於蓮街口與清軍相持，臉部中彈，力竭被執，不屈，臨刑時大呼：頭可斷，學說不可絕。遂遇害<sup>(134)</sup>。年廿六。

林覺民（一八八七—一九一一）字意洞，福建閩縣人，出身書香門弟，聰穎，讀書過目不忘，意緒瀟灑，不修邊幅，十四歲入新學堂，醉心自由之說，十九歲成婚，夫婦感情甚篤。後留學日本於慶應大學攻讀哲學及英、德語文，於國事之蝸蟻亟爲憤慨，嘗曰：「中國危殆至此，男兒死耳。」「吾輩既以壯士自許，當仗劍而起，解決根本問題，則累卵之危，庶可挽救。」三二九之役先返里號召同志共同參加，故此役閩籍人士特多。起事前在港致書其父及其妻，以示訣別，在致其妻書曰：「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



汝不必以無侶悲。」極其哀悽動人。舉事時與閩籍同志攻督署，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既覓張鳴岐不得，於巷戰中飛彈中腰，踣地忍痛縱起，力殺多人，又復被數創，鮮血暴注，遍體淋漓，力盡被俘。應訊時侃侃而談，綜論世界大勢，清吏爲之心折，去鐐銬延至堂上，縱筆一揮，立盡兩紙，洋洋數千言。書至激烈處，解衣磅礴，以手搥胸，若不復忍書者。書盡一紙時，傷痛欲嘔吐，李準親持痰盂近前，並奉以煙茶，鞠躬爲禮，以示崇敬。終從容就義死<sup>(135)</sup>。年僅廿四歲。

由以上諸人的死事壯烈，可瞭解三二九廣州之役，確是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其影響誠如國父在民元年祭文中所言：氣振風雷，虜胆爲摧。整個社會人心轉而趨向覆滿贊助革命，革命黨人內部不合作的陰霾，因此一掃而空，於是半年後乃有武昌起義的成功。

如果說三二九廣州之役是同盟會總部直接的規畫，參與其事者多爲與國父有深厚關係的閩粵同志，則武昌起義則是另一羣青年志士。他們多籍隸兩湖，與同盟會中部總會關係較深。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於一九一一年七月底上海，促成其事者主要爲宋教仁、居正、譚人鳳。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湖南桃園人，就讀湖北武昌文普通學堂時即參加華興會，係該會重要幹部。曾與胡瑛、張難光、曹亞伯等在武昌籌設科學補習所，作爲華興會在鄂支部，是爲湖北最早之革命團體。華興會決定在湘大舉時，負責常德一路事務。迨湘境舉事失敗，亦因係革命黨爲學堂開除。乃往日本就讀，與黃興、陳天華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鼓吹革命，並爲中國同盟會主要籌備人之一。同盟會成立後，曾擔任庶務部幹事。教仁爲人固執，諸事有其獨特看法，並不一切遵從國文指示。其所以成立中部同盟會者，一方面係根據同盟會會章，另一方面亦因兩廣舉事屢屢失



敗，有另樹一幟用心。氏對革命看法，初主仿葡萄牙、土耳其中央革命辦法，密結北方軍隊，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故曾於一九〇七年至東北活動，聯絡馬俠，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後因招兵失敗潛赴日本，編纂間島問題一書，寄北洋大臣袁世凱，以供交涉參考。一九一〇年教仁在滬擔任民報主筆，以爲可在長江各地樹立潛在勢力，俾一聲令發，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以成大事。三二九之役以後，南方再行舉事有其困難，故宋氏之策亦深得南方諸同志支持<sup>(136)</sup>。

居正（一八七六一—一九五一）湖北黃州人，一九〇五年赴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迨同盟會內部發生紛爭，氏與長江地區革命同志，組織共進會，一手草擬組織章程。日後並擔任該會地位僅次於會長之參謀。共進會組成份子會黨佔有相當比重。內中亦有不少青年知識份子由於出身地主家庭，對中山先生平均地地權之說，深不以爲然。故在孫武建議下將同盟會之平均地地權宗旨改爲平均人權。其革命運動方向，則以下層社會爲主<sup>(137)</sup>。共進會在淵源系統上與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科學補習所及日知會等又以新軍中青年革命志士爲其主要組成份子，故共進會與新軍關係深厚，亦可視爲是其特色之一。蓋湖北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於一九〇四年的創立，即是新軍中的青年志士與新知識份子的結合。自此而後，湖北的革命團體，無論日知會、羣治學社、振武學社或文學社，雖多以新軍爲主體，但仍是如此，與新知識份子間頗能合作。顯然在湖北，因新知識份子走入軍中蔚然成風，故其兩者間結合較易。此亦是何以留歐鄂籍學生堅主聯絡新軍的原因。居正以共進會重要領袖身份與宋教仁倡組中部同盟會，遂使同



盟會與共進會的關係得以加深。

譚人鳳（一八六〇—一九二〇）湖南新化人，年長於國父六歲，為革命黨人中年齡較長者，曾中秀才，洪門出身，為華興會發起人之一。一九〇六年東渡日本，因黃興介紹謁國父，加入同盟會。後曾與胡瑛等返國策應萍瀏醴起事，亦曾與議三二九之役，並携款二千元至兩湖聯絡孫武等，盼響應三二九之役。三二九之役失敗後，與宋教仁持相同看法，主改在中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兩人曾在東京召集十一省同盟會負責人共同議定成立中部同盟會，努力於中部各省舉事。中部同盟會成立宣言即出於彼之手。由於氏與香港同盟會總部關係良好，再加以是會黨出身，故彼不僅是同盟會總部與中部同盟會間重要聯絡人，亦是中部同盟會與兩湖會黨間的關係人<sup>(138)</sup>。彼雖非是青年的革命黨人，但對中部同盟會及策畫武昌起義均地位重要。

共進會在武昌的負責人為孫武（一八六七—一九四〇），原名葆仁，湖北夏口人。畢業湖北武備學堂，與吳祿貞同學。後任湖南新軍教練官及岳州威武營管帶。庚子時曾參加唐才常之役，任岳州司令，事敗後亡粵。一九〇四年參加科學補習所，謀運動軍隊舉事。事洩亡走日本，入成城學校，習海軍。以日本頒佈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返回武漢，加入日知會，響應萍瀏醴之役。失敗後走東三省依吳祿貞。一九〇八年赴香港，擬參加雲南河口之役。至滇，因河口之役失敗再往日本，成為共進會重要份子，任軍務部長。旋返鄂策畫革命。與由湖北軍隊同盟會轉化而成之羣治學社（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成立）有密切關係，與蔣翊武、胡瑛、彭臨九等所組織之文學社幾不相容。後因協助粵人聶經起事失敗，避居香港，改名武，加入同盟會。一九一〇年返鄂重整旗鼓



，密謀響應各省行動<sup>(139)</sup>。

湖南共進會負責人爲焦達峯（一八八六一一九一一），湖南瀏陽人，少年時代受同邑譚嗣同、唐才常殉國影響，立志革命。十八歲入長洲高等學堂預備科，即與秘密會黨及由日返國之革命志士相聯絡，籌畫革命，其中與激進革命黨人禹之謨關係尤密切。一九〇六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與黃興劉揆一等來往密切，並爲革命人東斌學校習軍事。次年以與秘密會黨有聯絡，擔任同盟會調查部長。後以同盟會組成份子複雜，行動緩慢，嫌不切實際，乃與長江地區志同道合者組織共進會，力謀在長江流域地區展開活動。一九〇八年雲南河口之役失敗，黃興在日本大森辦軍事講習會，氏亦加入研習陸軍。旋爲共進會任命爲參議部長及湖南大都督。是年底返國在漢口與湖北同志協商進行方法<sup>(140)</sup>。由於彼與鄂省同志合作無間，故日後武昌起義成功，湖南在彼策畫下，迅速響應，使革命形勢得以穩定，革命得以成功。

文學社係振武學社轉化而成。一九〇九年清廷決定由郵傳部接辦粵漢、川漢鐵路，計畫借款修築。湘川諸省紳商羣起反對。時湖北發生大水，沿江諸縣饑民麇集，嗷嗷待哺。羣治學社青年同志大肆活動，擴張其勢力。詹大悲、宛思濱、劉復基等並收購漢口商務報，以激烈言論宣傳革命。次年劉復基等擬毆懲主張借款修路之湘人楊度，使羣治學社爲清政府偵知，商務報亦因而停刊。羣治學社同志乃決定改其社爲振武學社，以聯絡軍界同袍，講求武學爲宗旨，積極發展組織，推行革命工作。振武學社鑒於過去機關爲清官府破獲，每牽連及整個組織，因而在組織結構上與前不同：每營設有小組，小組成員不與中央及其他組織接觸。僅標之代表可參加中央幹部會議



，以防一旦事敗，整個組織均受影響。迨振武學社復爲官府偵破，蔣翊武（一八八五—一九一三）、詹大悲（一八八八—一九二七）、劉復基（一八八四—一九一一）等復改振武學社爲文學社，推蔣翊武爲社長，詹大悲爲文書部長，劉復基爲評議部長，並尊業被捕入獄之胡瑛（一八八四—一九三三）爲領袖，與孫武等之共進會相對立<sup>⑭</sup>。因此譚人鳳爲調和兩社之爭執，曾兩次至獄訪晤胡瑛，亦勸孫武等和衷共濟。故終得團結一致，成立聯合會，共同論商在鄂起事辦法。

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兩會第一次集會，議商合作辦法，建立「同歸不必殊途」的共識。九月十四日再度集合，由共進會領袖劉公任主席，決定根據中部同盟會「責任分担，事權統一」的原則，請宋教仁、黃興、譚人鳳前來主持大計，並派居正與楊玉如前往相邀。亦議定在武昌城內多開旅社，以便聲息相通，作爲集會議事場所。在漢口租界內分租密室，製造炸彈及旗幟、標誌、文告等。迨四川爭路風潮事端擴大，鄂督端方擬調新軍第四十一標支一營往宜昌沙市，第二營往岳州。文學社幹部預籌態度之方：武昌一旦起事，調防各處之同志立即響應，占領荊、宜、襄、樊。時預計蔣翊武將調往岳州，故議定社務由王憲章及劉復基負責<sup>⑮</sup>。共進會也在軍中積極準備，採一致行動。

一九一一年九月廿四日孫武、劉復基召集兩團體聯合大會，議商切實起事計畫，軍隊各標代表及其他幹部參加者六十餘人。決定在中秋節（一九一一、一〇、六）起事，由蔣翊武任湖北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孫武自願任參謀長。協議起事組織分總務、軍務、參議、內務、外交、理財、調查、交通八部，分別推定正副部長<sup>⑯</sup>。時湖北軍中革命黨人勢力約在三千至五千人之間，再加



上學生、故擬製五千七百塊標識以供起事之用。革命經費原極困絀，文學社之經費是由軍人月餉中抽收十分之一，故其情況略好於共進會。共進會由於經費困難，於焦達峯來漢口寄住楊玉如家時，楊與焦等僅能日食一餐。鄧玉麟、孫武將所有值錢財物變賣典當一空，兩人僅剩藍布長衫一件，何人出外，則由何人穿著。居正與焦達峯爲解決財政問題，曾謀竊廟中金佛變賣，後以鄉間農人起甚早，而事亦未成。幸劉公家中匯來銀五千兩供其捐官之用，乃得解決起義經費<sup>(14)</sup>。

革命青年既決定起事日期及各項組織，而亦即在九月廿四日爆發偶發事件，致使清方加緊防範，幾使武昌起義難於成功。是日午後南湖第八標炮隊因官兵設宴餞別離營同志，喧嘩過甚，長官干預，發生小規模兵變。致而清方嚴予戒備，偵騎四出，捕拏革命黨人，時漢口各國領事已謠傳革命黨人將在武漢起事，街頭巷尾耳語中秋舉事。官府於十月四日緝捕劉公，未獲，其妻飲藥自盡。革命黨人被迫決定將起事日期延後四、五日，俟中秋節後清方防範鬆弛再行舉事。當時武漢官府爲防革命黨人於中秋節舉事，特令將中秋節提前一日舉行。並於十月六日不准士兵外出。十月九日晨蔣翊武自岳州返武昌，劉復基召集各標代表會議。中午孫武、鄧玉麟等，於漢口俄租界內配製炸藥，不慎爆炸，孫武頭部重傷，被送醫院，俄巡捕聞訊搜捕黨人機關，少數同志被捕，並獲黨人名冊、文件及旗號等，蔣翊武被迫下令當日晚間舉事。而武昌黨人機關旋亦爲清方搜查捕獲黨人數十名。劉復基本人雖以炸彈拒捕，但仍因身爲炸彈所傷受縛。楊宏勝則因運送炸彈爲衛兵盤查而擲彈受重傷被捕。一時間第三十標及同興學社復有二十餘人被捕。被捕者如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等均立即審訊，慷慨陳詞，不屈死。於是武昌城內黨人，人人自危。蔣氏之舉



事命令則因城內戒嚴，營門關閉，延誤至夜十二時以後方才送達。唯黨人仍然根據此一命令，工程營熊秉坤於十月十日晚首先發難，竟然使武昌起義一舉成功<sup>①</sup>。各省紛紛響應，清廷因此終告滅亡。

武昌起義之倉卒，計畫之不夠周全，其情況遠甚於三二九廣州之役，而之所以能得到成功者，實因革命黨人長期在新軍中運動，軍中青年革命志士人數眾多，迨孫武等被捕，人人自危，情勢所逼，祇有鋌而走險。但因青年革命志士遍佈新軍各標，故雖鋌而走險，力量亦極強大。再加以三二九之役以後，國人均知革命之成功為必然之事，人心幾全盼滿清早日覆亡，即使高級官吏亦無鬥志。故起事後，鄂督瑞澂及第八鎮統制張彪僅略予抵抗，即倉惶逃走。革命軍在羣龍無首，缺乏統一領袖情況下，亦得占有武昌，獲得成功。

## 五、結論

綜括上述諸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清季的青年運動實具有下列七點特徵：

一、它的興起是受國勢凌替、民族覺醒的刺激而形成，故民族主義思想是推動運動的原動力，也是其不斷追求的最主要目標。在性質上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澎湃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一部份。推翻異族統治——覆滿遂成爲此一運動的中心思想。在當時青年的觀念中，是將國家民族的振興與推翻滿清統治，視爲是同一件事，完全相信，祇要推翻滿清統治，則國家民族必然會富強康



樂。爲了推翻滿清異族統治，甚至不惜對滿人予以醜化，視爲是罪惡的化身，使整個運動充滿激情，而且將問題過於簡單化。迨辛亥革命成功後，發覺整個問題並不如此單純，於是進而懷疑中國文化的傳統過於老舊，不適宜現代國家的要求，因此又復進一步產生新的運動。充份反映出青年人考慮問題祇憑衝動，缺乏周詳的特性，故在此一性質上清季的青年運動，與五四時代青年運動，有其共同的特徵。

二、由於當時認定中國的積弱，是因新知的不足，國家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現代化的不夠，故在性質上也是一種一意求新的現代化運動。使其與新學的興起，新知識份子的成長有不可分的關係。庚子以前此一運動之所以不能快速擴張，其原因即在於此。蓋當時新學仍在萌芽時期，新知識份子的力量不夠強大。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如欲求現代化的穩固發展，勢必一面求新，一面謀求傳統與求新的結合。不幸當時由於國家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致而中國青年情緒激動的認定：唯有一意求新，才能挽救危機。於是使中國現代化的追求，在激情中逐漸遠離傳統，致而爲日後五四運動的打倒傳統，奠定其深厚的初基。故在求新的特質上，清季的青年運動也可視作爲五四運動的形成期，兩者均徹底反映出青年喜好求新的特性。

三、此一運動雖由新知識份子領導，但就其參與成員的情況而言，仍然是屬於社會各階層的全民青年運動，此與五四運動有根本上的不同。蓋五四運動是以青年學生與教師爲主體，絕少農民參加，文化氣息較重。而清季的青年運動由國父於甲午戰前倡導起，就有相當的草根性，與我國社會的下層密切接合成爲一整體。



四、此一運動雖係因激昂的民族主義而興起，是屬於民族主義運動，但因求新與追求現代化的關係，民主自然亦成爲其追求的主要目標。故在思想上頗與近代整個世界的民族與民權共生政治思潮相符合。此與太平天國的覆滿運動有本質上的不同。蓋太平天國的政治運動是民族主義與其宗教思想相結合，由於不具有民主政治觀念，故其現代性根本無法與清季青年運動相比。

五、清季的青年運動是一種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開放而甚平等的運動。如將之與當時士紳爲主體的維新、立憲運動相比，可看出是極富有理想與抱負的，不似彼等之妥協與因循，極具有前瞻開創的精神。其整個團體在觀念上極爲開放，注重平等，不僅沒有階段的意識，而且力求突破各種束縛。於是男女問題上表現最爲真切，使其運動帶動女權的抬頭，一夫一妻制上的建立，從此我國真正走向男女平等。

六、清季的青年運動充份表現出此時期青年的富於理想，純潔率真，一切均本諸爲國爲民，殊少作其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故在整個運動中充滿了個人奉獻犧牲的可歌可泣事蹟，他們以自己的血汗與淚水推翻滿清，創建民國，鑄造出中國國家民族的生機，扭轉亡國滅種的命運，使整個運動光輝萬丈，極爲感人動人，是深符合青年創造時代的真理的。

七、由同盟會內部的紛爭，以及文學社與共進會最初的不能合作，可看出在清季的青年運動中也有若干人領袖欲甚強，不甘屈居人下，致而影響及團體的合作。更由劉師培、王發科、湯薌銘諸人言行的反覆無常，亦可了解若干青年的思想不夠堅定，行爲幼稚可笑。幸在整個清季青年運動中這些人均僅居極少數，故雖對運動造成若干影響，並未能危害其成功。



## 註釋

- ① 國父家世據黨史會編國父年譜增訂本的記載，孫氏原為中原望族，唐代黃巢之亂時遷江西寧都，後再遷福建長汀，明永樂時遷粵，至鼎標公嘗參加反清義師，兵敗流徙，乾隆中葉遷居香山縣翠亨村。（見該書，民七十四年增訂本，上册，頁一）
- ② 國父於十一歲時聆知太平天國軼事，認洪秀全起自布衣，驅逐異族，雖及身而亡，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深慕其人。（黨史會編，國父年譜，增訂本，民七十四年，上册，頁十九）
- ③ 中山先生於十四歲隨母楊夫人乘輪赴檀香山，曾自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國父年譜，民七十四年增訂本，頁二四）抵檀香山後，就讀英教會所辦之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School），時以穿著清朝服裝，常受西方同學狎侮，國父毅然抵禦，勇敢如鬥拳師，同學始不敢忤。國父對年幼同學，禮讓備至，具有抑強扶弱之革命精神。在校好讀史乘，景仰華盛頓、林肯諸偉人勳業。檀香山時發生種族歧視問題，予國父刺激甚深，啓發其中國革命運動思想（國父年譜，民七十四年增訂本，上册，頁廿五、廿六）
- ④ 中山先生廿歲時再由檀香山返國，於香港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復學，時當中法戰爭，中國將領馮子材雖於鎮南關之役敗法軍，而清廷竟屈辱議和，承認越南為法所有，國父因憤清廷之腐敗，海防不修，屈辱媾和，乃決志「傾覆滿清，創建民國」（國父年譜，民七十



- 四年增訂本，上册，頁卅九（四〇）
- ⑤ 黨史會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近代中國社出版，民七十四年，頁五一〇；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四二。
- ⑥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四三；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七。
- ⑦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二册，傳記文學社，民六十六年，頁一八二。
- ⑧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五〇。
- ⑨ 黨史會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四七一至四七二；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七册，民七十四，頁四一二。唯楊氏出生年代另有一說在一八七六（見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一册，頁七十九），此處仍取一八六八年之說，蓋如一八七六年生，則至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其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年僅十三歲也，似嫌太幼。
- ⑩ 劉紹唐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七册，傳記文學社，民七十四年，頁四一二（四一五）。
- ⑪ 按鄭安據云曾為林則徐之「師爺」，時年已八十，在廣州觀音山三元宮潛修，曾力勸國父、陳少白、尤烈、楊鶴齡，如欲反滿必須聯絡會黨，並詳告會黨之組織與宗旨及在各地分佈情形。（見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五二）。
- ⑫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四七二。
- ⑬ 全上註。
- ⑭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四四七。



- ⑮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集，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台北民五十二年，頁二八四。
- ⑯ Harold Z Schiffrin 著，邱權政、苻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一九八六，頁卅六—卅九。
- ⑰ 全上書，頁卅九。
- ⑱ 中國現代史辭典，頁五一九。
- ⑲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集，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頁二八五至二八六。
- ⑳ Harold Z Schiffrin 著邱權政、苻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卅八。
- ㉑ 檀香山興中會誓詞因現今無原文留存，因此有史家認為當時只有這種看法，並未真正見之於文字，但自香港興中會成立之後，此一誓詞已成爲興中會宗旨。
- ㉒ 史扶鄰著，邱權政、苻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四十七。
- ㉓ 史扶鄰原著中作此時期興中會約有一五三人，其中商人六十九人，工人卅九，白領工作者十人，醫生和牙醫三人，學生二人，基督教牧師（華人）二人，軍事人員五人，農民四人，教師四人，銀行家一人，新聞記者一人，會黨活動份子十三人（見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四十七至四十八）。本文根據此一數字，求出百分比。
- ㉔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八十。



- ②5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頁二八九。
- ②6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七六至七七；教育部主編，中華民國建國，第一編，革命開國，第一冊，民七十四年，頁二二〇—二二一。
- ②7 全上書，上册，頁七四。
- ②8 全上書，上册，頁七六—七八。
- ②9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八六—八七。
- ③0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頁二九〇。
- ③1 轉引自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一編，革命開國，第一冊，頁二一四。
- ③2 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
- ③3 廣州乙未之役時，有梁大炮爲北江、英德、清遠、花縣一帶會黨首領，因鄭士良的引薦加入廣州興中會，謀參加廣州起義。庚子惠州之役由鄭士良領導，會黨實爲此次起事之主體。
- ③4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二〇五—二〇六。
- ③5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一三二。
- ③6 國父全集，民七十年再版，第一冊，頁四九六。
- ③7 黨史會編，革命先烈傳，中央文物供應社，民五十四年，頁五二七。
- ③8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八三。
- ③9 蔣永敬，興中會時期革命言論之演進，載於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七編，頁八一。



- ④〇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上册，頁二六八～二七四。
- ④一 全上書，上册，頁三〇三。
- ④二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二五三，秦力山。
- ④三 邱權政、苻致興譯，史扶鄰著，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頁二六〇；二七二。
- ④四 彭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頁二三一～二三四，關於中山先生的筆話殘稿；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一～三〇二。
- ④五 國史館館刊，頁三九五～三九六。
- ④六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二～三；十一～十二。
- ④七 轉引自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三。
- ④八 轉引自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三。
- ④九 章炳麟，尙書，定版籍第四十二；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一六三～一六四。
- ⑤〇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一六四～一六六。
- ⑤一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六～三〇七。
- ⑤二 黃興原名黃軫，原在湖北武昌兩湖書院肄業，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以湖北官費生赴日求學，入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與湖南同學陳天華等辦遊學譯編，宣傳革命，唯當時並未結識國父。次年黃氏在宏文學院領導湖南學生組織土曜會，以軍國民革命相號召，參加拒俄義勇隊，旋於五月底啓程返國，是年冬組織華興會。及瀏陽起事未成，重返東京。一九〇五年



七月國父由歐洲返抵東京，自宮崎寅藏處聞知黃興為兩湖青年中傑出人物，亦即親自至黃興寓所訪晤。按宮崎寅藏原意，欲召黃興來謁國父，蓋國父身份地位遠高於黃也，而國父不同意，竟親訪之。黃興極為感動，言談後對國父傾服備至，從此視國父為革命領導人。

⑤3 民報第一期，頁六六、六七，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日。

⑤4 國父全集，第一冊，頁四九七。

⑤5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册，頁一八六。

⑤6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二五、三二六。

⑤7 吳稚暉，總理行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三、六。

⑤8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四二〇、四二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頁三七九、四〇一。

⑤9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四二二。

⑥0 朱和中，歐洲同盟會記實，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九三、四〇一。

⑥1 全上文，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四〇一、四〇七。

⑥2 章炳麟，太炎自訂年譜，台北文海本，頁一三。

⑥3 章炳麟，客帝論，清議報，第十五冊。

⑥4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九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頁十一。



- ⑥5 黨史會編，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二四六。
- ⑥6 陶英惠，蔡元培，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一冊，民七十三年，頁六一六—六一七。頁二六八—二六九。
- ⑥7 革命人物誌，第二集，頁二二四—二二五。
- ⑥8 革命人物誌，第五集，頁一八二—一八三。
- ⑥9 拙著，民族主義與辛亥革命，載於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民七十四年，第二冊，頁三二。
- ⑦0 譚嗣同，譚瀏陽全集，頁二七七—二八一。
- ⑦1 梁啟超，新民說，台北中華書局，民四十八年，頁十六—十八。
- ⑦2 章炳麟，黃帝魂，台北，黨史會，民五十七年影印本，頁三二。
- ⑦3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〇。
- ⑦4 黨史會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民七十四年，頁二五三，秦力山。
- ⑦5 趙淑敏，永遠與自然同在—吳稚暉傳，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六十九年，頁二十七。
- ⑦6 周佳榮著，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香港波文書局，一九八〇，頁三五—五六。
- ⑦7 新潮社編，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文海本，頁四五〇—四五二。
- ⑦8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六十四年，頁一三—二二。
- ⑦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六十四年，頁二六〇—二六八。
- ⑧0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四三—三四五。



- ⑧1 全上書，上册，頁三四六～三四九；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頁五二九～五四〇；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二六〇～二七五。
- ⑧2 拙著，民族主義與辛亥革命，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三八。
- ⑧3 劉揆一，黃興傳，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三五八～三五九。
- ⑧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三五～三六。
- ⑧5 關於中美工約風潮，可參閱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五十五年。
- ⑧6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五四〇。
- ⑧7 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七十九。
- ⑧8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頁二五三～二五六。
- ⑧9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頁二二六～二二八。
- ⑨0 全上書，頁二二八～二二九。
- ⑨1 全上書，頁二二九～二三〇。
- ⑨2 全上書，頁二三〇～二三一。
- ⑨3 全上書，頁二三二。
- ⑨4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〇六～三〇七；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二八八～二八九。



- ⑨5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四一。
- ⑨6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二七五—二八三；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三六七—三七〇。
- ⑨7 張玉法書中僅有人數無百分比，百分比係作者自行算出。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二八二。
- ⑨8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二八八—二九一。
- ⑨9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四三九。
- ⑩0 全上書，頁四四〇。
- ⑩1 全上書，頁四四〇—四四一。
- ⑩2 全上書，頁四四〇。
- ⑩3 全上書，頁四四一。
- ⑩4 全上書，頁四七四。
- ⑩5 全上書，頁三七八—三七九。
- ⑩6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〇七。
- ⑩7 全上書，頁三一四—三一五。
- ⑩8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四七七—四七八。
- ⑩9 張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頁三五六中，僅有人數，各項百分比係作者自行計算出。



- ①⑩ 吳樾著，暗殺時代，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六〇四～六〇五。
- ①⑪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四九二。
- ①⑫ 民報，烈士吳樾君意見書，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八九。
- ①⑬ 詳情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六二～三七八。
- ①⑭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七十四年，頁五五四～五五五；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廿一～二七。
- ①⑮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一六七～二〇〇。
- ①⑯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二一七～二五六。
- ①⑰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五八～三六〇；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六二四。
- ①⑱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六二四～六二六；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六〇～三六一。
- ①⑲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册，頁六二七～六三六。
- ①⑳ 全上書，上册，頁六三六～六四三。
- ㉑ 拙著，民族主義與辛亥革命，載於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二冊，頁三九～四〇。
- ①⑳ 全上文，頁四〇。



- ⑫③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四六三～四九三。
- ⑫④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四九七～五〇四。
- ⑫⑤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〇五～五六〇。
- ⑫⑥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六四九～六九〇。
- ⑫⑦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三三～三八。
- ⑫⑧ 全上書，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三九～二七一。
- ⑫⑨ 張玉法在清季的革命團體一書頁三五五中僅列人數，本文中百分比係作者自行計算出。
- ⑫⑩ 黃興絕筆書錄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圖片，頁二四～二五。
- ⑫⑪ 趙聲傳，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四二八～四二九。
- ⑫⑫ 鄭烈，林文傳，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四三四～四三六。
- ⑫⑬ 鄭烈，方聲洞傳，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四四〇～四四四。
- ⑫⑭ 章炳麟等著，喻培倫傳、事略、墓表，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四三〇～四三四。
- ⑫⑮ 鄭烈，林覺民傳，及林氏與妻訣別書，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四冊，頁四四六～四五二。
- ⑫⑯ 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頁六六～六七，宋教仁；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三六四～三六五；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八六三～八六五。



- ⑬⑦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五二九～五三八。
- ⑬⑧ 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份，頁五九九。
- ⑬⑨ 全上書，頁二六六。
- ⑬⑩ 全上書，頁四四五。
- ⑬⑪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頁三七～一一四。
- ⑬⑫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八七七～八七九。
- ⑬⑬ 全上書，下冊，頁八八〇。
- ⑬⑭ 全上書，下冊，頁八七八。
- ⑬⑮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二編，第一冊，頁二一九～三四六。



# 劇變的時代

## 第貳篇

### 五四時代

#### 自覺與自救的澎湃浪潮



□ 著者簡介 □

呂芳上，台灣桃園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師範大學歷史所兼任教授。著有「朱執信與中國革命」、「革命之再起」。



# 一、劇變的時代

發生在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是北京地區的大學生，爲了抗議北京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而起的學生運動，同時由此引起全國各地一連串的罷課、罷工、罷市，終於造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加速了思想界的革命。無疑的，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生活在七十年後的中國人，也還感受著「五四」餘波的衝擊，五四當年所面臨的問題，至今也還未能完全解決，當日所追求的理想似乎也仍沒全部達成。因此歷史上的「五四」實仍然具有當代的意義。

民國八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世人無不視爲中國青年最具價值的愛國運動。中國歷史上雖不乏青年運動的前例，但就規模及影響力而言，五四運動堪稱無與倫比，這一重要運動之所以產生，實是時代劇變的結果。具體言之，首先是當日中國面臨較之清末更爲嚴重的外患。國家領土主權、資源經濟，處處受到列強侵略勢力的威脅，尤其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壓迫逐步加緊，除了已佔領朝鮮和台灣，強制取得了東北的各項權益外，更利用歐戰，進兵青島、控制渤海灣兩岸，對中國內陸形成扇形推進的形勢。面對這一嚴重局勢，國人都有一種亡國的警惕，故北京學生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①！」的呼聲，實隱涵著國家憂患、民族災難所激起的民族復興與意識的覺醒。其次，從清末維新運動以來，青年知識分子對政治逐漸發生興趣，從國內士人的公車上書，到留學生對愛國運動、革命運動



的競相參與，顯示知識分子對國事的關注與影響逐步擴大。至民初，新式教育開始廣泛推行，學生眼界擴大，與社會接觸增加，對國事有看法也有責任感，羣體力量的集合也相對的容易，激變的時局下，羣衆運動更易於引發。第三、從清末到民初的數十年間，國內民族資本有相當的發展，工業、商業、交通運輸等現代企業，次第建立。當它們受到外國勢力嚴重威脅時，爲了生存，自然提高了民族意識，熱烈的支持青年學生的民族主義運動，甚至於參加愛國運動的行列，學生與工商界力量的合流，故能造成空前的效果。這一切都可以說明五四運動實是時代激變，民族精神激盪，民族復興意識覺醒的結果。

歷史上的「五四」，其起訖時間及意義，各家說法並不一致。以時間的討論而言，有學者主張民國六年至民國十年爲妥，有人主張民國四年至十二年較爲真確，更有主張由民國八年五四當日到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止<sup>②</sup>。本文的重點放在民國四年到十三年，是因爲民國四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確引發國人高昂的抗日情緒，導致五四民族主義的高潮。而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吸納了五四青年運動的力量，打開了爾後國人政治覺醒，走向國家統一的新局面，這正是五四運動的最大目標。再就意義上說，也有不同名詞的界定，如「五四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最早提出「五四運動」這一名詞的是羅家倫，他以參與遊行示威運動的北大學生的立場，視五四爲學生與羣衆的愛國運動。胡適並不贊成學運，由於他倡導文學改革，所以就以本身的立場，稱之爲「文藝復興運動」。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也包涵了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在內，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就同時用了這些名詞。從思想



史發展的角度看，張玉法認為這一段時間的特色受思想的啓蒙，也就是運動的本身是由文化、社會、政治各方面新思想的鼓吹著手，造成中國後來的重大變動<sup>③</sup>。實際上這也還脫離不了新文化運動的範疇。如果把五四愛國運動界定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至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亦即從北京學生到天安門集會示威，火燒趙家樓，經過「六三」工人、商人罷工、罷市，到中國外交代表拒簽巴黎和約，北京政府罷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羣衆運動逐漸平息爲止，前後爲期兩個月左右，那麼新文化運動由民國四年到十三年，延續八、九年，時間要長得多。不過，嚴格的說，由民國四年留學生激烈的反對二十一條款，到五四之後，仍蓬勃發展的學生改革要求，「學生的五四」與「文化的五四」，雖屬不同的概念，但它們實有密切的聯繫<sup>④</sup>。

## 二、「五四」序幕

### 國恥與救亡

五四運動是中國在列強的壓力下，自然掀起的民族主義高潮。事實上，「救亡圖存」是清末以來知識分子救國運動的口號，只要列強的侵略不稍放鬆，青年感於民族危機所作的努力是絕不會終止，從五九國恥到五四運動的爆發，由留日學生的奮起到國內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正是民國初年青年救亡運動發展的真實寫照。



民國四年一月日本利用歐戰，其他列強無暇東顧之際，也利用袁世凱帝制自爲，欲求日本促成其事的時機，對中國提出了駭人的二十一條要求，立刻激發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反應最敏銳、迅速的是留日青年學生。日本，對中國留學生言，從清末就是熱心於國是青年的集中地。一九〇三年的「拒俄事件」，首開留日學生與上海青年學生，互通聲氣，展開行動禦侮的先河。一九〇五年「取締規則風潮」，留日學生大批回國，在國內發展其政治影響力⑤。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是革命運動的主力，其有功於民國之成立，自不待言。

民國四年二月十一日，留日學生首先獲悉二十一條無理要求後，立刻成立留日學生總會，在千餘人的聚會中，首先譴責日本的侵略行動，同時留學生決議相率返國⑥。十五日首批留日學生返抵上海，反日的氣燄也帶回了國內。留學生的舉動，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在日廷的要求下，留學生總會被公使陸宗輿解散，陸因此被留學生批評爲「亡國之外交官」⑦。留日學生相率返國，引起北京教育部的恐慌，爲此特別訓誡要求學生以留學爲職志，留學生則覆書以罷學歸國目的是爲救國⑧。三月十八日留日歸國學生發起的上海張園國民大會，除了決定成立「國恥會」外，更決定於各省成立分會，設立報館，開會要求政府拒絕日人無理要求⑨。北京政府不得不嚴令禁止學生干預國事、禁止抵制日貨，排日行動雖遭一時的扼抑，不過五月九日北京政府接受日本最後通牒而簽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一經傳出，各地學生與民衆無不義憤填膺⑩。許多學生自動結伴上街，向市民宣傳反日、抵制日貨。留日學生三、四千人集體離日返國，表達強烈的抗議⑪。上海、北京等地陸續舉行「救國儲金運動」，各地學生成立「勸用國貨會」、「軍國民教育會」，



進行溫和的抗爭行動。五九國恥所激起的風潮雖然不特別激烈，但對青年學生民族情緒的激發和獨立人格的培養，確有絕大的影響<sup>⑫</sup>。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對一向羨慕在短時間迅速維新富強的日本，在此事件之後，「變為恐懼和猜疑<sup>⑬</sup>」，相當的孕育了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成長。

民國四年袁世凱進行帝制鬧劇，青年知識分子在強大壓力下，雖覺憤懣，亦無可奈何。部分知識分子惑於政治改革無望，轉而謀思想文化的改造<sup>⑭</sup>。袁世凱帝制失敗後，政治情況依然杌隉不安。六年督軍團兵諫，各省獨立自主，府院之爭，黎段失和，段氏免職，解散國會，張勳復辟，外患內亂，接踵而來，青年痛恨至極，因此有「中華全國學生救亡會」的成立，他們的宗旨是：「聯合學生喚醒國民，扶持正義，拯救中華民國之危亡」<sup>⑮</sup>。學生自覺救國責任不容推諉：「國家教育之宗旨，研究科學，同時即陶鑄其愛國心，若當國家存亡之關鍵，而不事拯救，清夜捫心，所學何事，轉瞬碧眼紫髯兒，實轉吾土，其將充巡捕乎？抑將充翻譯乎？波蘭、印度、安南、朝鮮亡國奴之境遇，強半皆已領略矣<sup>⑯</sup>。」同一時期留日學生努力阻止日廷借款段政府，一方面又痛恨日本積極謀我，民國六年九月日本特使石井在美國紐約演說「東方門羅主義」，謂日本有保護中國之權能。留日學生認為石井之言嚴重侮辱中國，羣起抗議，復進而示威遊行，質問駐日公使章宗祥之處置，並搗毀使館，行動頗為激烈<sup>⑰</sup>。值得注意的留日學生與上海的學生救亡會，感於中國面臨內憂與外患的危機，已有聯成一氣，共謀進行救亡的計劃<sup>⑱</sup>。民國七年民族危機加深以後，海內外青年學生共同的救國行動，也就更具體化了。



## 新教育、新青年

近代中國的學生羣，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是隨著教育改革而來的。如果把一八六二年京師同文館的設立，視為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那麼在清末京師大學堂創立前的「萌芽期新教育」改革的內容和成效仍然有限。不過，被稱為「建立期的新教育」，由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九年間，新教育的內容雖多可議，而數量上的發展，却算快速。一九〇九年全國新式學校數五萬二千三百四十八所，較一九〇三年增加七十三倍，學生數一百五十六萬二百七十人，較前增加二百二十五倍<sup>①9</sup>。這一時期的新教育，造就新學生，根本目標在救國自強，所以受過新教育的人，自然會注意政治情勢，加深國家觀念，不會老是在八股時文或四書五經中打轉，「一個人不知道國家的事，還可胡塗生活下去，一經知道便要想方法改造」<sup>②0</sup>。近代學生羣和辛亥革命的關係，由此便不難推知了。民國以後學生數字更急劇增加，據統計民國六年全國學生總數有三、九七四、四五四人，民國十二年有六、六一五、七七二人<sup>②1</sup>，較之清末又增加五倍之譜。這一批青年學生，多半受新知識的陶冶，又不失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他們對政治更有敏銳感覺，連帶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也更迫切。這些青年人多數聚集在城市中，擺脫家庭的束縛，也少受傳統文化的牢籠，因此也更可以在精神上、思想上有新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革新的教育制度和活潑的教育內容下，新學生羣形成社會改造力量，便隨之呈現，北京大學的情形就是一個例證。

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是承襲清季，教育係為政府延攬人才的場所，直到民國初年的北大



，還沿襲這一暮氣沉沉的風氣。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學，風尚丕變，「變相科舉的觀念打破了，有了人大學是研究學問，而非爲出身的感覺<sup>②②</sup>。」知識革命的氣氛也籠罩著整個北大。北大的革新從組織開始，蔡校長推動富民主精神的會議制，教務由各科教授會負責，教授治校的制度獲得實行。學生方面加強課外活動與自治活動。學術性、游藝性、服務性的社團紛紛成立，展現了學生的活潑與自動自發的精神。隨著社團的產生，校內刊物紛紛出現，從北大日刊、月刊到新青年、新潮、國故等，連繫師生感情，也提供意見交換的機會<sup>②③</sup>。蔡校長在北大最重要的貢獻，是他推行「兼容並包」的政策。他認爲「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大學之所以爲大」，就是要容納各種學派人物以及各種學術觀點<sup>②④</sup>。他以思想自由爲辦理大學原則的主張，讓更多的教授參與大學決策，讓學生鍛鍊自己負責的能力與習慣，最後的目的在追求真理的環境中，產生卓越的知識。他把北大當成學術精英的養成所，目的要把進步的觀念推擴到全國。蔡元培對學術自由的真誠，也直接影響到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他一方面強調個人自由的尊重，但也強調服務社會的至高意義。他的確鼓勵學生自我獨立意識的建立和對國事的關注，然而，他對學生問政的態度如何呢？基本上他反對學生離開學習的本位去參政。他認爲先著手文化改革，才有可能追求完善的政治改革，學生參政徒然造成改革動力的誤導，對青年學生、對國家均是損失<sup>②⑤</sup>。後來幾十年，他都秉持相同的看法。

不過，民國六年以後，北大的改革，把束縛學生的包袱，逐步撤除，無論出版物，無論結社集會，都使學生自由行動。由北大擴散的影響力，及於其他學校，這一來傳統專制被動的教育，



才有更新的趨勢，逐漸走向自由、自動的新教育。由此，學生的青年精神和自動能力，跟著發揚，有些先覺的學生，也覺悟到學生並非只是「學校中人」，學生的事業，並不完全只有讀書，對全國大事漸有注意的興味，漸生「該去參與」的動機，這也是五四運動所以產生的契機。這樣看來，五四運動的自身，是政治上的國民自決運動，而這政治上的國民自覺運動，實又是導源於教育上的「學生自動主義<sup>②6</sup>」。

## 救國之聲響起

民國七年上半年開始，日本就加快了侵略中國的脚步。二月初，日方向北京政府提出建立「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建議。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交換了「共同防敵」的照會，五月十六日兩國由軍事代表日方齋藤，中方靳雲鵬，秘密簽下了「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條款的内容危害中國很深，例如，日本有權在北滿、外蒙駐軍，日本有權使用中國軍事地圖，日本有權在中國軍隊中任用日本教官等。五月十九日雙方進一步簽訂「海軍共同防敵協定」，九月六日又簽下「關於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幾乎把中國在東北的軍事權置於日本指揮系統之下<sup>②7</sup>。這些協定的進行異常隱密，但不能掩住中國人的耳目，終於再度激起國民救國的熱潮。

民國七年四月，中國留日學生獲悉這一「協定」的秘密消息，他們再度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四月二十八日留日學生千餘人召開大會，有全體返國之議。同時各省留學生相繼召開同鄉大會討



論進行方針。五月四日東京日本各校登出協定簽字消息，五月五日在東京的各校同學會、同鄉會正式組成了五四前最大的學生團體「中華民國留日學生救國團」，並發表意見書謂：

「我國民全體，若再不協力同心，共謀挽救，大好河山，非復我有，四億同胞，永淪奴隸，痛心切齒，孰有過此。……學界同人苦思焦慮，奔走號呼，冀圖團結一致，警覺當局，喚醒國民，抵制日人謀我之野心，打消其亡我之條件<sup>⑳</sup>。」

五月六日，留學生的一次集會中，與會的代表四十六人，遭到日本警察的毆辱拘捕，使學生情緒益發激烈。八日首批學生回國，接著留日學生分三途返鄉，一起至上海，一起赴北京，另一起逕回本省。返國之學生，依照計劃在上海設立「中華民國救亡團」本部，在北京設分部，於各省設支部，以聯合各界，一致注意中日交涉<sup>㉑</sup>。留日學生歸國後之救亡工作，一開始便計劃進行下列工作：組織總機關，與上海全國學生會聯繫，向政府力爭維持國家權益；地方分機關與地方各界組織國民請願會，六月底前成立，力爭國權；八月初召集國民大會，表達真正民意。同時爲使救國不廢學，也爲了表示團結仇日之決心，預備在上海籌辦私立大學，收容旅東返國學生<sup>㉒</sup>。留日學生此次返國事件，一開始就有完整計劃，由組織聯合機關到救國行動的展開，的確較之五九國恥時之救國行動進步，也爲五四運動開了學生積極救國活動的先例。而「仇日救國」的激昂情緒，更普遍感染了國內的學界。

民國七年留日學生約有四千人，據統計五月底返國的學生已有三千多人<sup>㉓</sup>。六月六日留日學生救國團開全體大會，要求政府公佈密約及附帶條件，宣稱協定一日不取消，救國團一日不解



散。會中並決定三項重要工作：一是成立宣傳刊物，此即當時發刊的「救國日報」；一是成立「勞動部」，目的在「演說既不能自由，故藉販賣機會與國人接洽，喚醒同胞」；一是籌組全國學生聯合會，作為拒約事件後，接替救國團的永久性機關<sup>③②</sup>。在基本上留日返國學生仍堅持以「只問外交，不干涉內政」之原則，進行救國活動。此顯然是在袁氏帝制活動前後，飽受壓制的驚恐之餘，加上對軍國政治的無奈，造成知識分子遠離政治的異常現象<sup>③③</sup>。不過，外交的失敗不能不牽引到對內政的不滿，這是五四運動之所以發生和必然的結果。

在旅滬留日學生的積極推動下，也激發各地青年學生救國的風潮。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的北大、高師、高等工專、法政專校等學生二千多人，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廢除協定，大總統馮國璋被迫接見學生代表。在上海，五月三十一日，由救國團、復旦公學、震旦大學、澄衷中學等十三校二千多人集會，推出代表向松滬護軍使盧永祥請願，要求阻止軍事協定，並允許學生自由集會<sup>③④</sup>。六月下旬，天津、南京、漢口、南昌、廣州、成都，都有青年學生分別集會，表達救亡心願。同時在留日學生的奔走下，京津地區的學生開始有了聯繫。北京學生組織了「愛國會」（後改名救國會），七月間這一組織的代表先到天津，又到濟南、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生們組成了近乎全國性的學生組織——學生救國會。學生初步有了共同的組織。由於學生活動的頻繁，引起了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不安，一方面嚴格訓令留日學生返日，否則取消學籍，同時禁止學生的集會活動；一方面北京政府教育及政治當局，對學生好言相勸，以軟硬兼施的辦法，迫使學生屈服，留日學生多數在七、八月後，紛返日本繼續學業<sup>③⑤</sup>。不過



，在國內的學生，基於愛國和救國運動的考慮，組織的學生救國會，發刊了「國民」雜誌，作為公開論政，堅決反日的共同論壇。同一時期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的「少年中國學會」，也在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成立<sup>36</sup>。其他如工學會、共學會也紛紛出現，這些表面上或為研究學術，或為敦品勵行的社團，實際上都為未來五四運動佈下了種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和會在巴黎召開，民國七年年底留日學生救國團即發表關於歐洲和議之意見，要求日人無條件歸還青島、膠濟鐵路、中東鐵路，甚至於要求收復台灣<sup>37</sup>。次年和議開始後，日本恫嚇參與和會的中國代表，造成國內青年的義憤，學生聯合組織疾起救國的呼聲，已響遍了各地。到這個時候，學生的勢力，不但已逐漸凝聚，連帶的新的社會勢力也在重組，這一切都表現在即將發生的五四運動中了。

### 三、學生的「五四」

#### 導因

民國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在法理上是戰勝國，決定派代表王正廷、顧維鈞、陸徵祥、施肇基、魏宸組出席次一月的巴黎和會。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此之前曾提出「十四點計劃」，主張廢止秘密條款，主張自由、公開、公平調整一切殖民地要求，尊重民族利益與各國



政府的主張。並保證各大小國家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sup>③⑧</sup>。這時候德國初敗，公理戰勝強權的口號高唱入雲，「威總統」被視爲世界正義的化身。中國代表也希望乘時取消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便向和會提出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撤消各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收回租界地、廢除客郵、取消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廢除日本二十一條款等。巴黎和會開幕時，國內的報刊充滿了幻想，紛紛著文慶祝。民國八年一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社論把歐戰的勝利，說成是「協約國及美國的大戰成功」，認爲巴黎和會中，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使中國能夠「與英法美並駕齊驅」。梁啓超在東方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也熱望國際聯盟的成立，認爲而今而後天下再無侵略主義了<sup>③⑨</sup>。但實際上又是如何呢？

民國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牧野伸顯在英、美、法、意、日五強會議上宣布，英、法、意三國曾於民國六年二月與日本簽署秘密協定，保證戰後協助日本，要求割讓德國戰前在山東及各島嶼的領土權。此話一出，美國的立場也變得猶疑。民國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代表更透露民國七年九月北京政府把濟順和高徐鐵路抵押，向日方借款，日外相後藤新平更建議，沿膠濟鐵路的駐兵權集中於青島，另派一支隊駐濟南，中日共管鐵路，對上列各項，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換文中，表示「欣然同意」，三天後又簽下濟順和高徐二路借款預備合同，日本掌有了一切法律上的根據，中國代表在和會上的努力，差不多等於白費<sup>④①</sup>。民國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威爾遜在和會上的態度動搖，局面不利於中國，四月底美、英、法三國代表秘密集會，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讓交日本，中國人於是從充滿了美麗憧憬的情況中跌入完



全失望的可悲境界，中國人尋找新世紀的黎明，却發現太陽沒有為中國升起，甚至於國家的搖籃也被竊走<sup>④1</sup>。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努力失敗的消息傳回，羣情驚憤，終於爆發了五四運動。

## 發 動

從巴黎和會中，山東交涉我國失敗的消息傳來之後，全國國民都非常憤激，一方面恨巴黎和會的不講公理，一方面恨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諸人的甘心賣國。各地各界，或發電政府，表示民意，或結合團體，共謀救濟方法。其中以學生界最為熱心。從四月底起，各個學生社團成員都自動集合起來商討國事，並決定積極進行在五月七日——二十一條款提出四周年那天，舉行示威大遊行的準備。後來失敗的風聲一天緊一天，青年學生氣憤的情緒再也無法按耐，五月三日晚間，就在北京大學開緊急會議，議決次日——五月四日，全體學生齊集天安門，整隊遊行，對政府表達民意。四日上午，包括北大、清華、北高、匯文等十三個高等專門學校的學生代表，又在法政專門學校開會，議決幾件要事：(一)拍電國內外，力爭山東問題；(二)喚醒各地國民；(三)組織北京學生對外永久機關——學生聯合會；(四)定當日下午遊行示威路線<sup>④2</sup>。下午一點半，滿懷愛國熱情的北京大專學生五千多人，齊集天安門，他們手執小白旗，上面寫著：「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國民應當判決國賊的命運！」「還我青島！」「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取消二十一款！」北京學界的一幅輓聯更表示學生的激憤心情：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北京學界同輓<sup>④3</sup>。」

除了旗幟標語，他們的口號「收回山東權利！」「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更喊出了中國人民的心聲。在集會中，北大國民社和新潮社分別準備了兩個宣言，一個文言，一個白話，充分表達了青年學生示威遊行的目的。文言的宣言全文是：

「嗚呼國民！我最親最愛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企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惡耗傳來，天黯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之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儕我于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然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是亡山東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拱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之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撒、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



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賊種，無可語于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極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爲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④④！」

白話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由羅家倫起草，五四當日沿途散發，是五四的重要文獻：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④⑤！」

到了下午兩點多，三千多學生整隊出發④⑥，先到東交民巷美使館，遞上說帖。要到英、法、意使館時，遭到巡捕的阻攔，學生只好退出東交民巷，向趙家樓、曹汝霖宅走。沿路分發傳單，許多人看了掉淚，許多洋人看見，脫帽喝采。到曹宅，軍警林立，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乘其不備跳入曹家，打開大門，學生湧入尋找曹、陸、章，這時曹躲入箱子間，章則避入地下室④⑦，學生搗毀器具，匡互生帶頭放火，章逃出，遭到學生的痛打，到六點學生開始散去，此時大隊軍警到



達，捕去了未及離去的三十二名學生<sup>④⑧</sup>，全送到警察廳監禁。

此次五四事件，明顯的可說是青年學生激於義憤而舉行的遊行示威，最後演變成多數參加遊行所不曾預料的騷動。學生主要的動機是真誠的愛國主義，沒有幕後的指使，也沒有黨派的煽動。如果沒有此後的發展，它或許只能說是學生對列強、對軍閥的一次集體反抗，是直接的救國運動。不過，它像許多社會運動一樣，由行動所激起的意識及心理上的變化和影響，則是可以肯定的。

## 擴大

五四事件後，學生被捕，使得北京學生恐慌而憤怒，隨即便朝著有組織的活動進行。五四當晚，北大學生集會，蔡元培校長也到場，表示支持學生，但勸阻學生逕往交涉，由蔡校長個人先和警察廳交涉。次日即五月五日上午，各校學生代表又開會，議決：由各校代表請各校校長呈請總統釋放被捕同學，同學未獲釋放前，各校一律罷課。下午再開全體大會，除通電國內外各機關團體一致行動外，決定成立北京學生聯合組織。這時社會各界同情學生行動，有的具呈保釋，有的報紙力為學生辯護<sup>④⑨</sup>。到了七日，十三所學校校長到警廳全力保釋，獲得允許，上午十時，各校的十三部汽車分別迎回被捕的三十二名學生，歡迎的學生齊呼「學生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情況極為感人<sup>⑤⑩</sup>。從學生的立場看，這是贏得了與政府對抗的第一仗。

從五月八日起，北京各校學生一律上課，但救國運動則仍繼續進行。一面組成「北京中等以



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一面進行抵制日貨，把各校售賣的日貨送到先農壇焚燒；一面又派出講演團到城鄉內外及近畿各地演說，喚醒國民，提倡國貨；同時還組織「北京學生護魯義勇隊」，準備隨時報效國家。他們的表現是強烈愛國意識下的救國行動。

當北京五四事件消息傳開之後，立刻得到全國學生的響應：天津的學生，五月六日集會，次日成立學生臨時聯合會，十二日召開千人追悼大會，紀念五四事件中，因傷致死的北大學生郭欽光<sup>⑤①</sup>。十四日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二十五日女學生也組成了「女生愛國同志會」。此後天津學生與北京學生聯手，密切推動全國性的學生組織<sup>⑤②</sup>。上海的學生，五月八日三十一校代表決定成立學聯會，十一日正式成立會，拍電歐洲和會專使，力爭國權；進行抵制外貨，由調查報告入手；並發表宣言書，呼籲青年學生努力喚起國民之愛國心，以切實方法挽救危亡<sup>⑤③</sup>。南京學界在五月七日舉辦國恥紀念會，有一萬人參加，會後遊行，向省長公署、省議會遞送請願書，其後學生又舉辦演說會，從事組織救國團，發動儲金救國運動。在武漢，五月十日中上學校十四校代表集會中華大學，討論力爭外交辦法，十四日成立學生聯合會，十八日各校學生之大遊行，激起救國風潮。其他如杭州、濟南、蘇州、無錫、揚州、嘉興、長沙、太原、南昌等地，短短兩星期內，至少有三十個以上城市學生舉行支援活動。特別值得一述的，很早就感受到外力侵略危機的留日學生，預備五月七日假中國駐日公使館開紀念會，不料七日當天，學生被佈滿的日兵、日警圍毆，學生受傷二十九人，被捕二十九人，後來釋放三十二人，仍有七人被控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的拘役罪，消息傳回國內，更增添學生的氣憤<sup>⑤④</sup>。



另一方面，在五卅事件後，政府應對的辦法是一面通知司法部查明禍首，依法訊辦，一面又令軍警維持秩序，不再縱容事故的發生。對被捕學生，原計劃移送法庭，後見鋒頭不對，允予保釋，但少不得嚴詞誥誡學生不得滋事。至於賣國賊，反不加懲辦，曹、陸提出了辭呈，總統還下令挽留說「曹汝霖體國公忠」，「陸宗輿，有裨大局」<sup>55</sup>。蔡校長則在獲知他被解除校長職務前於五月九日秘密出京，此事更激起學生對政府的不滿。由於北京政府對學生救國運動防制日嚴，五月十八日學生召開緊急會議，除了要求懲辦賣國賊、山東交涉不可簽字、挽留蔡校長、維持上海和議外，更決定五月十九日起全面罷課。

五月十九日，北京十八所專門學校先行罷課，次日，中學校也全部罷課，罷課後的學生生活動，一是組織演講團向國人宣傳愛國，一是組織「救國十人團」，進行演說及抵制日貨活動<sup>56</sup>。男女學生演講在北京街頭隨處可見，初受警察干涉，但宗旨純正，警察也受感動不再禁止。由於學生生活動大增，北京政府試圖與學生妥協，不意日本公使小幡忽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認學生鼓吹排日，要求取締，二十三日北京政府只好把學生聯合會發行的「五七日刊」禁止，把主持公道的「益世報」查封，二十五日教育部又下令限學生在三日內上課，由於軍警的干涉，加上學生也還沒與政府決裂的決心，便先停止了露天演說，專致力於販賣國貨。當學生生活動降低時，政府鎮壓的態度却增高。六月一日總統發布命令稱讚曹、陸、章，並責備學生，於是漸趨沈寂的學生，於六月二日、三日又大量流向街頭演說，結果學生被捕一千一百多人，並以北大校舍權充拘留所，京師戒嚴，氣氛緊張，使五卅事件的學生運動，又走向高峯，並迅速傳遍全國各地<sup>57</sup>。



## 共鳴

自從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限學生三天上課以後，總統又於六月一日接連下兩道命令，第一道說曹、章、陸功勞不小，國人不明真相，所以發生誤會；第二道誥誡學生不得「糾眾滋事，擾及公安」，並查禁學生聯合會及學生義勇隊<sup>58</sup>。六月二日，在東安市場販賣國貨的學生，被軍警捕去七人。北京學聯會當夜召開緊急會議議定：從六月三日起，每天派人上街演說，只說勸人愛國、勸人購用國貨二事，不提抵制日貨，又議定每回派出五十人，如被捕再派五十人，如官廳拘留一人，五十人一齊前往，聽從發落。四日因此有千來人被捕，教職員幫著張羅鋪被、饅頭和飲食。到五日上街的學生竟有五千人以上，軍警只好罷手不捉，至下午監管北大校園學生的軍警也突然撤去，學生却不願無故被監，又無故獲釋，不肯出校，後經調停，至八日始各回本校<sup>59</sup>。

北京政府六月二日起大事逮捕學生的舉動，引起了各地學生的憤慨，表現最激烈的是上海。早在五月七日上海學生便響應北京的五四愛國運動，由於京、津學生代表的不斷接觸，上海的學生活動的發展，反而成爲五四運動後期的中心，由於上海學生重視外界的聯絡，故五月下旬的大罷課步驟中，便有與商界聯合的打算。六月四日下午，上海學聯會獲悉北京學生被捕消息後，很快的，傳單號外佈滿市場，戴白布軟帽的學生——從抵制日貨以後，上海學生再沒有帶草帽的——填街塞巷，到處演說，要求工商各界一致救國。五日清晨，學生全部四出活動，南市首先響應罷市，跟著法租界、英租界、閘北、美租界都先後全面罷市。只見商店門上貼的、桿上掛的，



都是「不誅賣國賊不開市！」「營救學生！」「救國停市！」這些話<sup>⑥〇</sup>。隨著商人罷市，上海工人也開始罷工，南市華商電車公司和法租界電車公司的賣票人開車人、閩北商務書館印刷工人、浦東祥生鐵廠工人，招商、寧紹、大達輪船公司水手、江南船塢工人、滬寧滬杭兩路開車修機工人等，也都在愛國心的驅使下，走入罷工的行列<sup>⑥①</sup>。

學生罷課、商界罷市、工界罷工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表示民意」，除了各公團、私人拍發電報，要求北廷釋放被拘學生，懲辦賣國賊外，六月六日上海商、工、學、報各界，在總商會召開聯合會，到會一、四七三人，他們共同發了一個電報給北京政府，宣言非將國賊懲辦，誓不開市，同時對外聲明這是「中國人民最和平、最正當的愛國表示」，對內說明輟學的苦衷，「無非要除去賣國的奸賊，力爭國民的自由」<sup>⑥②</sup>。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三罷」過程中，社會秩序的維持，除了軍警、巡捕之外，學生聯合會的童子軍全體出發，各校學生也列隊分段站崗，協助維護治安，據說連上海的青紅幫也識大體的不造亂子，因此罷市七天，上海市井然有序，並無亂象<sup>⑥③</sup>。

由於上海的罷市罷工，也影響其他地區：南京商界在六日全體罷市，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學生，罷黜賣國賊，不達目的誓不開市。七日學生聯合會也派會員二千四百人出動，一半補助警力的不足，維持秩序，其餘的擔任演講，有專司糾察，有從事調查，有編演愛國新劇。南京以外的松江、寧波、無錫、常州、天津等地，都和上海取一致行動，先後罷市，宣言要待賣國賊的罷除，才肯開市。



## 勝利

上海、南京、寧波等地相繼罷市以後，政府雖然着慌，但地處東南，北京政府還有觀望意圖。到了六月八日下午，天津消息傳出，預定九日起一律罷市，市面銀根立刻緊急，北京的中國和交通銀行鈔票，在市面不能隨意兌現，一般商界也有響應天津罷市之意，於是北京政府終於不得不於十日同時下了三道命令，免去了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本職。十一日這一消息到上海，十二日清晨，上海各公團代表，各校學生數千人，齊集公共體育場，再由此地整隊出發，上街勸導各商戶開市。每團每校各有小旗，上書「國民一部分的勝利！」「發皇民氣！」「協力對外！」「感謝工界！感謝商界！」，沿途大放鞭炮，商店也回以鞭炮，升起五色旗，拍手歡呼，隨即開門營業，工人也開始入廠上工<sup>64</sup>。這次罷課、罷市、罷工，各界犧牲雖極重大，但結果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罷黜三個「賣國賊」，一般人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總算民意獲得初步勝利，也還值得。

由於學生愛國運動，造成各地區學生頻繁的接觸，各地學生除了本地的學生組織之外，也深深感覺到聯合組織的必要。六月一日，京、津、滬、寧及留日學生代表，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召集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籌備會，議決發電各地派代表集滬組成學生聯合會。六月十六日下午，全國學生聯合會正式在上海大東旅館六樓舉行成立大會，到會有北京、上海、留日學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濟南、嘉興、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寧波、河南、



唐山、蘇州、揚州各地代表五十多人<sup>65</sup>。教育、工商各界也都有代表參加。六月十八日，全國學聯會選出北京學生代表段錫朋為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為副會長，北京代表陳寶鐸為評議長。全國學聯會的成立，不只是說明這是這次學生運動中學生大結合的標幟，同時這一組織代表一個新社會產生的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往後的數十年頗具影響力。全國性學生組織成立之後，立即又投入五四還未完成的另一大事——拒簽和約運動。

本來山東問題，從四月底在巴黎和會決定之後，我國外交失敗，國內外公團、私人，打給和會專使，要求他們據理力爭，拒絕簽字的電報，至少也有七千通<sup>66</sup>。六月十八日山東派出請願代表團赴京請願，六月二十七日北京各界也舉行聯合請願，召開萬人大會，強調拒約救亡，甚至有推翻賣國政府，另組新政府的主張<sup>67</sup>。在巴黎和會專使，不只受到國內愛國運動的巨大壓力，並且還受到中國留法工人和學生的直接牽制。我國專使為尊重民意，不管北京政府的媚外決定，在巴黎竭力設法以「保留」解決。第一次要求「約內保留」，列強不允許；第二次要求「約外保留」，又不獲允；第三次要求「另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許，第四次要求「臨時公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之提請重議」，到六月二十八日午刻，又完全被拒<sup>68</sup>。是日下午三點，對德和約在巴黎凡爾賽宮正式簽字，我國專使終在國內強大壓力下，為正義、公理，出此最後抵抗，斷然拒絕出席簽字。至此五四運動中，學生的抗議目標，全部獲得實現。稍後的九月二十日，被迫出走的北大蔡元培校長，也重回北大任職。至此，學生的要求大體獲致滿意的答覆。學生救國運動所凝聚的力量不可忽視，這一點孫中山先生也有深刻的體會，他說：「試觀這



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sup>⑥9</sup>。」

## 影 響

從五月四日北京學生運動的爆發，經過六月三日、六月五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到六月十日曹、陸、章被免職，再到六月二十八日和約的拒簽，作為學生的「五四」來說，暫時可以告一段落。

這次學生運動，在政治上的兩個直接目標——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曹、陸、章的免職，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或改造北洋軍閥的政府，但一年之後，安福系垮台，段祺瑞下台，後來學生勇於與北京政府抗爭，仍可見到學生對政治改造的關切。巴黎和約沒簽字，山東問題雖一時沒解決，但學運擴大為全民運動的效果，表現民意劃時代的力量。中國外交由被動漸趨於主動，日本到了民國十一年底終不能不把青島交還中國，這多少說明國事取決公意的經驗，是歷史的新章。在五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中，許多人都肯定：這一運動純潔無私，直前奮鬥，是青年精神的表現；和衷共濟，協力同心，是互助精神的表現；沒有首領，由團體主動是平等精神的表現；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是犧牲精神的表現；公討賣國賊，是社會制裁精神的表現；督促專使拒絕簽字，是國民自決精神的表現；注意維持秩序，是守法精神的表現；不為無意識的排外，是自衛精神的表現；只有抵抗，沒有破壞是和平精神的表現；萬事公開，不守秘密，是真誠精神的表現<sup>⑦0</sup>。從近代中國羣衆運動的角度看，這些精神的確是五四的特色，是難能可貴的特點。不過，如



果從長遠的角度看，五四學生運動打開了學生參與政治的門徑，學生在政治運動中收到了效果，增漲了學生干涉政治的興趣，政治利益團體也開始運用學生力量，這在「後五四時代」的學生運動中，所造成負面的發展和影響，則又是不可諱言的事實⑦①。

## 四、文化的「五四」

五四運動和其他重要的社會運動一樣，是多方面的。扼要的說，五四運動在民族獨立、政治社會的改造和學術思想的自由有特殊的意義。「五四」的洪流當然不是陡然忽起的，而是有它的淵源。簡單的說，鴉片戰後中國在各方面的革新企圖和維新思想，中經辛亥革命之後國人改革的努力，都是匯流灌注於「五四」的泉源。大體言之，清末以降的革新事業，無論就教育、經濟、工業、軍事或外交，失敗者十之八九，成功者百無一二。辛亥革命的結果，未躋中國政治於光明，無進步成績之工業，未有足述的新教育，沒可用的新軍隊，無不失敗的外交，由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的艱辛經驗，的確構成了「五四」廣大而久遠的淵源。

「五四」在近代史上的確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其感人之深，號召力量之大，即使是現代知識分子也還深有感受。何以致此？主要的原因是「五四」除了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外，還同時具備了文化上的意義——此即所謂文化上的「五四」。



## 傳統價值的重估

文化上的「五四」，內容相當複雜，主要的特色，一是反傳統，一是新文學運動，另一是新思想的引介。如果把文化運動放在長時間來考量，那麼五四的巨浪實來自早期無數的潛流。民國四年新青年雜誌上攻擊傳統倫理與傳統制度的文章，乃至於民國五年春天袁世凱稱帝時，如火如荼的反孔運動，甚至早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康有為、章太炎、譚嗣同、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的文字，老早大量播下反傳統的種子。民國前十年，各式各樣與五四時期易白沙、陳獨秀、吳虞、魯迅等相近的反傳統言論，早就瀰漫。甚至可以說，傳統價值的翻轉，早在五四前一、二十年間，就已進行著了。翻開「新湖南」、「國民日日報」、「江蘇」、「女子世界」、「國民報」、「警鐘日報」、「天義」、「新世紀」……等刊物，「反儒家」、「反名教」、「三綱革命」、「家庭革命」、「打破階級」、「反道統」……種種激烈的破壞言論，充滿了篇幅。把「破壞舊社會」與求「變」當成正面價值的事，在五四之前已有相當的發展。袁世凱稱帝、祭孔和五四運動，不過是使它嚴重爆發的重要促緣<sup>72</sup>。

「傳統文化」範圍廣泛，一般指的是從漢以後「唯我獨尊」的儒家權威所構成的文化傳統。故以反孔為例，全面攻擊儒家的風潮起於袁世凱竊位前夕，陳獨秀的「新青年」，由第一期（民國四年九月）起，便從民主、科學、人權立論，不斷攻擊傳統倫理、風俗和制度。民國五年二月的青年雜誌，易白沙的「孔子平議」探溯孔教淪為帝王統治工具和被濫用的情形，同時指出孔教



絕非中國思想的全部。同時陳獨秀也直陳儒者三綱之說，「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sup>73</sup>」。反孔運動也得到四川知識分子吳虞的回應，他不僅在理論上批評孔子哲學，也在道德、法律、制度、風俗、歷史等實用方面給予嚴格駁斥。他的批判具有煽動力，胡適後來說他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打倒孔家店」也成為此時反孔的口號<sup>74</sup>。同一時期以優異文章風格，以小說雜文進攻傳統社會的是魯迅（周樹人），他的「狂人日記」，斥傳統倫理為「吃人」的禮教。這些「離經叛道」的吶喊，實際是當時新思潮流風的一面。對儒家倫理的無情攻擊，激起了守舊派如林紓等的反擊。不過在價值重估與反傳統的時尚下，傳統力量之不能迎敵，是可以想見的。

與反傳統相關的是文學革命。首倡者是胡適和陳獨秀。民國六年元旦新青年雜誌二卷五期刊出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他提出八事，作為文學改良的人門：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接著陳獨秀便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幟，發表「文學革命論」，聲援胡適的看法，他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字，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真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sup>75</sup>。」這篇文章，表面上限於「文學改良」的範圍，但實際上已涉及思想方式乃至生活方式，其中包涵了平民革命意識、反傳統的概念，這對廣大不滿現狀的青年，無疑是有刺激作用的。和胡、陳相呼應的是錢玄同和魯迅。錢熱情奔放，



激烈近於狂囂，魯迅則冷靜地，但狠狠的撕裂舊社會制度尊嚴的外衣，而基本上都在以「新」替「舊」，都在破壞舊傳統，求一個社會的新面目。白話運動的結果，白話期刊大為盛行，教育部也重行頒布注音字母次序，出版國音字典，帶動國語運動的推行。後來國小及師範的國文改用國語。白話文盛行的結果，國人對新思潮更肯下功夫研究觀察。文學社團紛紛成立，文學內容出現不同的風格，文體解放，使新詩、小說、戲劇、散文蓬勃發展，成就中國文學史璀璨的一頁。文學平易與自由運用的結果，相對的也使新思潮更趨複雜而多元。

## 百家爭鳴的新思潮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特色是「百家爭鳴」。而早期造成這一風氣的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從教員言論到學生社團刊物，紛然並起，兼容並包。知識分子在「新青年」的努力，在思想上也衝破了漢後獨尊儒術所形成「萬馬齊喑」的局面。孔孟之道到民國七、八年之後，權威既失，傳統價值受到懷疑，相對的，人們如飢似渴的吸收新知，西方思想乘隙而入。

從民國八年到十年間，國內學者發表介紹西方思潮的譯著不下百種，即以西方哲學而論，其中介紹實驗主義的有：胡適的「實驗主義」、「杜威哲學的根本觀念」、「杜威的教育哲學」（新教育，一卷三期，民國八年四月）；關素人的「實驗主義的哲學」（東方雜誌，十八卷三號，民國十年二月），衡如「杜威論哲學改造」（同上刊，十八卷八號，民國十年四月），楊端六「羅素之哲學研究法」（同上刊，十七卷二十號，民國九年十月），王星拱「羅素的邏輯和宇宙



觀概說」(新青年，八卷三期，民國九年十一月)，潘公展「羅素哲學問題」(東方雜誌，十七卷二十一號，民國九年十一月)。介紹唯意志主義、生機主義和生命哲學的有：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民鐸，二卷一號，民國九年八月)，張叔丹譯尼采「查拉圖斯特拉的緒言」、劉文超「自己與自身之人類」(同上刊)，張君勱「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談話記」(改造，三卷十二號，民國十年八月)，范壽康「柏格森的時空觀」(學藝，二卷九號，民國九年十二月)，馮友蘭「評柏格森的心力」(新潮，三卷二期，民國十年十二月)，蔡元培「節譯柏格森玄學導言」(民鐸，三卷一號，民國十年十二月)，張東蓀「創化論」(哲學，一、二期，民國十年五月)，費鴻年「杜里舒哲學概念」(東方雜誌，二十卷八號，民國十二年四月)，瞿世英「杜里舒哲學之研究」(同上)。同一時期學術團體的「共學社」、「尚志學會」以翻譯出版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著作爲主要業務，而新青年、民鐸、新教育、東方雜誌也都熱心的出版專號，介紹西方思想<sup>76</sup>。這段時間，一些有名的西方哲學家也應邀到中國講學，民國八年北京大學、新學會、尚志會、中國公學四團體聯名聘請杜威(John Dewey)來華講學，從八年到十年七月，前後兩年兩個月，遍歷十一省，做過百次演講，內容涉及哲學、教育、倫理學各方面。繼杜威之後，民國十年十月英國哲學家羅素(B. Russell)也到中國，停留十個月，先後到江蘇、北京、湖南等地，回國後還寫過「中國問題」一書。此外講學社本擬邀倭鏗(Eucken)、柏格森(Bergson)等來華，但未克實現。這些都表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新思想的熱衷追求。

在百家爭鳴，異說競起的時候，當然會引來一些爭執，在哲學思想上，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



與主義之爭，唯心唯物之辯；陳獨秀、陳大齊無鬼論與易乙玄等人有鬼論之爭；在文學方面新青年的白話文與桐城派、文選派的反對白話之爭；在教育方面，蔡元培和周春岳、余以智關於大學學制改制之爭；在歷史學方面，有顧頡剛、錢玄同和劉然黎、柳貽徵關於古史辯之爭；在心理學方面有陳大齊主張的行爲派和南京高師的實驗派之爭。這些爭論範圍廣泛而龐雜，在百家爭鳴的高潮中，充分表現了學術民主與學術自由的濃厚氣氛。在各種思想流派對立爭辯中，往往觸及改造中國，甚至改造世界的討論，這對廣大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更易引起對中國政治、社會改造與中國前途的思考。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喊得震天價響的口號是「民主」、「科學」。但不論「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意義都籠統而廣泛，有的甚至可以變成「主義化」、「萬能化」。在基本上，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的包袱下，共同追求「救國」的目標，爲了救國必須改造中國，爲了改造中國，一方面必須打破舊中國，視一切思想、行動只有工具性的意義，而無目的性的價值；這樣一方面便容易把當作手段的思想，通通會被吸納作爲改造中國的方法。於是蘇俄十月革命中，被視爲改造舊帝國有效的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施蒂納、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的各種無政府主義、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歐文的合作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議會主義等，五花八門，全部都流入中國<sup>77</sup>。五四時期的許多知識分子的確熱衷對社會主義的介紹，他們當時也的確是基於救國的熱忱，視社會主義爲新思潮的一支而樂於引入<sup>78</sup>。這種挾泥沙而俱下的時節，這些龐雜思潮的介紹，對日後



中國的影響是可以想像的。至少在民國九年夏天之前，當時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樣，都著重在學術的研究介紹，殊少行動的決心，不過對俄國革命的同情心理，則在普遍的高漲之中<sup>79</sup>，適時共產國際的刻意培植和運用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稍後竟變成爲有組織之政治團體的「意地牢結」(Ideology)，這當是五四初期知識分子引介新思潮時所未曾預料到的事。

學生的五四運動，是出於青年熱愛國家，是青年自覺於國家危亡之秋的處境，做出一番救亡圖存的努力。這一行動先前也受到白話文運動的啓發，新文化運動的刺激所造成的。待五四發動之後，五四也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從此一切文化整理、文化改革、文學創作，都因「五四」的精神而有了依歸。「五四」使中國知識分子對個人人權與民族獨立迅速覺醒，在思想和行動中團結了民衆，加快中國「民族國家」形態的統一，並由此運動在經濟、社會、政治和思想各領域，加入許多新的因素，形成了爾後現代中國的特質。故如不能掌握學生的「五四」和文化的「五四」的特性，也很難瞭解日後中國的發展。

## 五、「五四」後學運發展的動向



## 五四時期的學生與政治

傳統中國學生被視為社會優越身份的遞補者，學生也都把學校作為入仕晉身之階。因此新教育推行的初期，學校不過是變相的科舉，入學只為個人仕途出身<sup>⑧〇</sup>。但這種風氣，民國五、六年後開始轉變。蔡元培民國六年出長北大，首先聲明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主，非為個人仕途。北大風氣丕變，其他學校學風也有了轉換。除了學風之外，從袁世凱以後的北京政府，對任何不利思想滲入校園，多半加以壓制，南北對立的局面下，一般北方學生很難接觸到南方政治的訊息，包括國民黨的勢力和思想及刊物不易進入校園，這是可以想見的<sup>⑧1</sup>。民國六年北京政府都還頒令學生不得加入政黨<sup>⑧2</sup>，其防範學生干政的用心十分明白。學生甚至於一般知識分子在這樣的環境下，加上政局机阻不安，政治局勢一直難予改善，他們也對政治感到悲觀和失望，知識分子對政治的疏離，實是五四前顯著而普遍的現象<sup>⑧3</sup>。

民國六年以後，蔡元培主持北大，確實是以培養學術研究的風氣為目標，但他在北大的一番大改革，例如：個人民主與自由的尊重，却使具有政治潛力的個人自由得到充分的發展；他提供有助思想發展的自由討論場合，鼓勵學生自我獨立意識的建立，以及對國事的關注，正又促使教授和學生走上了政治激進與積極參與政治的道路<sup>⑧4</sup>。這毋寧說是蔡校長改革校政的副產品。儘管蔡校長、胡適等人，並不鼓勵學生參與政治<sup>⑧5</sup>。但是一股致力政治社會改革的勢力，已逐漸滋長，新社團、新刊物如新潮社、新青年、學生愛國會、國民社等，在致力於「思想革命」之餘，已



孕育了強烈的救國意識，所差的只是一個導火線而已。民國七年對「中日軍事協定」的反日運動，由留日學生返國激發了國內學生的反對運動，儘管明揭「不干涉內政」，但激起學生對國事的重視，認識強固聯合組織的必要，部分學生更產生了澈底改變現實政治的想法<sup>86</sup>，實已表明青年學生已走近政治。

民國七年下半年，由於對國家存亡危急意識的增高，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也開始認真的注意國事。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實際上已放棄了不談政治的初衷，他還認為「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可以不理，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能裝聾作啞呢<sup>87</sup>！」蔡元培雖認為學生分心來辦雜誌以喚醒國人，多少是個損失，但認為在國民大多對國家危亡無意識的情形下，以少數愛國家者出而喚醒大多數國民，抵制斷喪國家之行動，又非學生莫屬，這也是不得已的事<sup>88</sup>。北大教授李大釗則是鼓動學生參與政治最熱心的一人<sup>89</sup>。

五四事件的爆發，起於中國在巴黎和會中外交的失敗，是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情緒。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僅止於外交的抗爭，今則涉及政府責任的追究，而事件發展的結果，學生對政治參與的熱情也迅速增高，因此愛國運動造成的政治風潮，使北京政府的威權盡失，學生組織凝聚的力量令人刮目相看。學生的勝利，更證明學生力量已是中國不可忽視的新社會勢力。這一結果在稍後幾年顯現的情形是：一方面導引政治勢力介入了學生運動，一方面使許多學生政治化。學校不能再只是純粹的學術研究場所，同時它也是政治改革與社會改革的發源地。學生在學運中的單純角色，一旦轉化為政治運動的寵兒，學生對自身的運動往往身不由己，逐漸喪失其獨立



性。學生政治化的結果，「學生運動」便有變成「運動學生」的可能。五四以後的學生運動也就不再那麼單純了。

在五四時期學生對政治由疏離走向參與的過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是：與青年學生一向有密切關係的革命黨，究竟在這時期扮演什麼角色？革命黨在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後，政治上一時喪失了領導地位，黨人分散各地，在這一段「艱難頓挫」的時期，黨部轉移到海外，組織和活動都有一定的侷限。五年六月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造亂，從六年到十二年孫中山先生在南方進行反軍閥的努力，遭到連番挫折，革命黨的處境是「屢作屢起，艱苦備嘗」。這一時期中山先生的言論不易影響北方，革命在北方活動更無法開展<sup>90</sup>。民國七年底到九年正當五四運動高潮之時，中山先生正好在上海從事著述，他曾對學生問題和山東問題表示過意見。民國八年七月當廣東軍政府逮捕學生，中山先生曾致電軍政府要求釋放學生，另外，在對德和約簽字前夕，他發表了一份關於山東問題答日本記者的書信，譴責日本對山東的權利要求。並認為山東應歸還中國<sup>91</sup>。雖然革命黨在五四事件中並不扮演積極的角色，但是包括孫中山先生在內的革命黨人，對這一事件都採取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在許多函件中都顯示中山先生讚許學生的愛國行動，重視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認為這是國民知識的進步，是新思潮促成民意的覺醒<sup>92</sup>。中山先生也深切瞭解學生的愛國熱誠，學生有的來信請教，有的到上海晉見、傾談，在上海的學生組織還邀請他演講，表達了青年學生對革命領導者的敬慕之意<sup>93</sup>。「五四」發生後，在上海主編民國日報的革命黨人葉楚傖，在五月七日便發表了一篇社論，把北京學生稱作救亡雪恥的「五月七日之神」，他說：



「在萬鈞壓力下，（學生）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業來，這是五月七日之神，這是中國的恩人，這是山東問題瀕危中救命的丹方，這是留得一兩分良心的國民的模範，所以我應該代表國民，向北京學界，伸一百二十分的謝忱，並且誓與被捕的學生同生共死<sup>94</sup>。」

對日本有相當認識的革命黨人張繼和戴季陶、何天炯，於五四後四天——五月八日，在上海舉行記者會，向日本新聞界人士發表「告日本國民書」，表達對日本要求山東權益的憤慨，並盼其懸崖勒馬，改以平等、自由、互助之精神相待<sup>95</sup>。當五四消息傳抵上海，上海的黨人包括葉楚傖、邵力子、朱卓文、焦易堂、丁象謙、陳家鼐等，積極主持「國民大會」以響應北京的學運。這一時期卜居上海的重要黨人爲胡漢民、朱執信、廖仲愷、戴季陶等，除以文字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外，還經常與學生往還，熱烈贊助學生的活動。

對於五四前後蓬勃發展的新文化運動，中山先生十分重視，也作了回應。從學運的發展，中山先生體會到新思想「鼓盪陶鎔」之功，把握了新文化運動中「思想之變化」的重要性，故立刻命黨人創辦報刊，作桴鼓之應。民國八年六月八日，由戴季陶、沈玄廬、孫隸三主編的「星期評論」出版，這一份五四時期與北方「每周評論」齊名的刊物，注意社會勞動問題的探討，言論頗受知識分子注意，民國八年八月，革命黨另一份理論性刊物「建設」雜誌創刊，由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主編，以三大主義爲中心，並以五四流行的論題，如白話文學、婦女地位、儒家傳統、軍隊改造、羣衆運動等，作深入的分析。這一雜誌給人家的印象：是五四的四百種期刊中，具有「顯明主張」，給五四運動「以絕大政治動向」的刊物<sup>96</sup>。除了這兩種期刊外，中山先生還計劃



出版一英文雜誌和創辦一大印刷機關，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給海外同志的信中，表達了這一構想，更重要的是信中透露了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公允的評價：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撓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大放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sup>97</sup>。」

在上海，還有一份由黨人所辦的報紙是「民國日報」，在葉楚傖、邵力子主持下，民國八年六月改用白話，它的副刊「覺悟」是介紹世界新思潮和討論新文化的園地，影響很大。而遠在福建的漳州，這一粵軍根據地，在革命黨人的影響下，陳炯明也創辦了「以福建為圓心的起點，作新文化運動」的「閩星」半週刊，帶兵官也作主義和文化的介紹、宣傳，更顯示了革命黨人對新文化運動的熱心與支持<sup>98</sup>。

從新文化運動的本身說，其初本非政治運動，所以發生，一方面是民初知識分子對當時現實政治失望，故相率談文化不談政治；一方面是當時知識分子認為政治的基礎在文化，故著重文化



社會層面的改革。這一新文化思潮當然有助於學生的覺醒。到了民國八年的「五四」，在學運的帶動下，促進了工運、婦運的興起，也喚起國人普遍尋求個人解放、社會平等和國家獨立的意識，而這一文化思想革新的要求，是無法在思潮運動與社會運動中得到滿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國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國才能轉動<sup>99</sup>。」民國九年之後，相約「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陳獨秀等人，一個個又走回政治的領域中，這代表新文化運動發展的趨向。這期間，在南方的革命黨，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正迅速的採取若干措施，例如：改變黨的名稱、廣泛吸收黨員、充實黨的理論、標舉新政治的理想和目標、充分運用白話文作為宣傳媒介，正確的掌握了時代的脈動，終於贏得了許多五四知識分子的好感與支持。於是正如陶希望所講的：由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所啓發的思潮，最後「納入國民革命之河而歸於三民主義之海<sup>100</sup>。」也正如羅敦偉所說的：

「五四運動所提政治方面的口號，都與國民黨的政綱相同，很快的合流於國民革命，所有五四運動學生中的中心人物，後來都成爲中國國民黨的幹部。當年眼光敏銳的國父，也設法爭取了五四運動，獲得全國廣大羣衆的擁護。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後，正式採取了五四運動時期政治性的口號。全國廣大羣衆，一致擁護北伐，大多數五四青年參加中國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不能不說五四的貢獻<sup>101</sup>。」

這應該是革命黨人贊助「五四」，而「五四」又影響革命黨的具體說明。



## 「五四」後學運的發展趨向

民國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代表拒簽巴黎和約，學生以「五四」開始的抗議和示威行動告一結束。七月二十二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停止罷課抗爭等學潮，學生全面性的政治運動可說告一段落。不過個別地區性的學生運動，却仍在各地發生，即使北京也不能例外。

大體上說，「五四」是學生界活動的重要標誌，在此之前學界是靜寂的、個人的、被動的；在此之後的學生界多半主觀熱鬧的、社會的、自決的。五四運動，學生由校園走上街頭，過了一段開會、遊行、請願的「新生活」。五四之後，承此餘緒，各地學潮不斷。根據常道直的研究，以民國十一年全國十六省為例，共發生學潮一〇六次，發生在中等學校者，佔六十七%，發生在大專院校的有二十三%，在小學也有一〇%，學風敗壞可以想見<sup>⑩</sup>。民國九年之後，政治不安定，學校經費不足，教育人才不夠，教育制度不健全，都是學潮的因素。其中不滿校務的最多，其次才是政治外交問題。涉及校務的學潮規模通常不大，但愈到後來，涉及政治外交事項的學潮，便愈嚴重，往往驚動全國。學潮的發生，以地區而論，蘇、浙最多，其他則粵、桂、直、魯、閩、湘、鄂、皖、贛等省也都不可免。北京上海仍是學運的中心，兩地的學運往往會引發其他學生的共鳴，這顯然和學校集中，學生人數較多，是學生組織的重心所在，以及歷史的因緣相關。

民國九年以後學生運動的發展有幾個重要趨向，第一是對教育改革的要求。由九年到十四年的案例統計，學生謀求校務改革的「救校」運動最多，涉及的有撤換或挽留校長教員的；有要求



學校經費獨立、經濟公開的；有要求改良課程、反對考試、參加校務的；有要求爭取學生權益和自由的<sup>⑩③</sup>。這些學潮有的可以經由調解獲得結束，有的引發爭執甚至流血衝突；有的造成派系糾紛，校園永無寧日，嚴重的導致學校關門大吉。學潮頻生，對學校或學生兩者皆不利。第二個發展趨向是致力於打倒軍閥。五四學生有主張「打倒賣國賊」，類似參與內政的號召，而真正的態度是以罷免曹、陸、章為己任，基本上，只止於外交的要求。民國九年北京學生聯合會被迫解散，學運轉趨消極。不過，學生在五四後已以國事為己任，見國事之蝸蟻，當然難以置身事外。民國十年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三屆評議會在滬召開，出現了「否認北京政府」的提案。這時候北京學生代表還不能完全贊成，但到了十二年北京學聯會竟以反對北京偽政府案，遭北洋政府查封<sup>⑩④</sup>。北方學生政治態度的巨大轉變，正說明學界對北京政府的失望和不滿。民國十二年三月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召開的第四屆評議會，開幕當天即提出「澄清政治，擁護人權，獨立教育，力爭外交」的四項目標，從此學運不再侷限於外交和教育的興革問題<sup>⑩⑤</sup>。再一個月，全國學生總會的五四紀念通告，揭出「打倒北洋軍閥」的口號<sup>⑩⑥</sup>，這透露的訊息是：青年學生已對北京政府完全絕望了。

國家權益的爭取和收回，是五四學運訴求的主題，也是五四後學生運動一脈相承的目標。「外爭主權」的原始出發點是來自強烈的民族意識，這種「學生民族主義」(student nationalism)<sup>⑩⑦</sup>表現在政治口號上便是「反對帝國主義」。從民國八年下半年福建和山東，先後發生學生反對北京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權益的風潮，九年一月天津發生學生因檢查日貨，



遭軍警打傷，學聯會被封，引起北京學生遊行抗議，甚至於重演罷課事件，到十四年的五卅運動，青年學生的救國活動無不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從反對列強到反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展開，更在在顯示了學生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

五四後學運的目標不論教育改革的要求、北洋軍閥打倒的呼籲或國家主權收回的努力，基本上都是起於對北京政府政治的不滿。相對的在南方以孫中山先生為首，正在興起中的國民革命勢力，則正確的掌握了時代的脈動，熱切贊助學運，迅速響應新文化運動。他們標舉的三大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軍閥」兩大口號，正符合學生運動的要求，青年學生的力量終於匯歸國民革命的主流。這只要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動向，就十分清楚。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是全國性的學生組織，民國八年六月十六日「五四」之後成立，初創時動機單純，就是為了從事救國事業。該會成立時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他經常接見學生會代表，革命黨人也讚賞學生組織的能力不可多得<sup>⑩</sup>。五四後一兩年學聯會的活動較為少，不過到了民國十年由於「教潮」引發學潮<sup>⑪</sup>，學生對北洋政府不滿，這一年八月學聯會第三屆評議會遂有「否認北京政府、承認南方政府案」的通過。民國十二年學生驅逐教育總長彭允彝案的學潮<sup>⑫</sup>，給予北京學生界重大刺激，參與政治問題終於無法迴避。三月間舉行的全國學聯會第四屆評議會，通過了武漢代表提出的「對於現政治的態度之建議案」，認「中國政治問題及其亂源根本，不外兩因：一為北洋軍閥之存在；一為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播弄。根本解決方法，惟有國民革命之一途。」並明白指斥「北洋軍閥亂國殃民之罪，袁、段除外，未有甚於今日之吳佩孚、曹錕，……」



目前急切工作，便在打倒北洋軍閥派禍魁吳、曹<sup>⑪</sup>。」學聯會的政治態度與南方的革命黨完全合流。學聯會的聲明觸怒了吳佩孚，也為租界當局所不容，學聯會總部遂宣佈遷至廣州。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在廣州召開的學生聯合會第五屆評議會，中山先生親臨致詞，要求學生共負革命責任，合力解決國事。這次大會通過「請孫公中山組織政府行使總統職權」案，並通電全國否認北京政府<sup>⑫</sup>。大會發表的宣言，更明白的說明青年學生的力量已匯入國民革命運動的主流：

「我們覺得現在所需要的是民治主義，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我們要全體加入民主革命的戰線上，贊助三民主義，與主張三民主義者攜手合作，使三民主義早日成功<sup>⑬</sup>……」

到了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重視青年學生的力量，指出「學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分子，而且已在國民革命進行中佔得位置<sup>⑭</sup>。」當然，毫無疑問的，後來北伐事業之得予順利完成，青年學生的結合和參與的力量是不能忽視的。

## 六、結 論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它壯闊的思潮，的確在中國文化上、政治上掀起了軒然巨波，甚至於到今天都還餘波蕩漾。五四運動的本身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包含了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商人罷市和工人罷工、抵制日貨，以及新知識分子的社會與政治運動<sup>⑮</sup>。不論是文化的「五四」，抑或學生的五四運動，基本上都是來自民國以後逐步漲高的民族主義浪潮。



從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後，青年學生一致認定日本是中國之仇敵，因此凡親日者皆國民之公敵。當時掌握北京政府的是皖系，他們對外主張及實際行動爲「親日」，對內主張「武力統一」，這兩者與當時的國民心理正是背道而馳，人民都反對之。曹、陸、章是親日的外交人物，皖系對日借款、締結軍事協定，多半爲一派一系的私利，故國民積恨已久，不是一朝一夕之故。學生的「五四」之所以發生，一是歐戰結束，巴黎和會我國山東問題交涉失敗，加上北廷外交上有「欣然同意」之說，使青年學生忍無可忍；其次「五七」、「五九」均二十一條國恥之日，舊恨新仇，均集於五月，五四運動之爆發遂不可免。五四運動發生後能獲多數之同情，因學生之行動是真實代表民意之運動，而政府之處置未當，亦是原因之一。

與學生的「五四」有密切關係的是文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五四」之前，就表面言之，提倡新文化是主張以語體文，建設平民文學，用以代替高華典實之貴族文學；就實質來說，所謂新文化實是以自由主義爲基礎的文化。當時知識分子本自由主義，對中國舊日倫理發生懷疑，而提出最嚴格的批評，造成反叛的特質，破壞性極大，稱之爲「思想的大解放」並不爲過。五四運動是有組織的學生羣衆運動，新文化運動得此組織，得此機會，傳播益廣，效力更大。這兩種運動結合的結果，影響極爲深遠。政治上直接可見的是五四事件後，曹、陸、章遭到免職，內閣垮台，總統亦提出辭職。巴黎和約最後拒簽，一年後，段祺瑞失勢，安福系解散，北洋政治益失人心。而同一時期顯著看到的是民衆勢力的發展、社會組織的增加，「民主精神」開始萌芽，社會和政治結合的「民治」基礎也逐步發展。文化上或許這是一段大破壞的極峯，不過



，由少數人到多數人的覺悟，熱鬧的出版物，壽命雖有短長，介紹西洋文化深淺不一，總多少有喚醒社會促進思想改革的效力。同時五四後一般學生把對政府的眼光移轉來對學校，各地學潮蜂湧，當然也有缺失的一面，不過也帶動教育的改革。懵懵懂懂的學生，鬧起了知識的饑荒，學校團體生活與社會服務生活，也多半從這時候開始培養出來，新時代的「新學生」羣，五四前後有明顯不同的形象。

五四運動的意義十分重大，它不僅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甚至於是中國有史以來，唯一瀰漫全國的民衆運動。讀書人集體作政治運動，在中國本有先例，東漢太學生的伏闕上書，明末東林復社的維持清議，戊戌政變前的公車上書，都是以書生干預朝政。不過規模不大，也未波及全民衆。「五四」開始是學生運動，後來演爲民衆運動，全國學生總會成立後，工界、商界的總會繼起，協力作外交的抗爭，而又居然達成目的。可以說五四運動，是中國民衆另一次集體地覺悟到自己的責任，第一次表現公意於共同行動，第一次顯出民衆力量的偉大<sup>①①⑥</sup>。

「五四」更重要的還是一種文化運動。辛亥革命因是文化變革的前導，但並不能完全洗滌傳統政治的積蔽，也不能廓清傳統社會的遺毒，故而由政治到文化思想，引發出來的反抗傳統文化運動，來勢凶猛急遽，許多知識分子披上了西洋的新裝來評中國的舊制，對傳統則「批判」的精神充斥，對新制度、新思想的介紹往往淺嘗則止，但他們的確是能以清淺的理智主義對舊思想、舊制度加以無情抨擊；他們筆下和口頭上的「德先生」「賽先生」，雖然面目模糊，却生氣虎虎，栩栩如生；他們的思想雖粗淺不深入，積極而不澈底，但反抗的情緒、改革的精神，則咄咄逼



人<sup>①①⑦</sup>。這樣「一齊打爛」容易，「重新做起」就困難了。

五四運動影響雖然廣遠，但不論文化的「五四」，抑或學生的「五四」，都有它消極的一面。首先是參與運動者熱誠有餘而沉着不足，在引發一場騷動之後，就沒有對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提出一套長遠的設計。故而進行「全面的反傳統」，却也仍逃不出傳統<sup>①①⑧</sup>，做「全盤的西化」運動，仍然只能吸取別人的皮毛。五四掀起「大破壞時代」的序幕，表現出來的特徵是反抗的、改革的、移植的，「惟其反抗的，故勇敢而缺乏沉思；惟其是改革的，故實際而無系統；惟其是移植的，故美觀而不深入<sup>①①⑨</sup>。」從古今中西文化言，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困境就是在：該揚棄的沒有揚棄，該繼承的沒有繼承，該引進的沒有引進，該排拒的沒有排拒。又因為學生的「五四」和文化的「五四」，在本質上有愛國與知識的不同，前者是感情的，後者是理性的，五四時代救亡圖存的意念急切，故文化的理想反被削弱，所謂「救亡與啓蒙的雙重變奏」，愛國主義使知識分子走近政治，疏遠了學術，這是後世學者論五四感到遺憾的一面<sup>①②⑦</sup>。

其次，羣衆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但如一刀之兩面並不宜輕於使用，輕於使用反有自傷的危險。以學生運動而言，五四運動的動機純正，也發揮了大效力，但民國九年之後，學生為校內改革，為中日直接交涉，常以遊行罷課作手段，一年之中大半光陰被犧牲。而學校風紀一旦被毀，純正的學風更難以建立。五四時代遊行罷課的抗爭方式，後來成為學生運動的範本，有人譏為「浮囂」，也不見得是出於偏見。

五四運動延續了「讀書不忘救國」的歷史火種，聲勢上前所未有，故在時代的意義上也不止



一端。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是民族主義，但也不以民族主義為限，所謂「外爭主權」是對外打不平的，所謂「內除國賊」是「使公僕知吾國有主人，而正其僭竊之罪<sup>①</sup>」是民權的申張，這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軍閥」的口號實相一致。五四本身是學生基於救國意念的行動，是自動自發的愛國壯舉，但思想上仍有其淵源。革命的領導人和新知識的導師，都是長期激勵學生對國事及世界關心者，當然會直接、間接的鼓舞了這個運動。不過這些領袖並未直接倡議五四當天的示威，遊行現場也沒有任何政治勢力作為前導。但值得一提的，當時北方的新思想領袖像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都是老革命黨人，而革命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在五四前後，更予學生極大的關注和聲援，他在五四之後改組國民黨，接納新生力量。這表示一個大政治家受到五四的影響，又能立刻掌握五四之後中國新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趨向<sup>②</sup>。這應該是後來國民革命的怒潮能茁壯澎湃，造成中國政治新局面的原因。

## 註釋

①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見每周評論，第二十一號，民國八年五月十一日出版。

② 對五四運動時間的界定，周策縱主張民國六年至十年，見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6. 張玉法主張民國四年至十二年，見張著：中國現代史，



(台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六年初版)，頁二五四—二五五；鄭學稼主張民國八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見鄭著：《中共興亡史》，第一卷下冊，(台北，民國六十七年再版)，頁八三八。

③ 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號，羅家倫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首先創用了「五四運動」這一名詞；胡適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了一本英文小書稱五四為「文藝復興」，見 Shih Hu,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1934。周策縱及張玉法之指稱均見前引書。

④ 大陸學者的歷史著作，撇開了具體的歷史事實，說「五四」是由舊民主主義過渡到新民主主義的運動，是中共萌芽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典型的新著作，見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一九八三年出版。

⑤ 拒俄運動的原始資料見：楊天石、王學庄編，*拒俄運動*，一九〇一—一九〇五，(一九七九年北京出版)；又參見黃福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三集(民國六十一年出版)，頁二六〇—二六八；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取締規則風潮個案初探」，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台北出版)，頁一二五—一九〇。

⑥ 民國四年三月十一日留日學生總會成立，推沈定一為幹事長，大會通過決議五條：一、電請政府拒絕要求，並公布其條件；二、以文字警告勸導海內外國民，三、擬定留日學生對外宣



言，四、京滬設立分機關；五、決定歸國辦法。見申報，民國四年三月四日。

⑦ 見上海時報，民國四年三月八日。

⑧ 「教育部訓誡留日學生」、「救國之異解」，申報，民國四年三月六日。

⑨ 時報，民國四年三月十九日。

⑩ 程天放說那幾天「連飯都吃不下，睡都睡不安，過了相當長的時期，情緒才穩定下來。」程

天放早年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七年出版），頁二十二、二十三。

⑪ 黃福慶：「五四前夕留日學生的排日運動」，前引文，頁二六七；又參見衛民：「五四學生

與政治」，台大政研所碩士論文，頁七七。

⑫ 參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一九。北京中國公學學生

發起「學界國恥自勵實踐會」公啓中說：「學生者，任重致遠之代名詞，國家社會之中樞

……磋商規約教條，大意在根據獨立之精神，以保國性，造就完全之人格，以備往後儲藏惟

一之蓄力，以待不時。」見申報，民國四年五月十九日。

⑬ 蔣夢麟：西潮，（台北中華日報社，民國四十八年出版），頁六七。

⑭ 例如留日歸國的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於民國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上海出刊。

⑮ 「中華全國學生救亡會進程序」，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六年六月七日，「徵求會員啓」，

同上刊，民國六年七月三日。

⑯ 「中華全國學生救亡會宣言」，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六年六月八日，「救亡會」正式成立於



民國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負責人爲孫漱嚴、程天放、劉杜衡、李自立、熊夢周、何極、朱鐵樵。

- ①⑦ 「留東學界大鬧使館詳情」，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 ①⑧ 「留日學生總會覆學生救亡會函」「學生救亡會再致留日學生總會函」，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①⑨ 教育的發展分期及學堂學生數均採自陳啓天：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民國五十一年，台北文星書店影印），頁五六—五八；一六四—一六六。
- ②⑩ 同上，頁一六六。
- ②⑪ 同上，頁三七九—三八〇，這一數字並不包含教會學生數。這個數字併見第一回中國年鑑（民國十二年），商務印書館編印，頁一八六三。
- ②⑫ 馮友蘭：「北大懷舊記」，國立北京大學紀念刊，第三冊，頁二四九。（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六十年影印）。
- ②⑬ 詳見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五集，（台北，民國六十五年），頁二八一—二八六。
- ②⑭ 蔡元培：「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出版，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一九八四年北京中華書局），頁二一一。
- ②⑮ 蔡元培並不贊成學生不斷的從事激進的抗議行動，以致扼殺學術的研究，參見陶英惠前引文



· William J. Duiker, *Tsai Yua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ter 6.

- ②⑥ 參見文叔：「五四運動史」，學生雜誌，卷十期五，（民國十二年五月五日，上海出版）。
- ②⑦ 各協定內容，參見王芸生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卷七，頁二二八—二二九、二三〇—二三四。
- ②⑧ 「留東學界同人關於抵制簽押條件及全體歸國求學方法之意見書」，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
- ②⑨ 「留學生歸國消息」，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五月二十日。
- ③⑩ 「學生歸國進行方針」，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七日；「留東學界歸國求學方法意見書」，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五月十七日。
- ③⑪ 「留日學生多數回國」，時報，民國七年六月六日。
- ③⑫ 「留日學生救國團全體大會紀」，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六月七日。
- ③⑬ 留日學生全體歸國之決議，從一開始便有「聯絡全國一致對外，並不預聞內政」的主張，其中自然有避免北京教育部干涉的苦衷。不過這一主張，也有人提出質疑，例如程天放「告歸國留學生」一文，就認為一致對外，只是美麗名詞，北京政府殘民以逞，早為國人痛心疾首，「嗚呼，以若是之政府，而欲與之一致對外，則除一致賣國之外無他道。……今以惡政府之開門揖盜，日人乃得遂其亡我之願，諸君欲挽危亡，不謀所以革新政治，排除國賊，而專



言對外，則試問如何對法？」見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六月一、二日。

③④ 「上海學界請願廢約」，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六月一日及二日。

③⑤ 衛民：前引論文，頁一一三—一一五。

③⑥ 參見：張允侯、洪清祥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九七九年北京出版）第一集，頁五三六—五三八。

③⑦ 見「學生救國團對於歐洲議和之意見」，上海民國日報，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③⑧ 威爾遜（W.W. Wilson）的十四點計畫（Fourteen Points）是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在美國國會的演說中提出的，內容見 William L. Langer ed., *An Encyclopedia & World History*, p.944（民國五十二年台北影印本）。

③⑨ 梁啟超：「國際聯盟與中國」，東方雜誌，卷十六，號二，民國八年二月出版。

④⑩ 參見周玉山：「五四運動探實」，東亞季刊，卷十九，期一，（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頁八。

④⑪ Chow Tse-tsur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93.

④⑫ 文叔：「五四運動史」，學生雜誌，卷十號五，頁四。民國十二年五月出版。

④⑬ 曹瞞即曹操，在三國演義中被刻劃成奸臣，此影射曹汝霖；章惇為北宋王安石派，被司馬光視為「大奸」，此處譏諷章宗祥。



④ 此文言宣言，據稱是出於許德珩的手筆，這篇宣言當時未及印發，但事後仍流傳全國，文見龔振黃編：《青島潮》，附錄，民國八年八月出版。

⑤ 文載每周評論，第二十一號，民國八年五月十一日出版；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第一冊，（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台北出版），頁一。

⑥ 參加遊行人數有說五千，有說三千，據北京京師警察廳檔案記載，大約為三千餘人。見彭明：《五四運動史》，頁二七二—二七三。

⑦ 火燒趙家樓的情形，描述較為可信的是匡互生自己的記述，見匡：「五四運動紀實」，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七年，第二期，頁一二〇—一二五；曹汝霖九十一歲所寫的回憶錄，也交待了當天的細節，見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一五三。

⑧ 這三十二人，根據京師警察廳的檔案所列名單如次，見「吾愛國學生許德珩等被捕鬥爭情況」，北京檔案史料，一九八六第二期，頁六。

北大 二十人：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驥、牟振飛、梁穎文、曹永、陳聲樹、郝祖齡、楊振聲、蕭濟時、邱彬、江紹原、孫德中、何作霖、魯其昌、易克疑、許德珩、潘淑、林公頓、易敬泉。

高師 八人：向大光、陳宏勛、薛榮周、趙永剛、楊荃峻、唐英國、王德潤、初銘音。

工業學校 二人：李更新、董紹舒

中國大學 一人：劉國干



匯文大學——一人：張 德

④9 五四當晚王寵惠、林長民、汪大燮三人具呈保釋，北京的每周評論、國民公報、晨報、益世報，都為學生講話，上海民國日報葉楚傖寫的社論，把北京學生視為「五月七日之神」，說「北京學生的性命，便是中國的性命，要救中國，該先救被捕的學生。」見五月七日該報。

⑤0 各校學生被釋回校，受到英雄式凱旋的歡迎，情況感人，例如北大教職員及學生，全體在門外迎候，「彼此初一見，那一種喜歡不盡的樣子，自然叫我難以描寫，尤其那喜歡沒完，將一執手，彼此又全都大哭起來，感慨激昂，靜悄悄欲語無言的情況，更難以描繪。」北京高師的情形是：「約十點鐘，乘汽車至該校大門，當由教職員及同學出外迎接者有七八百人之多，沿途相送者，亦不下百餘人。掌聲如雷，並齊呼愛國同學萬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下午由四時起至七時，該校即全體開慰勞大會，會場在校內風雨操場，有聯云：『救國人牢薄海同胞齊頓首』『攘夷籌策中華志士更椎心』。……」見「北京學生愛國運動」，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十日。

⑤1 郭欽光，廣東文昌人，廣州初級師範畢業，民國六年就讀北大預科，五四積極參與，學生被捕，憤然大痛，嘔血，就醫不治。臨危時仍關心國家大事，五月七日賚志以歿，年二十四歲。當時郭烈士被視為五四愛國運動中死去的第一位愛國志士，引起北京及全國各地青年學生的哀悼，參見龔振黃：青島潮；又見五四愛國運動，上册，頁一八六；下冊，頁二五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史組編，一九七九年出版。）



⑤2 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五四七、五八三。

⑤3 「壯哉學生聯合會」，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十二日；又參見 Joseph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1971) pp.82~85.

⑤4 文叔：「五四運動史」，學生雜誌，卷十號五，頁六、七。

⑤5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十、十二日。

⑤6 當時社會上的「救國十人團」，以十人爲一團，消極的在提倡國貨，積極的是提倡儲蓄以培養國力。學生的十人團則以演講維持秩序爲主。見「大家注意救國十人團」，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十一日。

⑤7 五月下旬，全國重要城市的學生也都紛紛響應罷課演說的活動，罷課的時間上海五月二十二日、天津五月二十三日、南京五月二十九日、武漢六月一日，其他如蘇州、常州、鎮江、南通、長沙、安慶、開封、保定等地，均先後採一致行動，另有杭州的學生，被官廳用提前於五月二十八日放假的辦法，送回家鄉。參見：五四愛國運動，上冊，頁五二二、五五一。

⑤8 文叔：「五四運動史」，前引文，頁九。

⑤9 參見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六月七、八、九日。

⑥0 同上，民國八年六月五日、十一日；Joseph Chen,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pp.108~112.



- ⑥1 同上 Joseph Chen, pp.150~153.
- ⑥2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六月七日。
- ⑥3 同注五八，頁一〇。
- ⑥4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六月十三日；又見文叔上引文，頁一〇。
- ⑥5 參加學生代表的名單，刊登在申報，民國八年六月十七日。
- ⑥6 每周評論，民國八年七月六日。
- ⑥7 時事新報，民國八年七月二日。
- ⑥8 文叔前引文，頁一一。
- ⑥9 孫中山：「救國之急務」，民國八年十月十八日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國父全集，第二冊，頁三八五。（中央黨史會編印，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台北出版）。
- ⑦0 見文叔：「五四運動史」前引文，頁一三；沈仲九在五四後五個月寫的「五四運動的回顧」，指出五四運動具有勇毅、自動、犧牲、誠和和自治的價值，具有「學生的自覺」，「民衆的運動」「社會的制裁」的特色，載建設雜誌，卷一期三，民國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 ⑦1 民國八年六月七日的順天時報社論為學生與政治關係作過分析；五四之後學運的發展動向參見拙撰：「北伐前學運的動向（一九二〇—一九二七）」，七十七年八月十四日北伐統一六十年學術討論會論文。
- ⑦2 參見吳齊仁：「傳統價值的翻轉」，中國時報副刊人間，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四日。



- ⑦③ 陳獨秀：「一八一六年」，青年雜誌，卷一號五。
- ⑦④ 參見周策縱著、蔡振念譯，「五四前後的孔教與反孔教運動」，大陸雜誌，卷七十六，期三，民國七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 ⑦⑤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卷二號六。
- ⑦⑥ 如民鐸一卷六期「現代思潮號」，二卷一期「尼采號」，三卷一期「柏格森號」；新教育一卷三期「杜威號」；東方雜誌二〇卷八期是「杜里舒號」。參見趙德志：「五四後西方哲學的輸入及其影響」，中國哲學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頁九九—一〇〇。
- ⑦⑦ 五四中國幾乎成了各種生吞活剝西方思想小冊子的實驗室，這只要看看當時的不同社團，即可明白。參見：張允侯等編，五四時期的社團，四冊，（一九七九年北京出版）。
- ⑦⑧ 深入的分析參見拙著：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出版），第四章第二節。
- ⑦⑨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頁八三。
- ⑧⑩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對這一情形有所說明。
- ⑧① 參見李濟：感舊錄（台北傳記文學社，民國五十六年出版），頁一一。
- ⑧②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頁四一一。
- ⑧③ 以知識分子為例，陳獨秀民國五年便表示厭棄政黨政治，民國八年還強調從事的是國民運動與各派政黨要劃清界限，見「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卷一期五；「本誌宣言」，新青年



，卷二期一。當時新青年雜誌社的同仁有「相約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對現實政治的惡感，青年學生也不例外，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頁四三～四四。

- ⑧ 參見衛民前引論文，頁九一～九三；又參見·Kiang Wen Han,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N.Y. 1984), pp. 30～32.

- ⑧ 胡適在五卅第二二年寫了一篇「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發表在新教育二卷五期（九年九月五日出版），主張學生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的學生生活上去。又參見 J.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Harvard U. Press, 1970), pp. 78, 176, 215～216.

- ⑧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頁四五。

- ⑧ 新青年，卷五期一，頁五〇，轉引自衛民論文，頁一五七。

- ⑧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一九五九年北京出版），頁二九二。

- ⑧ 楊晦：「五四運動與北京大學」，青年運動回憶錄，第二冊，（一九七九，北京出版），頁一三五～一四七；又參見·Marius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Harvard U. Press, 1967) pp.71-73.

- ⑧ 即使孫中山先生返回上海，在租界居住的限制下，也甚少活動。參見 Joseph Chen, *The May Fo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p.24.

- ⑧ 「致廣東軍政府囑省釋工學界被捕代表電」，民國八年七月十八日，收入中央黨史會編訂，



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六二七；「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民國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原載上海民國日報，收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第五卷，頁七三〇—七四。

⑨② 民國八年六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覆四川同志蔡冰若函，最能表示這一意義：「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之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盪陶鎔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於全國，使國民有普遍的覺醒，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六二二。

⑨③ 民國八年秋在上海晉見過中山先生的張國燾，曾說：「在我離開上海幾天之後，全國學生代表，便請孫中山先生蒞會發表演說，這是全國學生傾向孫先生的第一個公開表示。」見：我的回憶，第一冊，頁三七。中山先生對五四運動的評價與支持可參考：李雲漢「國父與新文化運動」，民國七十年三月十二日聯合副刊；拙著：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第二章，頁二七—三一。

⑨④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七日。

⑨⑤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八年五月九日。

⑨⑥ 傅斯年語見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刊出。

⑨⑦ 「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國父全集，第三冊，



頁六七。

- ⑨⑧ 革命黨人與新文化運動關係的分析，參見拙著：《革命之再起》，第二、四、五各章。
- ⑨⑨ 傅斯年：「論學校讀經」，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七日。
- ⑩⑩ 陶希聖：「三個年代的五四」，民國六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
- ⑩① 羅敦偉文轉引自李雲漢：「國父與新文化運動」，聯合副刊，民國七十年三月十三日。
- ⑩② 見常道直：「民國十一年學校風潮之具體研究」，教育雜誌，卷十五期四，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 ⑩③ 參見拙撰：「北伐前學運的動向（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民國七十七年八月）論文，抽印本，頁二—四。
- ⑩④ 見申報，民國十年八月三十日。
- ⑩⑤ 申報，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 ⑩⑥ 學生總會五四通告的四個主張是，（一）收回關稅；（二）收回庚子賠款，由我國自由處置；（三）反對奴隸式的教育，實行學生自治；（四）打倒北洋軍閥。見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 ⑩⑦ 易社強教授用語，見 John Isrea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U. Press, 1966)。
- ⑩⑧ 革命黨人葉楚傖、戴季陶、張繼都對學生的組織能力表示讚賞，參見拙著，革命之再起，頁



四〇二—四〇三。

⑩ 民國十年三月北京國立八校因北京政府發不出學校經費問題，引發了嚴重的教潮——教員索薪事件，連帶學生也發起「讀書運動」「開學運動」之學潮，激起知識分子對北洋政府的不滿。參見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十七年出版），頁一四七—一七六。

⑪ 民國十一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控制北京政權，十一月北京政府任命與教育界素無淵源的政學會人彭允彝為教育總長，彭到任後提倡整頓學風、干涉司法，引起學生惡感，北大學生發起驅彭運動，十二年一月北大蔡校長以不願與之共事，奉身以退，學生驅彭挽蔡，示威請願，造成重大流血事件。詳見民國十二年一、二月申報。

⑫ 「學生根本解決政治建議案」，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⑬ 「學生聯合會之議決案」，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十二年九月四日。

⑭ 同上。

⑮ 「中國國民黨青年運動政策決議案」，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執會通過，載中國國民黨週刊，第十五期，民國十三年四月六日出版。

⑯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5. 又參見：葉嘉熾「五四與學運」，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五月），頁四三—五六。

⑰ 五四後不久沈仲九撰「五四運動的回顧」一文，即指出：五四「無非各人做『做人應該做的



事』，各人做『做民應該做的事』，就是各人要盡『人』『民』的責任。」，見建設雜誌，卷一期三，民國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①①⑦ 參見周策縱：「依新裝評舊制——論五四運動的意義及其特徵」，上海大公報，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

①①⑧ 借用林毓生語，參見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1979) .

①①⑨ 同註一一七。

①②⑩ 參見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創刊號，一九八六年；李怡：「五四的困境與今天的突破——專訪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三月。

①②⑪ 楊亮功、蔡曉舟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五月重印本），序。

①②② 參見包遵彭：中國近代青年運動史，（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初版），頁三三—三六；周玉山：「五四運動探實」，東亞季刊，卷十九，期一（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頁一四—一五。







中國國民黨改組與全國青年大團結

## 第叁篇

# 從北伐到抗戰

### 統一禦侮過程中的壯烈行動



□著者簡介□

蘇啟明，江蘇人，民國四十七年次，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現攻讀政大歷史所博士班，並任政大歷史系講師。著有「北伐時期的工人運動」、「東北義勇軍與抗戰」、「新四軍事件之研究」、「中國古代兵制沿革略論」。



# 一、中國國民黨改組與全國青年大團結

中國國民黨創導國民革命，其組織基礎在於羣衆，尤其重視知識青年。當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由粵抵滬，即常約見各地青年學生，宣講三民主義救國主張。十二年二月，陳炯明爲南方討逆各軍擊敗，孫先生返粵重建革命政府，適時全國學生聯合會亦於三月間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各地學生組織再度蓬勃發展起來。至十月，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基督教全國青年聯合會相繼遷至廣州開會，孫先生應邀分別蒞會致詞，認爲這是革命力量的大團結①。

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於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進行革命組織之改組，同時策定了新的革命方略。此對當時方興未艾的青年運動，具有兩點劃時代的意義：

第一是思想方面的導正。五四運動以來，作爲時代先鋒的知識份子，由於對北京政府的憎惡與對世界列強的憤懣，乃對新政治與新社會的追求，表現出熱烈的希望，於是西方各種新思潮，如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皆被引進中國知識界並受到熱烈討論。孫先生要引導這些分歧的細流，使交匯在一起，成爲國民革命運動的主流，因此先後著述「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革命理論和綱領，特別希望青年學生加以研究，以提高對三民主義革命之熱烈情緒。如其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爲民生主義之說明時，便說：



「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主義，便以此為世界極新之主義。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並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同之二種主義。……各代表抵俄後，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贊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②。……」

第二是組織方面的團結。隨著青年運動的蓬勃展開，全國各地學生組織亦踴躍成立，他們或為本身權利奮鬥，或為不平的政治、社會、經濟措施之改革而奔走，充分的表現了對國家民族之關心。孫先生體認此種力量的重要，乃計畫以革命之組織，予全國青年以革命之訓練，同時也希望藉此創造革命的新生力量。如十三年一月，孫先生接見剛從加拿大回國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黃季陸時，便曾說：「目前革命工作情緒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這次黨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識青年共同從事革命工作③。」為了凝聚青年學生的力量，國民黨因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於工農部外復成立青年部，訓練幹部，指導各地青年運動。鄒魯、邵元沖等先後擔任部長，對各地學生組織無不竭誠協助。當時最活躍的青年學生團體為廣州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學生聯合會，以及上海學生聯合會等，在經過革命主義的洗禮後，逐漸對國是有了一致之認識，並皆以實際行動投入革命陣營④。因此，中國國民黨在十三年的改組，無疑的象徵著全國青年的一次大團結。

由於全國青年的結合，使得孫先生深信革命大業後繼有人且成功在望。故十三年十一月，孫



先生接受北京政府邀請，離粵北上共商國是之際，復特別召集黃埔軍校及廣東大學兩校學生，作告別式之演說，謂：「今天在這裏聽講的，有文學生，又有武學生。……我現在即使不幸死去，對於革命前途，也大可放心，因為已經付託有人了⑤！」可見，孫先生對此時的革命事業，幾乎完全矚望青年學生。其發表的「北上宣言」中，曾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指明各省學生聯合會必須為團體代表之一。後經日本長崎時，應留日中國學生會歡迎會之請演講，亦訓示各省學生聯合會要促成「國民會議」之召開；同時希望加強與海外留學生聯絡，成立一個「國外學生聯合總會」，來解決國內民生問題，並打倒列強之侵略⑥。全國各地學生聞訊，莫不熱烈響應，並以具體行動宣傳鼓吹，因之掀起空前的革命高潮。

經過孫先生的號召，與中國國民黨的積極領導，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青年學生，對於國民革命終有了堅定的信仰；而革命組織，也由於大批有志青年的加入和擁護，精神日新，力量益大，此種團結氣象正如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對全體黨員之訓令決議案」內文所說的一樣：「國內青年，因受本黨之感化，而得新覺悟，認識革命救國之必要，相攜加入。本黨得此無數的革命後繼者，前途益更光明⑦。」中國青年運動由此邁向另一新階段。



## 二、反帝風潮中的青年運動

五四運動以來，民族意識高漲，反帝國主義運動逐漸成爲羣衆的主流，而青年運動尤爲中堅。

一般而言，青年都較富理想，而這些理想則常是趨使青年反抗現實的動力。民國以來，列強變本加厲的壓迫，及政府在內政外交上所表現的無能，在在都激起青年的不滿情緒，從而發生反抗心理。五四時期所標槩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便充分顯示了青年學生對當時政治環境的不滿情結所在。而此種情緒及意識，在政治組織的運用下，後來便發展成具體的「打倒軍閥及其所賴以爲生的帝國主義」之概念，成爲北伐時期最有力量的政治號召。故我們可以說，以青年運動爲中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實開軍事北伐之先聲。

民國十三年二月，中國國民黨完成改組，從此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在國民黨各地組織的領導下，蓬勃發展開來。當時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軍閥，深爲各界痛恨，於同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終爲奉軍擊敗，退出北京。獲勝的奉系及馮玉祥等，奉段祺瑞爲執政。爲緩和全國民氣，乃邀請孫先生北上，共謀和平統一之道。孫先生爲擴大革命主張之影響力，亦決定赴約，因提出速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深獲舉國民衆響應，因此在十一、十二月間，上海、北京、廣州、南京、保定、濟南、青島、石家莊、張家口及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地人民



團體紛紛發表通電、宣言，擁護召開國民會議，並分別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北京學生以地當首府，反應尤其熱烈，於十四年一月四日，特由北京學生聯合會召集國民會議促成會，出版會刊，演講宣傳，並與南方各學生團體聯絡，共同採取行動抵制段祺瑞政府預備召開的善後會議。至三月一日，由各省學生發動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終在北京大學三院禮堂召開，到會代表二百多人，代表二十多個省區，一百二十多個地方的「國民會議促成會」⑧。成功的傳播了國民革命主義和主張。

與國民會議運動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也經由各地學生團體的宣傳而在全國展開；當時因受到蘇俄三次對華宣言之影響，各界要求恢復中蘇邦交的呼聲很高，北京政府乃被迫派代表同蘇俄代表舉行復交談判，至十三年五月底終達成復交協定。於是以此為起點。全國掀起了廣泛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七月十三日，北京學生聯合會等五十餘團體聯合組成「反帝運動大同盟」。接著，上海、武漢、天津及湖南、山東等地，各界人士也紛紛組織起反帝同盟，各地學生聯合會均參加了當地反帝同盟，積極展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各項宣傳活動。九月七日，北京反帝運動大同盟紀念「辛丑條約」簽定之國恥，特發起決定九月三日至九日為全國反帝運動周；在此期間，廣州、北京、天津、上海、武漢、長沙、濟南、太原等地都召開了羣衆大會，進行了各種宣傳活動，反帝運動走向高潮⑨。

十三年下半年所掀起的國民會議運動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說明此時的青年運動已發展至另一階段；青年學生們此時要求的不僅是個別的公平待遇或社會正義，他們要求的是一個全新的



政治改造，而北洋軍閥政府與列強帝國主義者，則被他們視爲一體兩面的敵人。這種羣衆意識較五四時期顯然更進一步。然而軍閥政府與列強當局却未正視此種形勢之轉變，他們仍舊以一貫的暴力鎮壓手段，來對付蜂起雲湧的羣衆運動，於是更大的衝突便在所難免了。

十四年四月初，福州學生響應當時全國教育界正進行的反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於八日向福建省政當局請願，結果竟遭到福州軍閥鎮壓，當場打死請願學生七人，傷數十人，造成「福州慘案」。五月二十八日，在青島罷工抗議日本廠方的工人也遭到屠殺，激起學生公憤。而適前（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也發生類似事件，於是大規模的罷工抗議以起；上海各大學、中學學生透過上海學生聯合會之組織，爭相加入抗議行列，到處遊行、演講、募捐，俾支援罷工工人。上海租界當局採高壓手段，於五月二十三日分別逮捕若干抗議的學生，因此再激起工人及學生更憤怒的反抗。五月二十八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因決議於五月三十日，發動全市學生在公共租界內，進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宣傳；三十日，上海各校學生兩千餘人如約集會，至下午，英租界巡捕再行武裝干預，當場斃傷學生數十人，是爲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掀起了全國空前的反帝國主義風潮。首先在上海的工人、學生及一般市民，於六月一日聯合展開罷工、罷課、罷市之「三罷」運動，其中參加罷課的學校有上海、交通、復旦、暨南、文治、大夏、同濟等三十所大學，以及交大附中、復旦附中、同濟附中、復興中學、育才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坤範女中、務本女中等二十餘所中學，共計五萬多學生；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部分學生亦退學抗議，並重組光華大學以示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六月七日，在中華



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上海總工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召開大會，成立了「工商學聯合會」，以領導上海的反帝運動。學生們在這次運動中，除演講、遊行爲工人募捐救濟外，亦出版刊物，宣傳反帝思潮；學聯會更組織學生隊執行抵制英日貨，對帝國主義者進行積極的經濟鬥爭。

上海的三罷運動，迅速獲得全國響應，廣州、武漢、南京、北京、天津、濟南、長沙、九江、杭州、成都、旅順、大連、汕頭、瀋陽、哈爾濱、香港及陝西、山西、吉林、江西、安徽、廣西、雲南等地學生，都先後舉行集會，聲援上海的工人和學生。而帝國主義者却一味施實暴力鎮壓，致各地慘案連連；其中最重要的爲廣州六月二十二日的「沙基慘案」及漢口的「六一一慘案」，前者因此爆發了歷來規模最大、時間最久的「省港大罷工」，使得廣州的革命政府首當反帝運動的代表政權，爲日後的北伐獲得深厚的羣衆基礎。

由於青年學生及工人在「五卅」反帝運動中的積極奮鬥，使得列強開始注意到南方的新興勢力與中國的羣衆力量。而全國學生聯合會爲掌握此種形勢，鞏固並繼續發展各地青年組織，乃於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六日，在上海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大會共有三十多個地區六十一名代表出席，其最重要的決議是今後各地學生會組織中要增設工農部，以加強工農羣衆之聯繫。會後，學聯總會即派代表赴各地協助建立和健全學生會組織，到十五年六月底，全國已有十六個省建立了省學聯會，而加入各省學聯會的市、縣學聯會亦共計三百二十多個。許多學聯會都有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如全國學聯會有「中國學生」，各地學聯會的刊物有「北京學生」、



「上海學生」、「廣州學生」、「湖北學生」、「河南學生」、「山西學生」、「陝西學生」、「奉天學生」、「香港學生」等三十多種，彼此互通消息，宣傳革命主義，為中國學生運動帶動了「五四」以來另一個積極的活躍時期<sup>⑩</sup>。

青年學生及工人所發起的全國性反帝風潮，除了受到南方革命政府的肯定及支持外，對北洋軍閥政府却似乎無任何警惕作用。十四年七月下旬，盤據上海的直魯軍閥首先採取嚴厲手段，強制封閉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及洋務工會等民衆團體，九月，又查封了上海總工會；同時在天津、青島、濟南等地的軍閥政府也解散當地的工會和學生會，逮捕工人和學生領袖。對於帝國主義的暴行，竟以不了了之的態度敷衍過去。而另一方面，軍閥本身則復勾心鬥角，變本加厲的進行其地盤爭奪戰。十四年十月，孫傳芳利用京滬反對奉系軍閥的民衆基礎，發動了反奉戰爭，將直魯軍驅出京滬。於是上海的革命浪潮再度興起，各界民衆連日集會，要求重行審理滬案，啓封工會與各種民衆團體。時北京政府正擬與列強開關稅會議，北京民衆乃乘機發動反對關稅會議的示威運動；十一月十日，全國學生聯合會與廣州外交代表團等團體，於北京率先組成了一個關稅自主示威運動籌備會，旋發出通電，主張由全國民衆致最後通牒給段祺瑞政府，促其下野。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工學界大舉響應，整隊向執政府辦公處出發遊行，高揭「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建設國民政府」等口號，會後並湧入北京政府要員住宅示威。示威羣衆自稱此次行動為「首都革命」<sup>⑪</sup>。繼北京的國民大示威後，上海、武漢、南京、開封、長沙等地，亦舉行了同樣反奉倒段的示威遊行。



在全國反奉倒段運動的影響下，終促使馮玉祥與張作霖的決裂，十四年十二月初，國民軍與奉軍開始在河北境內大戰，國民軍在天津擊敗奉軍李景林部，占領直隸全省。日本為掩護山東魯軍赴援，竟於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派艦闖入大沽口，炮擊中國守軍；國民軍被迫還擊，將日艦逐出大沽口。三月十六日，日本乃糾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國公使，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解除大沽守軍武裝，限中國政府四十四小時答覆，否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採取認為必要之手段<sup>⑫</sup>。」

面對帝國主義這種威脅，各地民衆甚為憤怒，三月十七日，北京各學校和社會團體代表四百餘人，在北京大學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第二天在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會後，分兩組前往國務院及外交部請願，要求段祺瑞政府不要向帝國主義列強屈服，北京民衆「願作政府之後盾」。但段祺瑞不但不理會代表要求，反在國務院門前下令衛兵驅散民衆，當場刺傷請願代表多人。十八日上午，北京八十餘校學生和總工會、總商會等二百多個團體，十萬餘羣衆在天安門前舉行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對大沽事件及段政府的畏縮蠻橫表示激昂的抗議。會後，以北京大中學生爲主的二千多人請願團，再前往國務院示威，結果再遭到段祺瑞衛兵的武裝屠殺，四十七人被當場打死，二百餘人被打傷，這便是「三一八慘案」<sup>⑬</sup>。

「三一八慘案」激起全國公憤，除北京工、學界強烈抵制外，天津、廣州、上海、長沙、武漢、重慶、桂林、南昌、惠州等城市也紛紛組織「京案後援會」，積極聲討，表示了反對軍閥政府的堅強決心和對死難民衆的深切哀悼。同時，這個事件也使全國民衆真正認識到，軍閥政府本



即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要打倒帝國主義，就必須先推翻軍閥政府。而此正是南方國民政府北伐的目的所在。以青年學生、工人為中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經過「三一八慘案」的教訓，終完全喚醒了全國人民再革命的決心。

### 三、北伐戰爭期間的青年運動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誓師北伐，此後展開近兩年的打倒軍閥之戰爭，直至十七年十二月東北易幟，全國完成統一為止。這段期間一般稱為「北伐」時期，也有稱為「再革命」者。這段期間，由於政治情勢的劇烈變化，青年運動也發展出若干與從前不同的特質。就其與北伐戰爭的關係言，由於青年的積極參與，使國民革命運動能順利推動並獲得成功；然另一方面則因革命勢力的趨向多元，亦使得青年運動本身產生質變，而影響了此後的運動方向及作用。

#### 北伐與青運

民國十四年下半年至十五年上半年掀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為國民革命開啓了有利的形勢；而廣州革命政府自十四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為國民政府後，經過十四年底的二次東征，亦已完成兩廣的統一，為北伐建立了鞏固的實力和基礎。為了團結革命力量，中國國民黨於十五年一月再



次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中因有感於過去「一般青年運動，僅僅在偶發的政治問題中有所結合，沒有持續性，沒有在青年本身利益上，促成其永久的強固的組織<sup>⑭</sup>。」因此，於所決議的「青年運動的方案」中，特別指出今後青運要點爲：

(一)對學生青年，應注意各縣各學校普遍的基礎的組織。同時要求青年力量的集中與運動的一致，應促成全國青年統一的組織。

(二)除對政治鬥爭須設法保持其持續性外，應特別注意青年本身利益的要求。

(三)應設法引導青年，使成爲社會工作之一員，不使成爲特殊的知識階級，使青年運動不致成爲單獨的學生運動<sup>⑮</sup>。

此項決議深獲全國青年響應，全國學生聯合會因於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廣州廣東大學召開第八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北京、天津、上海、熱河、山東、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河南、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和香港等地學生代表五十四名。大會總結一年來的反帝運動經驗及教訓，通過了「會務總報告決議案」、「統一學生運動決議案」、「擁護國民政府並贊助北伐決議案」，以及文化問題、組織問題、婦女問題、擁護羣衆利益第十項決議案。

關於統一學生運動問題，大會決議：各地學生聯合會在當地一切工作中，力求做到統一組織、統一行動、統一主張，必須維護學生運動的團結和統一，決不允許一地有第二學聯的現象出現。關於今後學生工作，大會根據北伐戰爭開始後的新形勢，提出全國學生要繼續發揚「五卅」



反抗帝國主義，反抗封建軍閥的革命精神，積極參加民衆運動，爲完成民族解放與自身解放的歷史任務而奮鬥。要求各地學聯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宣傳羣衆，組織羣衆參加北伐的工作<sup>①⑥</sup>。這次大會確定的統一學生運動和支援北伐戰爭的任務，成爲當時全國學生運動的指針。

北伐開始後，廣東和兩湖的許多學生除直接參加北伐軍外，大批學生參加了各種戰勤工作；如組織宣傳隊隨軍出征，向羣衆宣傳北伐戰爭的意義；發動和組織羣衆進行各種政治、經濟的鬥爭，配合北伐軍作戰；協助黨團組織建立勞動童子團、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等，負責站崗放哨、維持社會治安；組織衛生隊、慰勞隊救護傷員，與士兵聯歡，鼓舞士氣。

由於革命勢力首先向英帝國主義勢力範圍——長江流域發展，引起英帝國主義的激烈干預。十五年九月，當北伐軍進攻武漢時，英帝國主義軍艦公開援助吳佩孚，炮擊北伐軍。九月五日，英國軍艦又炮擊四川萬縣，製造了中國軍民死傷千人的大慘案。而盤踞在北方的奉系軍閥，亦加緊同列強勾結，伺機向北伐軍反撲。因之，全國響應北伐的青年學生，乃在各地迅速發起反英、反奉的激烈行動。

在反英行動方面，當萬縣慘案發生後，全國學聯和上海學聯分別發出通電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國民政府向帝國主義索還賠償，號召全國人民共起鬥爭。湖南、廣東等地學聯發動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英示威運動。重慶、上海、武漢、北京等地人民也紛紛集會，抗議帝國主義的暴行。十月三日，上海各團體代表爲萬縣慘案在學聯總會開會，討論反對英帝國主義的方法。結果竟遭軍閥孫傳芳的軍隊包圍，捕去全部與會代表，五日且封閉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全國學聯



立即通電各地學聯、工會、商會、聲討孫傳芳的倒行逆施，並決議十月五日至十一日爲反英運動周，抵制英貨，擴大反英運動，影響及於海外的留學生<sup>①</sup>。

十月中旬，北伐軍完全佔領武漢後，全國各地的反共運動發展到空前規模。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漢二十萬人召開反英大會，各校學生踴躍參加，會上對英帝國主義支持中國軍閥和干涉中國革命的暴行提出了嚴重抗議，號召全國實行對英經濟絕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帝國主義在華租界。十六年一月三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在漢口英租界附近演講，英帝國主義借機挑畔，調集大批水兵衝入華界，驅逐聽講羣衆，用刺刀戳死海員一人，刺傷羣衆數十人。當晚，武漢各界市民舉行提燈遊行，表示抗議，英當局又行暴力干涉。四日，武漢工、農、商、學各界代表乃舉行會議，要求國民政府對英交涉，提出賠償、懲凶及收回租界等條件。五日，武漢各界四十萬人再舉行反英示威大會，再與英當局衝突，憤怒的羣衆遂逕行湧入英租界，將英租界當局驅逐而去。翌日，類似事件亦在江西九江發生，當地學生及工人也以壯闊的羣衆力量，收回九江英租界。英國當局初仍欲以武力還擊，但迫於中國的反英聲勢，終於十六年二月下旬正式承認將漢口、九江租界交還國民政府的事實。

在反軍閥行動方面，當北伐軍克復江西、福建後，江浙一帶即由當地青年學生帶頭鼓動反孫（傳芳）運動。上海學生從十一月八日起，每天出動二百五十名宣傳隊員上街演講，散發傳單，號召上海人民組織市政府，取代反動軍閥的統治。五天共散發傳單七十餘萬份，使「打倒孫傳芳」、「拒絕奉魯軍」、「歡迎北伐軍」、「人民武裝起義」等革命標語布滿上海市區大街小巷



，對孫傳芳的軍心士氣造成嚴重打擊<sup>⑱</sup>。在此期間，學生先後有八十多人被捕。十一月二十六日，學生們又進行了大規模演講，反對奉魯軍南下，反對英帝國主義借款給奉系軍閥。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學聯發動了五萬市民舉行反對魯軍南下接防上海的市民大會。十二月六日，學聯會又參加了組織上海特別市市民公會的工作，均加劇了軍閥孫傳芳的統治危機<sup>⑲</sup>。

十六年二月，北伐軍克復杭州後，上海革命組織乃蘊釀工潮以推翻軍閥之統治，於是在二月下旬及三月中旬先後舉行了兩次武裝罷工，與軍閥部隊直接戰鬥。不少青年學生參與其役，不僅進事情事的宣傳活動，更組織糾察隊（如上海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等）與工人並肩作戰；三月罷工勝利後，學生們在建立上海市臨時政府等項工作中，亦扮演著積極的角色<sup>⑳</sup>。

北伐戰爭係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及「使武力成爲國民之武力」爲號召，因此北伐戰爭推動了羣衆運動的迅速發展，而羣衆運動的發展又推動了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行。在這期間，青年學生最主要的作用，便是親身領導及組織廣大的工農羣衆協助北伐軍作戰。當時各地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青年學生便占很大比重；如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二期畢業的一百七十七名學員中，非農民出身的學生便占百分之三十；第三期畢業一百二十八人，則有學生二十九人。而十五年底武漢成立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招收的第一期學員八百一十人中，亦有青年學生四百人<sup>㉑</sup>。這些學生畢業後，活躍在湘、鄂、粵、陝等省廣大農村，他們發動羣衆，組織農會，有力的支援了北伐戰爭。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實施「清黨」，七月，武漢政權繼之「分共」，革命陣營隨之呈



多元化之發展。此雖影響了青年運動與北伐戰爭的合作關係，但却絲毫不減青年學生反帝、反軍閥之決心。故當十七年二月，北伐戰爭擴及到北方後，在奉系軍閥的統治區域內，反奉及反日的青年運動仍十分活躍。如十七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國主義為阻撓北伐之進行，竟出兵山東，釀成悲慘之「濟南事件」，各地學生即紛紛組「濟案後援會」，抗議日軍的暴行。北京大學濟案後援會學生即曾發表宣言指出：「日本出兵侵害我國主權，已為我國民所不能容忍，況又恣意虐殺，以有組織之軍隊屠殺我國民衆，豈正義人道所能容？……危機迫矣，國事棘矣，望我全國國民羣起抗爭，聲罪致討，幸勿任帝國主義者在我領土內殘民以逞也<sup>②②</sup>。」張作霖為鎮壓學生抗議浪潮，竟出動大批軍警到北大三院，強行解散北大濟案後援會，同時拘捕學生。雖然如此，但北京的青年學生仍不屈不撓，他們在軍閥的武力威脅下，轉入地下，暗中接受革命組織的指揮，為北伐軍進攻河北作準備。

十七年六月中旬，奉軍兵敗出關，北伐軍終於克復河北，戰事告一段落。而全國青年學生在經過兩年來的革命洗禮後，本身組織也獲得了空前之發展。在中國國民黨的促成及整理下，各省學生團體逐漸由分而合，而精神亦由分歧趨於統一。如在浙江先後有省學生聯合會及中國青年勵志會（係全省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領袖二百餘人組成）；在安徽有安徽青年聯合會，下有蕪湖、合肥、蚌埠、大通、阜陽、休寧六縣市之青年聯合整委會；在河北有河北省青年聯合會整委會（十八年成立）；在河南，先後有河南省學生聯合會（十五年成立）及河南省學生聯合會籌委會（十六年成立，十七年再改組為整委會）；青海省有省學聯會、西寧縣學生聯合會（十五年成立）及



青海省回教青年學會（二十一年成立）；在廣西有全省學生聯合總會、南寧市學生聯合會、梧州學生聯合會及桂林學生聯合會；在綏遠有全省學生聯合會；在南京則先後有南京學生聯合會及南京市學生聯合會整委會（十七年成立）；此外，平、津、滬、漢各大城市，均有類似組織<sup>②③</sup>。惟由於國共之分裂，在中國共產黨的操縱下，也有許多青年學生組織轉變為中共的外圍團體，如全國學生聯合會及上海學聯會等，這種變化對此後的國家發展及青年運動本身，都產生了深遠之影響，容於下節討論。

## 青年運動之轉向

青年學生基於對國家民族之關心，挺身於社會、政治及文化等各層次之實際活動中，進而並投身於國民革命行列，為救亡圖存而奮鬥，此為青年學生的一種自覺現象。然而在北伐時期，由於政治環境的激烈變化，青年運動也隨之發生若干歧異的轉變；這些轉變無形中使得青年運動演進到另一形式，並對此後的青運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使青年運動發生轉向的最主要因素，是導源於中共對國民革命之利用。

當中國共產黨未正式成立時，上海及北京的一些青年學生便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名，進行建黨的早期活動。然因其成員信仰複雜、意見分歧，致各地青年團的活動至十年五月即告停頓。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成立，旋即接受共產國際和少年共產國際之指示，積極重組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其重新制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章



程」中便明白規定：「社會主義青年團」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實行社會改造及擁護青年權利為宗旨。」又明確宣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團體」<sup>②④</sup>。於是各地團務活動又積極恢復及發展，至十一年五月乃於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中共的「組織原則和組織方案」，通過團的組織綱領，並正式加入「少共國際」。此時社青團的組織已徧布上海、北京、武昌、長沙、廣州、天津、唐山、南京、保定、唐沽、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會、肇慶、安慶等十七個城市，團員總數約五千餘人<sup>②⑤</sup>。從此直到民國二十四年，社青團（後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便成為中共青年運動的中心機構。

民國十二年八月，中共三全大會後兩個月，社青團接受中共訓令，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計畫參加國民黨後的工作方式，當即決議：

本團團員加入國民黨，應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當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

- (一)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

- (二)本團應保存本團的獨立的嚴密的組織<sup>②⑥</sup>。」

十三年三月，該團再舉行中央擴大會議，決議「設法整頓上海學生聯合會，使為我用」。並通過「關於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要擴大國民黨組織，避免衝突而注意下層工作，介紹工、農及中等學校學生入黨但勿忘無產階級立場等<sup>②⑦</sup>。此時全國學生聯合會已於十二年三月重組，在中共黨員黃日葵、夏曦、范鴻劫等的操縱下，活動方向已由從前的抗議示威進入積極的政治鬥



爭層次，惟一般學生並不自覺而已<sup>⑳</sup>。

十四年二月，社青團繼中共「四大」之後，於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此時全國已興起普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名義，極力在各種羣衆運動中樹立本身實力，社青團的改名可能與此種實力的增長有關<sup>㉑</sup>。五月，上海工潮發生後，中共的活動尤其積極，全國學聯總會和上海學聯會幾乎全在共青團的控制中，至六月二十六日乃召開第七次全國學聯代表大會，通過四項重要決議：(1)規定全國學生反帝之任務與方略；(2)決定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努力於民族革命，並應參加校務會議，干涉學校行政；(3)學生應參加各地工農運動，在學聯會中設農工部；(4)確定民主集權為全國學生運動之組織原則<sup>㉒</sup>。

依據第七次全國學聯代表大會的組織原則，當時學生的基本組織為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會，設主席及各部，有總務、宣傳、組織、遊藝等，部設部長，各部之下再分若干股，由股長主持；然後選舉（或指定）代表，出席省（市）學聯代表大會，組織省（市）學聯；再由省（市）學聯選出代表出席全國學聯代表大會，以組織全國學聯。全國學聯指揮省（市）學聯，省（市）學聯指揮各學校學生會。

北伐前夕，中共便利用此種組織系統深入各地學生團體，進而操縱學生運動，連軍校亦不例外。部分青年學生不甘受共黨蠱惑及利用，亦紛紛另行組織以為對抗，如上海東南大學、法政大學、廈門大學、四川省立女子師範、武昌中華大學等，在十四年七月皆曾宣布脫離全國學聯會，而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系統，以示「不作政團之活動」<sup>㉓</sup>。而廣東的「孫文主義學會」反共尤



力，他們除了在黃埔軍校中對抗中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外，並擴大影響力至廣東一部分大中學校，致使共黨在廣東的學生運動「成績甚少」<sup>③②</sup>。十五年一月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七月的全國學聯第八次代表大會，所以必強調統一學生組織，絕對不允許一地有第二學聯的現象出現，可以看出這種鬥爭的激烈。

北伐軍興以後，共黨把持的羣衆組織，隨著北伐軍的進展而延伸至各地，其中尤以工農運動爲甚。而此時共青團的活動對象亦不限於學生，青年工人及農人成爲共青團的重要成員。然因學生較具政治意識，故仍爲共黨用以發動羣衆和組織羣衆的主要工具，所以在廣東及兩湖的若干農民運動講習所，皆刻意吸收青年學生以爲農運骨幹。爲此，共黨的手段幾是到了無所不用其極之地步，如當時曾親至兩湖家鄉探訪的胡禮賢氏，便曾詳述當地學生青年被共黨裹脅之狀況，他說：

「武昌中山大學開學已經有好多日子，但是從沒有上過課。『讀書是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這便是共產黨所喊出的口號。如果學生中有人來請求一面讀書一面革命的，便說這話是發源於鄒魯在革命最高學府中所說，非西山會議派的走狗，決不得拿來再說的。學生們一聽到西山會議派的走狗字樣，當然不敢再做聲了。……因爲共產黨唯一的策略，便是利用頭腦簡單的青年及一般盲目羣衆做他們的工具，所以共產黨關於教育計劃，儘使一般人粗解文義爲已足，決不願意大家都有高深學問，可以培養其思想有自由發達的餘地。同時又用盡種種方法來麻醉這般青年，不至於出而反抗，而且天天去替他們做許多許多下層工作<sup>③③</sup>。」



這種利用青年學生的情形也發生在江西，當時奉令至江西視察教育的龍叔篤氏曾作如下報告：

「國民革命軍到贛後，雖有少數共產黨暗中力爲活動，挑撥播弄，無所不用其極，然民衆對之，類皆嗤之以鼻。自南昌四月二日之變，該黨分子，遂到處演說，宣傳必屠殺民衆愈多，則革命成功愈早，對青年則或誘之以利祿，或動之以血氣，不入其彀中者，則誣以國家主義派或右派黨羽，使其畏懼潛逃<sup>③④</sup>。」

南昌「四、二之變」便是共黨利用部分野心政客容軍人繼成立武漢政權後，再攘奪江西地盤的進一步行動，據當時任職江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的程天放自述其經歷說：

「四月一日，武漢的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將一般忠實同志免了職。這個電報在四月二日到達南昌，同時郭沫若也奉了共黨命令潛來南昌，指示機宜，所以當天共黨分子就實行暴動。首先是共黨學生搗毀教育廳，將職員全部趕出，將房屋封鎖。我那時正在省政府，所以他們未找着我，可是我住在廳內，私人的衣服，書籍等統統損失了。下午我從省黨部出來，在街上遇着共黨學生，就將我抓住。先送到衛戍司令部拘押，衛戍司令部不肯接受，又送到總工會<sup>③⑤</sup>。」

共黨利用青年運動的情形由上述記載可見一斑。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爲挽救革命危機，斷然實施「清黨」。共黨及其把持的武漢政權乃擴大所謂「反蔣」運動，於是湘、鄂、贛三省的青年學生運動也隨之「轉向」，變成內鬥之工具。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共黨的策劃下，全國學聯在武漢舉行第九次



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遂完全聽任共青團擺布，實過了「打倒蔣介石，擁護國民革命軍東征討蔣」等議案，並發表「討蔣」之宣言。但事實上，此時武漢的左派國民黨也已掀起了反共之聲，共黨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陰謀已告敗露，因此大會結束後，學聯總會鑒於武漢的所謂「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實際情況，做了應變的準備工作：一方面動員學生參加我黨（共產黨）領導的東征部隊，爭取掌握武裝；另一方面把一批已被敵人注意的學生疏散到外地，全國學聯也做了轉入秘密活動的準備。在革命的危機關頭，學聯在團組織領導下，為黨保存了大批骨幹力量<sup>36</sup>。」

總結前述史實，可知北伐時期的青年運動，固然於國民革命的推展有其正面之貢獻，然由於中共的居心不良，也使青年運動產生若干程度的負面影響。而以青年學生本身言，在北伐以前，青年學生參預國事，多出於自發之義憤與愛國心，其手段雖也有激烈者，然動機皆甚純正；北伐時期的青年學生固也有出於愛國之熱忱者，然因黨派的強加引導，份子遂複雜，其動機與手段遂愈趨歧異。此外，就青年學生與其他社會羣體的互動關係言，在北伐以前，青年學生常為各種羣衆運動的先趨者，由於青年學生的熱誠，常感動其他社會羣體的響應，因而造成一種自然的聯合，北伐期間此種互動關係則多係人為的組織作用，有時學生甚且淪為工農運動的馬前卒，彼此的關連性幾乎全以黨派利益為基礎，非復從前的同情與關懷。此種變異殆全根源於北伐期間的政治環境。



## 四、九一八國難期間的青年運動

### 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青年政策

北伐告成，全國在形式上已告統一。中國國民黨認為軍政時期已經結束，乃依據建國大綱的規定，於民國十七年八月決議實施訓政<sup>③7</sup>。當時鑒於革命之破壞時期已過，國家即刻進入建設階段，中國國民黨乃於十八年三月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確定訓政方針及實施計畫。會中曾確定了今後民衆運動的最高原則，指出：「民衆運動在軍政時期是要作各種示威運動，來搖撼一切革命的障礙；而在訓政時期就要以全力來推行地方自治和公共建設事業了。今後地方之施政綱要，必須以安定秩序，培養民力為最大的任務。」其對青年運動所作的決定因此為：「本黨對於男女青年，今後應竭力養成學校以內之自治生活，實行男女普遍的體育訓練，提倡科學與文藝之集會結社與出版，獎勵實用科學的研究與發明<sup>③8</sup>。」

同年七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特別發表「為北方青年同志進一言」文告，向青年指出，既已打倒軍閥，下一步則當以打倒帝國主義為目標，「可是這不是很簡單的工作，也不是一蹴可成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拿出實實在在的力量來奮鬥，而後他們才肯屈服。所以打倒帝國主義，須要有極周密的準備，極刻苦的努力，那就少不了知識、學問和技能，我們沒有和他們相等的知



識，我們就沒有能力作種種的準備。所以在前期，我們只是以破壞的方法，去闢建設的途徑；在後期我們就得以革命精神來建設，而後我們才有同人家對抗的力量。」「青年們這時候最重大的責任，無過於完成革命，使最實際的革命方法，是要尊重革命的秩序，修養專門的知識。」

民國十九年一月，中央訓練部即根據恢復秩序、專精學術的原則，擬定了「學生團體組織原則」、「學生自治會組織大綱」，並於二十年二月五日公布實施「學生訓練暫行綱領」。這中間最重要的規定是：「學生訓練須認清學生在民族生存上之重要地位。」「學生訓練須使學生課外作業，日常生活，與學校課程，互相聯貫，使適應社會生活。」而在學術思想上，則「將三民主義融會於一切學術，使學生有深切之認識與信仰；並明瞭中國國民黨之政綱政策，及訓政時期之民衆運動方針。」並「使學生認識世界大勢，及我國家民族在國際上所處之地位，且明瞭其本身將來對於國家民族所負之責任<sup>39</sup>。」凡此，均是爲使青年學生的運動活力轉化爲建設國家之動力。

爲了達到此一目的，國民政府又從事全國教育之整頓。於民國十八年四月首先公布教育宗旨，謂：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爲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sup>40</sup>。」

稍後即本此宗旨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及中、小學教育的基本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便是：

(一)採取國家統制政策。以教育部爲全國最高教育機關，管理各級教育。從幼稚園、初級小學



一直到大學和研究所，教育部皆規定課程、設備、經費、師資的最低標準；小學和中學教育，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但各地方當局接受教育部指示，必須執行上級命令。這是爲了力矯軍閥時期的不干涉主義教育政策而引起的混亂現象。

(二)實施黨化教育。訓政時期既以黨治國，因之如何貫徹三民主義信仰爲當時教育之目標。國民政府除在各級學校課程設計上規定各種「黨義」課目外，復對學校內的軍訓及青年訓導工作，直接視導。爲了維護教育環境之安定，政府特別強調學生受業的紀律問題，故除消極的禁止學生罷課、限制校外活動等外，也採取積極的教導合一制度，如提倡有秩序和有意義的自治會、新生活運動等。這是爲了矯正過去因漫無紀律的學生運動而引起的不良讀書環境。

由於國民政府的明確青年政策及教育改革之進行，遂使得訓政時期的教育環境達到建國以來空前之改善。青年學生們在此種進步的教育環境中學習，知識日增，對國家民族，乃至社會文化的關懷愈深，就正面意義言，這是國家建設不可或缺之力量；然不幸，由於訓政時期的內憂外患不斷發生，竟使得國民政府的施政無法普遍貫徹於各地。而若干青年復迷惑於當時混亂的局勢及紛歧之思想爭辯，精神及意志遂生困擾，甚者且對國民黨及政府的統制措施採懷疑及敵對態度，如此愈減低了訓政時期政府施政的效果。「一九一八年事變」以後，部分青年的不安及不滿情緒因得藉題爆發，而青年運動也就隨著國家情勢的改變又進入另一截然不同之階段。



## 九一八事變後的學生抗日運動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爲進一步侵略中國，突於瀋陽附近發動軍事行動，數日之內即占領長春、鞍山、撫順、營口、遼陽等城市。當時負責東北邊防的東北軍以精銳盡在關內，防備空虛，加以當局應變失當，致令東北三省於百餘日後全部淪陷。

消息傳來，全國民情激憤，咸認爲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危難關頭。青年學生尤其熱烈，在「九一八」的第二天起，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太原、西安、長沙、廣州、福州、廈門、開封、濟南、安慶、武漢、南昌等地，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即紛紛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如抗日救國會、救國義勇軍、反日救國十人團、日貨調查團、抗日宣講隊，並組織了軍事訓練班、看護訓練班等。他們集會遊行，發表通電，進行抗日宣傳，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衆，出兵抗日。其中以上海及北平的青年學生最爲積極，他們自九月下旬起到翌年「一二八」戰役爆發期間，相繼組隊羣赴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請願，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收復失地。因此南京成了這時期全國青年運動的中心，其間規模較大的抗日請願行動爲下列三次：

第一次大規模請願活動，發生在二十年九月下旬。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復旦、暨南、光華、大夏、中大、中國、同濟、東吳、商船、美專、無錫學院、及鎮江中學等校學生組織所謂「督促政府出兵團」，陸續抵達南京。二十六日，學生們高舉「督促政府立即出兵，民衆速起共作後盾」橫幅，結隊向國民政府辦公處出發，要求政府領導人接見未果。二十八日，學生三千餘人再



至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旋轉赴外交部抗議外交當局「訴之國聯」之對策，部分中央大學教職員生激憤之餘，竟衝入部長王正廷辦公室內，對部長加以毆辱，藉以發洩不滿之情緒<sup>④①</sup>。

十一月中旬，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國聯兩次撤兵決議均遭日本拒絕，乃於十一月十四日發表對外宣言，表示「大會堅決主張國民政府應速準備，實力收回東三省」<sup>④②</sup>。南京各大中學聞訊，即起而響應，乃再發起北上抗日運動。十一月二十五日，二萬多名青年學生羣集南京，各地工商界亦有代表參加，於是形成第二度請願風潮。十一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先生首次接見請願學生代表，剴切曉示禦侮救國之道不外乎統一和平及守法奮鬥，學生今日之務應以各盡其職，勿越法紀為重<sup>④③</sup>。然却未能平學生激憤之情。

十一月下旬，北平學生聞說國民政府向國聯提議將錦州劃為「中立區」消息，羣情激動，乃紛紛組團準備南下赴京加入請願行列。蟄伏三年餘的共產黨及共青團，乘機鼓動；十二月三日，以北京大學、北平工學院為主的學生組成二千多人的示威團，強行登車南下，並散發「告全國民衆書」和「南下示威宣言」等傳單，竟然聲明：「倘政府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不能武力驅逐日本出境，不能保障中華民族之獨立時，則非但不信任它，而且還要打倒它！」五日，國民政府明令禁止學生來京請願，然示威學生仍活動不已，甚至喊出「打倒賣國政府」口號，國府軍警勸阻無效，遂發生衝突，一百八十五名學生被捕，三十三人受重傷，是為「一二五事件」<sup>④④</sup>，部分北大學生被軍隊強迫離京返平。然全國各地學生受「一二五事件」影響，態度更為激烈，上海、杭州、徐州、濟南、廣州等地學生紛紛致電聲援北大被捕學生。十二月七日，上海市一萬五千名學



生首先舉行總示威的抗議行動，而南京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及濟南大學等原參加請願行列者，亦相繼改懸示威旗幟；北平各大中學學生更佔據北平車站三晝夜，迫路局撥車載送南下。

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學生書，聲明政府不可告人之事，要學生勿為敵人反宣傳所中傷，國內之紀律秩序，不辭任何之犧牲，必須保持；凡毀壞紀律、違反法令者為國家罪人④⑤。無乃學生變本加厲，競相詰責政府壓迫學生愛國運動。九日，上海學生以平、京學生在滬代表為便衣隊毆捕，搗毀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並包圍市政府，要求懲處公安局長陳希曾、市黨部委員陶百川，市長張羣被迫接受。十日，濟南、安徽、太原學生繼續發動赴京示威運動，杭州學生遊行示威，亦搗毀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上海學生進而在市政府組織人民法庭，由學生自任審判長、推事及法警等，審訊前日毆捕學生之官員。據估計，至十二月十三日，全國各地先後抵達南京的示威學生約達三萬人左右④⑥。乃由北平法學院學生李時雨、杜宏藩等倡議，計畫進行全國各校學生聯合示威。

十二月十五日，北平來京學生兩千餘人，首趨國民政府外交部，將之搗毀後，又整隊進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塗污青天白日黨徽，強繳警衛槍械；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與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代表中央接見學生，結果發生衝突，蔡、陳均為學生毆傷，學生亦被捕多名。十七日，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安慶、蘇州、濟南等地學生；會同南京各校學生發起聯合大示威，再開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搗毀中央日報社，軍警出動阻攔，雙方於珍珠橋畔發生混戰，



三十餘名學生死亡，百餘名學生受傷，六十多人被捕，是爲此次學潮中最嚴重之流血事件<sup>(47)</sup>。

十二月十八、十九日，國民政府兩度下令取締學生越軌行動，禁止學生再遊行示威，同時宣布南京臨時戒嚴。大批示威學生乃在軍警強制下，陸續返回原地。由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所激發的學生抗日運動，至此暫告一段落。

這次學潮帶給政府很大困擾，當時政府的最高政策係「先安內後攘外」，衡諸本身國力，實無法立即對日作戰，惟有循求國際組織，藉國際正義壓制日本之侵略。而國內復有剿共戰事之進行，西南諸省更與中央離異，故內部團結實刻不容緩之事。關於此中利害，中國國民黨於九月二十八日，即學生第一次請願風潮時，便發表「告全國學生書」一文詳盡闡析；文告中首言：

「中國今日當存亡關頭，政府受人民之託，合人民之力，負折衝禦侮之責，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則人民必唾其政府而國乃亡；人民不服從政府之指揮，則政府不能約束其人民，步驟錯亂，爲敵所乘而國亦亡。」

繼曰：

「吾人固知存亡大計，決於自身，但求同情，等於依賴，惟深信只有刻厲沉著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偉績，惟有步伐整齊之紀律，乃能決勝克敵於疆場。」

最後沉痛指出：

「今乃有以不宣戰不開課爲揭示者，有以出兵與讀書並提者，其發於熱誠，固難厚非，衡諸事理，實多紕誤。夫宣戰問題，決不能以學生之罷課與否爲衡者也。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



，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未畢，而輕於一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備戰完妥，而不敢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時期，負全國存亡之責，全民生死之寄，所願以與國與民，同生其死者，惟有以公忠之決心，受人民之信託，秉惟一之權能，以定惟一之大計耳。若政府於此，而可不計國家利害，輕徇請求，或築室道謀，躊躇不斷，則為溺職為誤國為千秋萬世之罪人。大難臨頭，至於此極，人民猶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猶不絕對負責，則詬誶未息，國已不國矣④⑧！」

這篇文告，不僅代表著政府的立場，也反映著學生過激行動帶給國家的隱憂。後來日本終利用中國民衆及青年學生所造成的緊張氣氛，由居留上海的日僑民發起連續的「膺懲暴戾支那」大會，請求日本再派兵來中國。時日本駐華公館派在上海的副武官中隆吉等，即循此情勢，製造足以導致中日雙方衝突的事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海軍突然發動對上海的侵略戰爭，便與此有關④⑨。

## 五、日侵華北與青年救亡運動

日本發動「九一八」侵略事變，是中國空前之國難。當時國民政府的立場，雖不希望青年學生有太過激烈致影響國內團結，且為敵所乘之示威行動；但基本上却鼓勵此種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的發揚，因為捨此之外，別無其他救亡途徑。故當時各地學聯會、自治會紛紛組織學生義勇軍



以響應東北抗日義勇軍時，中國國民黨極爲重視，中央執行委員會曾制定綱領加以輔導（二十年十月一日），其中規定：「全國高中以上學校，一律組織青年義勇軍，初中以上各學校，一律組織童子義勇軍，實施軍事訓練，宣誓信奉三民主義，振興中華民族，矢忠矢勇，雪恥救國。並守以下規律：(1)犧牲自己，愛護國家，永爲忠勇之國民；(2)服從命令，嚴守紀律；(3)養成自治習慣，實行團體生活；(4)隨時隨地扶助他人，服務公衆<sup>⑤0</sup>。」而民國二十一年，中國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關於教育的決議案中亦規定：「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民族思想，以及恢復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達到中華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之目的<sup>⑤1</sup>。」

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全國熱血青年，目睹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日益加深，類似義勇軍性質的愛國團體及組織乃遍及全國；他們於激烈的請願示威外，亦展開各種持續且深入的宣傳教育活動，對全國民衆民族精神的振發，自起一定之作用。「一二八」之役以後，國民政府安內攘外政策確定，國家目標明朗，青年學生激進之行動遂告一段落，然作爲學生抗敵救國永久組織的學生自治會等，仍不斷的鞏固發展，到民國二十三年，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全國各校學生會總數達六百十八個，實際的數目當更不止此<sup>⑤2</sup>。這些便是民族正氣之所繫。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日本關東軍繼占領中國東北後，再企圖染指熱、察、綏等漠南地區，以遂行其「滿蒙一體」之侵略計畫。國民政府決心抵抗，先後動員八個軍團分在長城各口拒敵，於是爆發了歷時兩個月的「長城之役」。但由於國軍實力不足，仍無法抵禦日軍攻勢，至五月上旬，日軍攻陷灤東，直薄北平附近之通州，華北情勢告急，政府爲保全計，不得已與日軍簽訂「塘



沽停戰協定」，在日軍壓迫下，冀東大片土地成爲「中立地帶」。從此日本即據以進行其分離華北的陰謀，繼民國二十三年宣布所謂「廣田三原則」後，關東軍與天津駐屯軍更於二十四年一月及五月，先後進擾察東及製造各種糾紛。國民政府爲爭取備戰時間，忍辱負重，委曲周旋以應。但日本則變本加厲，於八月以後又積極策動所謂「華北自治」，計劃分離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於中央政府統治權外，以建立日人的傀儡政權。華北局面陷入空前的危急。

國民政府在長期抵抗的既定方針下，當時的應付方式爲：對外（日）隱忍求全，以拖延軟化日本的全面侵略脚步；對內則希望集中全國意志和力量，以謀未來全面抗戰之準備。因此在政策執行及運用上，總要求民間體諒，儘量避免出現和政府步調分歧之作爲，致爲敵人所乘。故在二十四年六月間，亦頒布「敦睦鄰邦令」，藉以約束各種反日活動。另一方面，以潛伏各地的共黨分子，不時利用國難時機，肆行破壞，政府亦必須嚴密監視以爲防患。凡此非常舉措在當時皆有難言之苦衷，無由亦無法一一向民衆解釋。而也因此社會各界對政府各項措施往往產生誤會。青年學生感情豐富，對時事現狀亦較敏感，處在內憂外患日亟的國難當頭，其反應複雜可知。有識之士，固知政府立場，因能持較理性態度從容以對；然大多數的熱血青年，不甘坐視危難發展，其表現自顯得慷慨激昂，當時學生間有謂「偌大華北，已不容安置一張平靜的書桌」，正是此時期多數青年學生的悲憤憂惶心理之寫照。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下旬，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籌備期間，北平燕京大學學生即思利用此機會向最高當局請願言論自由及約法上規定之人身自由權，經數日聯絡，得



北平部分學校學生贊同，乃於十一月一日，由燕大、清大、師大、第一女中、滙文中學、貝滿女中、女師學院、河北法商學院、天津中西女中、天津滙文中學等十校自治會共同具名，發出「爲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之請願書，籲請政府尊重約法精神，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學生。

「莫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據報紙記載，至二十萬人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sup>53</sup>。」

請願書到南京時，適值汪精衛遇刺，六中全會未及處理。學生正失望，而天津日文報紙，復登出華北民衆自治促進會成立消息，攻訐國民政府，鼓吹華北五省自主。青年學生愈爲憤懣，燕大學生東北同鄉會會長張兆麟見華北行將淪爲滿州國第二，乃欲恢復自二十一年起停閉之學生聯合會，以團結平津學生再作示威。經多方奔走，獲得平津各校響應，乃於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宣布恢復「北平市學生聯合會」，參加學校共二十二校，以燕大、清大、第一女中、中國大學及河北法商學院爲主要，總部設在第一女中，首任主席爲一女中的郭明秋<sup>54</sup>。

北平學聯成立不到一月，華北情勢驟形惡化，在日本指使下，平津漢奸流氓大肆活動，僞託民意，蘊釀「自治」。北平教育界人士再也忍耐不住，十一月二十三日乃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燕大校長陸志韋、師大校長李蒸、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及胡適、傅斯年、蔣廷黻等二十餘位知名學者，聯名發表宣言，否認華北民衆有所謂自治或自決之要求，同時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組織特殊機構的陰謀舉動，國家領土及行政主權必須維持完整<sup>55</sup>。是項聲明立獲全國



知識界響應及支持，不數日聯署人士即增至二千六百餘人。二十五日，殷汝耕在通縣宣布「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成立，激起全國一片討伐，民心士氣爲之振盪，青年學生久蓄待發之愛國情緒不啻受到鼓舞，於是一躍而爲波瀾壯闊之救亡運動。

十二月三日，北平學聯在市立第一女中召開會議，決定聯絡北平各大中學校，向華北最高當局發起大規模的請願以反對華北自治舉動。六日，燕大、清大、師大、東北大學、法商學院、第一女中、朝陽學院等十五校學生自治會聯合發表了「北平各校通電」，要求：(1)誓死反對防共自治政府，請政府即下令討伐殷汝耕；(2)請政府宣布對敵外交政策；(3)請政府動員全國對敵抵抗；(4)請政府切實解放人民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sup>56</sup>。此時，南京中央適派軍政部長何應欽抵平，準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應華北局面；平津各界相傳此係政府對日妥協之新措施，華北的分離舉動或因此實現。北平學聯因於十二月八日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於翌日聯合各界舉行請願遊行，以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

十二月九日清晨，北平學聯所屬二十二校單位學生，按照預定計畫如期出發。清華、燕大學生因在城外，受軍警阻擋未克進城；然城內各校學生則遊行不誤，沿途經無數阻壓，卒於十時集新華門，旋選出代表，欲入居仁堂向何應欽請願，表示下列六項要求：

- (一)反對華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及其類似組織；
- (二)反對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經過；
- (三)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



(四)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釋放被捕學生<sup>⑤7</sup>。

何應欽因先一日赴西山，軍委會北平分會乃由一參謀出面，學生乃憤。旋聞燕大、清大同學被阻於西直門外，遂分兩隊，一赴東城，擬在外交大樓示威，一赴西城，謀接應燕大、清大同學。在學生激動的情緒感染下，北平城內許多未參加學聯的學校學生，如輔仁大學、北京大學、中法大學等，亦紛紛加入遊行示威行列，致學生陣營人數由原先的八百餘人增至六、七千人，他們沿途高呼口號，散發傳單，終至與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衝突，騷動至傍晚，卒因軍警的強力壓迫而告解散。

當晚，聚集在北大三院的學生，以請願失敗，同學又受傷或被捕，極端憤恨，於是決議北平各校從十二月十日起實行總罷課。次日，以東北大學遭到北平公安局檢查，捕去學生九人；各校愈不自安，激進學生遂不顧政府禁令相繼恢復各種學生組織，以謀對抗。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且於十二月十二日召開記者會，宣傳學生運動。十三日，南京發表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消息，北平學生羣情激憤，蘊釀再發動一次示威以爲抗議。其中部分左傾的學生，在中共北平市委會暗中指導下，表現特別積極，他們透過北平學聯的指揮關係，開始預作嚴密的部署。

政府當局非常痛惜學生的行動，於十二月十日曾通令各級機關切實保障正當輿論，十四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勸學生復課。胡適博士更於十五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爲學



生運動進一言」文章，力勸學生勿受少數人煽動，勿以罷課為武器，時局愈艱困，應愈奮發讀書，以為將來國之大用<sup>58</sup>。但絲毫不改青年學生再次示威之意圖。

十六日清晨，示威學生有組織的分四路：第一路由東北大學領隊，以平大工學院、第三中學、平民中學、師範大學、民國學院、民院附中、鏡湖中學組成；第二路由中國大學領隊，以弘達一院、平大法商學院、平大醫學院組成；第三路由北京大學領隊，以東北中山中學、求實中學、貝滿女中、兩吉中學、河北高中、輔仁大學、華北中學、中法大學、竟存中學、精業中學、溫泉中學組成；城外為第四路，由清華大學領隊，以燕京大學、平大農學院、孔德學校和弘大二院等校組成。總計參加學校共四十四所，人數達七千七百七十五人<sup>59</sup>。

四路學生甫出校門即遭軍警攔截，學生奮勇衝擊，軍警本同情學生，壓制無效而退散。城外第四路亦破西直門而入，近午各路齊會於天橋廣場，於是就地召開市民大會，籲請政府抗日，口號四起，傳單遍布，北平市民為之動容，爭饗茶水。下午，學生進行示威遊行，分趨正場門、宣武門等處，再與守城軍警衝突，雙方相持至夜，寒風交加，學生忍饑耐凍不改顏色，至九時許始遵北平學聯指揮，分路返校。事後檢視，學生在與軍警搏鬥中輕重傷者三百七十餘名，被捕八人，失蹤二十五人。而冀察政務委員會本擬是日正式成立，亦被迫延期二日<sup>60</sup>。

「一二九」與「一二一六」的兩次學生示威運動，震撼中外，也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連鎖反應，各大城市青年學生相率聲援，此伏彼起的展開類似示威。如杭州學生，首先在十二月十日響應北平各校之罷課，二十日浙江大學且發起赴南京請願，致滬杭交通為之中斷。南京學生於十二月



十二日、十八日及十九日亦展開示威，先後聚眾至五千餘人。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八十餘所中學聯合發表宣言，反對華北自治，接著五十多所學校宣布成立上海學生救國聯合會，復旦大學更於二十三日發起進京示威運動，迫使上海當局於二十五日宣布戒嚴。統計，從十二月中旬起，除北平、上海、杭州、南京、武漢、廣州、開封、西安、濟南、青島、南寧、長沙、安慶、廈門、梧州、南昌、成都、桂林、太原、揚州、徐州、保定、蘇州、張家口、寧波、南通、重慶、蕪湖、江寧、應城、焦作、信陽、宜昌、常州、香港等三十餘處的學生都舉行了遊行示威，一個月內前後共計六十五起<sup>⑥1</sup>。中共各地的黨、團組織乘機宣傳，十二月十二日，立場偏左的馬相伯、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蔣維喬、王造時等二百八十三人，在上海以「文化界救國會」名義發表救國宣言，表示支持學生行動。二十日，共青團發表告全國學生民衆書，鼓動學生進一步與工農羣衆結合，並擴大行動到軍隊中去。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安定瓦窯堡通過決議，正式接受托派於八月一日在莫斯科發表之「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開始全面執行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十七日，馬相伯、沈鈞儒等亦宣告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組織，公然爲中共張目。全國各地參與示威的青年學生，惑於中共的抗日統戰宣傳，不少人因而加入中共組織，部分學生團體亦從此落入共黨之掌握。

十二月底，北平學聯中的左傾學生假藉成立平津學生聯合會之名，分化北平學聯，並由燕大及清大學生倡議，組織「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計畫貫徹共黨的學生與工農羣衆結合之指示，於二十五年一月起分爲四團沿平漢鐵路徒步南下至各鄉間宣傳抗日。上海、武漢、廣州、徐



州、濟南等地學生也發起類似活動。由於遭到各鐵路沿線軍警的攔截，各宣傳團多半途折返。部分立場原較溫和學生從這些活動中亦逐漸認清共黨面目，於是相繼退出活動。

民國二十五年年初，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返平後，中共北平市委以分化目的已成，為完全控制北方學運，乃決定於共青團之外別行組織更富統戰性質的學生團體。二月一日，宣傳團各分團於師範大學召開代表大會，遂正式宣布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其工作綱領中明白揭示：(1)站在最前線，參加一切救亡鬥爭，不畏縮、不後退；(2)與各種救亡團體密切聯繫，採取一致行動，建立一個廣泛的抗日聯合戰線；(3)把握現實，分析當前國際形勢，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論與實踐，使行動和理論密切結合起來；(4)學習軍事技術和理論，促進民衆武裝自衛運動，使自衛運動普遍化。民先隊成立之後，有正式隊員三百人左右，分爲二十六個分隊，至二十五年九月增至一千二百人，到七七事變爆發前，更達七千餘人。總隊部設於北平，除國內外，亦透過國際青運組織在南洋及歐州設立聯絡處<sup>⑥2</sup>。後日中共的青運主幹多由民先隊吸收培養，進而主導全國青年學生方向。這是中共在「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兩次學生運動中最大的收穫。

國民政府自始重視北方青年學生的活動和意見，蔣中正委員長尤愛惜學生，屢有誠懇之表示。二十四年十二月中旬行政院改組，蔣委員長兼任院長，旋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令教育部通知各省市專科以上及中學校長、學生代表，定二十五年一月五日在首都會見，聆聽政府抗日方針。各省市學生多表踴躍。惟平津左派學生反對。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各地學生代表三百餘人，同集南京中央軍校，蔣委員長親臨，演講對日政策三小時，並答覆學生問題。除闡釋了政府自九一八



以來的安內攘外政策實情外，蔣委員長復聲明政府從未也不會與日敵簽定任何喪權辱國之條款，如到最後關頭，必當不惜一戰。他勸學生重紀律、勤學問、鍛鍊身體，勿受人離間，致使愛國之舉成爲破壞秩序之媒<sup>⑥3</sup>。蔣委員長說明，獲得全國學界廣大迴響，一月十七日，各校校長一百六十四名發表聯合宣言，表示信任政府，反對分離運動，保持教育生命，制裁罷課及破壞紀律之舉動<sup>⑥4</sup>。除了已受共黨裹脅之少數學生外，大多數青年皆認同此號召，自日人在華北製造侵略的緊張局面以來，由青年學生所引導的救亡運動至是告一段落。

「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學生運動是繼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來，最令中外矚目的愛國行動。這股以青年學生爲主體的激流，其對民族尊嚴及國家主權的強調，尤勝五四時期的「外抗強權」主張，故有史家特以「學生民族主義」(Student Nationalism)稱之<sup>⑥5</sup>。這次愛國救亡行動，直接打擊了日本人及漢奸集團欲分離華北五省的陰謀和企圖；也落實了全國上下向來提倡的民族精神教育。後來對日抗戰得以進行，不可不謂是此種民族精神發揚成功之結果。這是自九一八國難以來，青年運動最有意義的影響。

## 六、對日抗戰期間的青年運動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向北平郊區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八月十三日，日軍又大舉侵入上海，全國軍民奮起抗戰。從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爲止。

在八年對日抗戰期間，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除了直接發動軍事戰爭外，亦透過各種政治手段摧殘我民族歷史和文化；而中國之抗戰，更是傾舉國之力進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因此，在這段時期，如何組織民衆，以集中意志團結禦侮至爲重要。而全國各界亦能不分黨派、地域、階層、信仰，共爲國難全力奮鬥，其中尤以青年學生之表現，最爲一心一德。故此時期的青年運動，可視爲中國青年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並發動國民革命運動以來的又一次大團結。其表現，無疑的有著一定之歷史地位。

###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創立與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由於初期的戰場多在沿海各省，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首當其衝，集中在這些城市的大、中學校不久即隨著城市的陷落而受到破壞。政府及學校當局爲保全教育文化計，乃於戰亂之中盡力於學校之遷徙。許多學校學生，在師長率領下，跋山涉水，歷盡艱苦，一遷再遷的退向西南及西北大後方，以繼續爲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而弦歌不輟。而一些愛國青年，更就地投筆從戎，在廣大的淪陷區參加抗日游擊隊，直接以身報國。領導對日抗戰的中國國民黨，鑒於國民革命大業向來都以青年爲中堅，而青年力量的凝聚與否又常爲革命事業成敗之關鍵；當此強寇侵凌，非常之大時代業已降臨，欲完成抗戰建國之艱鉅事業，自必更有賴於全國青年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因於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時



，正式決議：取消預備黨員制，另設青年團，徵求全國優秀青年而訓練之，使各成爲三民主義之信徒<sup>⑥⑥</sup>。其黨總章旋經大會修改，明列：「本黨爲訓練青年，設三民主義青年團。」

四月六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總裁蔣中正交議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青年團）組織要旨案。再經過計畫、籌備，終告成熟。六月十六日，蔣總裁發表「爲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告全國青年書」，宣布了青年團成立的意義、任務和對全國青年的期望。文告中首言：

「青年爲革命之先鋒隊，爲國家之新生命，舉凡社會之進化、政治之改革，莫不有賴於青年之策動，以爲其主力。……嘗念中國革命，久遠而艱鉅之事業，對吾富有革命精神繼續革命事業之青年，愛之有如至寶。換言之，中正實視吾青年即爲余之生命，蓋必有無量之革命青年，結合而成一偉大的力量，前仆後繼，百折不回，而後可以力行主義，捍衛國家，復興民族，以達成國民革命最後之目的。中正之於我全國青年之身，而所以組織之，訓練之，使能盡成爲真正中國之青年，真正足以擔當抗戰建國幹部之青年，則爲本團無可旁貸之職責。本團之成立，即爲欲盡此重大之責任而產生，亦鑒於國家民族當前之迫切需要而組織。」

因此，青年團產生的主要意義爲：

第一、爲求建國之成功。

第二、爲求國民革命新的力量之集中。



第三、爲求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

其作用，一方面固爲適應戰時總動員之迫切需要，而他方面尤爲樹立將來國家社會建設之幹部基礎。爲達成此艱鉅之使命，蔣總裁特別希望參加青年團的青年，必須整齊嚴肅、至誠純一，負起下列之任務：

- 一、積極參加戰時動員；
- 二、實施軍事訓練；
- 三、實施政治訓練；
- 四、促進文化建設；
- 五、推行勞動服務；
- 六、培養生產技術。

蔣總裁最後指出：

「本團之目的在集中全國優秀之青年國民，無問兵工農學商，而與以一貫之訓練，集之於同一之組織，納之新生活之規律，由明禮義，知廉恥，具備現代國民之基本條件；以進予羣策羣力，一心一德，負責任，守紀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現代最新國家之基礎。本團之創設，非爲吾青年個人謀出路，而要求吾青年貢獻其能力自由與生命，以爲國家民族謀出路；非爲吾青年策安樂，圖享受，而欲吾青年共甘苦，同艱危，以求抗戰建國之成功，與三民主義之實現<sup>⑥7</sup>。」



同日，並頒布了青年團團章。七月九日，青年團正式宣布成立，團中央設於武漢，由蔣總裁兼任團長。依團章規定，中央團部設幹事會、監察會及各處室，以執行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各事項；下分支團部、區團部、分團部、區隊及分隊。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青年團中央臨時幹事會頒發「各級團部工作之指導方針」，具體指示了組織之工作要領八條如下：

一、本團應使全體團員與全國青年，深切認識本團乃團結青年及訓練青年，使其能力行革命主義，捍衛國家，復興民族之唯一的青年革命集團，而非一般人所稱政黨。

二、本團應以至誠至公之態度領導全國青年，並發揚吾國立國之精神與固有之德性，以為青年思想及行為之軌範。務期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更指示其鬥爭對象為克服自然界的環境，及歧誤的思想，墮落的行為，以富於積極進取之新青年，創造國家民族之新生命。

三、本團各級幹部應為全團同志服務，本團團員應為全國青年服務，並策動全國青年為全國國民服務。

四、關於團員之徵求，固在選擇優秀精幹之青年，同時尤須以本團工作之表現，感召青年。於謹嚴之中寓寬大之意，於團結之中力祛排他之習。

五、學校團部之主要工作，在與學校教育相配合，並取得校長教師之指導與贊助，以發展青年羣衆之政治認識、體格鍛鍊、學術研究及培養其組織力與合羣性。

六、本團工作的發展，除應著重學校青年之外，並應對於社會青年，尤其具有生產技能及職



業者，加以組織訓練，使無論學校的社會的青年皆能以互助協作之精神與需要，形成一全國青年之偉大力量。

七、本團對於抗戰建國的實際情況，國際關係之趨勢，以及敵人和漢奸之陰謀，均須隨時予以正確的指示，使之明是非、別利害，以堅定其信念，求國家之獨立自由。

八、青年團之工作，必須於青年生活中表現之。即對於青年一切生活之需要，就其本身上予以指導及協助。如擇業、求學等，皆青年切身之問題，本團應視爲責無旁貸而應助之解決者<sup>⑥8</sup>。

由是可知，青年團的組織，雖含有政治的意義，但其工作方針及內容則是以教育占主要地位。爲貫徹此種教育工作，蔣總裁特別堅持青年團的純正性和服務性，如其在二十八年七月間視察團務時，即剴切詔示：

「我們青年團的訓練，要注重人格的修養和精神的鍛鍊，切不可襲用共產黨卑劣惡濁的方法來麻醉他們，反而消蝕他們純潔天真的本性。更不可以權位利祿相引誘，從而造成他們升官發財的心理。……本團長以爲如果我們專門使一般青年和他人從事黨派的鬥爭，因之祇是指使他們學得人家鬥爭的技能和手段，來發展團務，這種方式，即使發生效力，最多也不過和從前中國共產黨創辦少年先鋒隊的辦法一樣，由此種方式所訓練出來的青年，最多只是和中共一樣的東西。不僅於青年和民族的前途沒有好的影響，抑且與本團創辦的初衷完全違背了<sup>⑥9</sup>。」

其對團員之吸收，主張採「精兵主義」，寧缺勿濫，更不可模仿共產黨的辦法到處拉人擴充勢力



；而要防止共產黨運動羣衆，誘脅青年，只有以先驅前導的態度，切實盡到領導監督的責任，用正正當當的方法對付即可。因此，蔣總裁於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專電青年團本部書記長陳誠曰：「青年團不許令團員任特務性之工作，使其刺探同學。此種習慣應切實戒除。只要主持團務負責人員考核嚴密，小組會議、批評與討論認真，不懈不間，則匪諜不易容身於其間。而且要使一般青年，對於團務熱烈參加，並不嚴加限制。尤其對於積極與左傾分子，更應設法使其加入本團，使其得有機會陶冶就範爲要<sup>⑦〇</sup>。」

民國三十年六月，國際形勢轉劣，國內政治經濟危機四伏，中央團部因之頒發「爲克服當前之困難與爭取最後之勝利對全體團員之訓示」，指出「抗戰的最大目標在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所以國家民族高於一切。」凡是「動搖抗戰信心，直接間接足以削弱國家民族意識，分散國家民族力量，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者，本團團員應視爲全國公敵，予以駁斥糾正，揭發而徹底肅清之。」同時號召全國青年「對於經濟割據的趨勢，與各地把持糧食、操縱物價、營私謀利的行爲，及藉抗戰以發國難財者，本團團員均應堅決反對之。」要青年們向「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流痞奸商」發動總攻擊<sup>⑦①</sup>。

七月一日，青年團在重慶召集全國幹部會議，決定自三十一年五月起至三十二年八月止，實施全團團員總考核。分思想、品行、精神、體格、學識、能力、工作七項檢討三年來的成績。當時全國團員共三九三、一九〇人，實際參加考核者爲二四三、五七五人。經十五個月的批評檢討後，甄選出最優秀的團員有四二、六〇二人，占總員數百分之十八；完全合格的團員爲一九二、



一一二人，占總員數百分之七十九；不及格的團員有八、八六一人，其中二、一五五人被清除，六、七〇六人受暫停團籍之處分<sup>72</sup>。這次總考核，首先使青年團顯出了嶄新的陣容，加強了團員的組織意識與紀律觀念，對後來的工作發展很有幫助。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團鑒於團務日益壯大，為檢討過去工作得失，策進今後努力方向及確立團的基礎，乃於重慶馬家寺青幹班址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的各省區團員代表三百二十人，中央幹事、候補幹事、監察、候補監察八十二人。蔣總裁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我們青年團這次舉行全國代表大會，對於黨國興亡，民族盛衰，抗戰成敗，都有重大關係。在革命史上，這次會議可和民國十三年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樣重要。」繼謂此次大會乃中國青年自興中會、同盟會及民國十三年本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第三次大結合<sup>73</sup>。這次大會共開了十五天，制定了團綱，通過了「發展團務十年計畫總綱案」、「統一全國青年組織綱領案」、「發動青年建設新中國案」、「建立青年工作管理機構案」及「增進青年福利案」等二十四條。會後並發表宣言，表示將按總裁手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主旨，力行主義，貫徹抗戰建國目標，以建設國防、經濟、文化三體合一的新國家<sup>74</sup>。

青年團經過積極的建設，組織發展很快，在戰區、邊疆、沿海、全國各省、縣都有團的組織及活動。到三十五年六月止，已有支團部十四、區團部七、分團部一九七；專科以上學校分團八十四處，訓練機構的區、分團有四處，中學團隊有二五〇處。而是時全國青年參加團組織者共達一百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零七人。年齡在十六至二十歲的占百分之五二·五六；二十一歲至二十五



歲的占百分之三二·三六；僅受中等教育的就占百分之十三強<sup>⑦⑤</sup>。

根據三十五年三月底統計，青年團團員在國家建設的事業中，亦占著高度的比重。如分布於地方基層自治工作的，占團員總數百分之六十二。據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報告，青年團員當選省縣參議員的，就黔、湘、渝、川、青、陝、閩、京、鄂、寧、滇等十一單位計算，其中省參議員閩省占全省總數百分之五八，縣參議員以湘省為最多，占總數百分之四二。平均全國各地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又從事其他事業者，如農業占有百分之二·八，工業占有百分之二<sup>⑦⑥</sup>。

總體來說，青年團員以在校學生為主，占總團員的百分之四六·二一；另有百分之九·九的團員分布於軍隊中，擔任文化宣傳或直接從事戰鬥任務<sup>⑦⑦</sup>。

青年團除了凝聚全國青年參與抗戰建國行列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其正大光明之組織與活動，曾成功的遏阻了中共利用抗戰裹脅青年之陰謀。蓋自抗戰前夕中共成立「民先隊」取代共青團的活動後，即採秘密方式滲透於各大、中學校裏，宣傳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復利用各校西遷之際，誘騙青年往中共盤據地區，受其役使。及至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中共青運工作始告中挫，許多活動於各學校的民先隊份子被迫逃離或隱匿，致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於二十九年六月三日發出所謂「關於目前國民黨區學生工作的幾個決定」之指示，要其青運幹部「今後應改為長期的潛伏發展，積蓄力量，爭取人心，而工作重心應由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轉為校內學生工作；從純政治性活動轉向和學術性的、生活福利性的活動相結和。」其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更對所轄的學生工作指示：「以勤學、勤業、勤交友的工作方法，以取得社會地位和信任<sup>⑦⑧</sup>。」很顯然的，中共自抗



戰前夕以來一再於社會上鼓動的抗日救亡運動，至此已完全不能繼續，故祇得託蔽於正常的學校生活中，冀求生存之餘地。

青年團的創立和發展，不僅是中國國民黨青年政策及運動的成功，也反應了戰時中國青年的志向與需求，而其蘊育的精神及風格，更值得後世青年自我教育與學習，這是其價值所在。

## 青年從軍運動

國民從軍，為現代國家的國民義務。惟民國建立以來，政治混亂，民生凋敝，加以傳統社會重文輕武之觀念，國家始終無能也無由建立正常的兵役制度。中國國民黨為貫徹國家現代化之理想，當民國十三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便於政綱中規定：「將現時募兵制度漸改為征兵制度。」故十七年八月，北伐即將完成之際，訓練總監何應欽即根據上述政綱，草擬「征兵制度施行準備方案」，以為兵役法規制定之依據。二十年「九一八」變起，日寇侵我愈亟，國民政府乃於翌年一月擬定「陸軍兵役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修正通過，二十二年六月七日正式公布「兵役法」，至二十五年九月八日始頒布征兵令。這是中國現代兵役制度的開始<sup>⑦⑨</sup>。

根據兵役法規定，凡中華民國男子，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均有服兵役之義務，而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男子，經體檢合格，且需服常備兵役<sup>⑧⑩</sup>。抗戰爆發後，各省兵員徵召大都依此法進行，惟政府鑒於實際環境和條件限制，又為愛惜學生學業，培養國家元氣起見，亦按兵役法規定，對於在學之青年學生特許以緩徵或免役辦理<sup>⑧⑪</sup>。因此，抗戰初期青年學生之從軍者大多為自願性



質。如二十六年底淞滬會戰期間，京滬各大專院校學生紛紛組隊赴戰地服務；當沿海各學校西遷之際，許多學生在西安、洛陽、成都等地參加軍隊工作或投入軍校；二十八年，教育部徵調大學醫學院畢業生擔任軍醫，幾年之中，被徵調者不下三千餘人；三十年，大批的工科學生被徵調去趕築公路和製造兵工品；美國空軍來華，教育部又徵調了外國語言系學生去做譯員<sup>82</sup>。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後，入團的青年學生出生入死，活躍於各戰場上，他們協助國軍擔任構工、消防、宣傳、慰勞、救濟、徵募等工作；武漢會戰期間並掩護國軍撤退，收容難民，搬運軍需，搶救傷兵等，或忠勇殉職，或陷敵不屈，或見義勇為，或毀家紓難，忠義精神，直可為全國青年之典範<sup>83</sup>。

雖然如此，抗戰中期以後，由於戰區擴大，兵源乃漸感困難，前線舊有之列兵，多傷亡殆盡，而新徵募者，大多訓練不足，素質低落，不僅難於達成戰鬥任務，且無法發揮戰鬥精神，致使整個戰局遭受嚴重影響。為補救此種危機，自需重整軍備，而重整軍備，首在貫徹兵役法，使兵役負擔公平，軍隊素質及來源才有提昇及增加之可能。蔣委員長因於二十八年一月，發表「告士紳教育界同胞書」，勸勉地方士紳賢達，與教育界人士，一方面策應政府，宣傳抗戰成敗與兵役實施之關係，激發民衆抗敵意識，使其踴躍應徵，另一方面，則希望糾正過去「好男不當兵」觀念，鼓勵及齡子弟入伍，或投考軍校，藉以倡導風氣，以彰效法<sup>84</sup>。至三十年六月，乃發起士紳公務員子弟當兵運動。

三十年代，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軍為支援盟國作戰，乃派遣遠征軍入緬。至次年五月，以



緬戰失利，部分國軍撤入印度，集中於印北藍伽整訓，改稱為駐印軍。駐印軍由美國負責裝備及訓練，時美方以訓練成效不錯，乃建議中國政府續派兵員至印基地，擴大實施，以為將來反攻日軍及改造中國軍隊之基礎。中國政府接受之，而認為以知識青年增補赴訓最為妥當，因為知識青年腦筋靈活，易接受新觀念和新技术，且青年富愛國熱忱，遠赴異域，自較安土重遷的農民子弟踴躍，將來訓練成果易較顯著。因於三十二年三月繼公布新兵役法後，復以行政命令，規定學生服役之權利義務。同年，蔣委員長手著「中國之命運」出版，明示青年報國之道乃「立志為軍人，為飛行員」，以「轉移我國三百年來國民怯弱萎靡之風氣，恢復我五千年來民族固有的偉大精神<sup>85</sup>。」青年學生受此感召，從軍報國之情不襟油然而生，自三十二年下半年乃蔚為一股普遍的風氣，從而掀起抗戰期間青年從軍運動第一次之高潮。

三十二年十一月，軍事委員會為調訓軍中幹部，教以新式武器之使用及專業技術，同時策動學生赴印接受訓練，乃在廣西桂林成立「東南幹訓班」，而以四川軍營區為主要徵集地區。該軍管區參謀長徐思平奉命後，於十三日藉考察北道各師區役政業務之便，特召集地方士紳及青年學生，曉以大義，鼓勵志願從軍，慷慨激昂，聽者極為動容。當晚即有綿陽中學學生邱永森等十五人，至徐參謀長駐地，申請入伍服役。此為三十二年學生從軍運動之嚆矢<sup>86</sup>。十五日，徐氏出席三台東北大學紀念週會，講演「兵役義務與文武合一」，強調：「東北大學之惟一時代要求，在戰時參加協助抗戰，收復東北，戰後建設東北，舍此則東北大學可以不辦。」當場即有男生十五名，女生四名申請入伍。十六日，再召集中學以上學生千餘人演講，遂獲請纓之男生二百餘人，



女生三十餘人，情況至為熱烈，部分女生且因被婉拒而痛苦流涕。其後三台縣政府與民衆競相贊助，熱潮逐日高漲，至二十日正式成立遠征軍新兵大隊，進行體格檢查，於二十五日起入營<sup>87</sup>。

由於三台東北大學及縣內各中學青年學生首先響應從軍運動，很快即使四川全省青年跟進，「聞風景從者，由成都四川西北各縣，更由陪都（重慶）而川東南各區，各地大中學生無不爭先恐後，集團登記，以求遠征。而各地公教人員，甚至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石柱僧伽訓練班各僧徒，不甘後人，亦集團參加。截至十二月二十日止，總計四川各地各縣登記報到數字，已有一萬四千餘人，僅成都一地八千餘人。由各縣市聞風興起者，尚絡繹不絕<sup>88</sup>。……」陝、甘、湘、贛、粵、桂、黔，各省大中學生，亦受風潮影響，從軍日衆。致報名總數達到三十三年下午，即達五萬餘人，而以中學生居多<sup>89</sup>。

三民主義青年團為配合政府，並響應青年從軍運動，亦於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成立「學生從軍指導委員會」，分置幹部於各省，帶頭請纓入營。而政府感於青年學生當兵，動機及背景概不同於普通壯丁，有必要特別照顧及編訓，乃於軍政部兵役署內別立學生服役小組，專責其事。並制頒「學生志願服役辦法」，嚴格規定對服役青年學生之保障。至三十三年一月中旬，由志願服役青年學生組成之教導第一、二團，首先在成、渝兩地成立，共編有新軍五千九百二十七員；至同年八月，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八個教導團及三個教導營，計有兵員共一萬九千零四十八人。他們於接受初步的訓練後，即分別按照駐印基地要求，空運赴印，迄三十四年元月底，先後撥運人數為九千一百六十四名<sup>90</sup>。



三十三年春，日軍爲打通由中國大陸至南洋的交通線，乃自豫、湘、桂戰場發動凶猛的新攻勢。中國政府受緬北反攻戰事牽制，雖於東戰場奮力抵抗，然仍無法遏阻日軍之前進。而國軍第十軍方先覺部，則於日軍進抵衡陽之際，拚死力守，苦戰達六星期之久，至八月八日始因犧牲殆盡而去。衡陽陷落後，日軍直迫桂、黔，戰局頓呈惡化，西南中樞爲之震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最高當局乃決定擴大號召青年從軍，以救國家最後關頭。蔣委員長因此於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兩度指示黨、團各機構積極策畫知識青年從軍，第一期以十萬人爲目標，三個月內完成徵集<sup>⑨</sup>。

中國國民黨及青年團奉令後，分別集會商討徵編計畫。自十月十一日以迄十四日，一連四天，中央有關各部會、各省市黨、團負責人，及教育界人士，共一百二十七人，於重慶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對於知識青年從軍之徵集辦法、編練計畫、幹部選拔及指導徵集機構，進行縝密之研討。蔣委員長曾兩次蒞會訓示，強調此次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實關係黨國前途至鉅，無論黨員、團員皆應以身作則，率先從軍。他說這次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的宗旨是：「第一，要使一般社會民衆改變其過去對於兵役的心理，從而踴躍應徵，來充實作戰的實力。第二，要使社會民衆改變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態度，認識中國國民黨革命犧牲的精神，因之接受國民黨的領導，共同一致來完成革命的使命。……這兩層用意，後者尤重於前者！」由於共產黨和反動派人士利用戰事失利之不安情勢，不斷詆毀及誣衊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企圖惑謠國際視聽，動搖民衆對抗戰之信心，故蔣委員長繼而沉痛指出：「本黨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我



們沒有其他方法來提振我們一般同志的志氣，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此次所發起的知識青年從軍的一個運動，只有這個運動成功，乃能振作我們一般同志的精神，重整我們本黨革命的旗鼓，這真是本黨起死回生最後的機會<sup>92</sup>。」

此外，蔣委員長並指示改善從軍之待遇和出路，加強對學校青年及公教人員之徵召，以爲民表率。至於召集方法則應注重調查、登記、宣傳和組織。委員長強調：年齡在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黨員應自動登記，準備應徵，否則開除黨籍；三十五歲以上者，如其本人不願當兵，應至少介紹一位子弟或親屬代替之<sup>93</sup>。大會根據委員長之指示，訂定了「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優待辦法」，以爲此次徵兵之依據。十月十四日，「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同時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之口號。十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發表「告知知識青年從軍書」，以三義昭示全國青年：第一、青年非從軍無從造成其人生偉大的志業；第二、青年非從軍無從消雪其國家積弱的恥辱；第三、青年非從軍無從獲得其抗戰最後的勝利<sup>94</sup>。同日，二十四所國立大學院校校長聯名電陳：決各本職責，指導青年響應從軍運動之號召。翌日，中央即通令各省市縣，成立各級徵集委員會，自十一月十一日起，統一辦理青年人伍登記<sup>95</sup>。全國知識青年，既承前年從軍運動熱潮之餘波，復深切感受國家民族危難之需要，乃毅然奮起，相率響應，遂滙爲另一次青年直接報國行動的高潮。

根據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徵集辦法規定：凡受中等以上教育，或具相當知識程度之青年（男），年滿十八歲至三十五歲，依法緩徵、緩召及應徵服役，而體格合於規定者，均可志願參



加<sup>96</sup>。自從軍辦法公布實施後，各地青年學生十分踴躍，有些城市設立的徵集站，以應徵者過多，而不得不延長徵集期限；而如成都、重慶等地的徵集站不到一星期，預徵名額即滿。由於各地從軍青年報國心切，每多輟學辭業，先期來會，請求入伍；遠道及淪陷區的從軍青年，更大批湧至四川，致重慶、成都市內原設之招待所不敷使用，祇得借住學校、戲院等公共場所。女青年們亦不甘後人，中央祇得再制定「全國知識女青年志願服務徵集辦法」，以為納編。

自十一月中旬起，迄十二月底，計共徵得中學程度以上學生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人，大專程度以上學生一萬五千五百人，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工作人員二千六百二十人，總數達十二萬五千五百人，超過預期十萬人之目標。其中學歷再細分，則專科以上占百分之十，高中以上占百分之二十三，初中占百分之六十，小學占百分之七<sup>97</sup>。根據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時蔣委員長之指示，定名為「青年遠征軍」（簡稱青年軍），於十二月二十日後，即陸續入營受訓。其編制一律按中華民國駐印軍之編制，分在四川、貴州、雲南、陝西、江西等地組訓，共編成九個師。由於陸軍第二〇〇師，係抗戰期間最早建立之機械化部隊，戰功彪炳，亦曾受命赴印緬作戰，被日敵譽為「支那虎師」，故青年遠征軍之番號，乃自二〇一師編起，以迄二〇九師，顯示中央對此軍深切之期許<sup>98</sup>。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編練總監部宣布：「知識青年從軍號召的數目是十萬人，報名應徵的有十二萬人。至本年四月底止，因戰事關係及交通運輸關係，實際報到入營的有八萬六千人。後來又因一部分分發駐印軍及其他部隊，現在確數是七萬六千人，編成九



個師。原定計畫是八月訓練完成，九月開始參加反攻。照現在情形來看，正好到可以使用程度。青年軍可視為建軍的示範部隊<sup>99</sup>。」實際上，自徵集之初，為應付戰局所需，青年軍即採隨到隨編，隨編隨訓之原則，故自三十四年二月初，便陸續有已完訓之部隊派往印北參加反攻緬北的戰役，其總人數共計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人<sup>100</sup>。當編成之際，黔、桂戰局已扭轉，故中央將青年軍改撥至已裝備美國軍械之新一軍、新五軍、新六軍，預備作總反攻之用；而日本則於八月十四日宣布無條件投降。政府顧及青年出路，旋配合戰後裁軍計畫，於三十五年五月，下令青年軍復員，除二〇七師以奉派赴東北擔任剿共戡亂任務而自請延長服役外，其餘多數從軍知識青年，從此卸除戎裝，參加建國行列<sup>101</sup>。

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是對日抗戰期間影響最為深遠的青年運動。它象徵著中國青年已由愛國思想的鼓吹推進到直接報國的行動層面，這是中國青年運動本質的轉變與提昇。就政治意義言，它表示了全國青年同仇敵愾，堅苦卓絕，誓死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及領導地位；就社會意義言，它顯現一種新風氣和朝氣，一改傳統鄙視軍人的不正常觀念與習尚，為國家民族之進步起了一種正面的示範作用。而青年本身經過此種軍事生活之鍛鍊，亦盡祛過去祇會坐而論道的文弱書生之印象。由於青年軍在服役期間，政治與軍事訓練並重，對國家處境體會益為深刻，所胸羅之理想亦更能兼領實際之奮鬥，人格乃益臻成熟。因之復員以後，其無論在任何行業，表現均超人一等。很多從前為共產主義所迷惑的青年，經此戰時生活之陶冶，對共黨禍國陰謀有了認識，而成爲堅決的反共鬥士。如後來戡亂期間，河北、山東復員之青年，在共軍進迫，守城國軍犧牲殆



盡之際，即自動組率當地民衆，堅守孤城，保衛地方。如湖北復員之青年，於共軍蹂躪地方時，亦多自動協助國軍進剿，組織民衆自衛，以寡擊衆，綏靖地方。至上海、北平各大專學校之復學青年，則秉往日從軍熱忱，忠貞體國，維護學校秩序，擁護政府法令，與共黨的職業學生搏鬥，正氣磅礴，不惜犧牲。故當大陸淪陷後，共黨大肆屠殺反共人士，復員青年軍壯烈殉難者達數萬人<sup>⑩</sup>。抗戰期間四川省主席張羣有云：「學生從軍，戰場效果小，精神效果大，抗戰意義大，建軍意義更大。」就近代中國青年運動的歷史意義言，其爲民前鋒的至情與至性，尤值表彰。

## 七、青年運動的逆流、結果與教訓

中國青年運動，自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揭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以來，即以民族主流須其主流。此後歷經北伐、九一八及全面對日抗戰各時期，中國青年奔走呼號，犧牲奮鬥者，更遠超出一般羣衆運動所企求的本身利益之外，這是因爲青年學生有知識、有理想，深知非國家與民族的根問題獲得解決，否則無以確保個人的生存及發展。在當時，這是一種時代的需要，也是中國青年運動的精神和意義所在。然而不幸，此種精神到了對日抗戰勝利以後，竟逐漸喪失，而致演變爲爭一己之利，逞一時之快的暴戾之氣；遂使五四以來聖潔光明的民族主義之主流，激化成一股妨害民族生機，破壞國家建設，擾亂社會秩序的逆流，卒至河山變色，同胞盡受奴役而後已。



首先導致青年學生走上激烈變質的羣衆暴力之途的主要因素，是抗戰末期以來日益滋生漫衍的反戰心理。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期間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國民政府即積極著手進行受降及接收淪陷區事宜，並從事各項復員工作和計畫。而利用抗戰占領華北、華中部分地區的中共，爲搶奪勝利果實，竟悍然抗拒中央政令，私自進兵各淪陷區阻撓政府的接收工作。此種敵對態度，使得甫經勝利的國家又蒙上了內戰的陰影與威脅；儘管國民政府顧全大局，極力容忍中共的蠻橫行徑，在三十四年八月至十月特別與中共當局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以謀國家和平，但由於雙方的互不信任，國共間的軍事衝突危機反日益升高。

青年學生在飽受長期戰爭的煎熬後，目睹方露生機的國家竟再面臨戰亂之噩運，無不失望和惶恐。部分在抗戰期間即對國民黨素懷成見和誤解的知識份子，更受刺激。當時在政治及軍事力量上均不如國民黨的中央，乃大肆散布民主論調，煽動知識份子及青年學生相信其擅構的國民黨之「內戰政策」說，以利用不滿現狀的青年學生爲其所謂的「第二條戰線」而戰鬥<sup>(103)</sup>。因之，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聚集在重慶的「民主同盟」人士，便首先成立「陪都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表示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十一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報」即發表社論與之唱和。數日後，中共在昆明的學運組織「中國民主青年同盟」（三十四年三月成立），亦發動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科學校等校附共師生，通電反對內戰。

十一月二十五日，西南聯大等四校學生自治會，進一步召集昆明各界人士，於聯大校園內開



「反內戰時事晚會」，與會者六千多人，包括多位向來即反政府的教授學者，會中演說諸氏極力詆毀國民黨及政府，公開聲明擁護共黨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時雲南省政府甫經改組，地方甚為不靖，昆明軍政當局恐此等羣衆大會再生事端，故嚴密監視。會中的共黨份子乃藉詞鼓動，號召與會學生自翌日起罷課抗議，於是二十六日，聯大等九所大中學校即宣布罷課。然部分學生認爲此實爲過度之反應，堅不相從，結果就爆發了連日的罷課與反罷課鬥爭，牽連達全市半數以上大中學校，昆明全市爲之騷動。

十一月三十日，聯大內的罷課學生再度集會脅迫同學，適昆明第二軍官總隊學員按早先排定時間來校參觀，罷課學生誤以爲昆明當局派軍鎮壓，竟加以毆辱，引起混戰；翌日，軍官總隊學員至聯大理論，引起兩派學生互鬥，相持於聯大師範學院內外，軍警前來疏解，混亂間有人向學生投擲手榴彈，遂造成死傷十餘人之慘案。

「一二·一慘案」發生後，中共趁機宣傳，指稱國民黨當局血腥鎮壓學生運動，昆明的罷課學生氣焰益張，於十二月六日再集會決議擴大示威行動，並到處傳撥反政府的宣傳品，而西安、貴陽、武漢、廣州、長沙、南京、南昌、福州及重慶各地的中共外圍團體也羣起聲援，他們要求政府懲凶、賠償外，復提出制止內戰、撤退美軍、組織聯合政府、保障人身自由等種種不關事件的政治要求。十二月中旬，國民政府派員逕赴昆明處理善後，依法調審肇事者及有關失職人員，醫療受傷學生，同時要求罷課學生復課，否則解散西南聯大。罷課學生却以政治目的的未達，仍企圖頑抗，中共當局不願見到剛起的學運基礎化爲烏有，乃密令策動罷課的職業學生收束行動，



十二月二十七日各校學生復課，此一於抗戰勝利後，首揭學生運動序幕的昆明學潮遂告結束。

昆明學潮起於青年學生反戰心理，中共則利用青年學生此種不安的情緒來進行其叛亂之陰謀。就當時的中共而言，因為尚無力量直接與國軍抗衡，故亟力煽動此種反戰情緒以抵制政府的優勢兵力；而勝利之初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尤使中共恐懼，因此當其煽動反內風潮時，亦積極鼓動反美情緒。中共宣稱政府「挑起內戰」，而政府之所以敢挑起內戰，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由於政府一味進行其內戰政策，才導致民不聊生的局面。於是從昆明學潮結束以後，中共便將其宣傳置於反內戰與反美帝的重點上，並進而引申出經濟性的羣衆鬥爭。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在美國的停處下，國、共之間達成停戰協定；同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嗣後政府宣布將於五月召開國民大會，遭到中共反對。雙方軍事衝突再起，共軍連連敗挫。政府為開和平之門，再三頒令停戰，而中共却拒絕如故。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正式召開，中共決心「先發制人，奮鬥到底」，至此完全拒絕美國的調停。為恐美國從此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因此，中共當局自三十五年底開始，全面策動各地的反美運動。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駐在北平的美軍慶祝聖誕夜，歌舞喧囂，一名北大先修班的共諜女生沈崇擬赴戲院看電影，聲稱於途中遭到酗酒美軍「強暴」。當時駐華美軍在各大城市即常鬧事，早引起一般民衆側目；沈崇被美軍「強暴」的消息傳出以後，中共擴大渲染，於是激起社會各界極大之憤慨。北京大學歷史系首先於二十七日發起全校各系級代表和社團代表大會，當即通過「嚴懲暴徒」、「駐華美軍當局公開道歉」和「要求美軍立即退出中國」等決議，又發表「告全國同



胞書」、「告美國人民書」等，並決定三十日罷課一天以示威。二十八日，清華大學學生自治會響應，並擬聯繫各校共同發動遊行。隨後北大、清大等校園內，即貼滿了抗議美軍暴行的壁報及標語。三十日，中法、朝陽、師大、鐵道管理學院及清大各校抗議學生齊集北大，展開示威遊行。政府當局認為沈崇事件乃法律問題，不應牽扯為政治事件，極力勸阻無效，反美示威活動遂漫衍開來。

天津方面，因正為駐華美軍陸戰隊司令部所在，該地學生反應特別激烈，除示威遊行外，並於三十六年一月十二日成立「天津學生團體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至同月下旬，進而與北平學生合組「平津學生抗暴聯合會」，展開所謂「敦促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全國學生簽名運動。

京滬方面的抗議也屬空前，上海共黨透過「文匯報」的誇大渲染，使得上海學生羣情激憤。十二月二十九日，暨南大學學生首先成立了「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交通大學學生召開系科代表大會，決議成立交大抗暴委員會，向各界發表「抗暴宣言」，同時自十二月三十日起實施總罷課。接著，復旦、同濟、大夏、上法、上海醫學院、光華大學、體專、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等也先後成立了「抗暴會」，到處舉行羣衆大會，宣傳反美。中共中央上海局把握機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公開成立「上海市學生抗議駐華美軍暴行聯合會」，並於三十六年元旦（中華民國憲法公布之日）發動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南京的戲劇專科學校學生自一月二日起，到處演出美軍「暴行」的活報劇，並在三日聚衆遊行至美國大使館前和國民政府辦公處前示威；中央大學學生特別踴躍，在同日領導組成「南京大



專院校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據中共宣傳，在三十六年一月間，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反美運動，除平津、京滬四城外，杭州、蘇州、鎮江、常熟、溫州、武漢、長沙、南昌、濟南、廣州、福州、桂林、昆明、成都、重慶、西安、蘭州、開封、洛陽、青島、瀋陽、長春、哈爾濱等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的學生，都舉行了罷課集會或示威遊行，參加人數達五十萬人以上<sup>⑩④</sup>。

三月八日，中共策動的「全國學生抗暴聯合會」在上海成立，為抗戰勝利後第一個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宣言「美軍在中國一日，即反對一日」，又造謠詆毀中美兩國間訂有軍事性的秘密協定，而提出要求「公開中美秘密協定」之口號。

這次反美運動是抗戰勝利後，中共策劃之首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延安「解放日報」譽之為「是中國青年繼五四、五卅、一二九以後又一次轟轟烈烈的大運動；這也將和五四、五卅、一二九一樣，作為一個先聲，開闢中國歷史的新頁。」中共中央，則認為這是其「反對美蔣反動派的第二條戰線形成的起點」<sup>⑩⑤</sup>。

由沈崇事件引起反美學潮至三十六年一月中旬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的離華及二月起駐華美軍的相繼撤退而漸告和緩<sup>⑩⑥</sup>。然而此時的中共當局，以國民大會既已召開，失去政治鬥爭的馮藉，遂決定集中全力於軍事上之擴張；國民政府為穩定局勢，亦對共軍進行全面掃蕩。從三十五年十二月起，至三十六年六月，共軍攻占了不少城市，國軍也收復了不少城市，而三十六年三月間陝北延安的攻克，對中共打擊尤大。共軍在東北進攻長春、瀋陽，不僅未得手，反蒙受更大損失。



爲了挽回軍事上的劣勢，中共決定繼續發動各地的羣衆運動以困擾政府。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特別指示各地組織新的鬥爭策略，謂：「針對目前蔣的鎮壓政策，我們應擴大宣傳，避免硬碰，爭取中間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從爲生存而鬥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sup>⑩</sup>。」在這個指示下，中共當局乃策定了所謂「一校一事運動」，預謀以新的學潮來打擊剿共之民心士氣；而推波助瀾者則爲早與中共勾結的民主同盟<sup>⑪</sup>。

民主同盟組織在三十二年九月恢復活動後，其總部即設有「青年工作委員會」，對策動學潮不遺餘力<sup>⑫</sup>。其在青運工作上所以易於開展，主要是民盟份子多數爲各大、中學中的教職人員，中共的職業學生很多即是透過他們安排而進入各大、中學校內，並得其掩護以發展工作。抗戰勝利後，西南後方各大、中學相繼返回原址復校，民盟的活動亦隨之轉移到京滬地區。在中共「一校一事」的運動方針下，三十六年發端於京滬地區的「五月學潮」即是民盟爲表，中共爲裏的唱和之作。

五月學潮的發端，以上海各大學紀念「五四」二十八週年活動爲始，當時上海中共組織的「五月工作計畫」中即指示：「發動學潮以五四紀念爲活動中心，以各校抗暴會爲基幹，以各大學爲活動對象，以造成流血事件爲目標，以繼續發動請願示威爲鬥爭方式<sup>⑬</sup>。」，因此當三十六年五月初，民盟份子羅隆基、章伯鈞、王紹鏊、施復亮、馬寅初等即分赴京、滬、杭各大校演講，作公開之鼓動。他們藉著各校因復員之際引起的各項校務問題，批評政府的措施，導引學生的



不滿情緒，而進一步發動對抗行動。於是首先就有浙江英士大學學生以要求將校址由金華遷回上海或南京而發起罷課請願（五月二日）。繼之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以反對教育部停辦該校航海、輪機兩系及改制為學院而掀起所謂的「護校運動」（五月四日）。這兩校學生在民盟份子及中共職業學生的組織下，先後於五月上旬派代表赴南京請願，蠻橫的取鬧於京滬線上，是為五月學潮之序幕。

五月十日，由民盟份子控制的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藉口政府所發副食費無法維持開銷率先提出「增發公費」的要求。學校方面以政府財政實在困難懇切相告，結果引起學生不滿，自治會所屬的學生伙食團代表乃集會決議，發動「吃光運動」以為抗議。十二日，自治會正式決定全校學生罷課以進行公費之爭取。

中大的要求增加公費運動傳出，立刻獲得音專、劇專、東方語專等校學生之響應；十五日當天四校學生三千餘人即聚集於教育部前示威，繼遊行至行政院。他們要求政府「停止打內戰，把錢拿來辦學校」，定要政府比照物價指數增發學生公費和教職員薪津，態度驕狂而惡劣。十六日，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學生也加入示威，風潮有日趨嚴重之勢。政府不得已乃於同日宣布調整大學生的副食費，每月由二萬四千元增至四萬八千元。學生以所調整者仍未達物價指數標準，決定繼續抗爭；十七日，中大宣布無限罷課，同時召集金大、劇專、音專、藥專等校學生代表，成立「南京市學生聯合會」。又計畫於五月二十日國民參政會開幕時擴大舉行反飢餓、挽救教育危機的遊行示威。中大學生自治會更派代表至上海、杭州、蘇州等地進行聯絡，並通電北平、武



漢各地大學一致行動。

南京學生十五、十六兩天的要求增加公費運動，在中共各地組織的傳遞下，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大專院校。浙江的浙江大學，武漢的武漢大學、華中大學，蘇州的社教學院，開封的河南大學及四川重慶大學等，皆於五月十七日前後舉行了類似的遊行及罷課。上海各大學尤其激烈，十六日，復旦、暨南、同濟三校率先罷課，繼而聯合交大、上醫、音專、幼師等校於十八日成立「上海市國立學校學生聯合會」；十九日再與浙江大學代表，聯合組成「滬杭學生代表晉京請願團」，準備配合南京學生在二十日要進行的示威活動。他們提出四項要求：(1)依照必需之營養標準及物價指數增加公費數額；(2)普遍增加公費生名額；(3)提高教職員待遇，依照物價指數支付；(4)提高全國教育經費至國家每年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五<sup>⑩</sup>。十九日請願團赴京前夕，交大、同濟、復旦等十餘校學生藉歡送之名大肆集會遊行，高舉所謂「向炮口要飯吃」等標語，瘋狂喧鬧。

北平方面以清華大學最先響應，五月十五日晚，該校學生會召開院系班代表大會，一致決議反對內戰，要求按物價指數提高公費標準，並決定罷課三天，同時派代表分赴北大、師大、燕京、中法等校聯絡，組織共同行動。十七日，清華大學學生開始罷課，並成立「反內戰反飢餓罷課委員會」，作為公開領導運動的指揮機關。而北大學生經清大學生聯繫後，亦於十九日起罷課三天，同時發表罷課宣言及告同學書，向政府提出停止內戰、恢復政協路線、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停止徵兵、挽救經濟危機、保障人權、提高教育經費等六項要求<sup>⑪</sup>。朝陽、中法、燕京、滙文等校繼起投入之。而天津南開大學也在十八日起罷課三天，期間依樣畫葫蘆的成立「反內戰反飢餓



行動委員會」，並倡議以六月二日爲內戰日。中共乘勢利導，於五月十八日晚串聯已發起罷課的北大、清大、燕京、師大、中法、朝陽、輔仁、南開、北洋、唐山交大等校積極份子，齊集北大開會，而正式成立「華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聯合會」，並決議在五月二十日舉行示威遊行呼應京滬地區的行動。

面對連串的汹涌學潮及因經濟崩潰所造成的混亂社會秩序，國民政府處境至爲艱難；中共除一面積極調整各項經濟財政措施外，復力圖穩定社會治安，期使不利的政治環境轉危爲安。五月十八日，臨時國務會議針對各地衝突不已的搶米風潮及學生滋擾事件，特別製頒「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六條，希望制止變亂相循的請願、示威之遊行和集會行動。其中平津、京滬學生的一意孤行行動最令政府憂慮，蔣中正主席特於十九日發表談話，表示了他對青年學生恣肆暴戾之痛心，進而堅決要求各校務必整飭學風，維護法紀，政府基於國家至上立場，必要時對學生運動將不能不採取斷然處置<sup>①③</sup>。中共旋透過左傾各報，曲意譏刺國民黨對學生之恫嚇和威脅，要各校罷課學生「不畏強暴、硬幹到底」。而民盟份子則相繼贈款滬、杭學生，鼓勵他們照預定計畫至南京參加大示威運動<sup>①④</sup>。

五月十九日，中大學生自治會以南京五大學自治會聯署之公文，送達南京衛戍司令部，謂將於二十日晨遊行示威，衛戍司令部以十人以上之遊行請願爲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所禁止，當即批覆不准。中大學生不服，即於是日夜召集滬、杭、蘇各校至京學生代表，決定仍照計畫發動遊行，並以中大、金陵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交大、浙大、蘇州社教學院學生代表爲主席團



，領導示威遊行。

二十日晨，滬、杭、蘇學生代表團與南京五大學學生三千餘名齊集於中央大學操場，各校校長、訓導長及部分師長勸阻無效，衛戍司令部乃派出大批憲警分駐全市重要交通要道，以防學生越軌之行動。十時許，聚集在中大的學生出發，即與部分未趕至的金陵大學學生會合於鼓樓，然後列隊向參政會前進。學生們沿途高喊「反對飢餓」、「反對內戰」、「取消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挽救教育危機」等口號，且有宣傳車隨隊散發請願書，張貼及書寫抗議標語。歌聲震天，幡條招展，聲勢浩大。至珠江路口，憲警已整隊作阻攔準備，雙方溝通不成，隨即衝突，警察以水龍強驅學生，學生反奪水龍逆衝憲警，遂引起混戰，當場受傷學生一百二十餘人，而二十八人被捕。至中午，被驅散學生復集於國府路，憲警派出騎巡隊擋在街頭，彼此相持兩個多小時，適降大雨，學生不欲再作激烈對抗，乃派代表求見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並與衛戍司令部人員談判，請釋放被捕學生、嚴懲凶手、醫治受傷同學及撤退憲警等。一部分學生則就地舉行記者會，「控訴」政府暴行及宣傳學生主張。下午四時，邵力子允將學生主張和要求轉達參政會及國民政府，並協調衛戍司令部撤退憲警。遊行學生即繞經參政會後各自返校，結束示威活動。

同一天，平津學生也依預定計畫發動了遊行示威。其中天津南開大學學生被軍警毆傷五十餘人，被捕十七人。華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聯合會亦響應天津學生之議，定六月二日為反內戰日，同時將北大廣場命名為「民主廣場」，預定進一步的示威運動。

南京五月二十日遊行學生與憲警衝突的事發生後，中共及各左傾團體爭相報導，將之渲染為



「血案」，於是各地學生復繼續發動所謂「反迫害」示威。上海學生首先宣布二十三、二十四日實行總罷課，天津學生繼起；二十二日起，昆明、南昌、武昌、南京、廣州、西安、開封、重慶、武漢、瀋陽、青島等各大城市都先後發生了罷課、罷教及罷工之抗議活動。國民政府認定學潮為中共所策動，決心強力對付，因自五月下旬起，全面執行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許多學校都遭到軍警搜查，激進學生亦受到監視或拘捕，衝突不斷，抗議也不斷；在搜捕鎮壓過程中，也確實查獲若干證據，證明多數學潮為中共及民盟在幕後策動<sup>(15)</sup>。由於政府採取不姑息的高壓手段，曝露了中共陰謀，若干學校內的職業學生紛紛走避，罷課學生氣焰嚴重受挫，平津學生原訂的「六二大示威」遂無形瓦解。在部分教授的呼籲和反罷課學生的抵制下，六月三日以後，中大、北大等京滬、平津學校相繼復課，這場歷時近一個月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潮才算告一段落。

中共從不忘記從羣衆運動中建立組織。當五二〇大示威後翌日，京、滬、蘇、杭罷課學生即成立了「京滬蘇杭四區專科以上學生聯合會」，不久河南學生加入，四區學聯乃擴大為京、滬、蘇、浙、豫五區學聯。六月二日，華北學生反飢聯以大示威活動不成，改在北京大學校內召開「華北學生反內戰紀念會」，會中即宣布正式成立「華北學生聯合會」。至六月十五日，南北學聯秘密活動，在上海舉行第十三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隨後再度成立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同時正式申請加入聯合會之組織。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五月學潮最緊張的一天，中共與蘇俄簽訂了「哈爾濱協定」，內容包



括十三條條款，這協定使得中共獲得足可裝備五十萬部隊的武器<sup>①⑥</sup>。鑒於此一嚴重情勢，國民政府不再寄望於談判政策，而決定開始全面與中共作軍事對抗。三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最高法院檢查署下令通緝毛澤東，七月四日政府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變方案」，以對付中共。由於蘇俄不斷對中共進行援助，美國亦於是年十一月恢復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國軍的攻勢，初期頗為順利，但至三十六年十月共軍由東北及華北發動秋季總進攻後，開始受到頓挫。由於軍事的逆轉，使得各地反政府的學生運動又再度昇高。這年十月下旬，上海郵電局查獲浙江大學學生黃賢林與該校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密謀策應中共反動員令之活動，循線將黃、于等一千陰謀份子逮獲，于子三在拘禁中畏罪自殺。中共立即利用浙大學生懷疑情緒，大肆鼓動，於是北平清華、燕京、北大等校與天津南開於十一月六日首先宣布罷課抗議，華北學聯提出所謂「反迫害、反誣蔑、反非法逮捕」口號。上海學聯同時響應，金陵、交通及中央大學等分別舉行了于子三追悼會以示抗議。此時各大學學生自治會早已成了中共製造學潮的公開機關，政府為根本消弭中共的職業學生之活動計，乃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頒布「修正學生自治會規則」，規定各校學生自治會幹部應由各校當局指派、圈定或批准；自治會的活動也祇能限於校內的課外時間，不得參加社會上各種團體和活動，也不得組織校際聯合會和往來；自治會的任務，限於學藝、健康、服務、風紀等範圍，並須由學校派人監智；對違反校規的學生自治會，學校當局可以隨時解散<sup>①⑦</sup>。

自治會規則頒布後，一些大學按規定重新改組自治會組織，惟南京中央大學學生堅不遵從，



該校乃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學生自治會解散，部分學生不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罷課抗議，學校當局旋開除之。三十七年一月上旬，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自治會亦至改選階段，中共職業學生搶先發動自由選舉，遭校方警告，反動學生乃藉口「規定」抵觸憲法，煽動學生抗議；校方嚴格執行禁令，至一月下旬先後開除了抗議學生三十四名。反動學生乃聚眾表示要進京請願。一月二十九日，同濟抗議學生進京請願團開始行動，上海市長吳國楨親來調解，學生鼓噪叫囂不已，態度惡劣，至與維持秩序之憲警衝突，吳市長在混亂中被學生圍毆，市當局遂強制驅散學生，同時逮捕肇事者多人。翌日，反共學生宣布復課，同濟、復旦、大同、交通及上法等校的中共職業學生遁無所遁，乃相繼離校而去。

中共當局針對此一頹勢，即於三十七年一月底發出指令，要其各地下組織轉變過去種種學運中的舊形式，以新的鬥爭方式締造此後的「學運新階段」，除繼續擴大「爭民主、反迫害、反飢餓」之鬥爭外，還要針對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新支援進行國際性的示威<sup>①⑧</sup>。關於前者，主要為延伸城市鬥爭的基礎至鄉間；至於後者，則為繼此展開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運動」。

三十七年三月下旬，平津各大中學相繼放春假，中共地下黨學委決定，通過學生的春遊活動，深入鄉間，「鼓舞鬥志，迎接新的戰鬥」。於是天津的南開、北洋和唐山工學院學生約五百餘名，首先利用春假遊覽古城北平之名，聚集於平津郊區，到處辦座談會、晚會等活動，向各農村及工廠作反政府之宣傳。而在北平的華北學聯則利用此活動掩護其代表大會之舉行。至三月二十八日，平津各地出遊學生紛集於北大，接著召開了「平津學生春季聯歡大會」，通過「保衛自治



會」、「保衛華北學聯」等決議，公開宣稱：「一校被迫害，七校支援；一人被摧殘，全體營救」的平津唐八校學生自治會的聯防政策。

北平警備當局一本中央戡亂方針，於三月二十九日宣布華北學聯非法組織，禁止繼續活動。三月三十一日，華北學聯以挑戰姿態，發表反迫害聲明，同時鼓動各校學生實施罷課。翌日，清華先修班率先宣布罷課五天，抗議華北學聯被查禁；接著，北大醫學院、工學院召開理事會表示堅決支持學聯。四月二日，北大組成罷課委員會；平津七校則發表聯合抗議書，同時展開罷課及請願。

學生為支持華北學聯而罷課，原因看似單純，但影響却很廣泛。自三十六年十月以後，政府的戡亂軍事行動漸趨失利，經濟情況更是每況愈下，社會秩序已失去控制；中央及地方當局對學潮的嚴厲鎮壓行動，雖遏阻了反動學生的氣焰，但並無助於大多數學生及教職員的生活窘境，因此若干態度原較持重的學生及中下級教員，反轉趨同情激進同學的立場和行動。故當北大學聯掀起抗議學潮後，四月五日就有清華講師助教聯合會、北大講師助教聯合會、北平研究院助研人員聯合會、清華職員工會、工警聯合會、北大職員會、工警工會等團體，發表「告社會人士書」，要求立即改善低劣待遇，按生活指數調整薪津，宣布自六日起罷教、罷研、罷工、罷職。北大附設醫院的醫生護士也加入行動，同時罷診。於是所謂的「四月六罷風潮」就在平津一帶形成。

平津的四月六罷風潮，使得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之鬥爭愈為得勢，許多學校師生甚至公開傳閱共黨的宣傳品，收聽並轉播中共電台廣播，展示「解放區」圖片及播映俄共、中共製



作的電影等。其反動方式已不限於街頭上的遊行示威，關心的問題亦已不限於本身利益。至五月初，一場大規模的騷動乃繼之而起。

五月一日，中共藉「五一勞動節」之廣播，發出號召，要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以反對美帝國主義者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復活<sup>(119)</sup>！時美國準備積極協助戰後日本復甦的計畫在三十七年一月批露後，國內知識界即甚關注；三、四月間上海各校學生便曾零星舉行過反美的演講會和討論會，一些工商團體亦對美國重振日本財團的政策表示不滿。中共推波助瀾，決心擴大聲勢。五月四日，上海學聯會召集近萬名學生於交通大學操場，藉紀念五四運動之名，聲討美國的扶日政策。當即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簡稱反扶日聯）。同日，南京大中學校學生一萬多人也在中央大學廣場舉行螢火晚會，通過「紀念五四保障人權保障教育、搶救民族危機宣言」，提出以反對美帝扶日和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目標的六項要求<sup>(120)</sup>。

半個月後，各地學生陸續展開紀念五二〇大示威週年活動。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決定召開一次大規模的集會，進一步動員反美扶日鬥爭。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乃有上海一百零二所學校，一萬五千多學生在交大召開五二〇週年紀念會。會上，「反扶日聯」號召學生以實際行動抗議美帝扶日，發起十萬人簽名活動；同時提出解散日本海上保安廳，沒收走私日貨，拘捕並公審一切日本戰犯，召開對日和會等主張。

學生們反對美國重建日本政策，本帶有民族意識之意味，很獲得一些社會人士的贊同；然中



共則利用反美鬥爭極力醜詆國民政府，謂國民政府無能、媚外，致有今日的民族危機。如五月三十日，華北十二所大專院校及分東北學生在北大廣場舉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紀念五卅大會」，燕京大學學生即演出活報劇，諷刺日本帝國主義者與國民政府在美帝面前爭風吃醋；而會上部分反政府人士更「言之鑿鑿」的造謠說政府已與美國訂約，準備聯合開發台灣云云，甚至妄言「而今日之事，正是九一八前後國民黨反動派賣國歷史的重演<sup>(12)</sup>……」

反美扶日運動自五月下旬起，迅速擴散到全國各大城市，並深入政、軍、文、教、工、商等階級，天津、昆明、青島、廈門、武漢、重慶、成都、長沙、廣州等地，都瀰漫者較三十六年初更嚴重的反美空氣。美國當局無法忍受，五月底即有上海美商報紙譴責聖約翰大學的反美運動，提醒學生要記住所唸大學是靠美國的支助，且若非美國擊敗日本，中國學生不可能在上海享受自由。五月三十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波特（John M. Cabot）更公開講演，說反美扶日運動是受奸人蠱惑，中國學生受教育是受惠於美國，不應忘恩負義。六月四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arat）發表聲明，否認美國有任何威脅中國的對日政策，警告中國學生反美是一種無理及不負責任的陰謀，如果繼續下去，將導致不幸之後果<sup>(12)</sup>。

這些論調立即引起中國新聞界的反擊，反美學生尤受刺激，六月五日，即有上海學生五千餘名遊行示威；六日，北平學生也展開同樣動作，通電抗議司徒雷登之聲明，並決定九日起罷課示威。各大學教授亦紛紛為文駁斥美國的論調，有些師生且發誓拒不領食美援米糧。國民政府處境至為尷尬，各地軍警雖仍奉令繼續取締學生遊行示威活動，但已有部分軍警不願執行，示威學生



旋捕旋釋。少數三青團學生及復員之青年軍，基於一片忠誠，奮勇作力挽狂瀾之舉，但已被視爲是在冒天下之不韙。

反美扶日運動持續了近兩個月，雖未影響美國對國民政府援助之決定，（七月三日，中美雙邊協定在南京簽字，美國允給中國經濟援助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特種贈與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但却已造成美國國內普遍的對華反感。而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份子，對國民政府日益離心，各校及地方當局愈不能控制學生運動，社會秩序更亂，黨政高階層不能協調合作，前方戡亂戰爭更趨失利，由學生運動所造成的政治、社會、經濟之惡性循環現象已成難返之勢。這是大陸淪陷之前，最後一次全國性的學潮，令人痛心而應當知所警惕。

三十七年三月至七月，國、共主力連續交鋒於東北、華北、西北及華中地區，國軍除在豫東一役獲勝外，其他戰役無不挫敗；廣大地區除幾座孤城繼續控制在國軍手中外，大部分的鄉村及城市間交通都已爲共軍所占領。東北尤呈不保之勢，大批難民及學生紛紛入關，集中於平津各地，等待政府救濟。

政府對流亡的失學失業青年學生素極重視，在三十七年三月間即於北平和天津分別籌辦東北臨時大學及臨時中學，以撫輯輾轉南來的東北學生。惟當時環境至爲困難，籌設的臨時大、中學始終無法正式開學，近萬名的東北流亡學生寢食無處，日用匱乏可想而知。七月初，北平市參議會針對流亡學生擬訂了一項「救濟東北來平學生決議案」，於七月四日公布。主要内容除規定若干救濟條件外，又列舉數項對留平學生實施軍事訓練辦法，「其身分不明，思想乖謬者，予以管



訓，學力不合格者，即發入軍隊服兵役<sup>(123)</sup>。」東北學生對此規定非常不滿，翌日即有五千多人遊行至參議會前抗議，要求取消上述的救濟案，而立即開辦東北臨大和臨中。嗣後衝至參議長許惠東住所，大肆破壞，北平警備司令部派員阻止，學生暴亂不已，終引起流血衝突，軍警死二人，學生死九人，傷一百餘人，被捕三十七人，北平當局即宣布戒嚴<sup>(124)</sup>。

慘案發生以後，東北流亡學生於七月六日組成「抗議七五血案聯合會」，展開聲討活動。北平、天津、唐山各校學生寄予無限同情，也成立各種後援會支持之。中共北平地下組織認爲此時副總統李宗仁正式在北平，可以利用此一事件擴大李氏與南京中央的矛盾，因此即策動平津各校學生展開進一步的抗議行動。

七月九日，華北、東北三十多所院校學生一萬多人，正式展開抗議遊行，軍警未再干涉，學生湧至李宗仁官邸，向李氏遞交了「東北華北學生爲七五慘案請願書」，要求嚴懲凶手，撤銷市參議會的決議，立即釋放被捕學生。李氏答應了部分要求，抗議學生乃回到北大廣場。繼而舉行「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慘案哀悼控訴大會」，表示「爲替死者復仇，爲了要讀書，要活命，決心向統治者鬥爭到底！」「控訴」之後，當即宣布正式成立「東北華北學生抗議七五血案聯合會」，以領導鬥爭。

在上海的全國學聯乘機宣傳，企圖再挑起南方各校學潮，他們發表宣言，聲言：「血的事實又一次教訓我們，不應對反動政府再存任何幻想」十四日，又向東北學生發出慰問電，宣稱已將七五血案公諸全世界<sup>(125)</sup>。同日，分爲國、共控制的瀋陽和哈爾濱之學生，也分別舉行了近萬人的



抗議遊行及控訴大會。京滬地區，由於治安機關已密為防患，故上海學聯的策動遊行計畫始終未成。

由「七五慘案」引發的「七九遊行」，可以視為北方地區完全陷共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飽經憂患的東北流亡學生經此刺激，大部分人難免對國民政府心生怨恨，而甘於投奔共黨陣營，遂至間接造成後來國軍在平津保衛戰的失敗。

國軍的剿共行動，至三十七年下半年後，進入決戰階段。政府鑑於學生的暴亂，對民心士氣的打擊太大，因此決心作最後之整頓。八月十七日，國民政府公布「特種刑事檢舉法」，設立特殊犯罪法庭；是日，行政院即令各地治安機關依據此法徹底肅清「匪諜」。翌日，中央日報配合政府政策，開始系列刊出中共製造學潮及擾亂金融的證據，號召全國愛國青年挺身檢舉「學匪」，並與之「作生死之鬥爭」。同時國民黨中央青年部亦展開部署，分在北平、上海及南京聯絡當地軍警機關組成「學運小組」，專門對付各校的職業學生。

八月十八日，北平及南京的特種刑事法庭正式票傳各校「學匪」嫌疑份子，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以北京大學為最多；接著天津、武漢、上海、廣州、重慶也展開行動，先後拘提人數在三千人以上<sup>(126)</sup>。八月二十二日，蔣總統在南京發表談話，表示決徹底執行財政經濟改革，清除各大學潛伏「匪諜」，決不姑息；戡亂乃抗戰之延長，本質上為民族戰爭，中央此次逮捕行動係為免國家淪於俄共之「赤化」<sup>(127)</sup>。

中共懾於國民政府的整肅行動，自八月中旬起即陸續自各校疏散其職業學生，或輸往「解放



區」，或託蔽於親共人士家中，或停止活動<sup>(128)</sup>。值得重視的是，由於中共潛伏各校的職業學生，平時學行表現均甚優異，偽裝工作甚為獨到，因此在此「危難」之際，亦能獲得部分師長及同學之掩護和協助。然無論如何，自抗戰勝利以來，舉國紛擾不寧的學潮暴亂，終在政府此次全面的取締行動下嘎然而止。

回顧此一階段的青年運動，可以肯定的事實是，自五四運動以來，沒有任何一階段的青年運動有如民國三十六年及三十七年的各次學潮的幅度深廣，然係受中共操縱，而其對戰後中國的政、經濟、社會影響固不待言，對整個民族的生機尤有莫大的創傷之害。蓋青年學生為國家前途及民族希望之所在，此在多難之近代中國特別可貴；國民政府自建立以來，無時不以作育英才為國培元固本為念，即使在面臨著如八年抗戰般之艱苦環境，亦不放棄保全民族的文化和教育，其目的無非是希望以所教育之青年為國家日後建設之棟樑。無乃抗戰勝利後，外患方除，而內憂繼生，青年學生惑於眼前之私利，苟安於現實之危卵，遂為中共所乘，迷失而不自覺。歷代以來，其無理性、無智性的反動運動，未有如此之例者。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歷經五卅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北伐的國民革命運動及抗戰前的反日抗日運動，率常基於民族主義和國家意識，作自發之行動，故其對社會、對政治乃至文化的主導性亦高。然抗戰勝利後的各次學潮，則幾全出於叛亂集團中共之策動，所謂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等，亦全不具民族正氣之表現；至若反美抗暴、反美扶日等，亦在掩護中共於同一期間之勾結蘇俄的陰謀和行動。故吾人謂此時期的青年運動為「逆流」是中國青年良心的一大蔽障！



三十八年底，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對於青年學生的「亂說亂動」開始展開嚴密控制。他們首先藉所謂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三十八年四月成立）過濾及吸收可資共產黨繼續利用的對象，然後自三十九年起發出所謂「五大運動」（即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思想改造之名嵌制青年學生的自由意志，以抗美援朝之名遣送大批青年學生到韓國戰場當砲灰。數百萬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及在學知識青年，因而被戴上「反革命」帽子，遭受囚禁或殺害。至四十四年，中共當局又發動「肅反」運動，將所有「解放戰爭」前參加過學潮的青年學生及知識份子強迫勞動改造。毛澤東曾說：「知識份子是最不可靠的革命隊伍」，「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連大師傅都不如<sup>⑫</sup>……」就在這種輕視和玩弄下，鑄成了中國青年運動逆流之惡果。這段與國運相始終的史實，自值吾人反省和警惕。

## 註釋

- ① 孫中山，「學生要努力宙傳擔當革命的重任」，國父全書，頁九二五—九三一。
- ② 引自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華學術著作獎助委員印行，民國五十四年，上册頁二一九。
- ③ 同前書，頁二一六。
- ④ 包遵彭，中國青年運動史，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三年，頁一二四。
- ⑤ 孫中山，「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國父全書，頁一〇〇七—一〇一〇。



- ⑥ 包遵彭前書，頁一二五。
- ⑦ 同前書，頁一二五。
- ⑧ 邵鵬文、郝英達，中國學生運動簡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一〇六—一〇七。
- ⑨ 同前書，頁一〇八—一〇九。
- ⑩ 同前書，頁一一六—一二三。
- ⑪ 平心，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台北古楓出版社影印，民國七十五年，頁二五〇—二五一。
- ⑫ 李健民，「三一八慘案研究」，中共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四期，台北，民國七十四年。
- ⑬ 同前文。
- ⑭ 包遵彭前書，頁一二八。
- ⑮ 同前。
- ⑯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三二。
- ⑰ 同前書，頁一三四。
- ⑱ 同前書，頁一三五。
- ⑲ 同前書，頁一三六。
- ⑳ 黃逸峯、周尚文，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頁六二—六三。
- ㉑ 邵鵬文前書，頁一三六—一三七。



- ②②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第十九輯，總頁三五八五。
- ②③ 包遵彭前書，頁一二九—一三〇。
- ②④ 邵鵬文等前書，頁八二。
- ②⑤ 同前書，頁八三。
- ②⑥ 包遵彭前書，頁一四三。
- ②⑦ 同前書，頁一四四—一四五。
- ②⑧ 邵鵬文等前書，頁九一。
- ②⑨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冊，頁一八五—一八六。
- ③⑩ 同前。
- ③⑪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二九。
- ③⑫ 鄒魯，回顧錄，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三年，第一冊，頁一八一—一八二。
- ③⑬ 胡禮賢，「兩湖一瞥」，見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頁三〇八—三〇九。
- ③⑭ 龍叔篤，「江西最近情形報告書」，見前書，頁三五六。
- ③⑮ 李雲漢前書，下冊，頁五九七—五九八。
- ③⑯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四一。
- ③⑰ 關於訓政實施期限，初步決定為六年，即從民國十八年開始至二十四年結束；國民政府必須



在此期間內，完成地方自治的建設，並制定憲法，開始憲政。見李雲漢，中國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七十四年，頁四四九。

③⑧ 張其昀，黨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八年，第二冊，頁五二三。

③⑨ 包遵彭前書，頁一三一—一三二。

④⑩ 陳錫恩，「中國的教育」，見薛光前主編，艱苦建國的十年，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年，頁二七九。

④⑪ 沈雲龍，「一九一八事變的回顧」，見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書出版社，民國七十年，頁二九〇—二九四。

④⑫ 革命文獻，第六十九輯，頁二五五—二五七。

④⑬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蔣總統大事長編，民國五十六年，卷二，頁三七。

④⑭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五四—一五五。

④⑮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七十四年，第三冊，頁一一六。

④⑯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五六。

④⑰ 同前書，頁一五九。

④⑱ 革命文獻，第六十九輯，頁二五〇—二五二。

④⑲ 李雲漢，「一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中正先生的對日政策」，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抗戰勝利四



十週年論文集，民國七十四年，上册，頁四六六～四六九。

⑤0 包遵彭前書，頁一三七。

⑤1 同前書，頁一三二。

⑤2 同前書，頁一三八。

⑤3 梁敬鎔，「華北自治運動」，見氏著：日本侵略華北史述，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七十三年，頁一一九。

⑤4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七四。

⑤5 梁敬鎔前書，頁一一六～一一七。

⑤6 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一二九運動，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頁一四四。

⑤7 一二九運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三六。

⑤8 大公報，天津，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頁。

⑤9 梁敬鎔前書，頁一二三。

⑥0 John Ise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27。

⑥1 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一二九運動，頁六一～六九。

⑥2 邵鵬文等前書，頁一八九～一九〇。

⑥3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第一冊，頁



- 七四三、七四八。
- ⑥4 梁敬錚前書，頁一二六。
- ⑥5 見 John Iserael 前書。
- ⑥6 張其昀，黨史概要，第四冊，頁一二六八。
- ⑥7 革命文獻，第六十九輯，頁三二八、三三四。
- ⑥8 革命文獻，第六十二輯，頁五〇、五一。
- ⑥9 張其昀，黨史概要，第四冊，頁一二八三。
- ⑦0 同前書，頁一二八六。
- ⑦1 包遵彭前書，頁一七五。
- ⑦2 同前書，頁一七六、一七七。
- ⑦3 革命文獻，第六十二輯，頁一一三、一二三。
- ⑦4 同前書，頁一一〇、一一三。
- ⑦5 包遵彭前書，頁一八〇、一八一。
- ⑦6 同前。
- ⑦7 同前書，頁一八二。
- ⑦8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一二、二二一、三。
- ⑦9 容鑑光，「抗戰中之兵力動員」，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册，頁七九〇、七九一。



- ⑧ 同前。
- ⑧①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頒行之新兵役法，縮小了免役範圍，規定凡役齡男子皆需入營，無論黨員、公務員、士紳子弟及各學校的役齡學生，都一律依法服兵役。然實際上未滿二十五歲之專科以上學生得以緩征，小學教師、薦任以上官職及軍警或工業技術員工，仍可緩召。見台灣省訓練團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印，兵役法要義，民國五十三年，下冊，頁五八九～五九九。
- ⑧②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綜合月刊社，民國六十三年，下冊，頁六九五。
- ⑧③ 包遵彭前書，頁一六九～一七一；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編，中國國民黨與社會建設，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三年，頁九七～九九。
- ⑧④ 革命文獻，第六十二輯，頁一九一～一九二。
- ⑧⑤ 同前。
- ⑧⑥ 同前書，頁一九三～一九四。
- ⑧⑦ 同前書，頁一九四～一九五。
- ⑧⑧ 同前書，頁一九九～二〇八。
- ⑧⑨ 同前書，頁二〇九～二二六。
- ⑧⑩ 同前書，頁二三九～二四二；陳曼玲，「抗戰與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上册，頁八六六～八七一。
- ⑧⑪ 革命文獻，第六十二輯，頁二五三；蔣總統大事長編，卷四，頁一三二。



- ⑨2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輯，卷二十，頁五二二～五二三。
- ⑨3 同前書，頁五一七～五一八。
- ⑨4 同前書，卷三十二，頁八九～九五。
- ⑨5 陳曼玲前文。
- ⑨6 革命文獻，第六十三輯，頁三二六～三二八。
- ⑨7 陳曼玲前文。
- ⑨8 同前。
- ⑨9 吳相湘前書，頁一〇六八。
- ⑩0 陳曼玲前文。
- ⑩1 同前。
- ⑩2 同前。
- ⑩3 所謂「第二條戰線」語自毛澤東，他在民國三十五年底曾對中共幹部謂：「中國境內已有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此後中共即以此專名其策動的學生運動。
- ⑩4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六一～二六二。
- ⑩5 同前。



- ⑩ 事實上駐華美軍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起即決定分批撤回美國，因中國東北情勢告急及遣送日俘工作未畢而暫緩，然馬歇爾等却甚堅持撤離，待沈崇事件發生後遂實施。自三十六年二月首批駐華美軍開始撤離，同年六月全數返美。見蘇啓明，「抗戰勝利後美國在華軍事活動（一九四五—一九四七）」。
- ⑪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六四。
- ⑫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冊，頁五六二—五六四。
- ⑬ 如民國三十一年一月間，由西南聯合大學發動之「倒孔（祥熙）運動」，即是民盟份子策動。
- ⑭ 王健民前書，頁五六四。
- ⑮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七一。
- ⑯ 同前書，頁二七二。
- ⑰ 中央日報，南京，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第一版。
- ⑱ 周謀添，抗戰勝利後中共的青年學生運動（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八年，頁五九—六〇。
- ⑲ 王健民前書，頁五六五—五六六。
- ⑳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民國六十九年，下冊，頁七〇三—七〇四。
- ㉑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八七—二八八。



- ①18 周謀添前書，頁一八四。
- ①19 邵鵬文等前書，頁二九七。
- ①20 同前書，頁二九八。
- ①21 同前書，頁二九九。
- ①22 周謀添前書，頁一九七～一九八。
- ①23 邵鵬文等前書，頁三〇五。
- ①24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頁七六九～七七〇。
- ①25 邵鵬文等前書，頁三〇八～三〇九。
- ①26 周謀添前書，頁一九八～一九九。
- ①27 郭廷以前書，頁七八二。
- ①28 邵鵬文等前書，頁三一二。
- ①29 郭華倫，中共史論，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民國七十年，第四冊，頁三八二。



- ①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②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③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④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⑤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⑥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⑦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⑧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⑨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⑩ 中國青年運動史，頁一八四。



# 第肆篇

# 反共救國的新里程

——自由地區青年運動的發展



□ 著者簡介 □

陳三井，台灣彰化人，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原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淡江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國立空中大學教授兼人文學系主任，現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任所長，師範大學兼任教授。著有「近代外交史論集」、「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鄭成功全傳」、「國民革命與台灣」、「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勤工儉學運動」、「台灣近代史事與人物」、「人類的歷史」等書。



# 一、前言

時代巨輪的滾動奔騰，席捲起青年學子的熱血昂揚，隨著歷史脚步的前進，政府遷台數十年來的一部青年運動史，正是台灣政治社會脈動起落奔流的實像映照。

從民國五、六十年代民族主義情懷的激昂，到七、八十年代民主自由理念的萌芽茁壯，自由中國的青年緊密地應奏著時而低沉迴旋，時而急促奔揚的樂章①。

茲以時間為經，事件主題為緯，對四十年來台灣的青年運動史，做一概要式的回顧。

## 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立與發展

敘述台灣青年運動史，不能忽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個組織的成立，與它對青年思想和社會國家各方面的影響。

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在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的號召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正式成立，從此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青年第三次大結合的序幕，使青年前途與國家民族的前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 成立的背景與特性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

民國三十八年，由於中共倡亂，大陸局勢逆轉，使國家面臨最危急存亡之秋，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振奮黨的革命精神，嚴肅黨的戰鬥紀律，特於九月二十日在重慶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同志研討改造方案，要求以新組織、新綱領、新風氣，與中共奮鬥<sup>②</sup>。三十九年八月五日，中共改造委員會在台灣正式成立，嗣即進行黨的各項改造工作。

除了黨的改造外，青年工作也非常重要。鑒於大陸澎湃學潮的血的教訓，由於大陸勦匪戡亂受挫的經驗；共黨既利用青年學生破壞政府形象、製造社會動亂，又假藉自由民主的口號，策應中共的軍事行動，為進一步團結青年，特於民國卅九年四月廿九日，首先在台北成立了「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當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蔣經國先生，曾向千餘青年提出兩點希望：一是以身作則，轉移後方社會風氣，勸告同胞提高警覺，勿再驕奢淫逸，醉生夢死，否則他就不配活在台灣；二是盡一切力量，支援前方將士，希望在台青年盡所有力量想辦法發動整個社會人士，參加一人一物慰勞前方將士運動<sup>③</sup>。

同年十一月一日，在台北召集了第一次全國青年代表大會，通過「青聯會」的工作綱領、組織章程、會旗、會歌等，更深入的推動了工作。這是「青聯會」從各地的零星隊伍，進一步的團結聯合，成爲一條壯大的行列的開始<sup>④</sup>。至民國四十一年青年節，蔣中正先生發表「告全國



青年書」，指出「惟有團結，才有力量；亦惟有組織，才能團結，才能成功」，並強調「青年爲國家未來之主人翁」、「青年是時代的基礎，時代的重心」、「近半世紀的中國民族革命史，就是一部青年救國運動史」、「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勉勵青年「增進其智能，鍛鍊其體魄，訓練其工作技術，加強其革命信念」，最後號召全國青年三度大結合，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⑤。

於是，在全國青年熱烈響應下，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救國團正式成立，當時係以學校軍訓、愛國教育、戰鬥訓練和服務活動爲主。四十九年，將軍訓業務移交教育部軍訓處。五十年廢止學生個人團員（根據四十一年之籌組原則，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須一律參加），改爲以學校爲單位的團體團員制，「凡是認同救國團宗旨者，皆可申請加入成爲團員⑥」。

救國團成立伊始，蔣中正先生對其組織任務，有以下的明確提示：

「從遠處看，是要繼承五千年祖先光榮的傳統，發揚民族歷史文化的光輝；

就目前看，就是完成全國青年第三次大結合的使命，達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任務。」

此外，並指出組織的工作特性有三：

1. 救國團是一個教育性的組織，國家需要革命青年，青年需要革命教育；因此，本團必須負起給予青年正確教育的責任；

2. 救國團是一個羣衆性的組織，本團乃以學校青年爲基本的成員，然後從學校擴展到整個社會，來共同參與此一大時代反共抗俄的任務；



3. 救國團是一個戰鬥性的組織，我們必須提高戰鬥情緒，學習戰鬥技能，勵行勤儉生活，加強服務熱忱，使全國青年成爲文武合一的時代青年<sup>⑦</sup>。

## 工作和影響

救國團成立之初，蔣中正先生即以三民主義的尖兵期許青年。因此，救國團的一切工作，都以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思想爲其基本內涵和理論基礎。同時，在總團部及地方各級團務指導委員會的規劃與配合之下，推展各種青年活動，培育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建立起「倫理是我們反共的武器」、「民主是我們復國有效的途徑」、「科學是我們建國最需要的知識和最有效的工具」之基本共識。

由於救國團的教育性，推動學校團務乃成爲重要工作。從推動文武合一教育，發展社團活動，提倡青年文藝活動，舉辦工讀、獎助學金，到推行育樂活動、教師聯誼服務等，在在都是配合正常教育制度，達成爲國育才的目標。

由於救國團的羣衆性，團務工作與社會青年乃有更廣更深的關係。透過地方團委會和各級學校教師與義務幹部的推動，在工廠、礦場、農村、山區、海濱、漁村、各地的社團，展開學藝性、康樂性、技藝性、體能性和服務性的活動。近年更成立「張老師」，從事專業輔導的工作；此外，設置青年獎章，表揚優秀社會青年，表揚優秀及資深義工同志，使青年朋友與社會建設融爲一體<sup>⑧</sup>。



由於救國團的戰鬥性，舉辦寒暑假青年自強活動，以鍛鍊青年強健的體魄和堅苦卓絕的毅力，乃成爲最吸引青年、最受青年嚮往的活動。三十五年來，救國團舉辦青年自強活動計一八四、八二六期隊，參加青年總計一八、四三〇、〇八八人<sup>⑨</sup>。

此外，救國團對華僑青年與國際青年亦展開各項服務。前者著重在學業與生活的輔導，以及參觀與研習活動。對各國在華的留學生，包括來自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西亞、比利時、土耳其、哥斯達黎加、英國、琉球等國，其服務工作不僅包括代辦膳宿及舉辦育樂活動，更讓他們體會三民主義社會的優越性，進而擴及海外國際青年的聯誼活動。

救國團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爲反映時代的脈動及配合青年的需求，必須適時有所調整。以暑期自強活動爲例，大致可分爲四期：

1. 青年戰鬥訓練時期：民國四十二年至五十年；
2. 青年幹部訓練時期：民國五十年至五十一年；
3. 青年育樂活動時期：民國五十一年至六十一年；
4. 青年自強活動時期：民國六十一年迄今<sup>⑩</sup>。

一般而言，救國團成立三十六年來，確實爲青年提供不少的服務。每年的冬、夏令青年自強活動，雖被批評人士譏爲「逸樂取向」甚或「從事最大非法旅行社業務」，但的確是父母親最放心讓子女們參與的戶外活動。爲社會青年所開設的種種訓練課程，也以較低廉的收費及不錯的師資設備，受到歡迎及肯定；輔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張老師」，更有非常好的風評<sup>⑪</sup>。



救國團每年寒暑假所舉辦的自強活動，既然廣受大中學生歡迎，但學生踴躍爭相報名的情況與總團部分分配給各校名額相比，實在是僧多粥少。因此，各校爲了擺平這個問題，往往不得不對報名資格加以限制。有些學校是以成績取人，有些學校則將報名機會視爲對學生幹部、或曾爲校爭光學生的一種酬庸，這難免引起學生的不平<sup>⑫</sup>。

救國團一直秉持「團結愛國青年，完成中興大業」的目標，來培育青年，輔導青年，對青年提供了不少的服務，已如上述。論救國團的工作影響，可以說無遠弗屆，既廣且大，有口皆碑。茲分述如下：

### (一) 青年思想與觀念導向

引導青年朋友們對「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有堅定的信仰與認識。透過民族精神教育、時事教育與大陸問題研究、愛國家、愛社會、愛學校、愛家庭，成爲這一代青年生活言行所憑藉的情操。過去的「建艦復仇運動」、「支援金馬運動」、「團結自強運動」、「保釣運動」，以及近幾年來種種的社會服務運動等，都可看出青年人愛國熱情的高漲。

### (二) 青年服務事業的開拓

除國內與海外特定對象外，對青年的一般服務事業，計有「青年文化服務事業」（包括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及所屬的幼獅通訊社、幼獅廣播電台、幼獅少年、幼獅文藝、幼獅月刊、幼獅學誌）、「青年社會服務事業」（包括中國青年服務社、青少年輔導中心，台北、台中、台南、宜蘭、花蓮等學苑）、「青年育樂服務事業」（包括金山、日月潭、溪頭等十個青年活動中心與十



四個山莊），以及青苑、蓮苑、橋苑、逸苑、中苑、蘭苑等藝文中心，讓青年朋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在身心及人際關係方面都有極爲開闊與便利的進修活動場所與機會。

### (三) 青年人才之發掘與培植

救國團對於青年人才的發掘與培植，更是功不可沒。救國團工作幹部普遍予人的印象是：年輕、熱誠、負責、有效率。幹部所服膺的信條（座右銘）是：

(1) 本團的幹部應親切、自然、實在、主動、積極、負責，以爲青年的表率。

(2) 本團同仁的工作態度應謙虛、誠懇、隱藏，去忌個人色彩之表現，以免招致青年反感。

(3) 本團同仁應發揚傳統之風格與服務精神，以爭取青年之認同，言行舉止務必審慎，以免扭曲「公共形象」。

(4) 本團同仁對「自我形象」與「公共形象」應做深入之了解，尤須以開闊的胸襟與寬容的態度，廣泛吸收各界之意見與批評。

(5) 本團幹部均應懷抱工作理想，把持應有原則以服務青年，不可完全遷就青年之喜好或非理性之需求。

救國團各級幹部最銘記於心的座右銘，是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訓示：「要有政治責任，不要有政治慾望」和「我們爲青年服務，青年爲國家服務」。我們從這兩句話中，可以發現一種奉獻式的服務精神，三十多年來不斷由幹部本身做起，慢慢地影響青年朋友，形成風氣，「以服務代替領導」遂成爲救國團幹部的勤奮風格，也成爲團務工作的傳統精神。



救國團成立時入團的青年，今天都是社會上的中堅，從事各行各業為社會國家服務。而曾在救國團服務過的專職人員，在轉職黨政、新聞或投人民譽，從事其他事業時，多有傑出的表現。

#### (四) 青少年輔導工作之運用與開展

「張老師」是服務青少年的專業性輔導機構，由於「張老師」具有專業知能和研究精神，因此對於日漸複雜的社會問題和人際關係比較具有主動引導與調和的作用。救國團近年來有強化社會工作的趨勢，「張老師」乃擔負起此一任務，其所發揮的影響力，不限於青少年的輔導工作，更是當代社會服務的最新取向<sup>⑬</sup>。

### 團務工作面對的新考驗

救國團對青年的服務，固然受到歡迎及肯定，但邇來也遭到相當的批評。在大學校園裏，若干學校學生基於「校園民主」的理由，指責救國團「控制學生思想」，並干涉學生的社團活動，因而有學者撰文或立委質詢，主張救國團應退出校園。在社會上，救國團也成為被批評的對象，主要在於它因與執政黨的密切關係所享有的優惠待遇。儘管救國團自稱是個「民間社團」，矢口否認自己是個特權機關，但傳播媒體陸續報導的活動中心使用公地、經費接受政府補助問題却都是事實，使救國團無以反駁。而歷來救國團主任多由黨政要員出任，更加深大眾「黨團一體」的印象<sup>⑭</sup>。

蔣經國總統曾說過：「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面對這個新情勢，救國團的工



作也面臨新的考驗。在民國七十六年的團慶檢討會上，據總引言人郭為藩的觀察，救國團工作所面臨的新考驗，約有下列幾點，茲分述如下：

(一)服務對象的多元化——救國團早期只以學校青年為服務對象，後來逐漸擴大，學校教師（包括大學院校教師）、工廠青年、國際青年、海外青年（華僑青年）都成為照顧與服務的對象，這種多元化的發展固然使團務範圍擴大，却亦使力量分散。

(二)制度化的壓字——救國團在成立之初，因客觀環境的需要，而負有獨特之任務，從而在推展工作方面，都能獲得廣泛之支援。近來由於解最後種種客觀環境的演變，這些支援已日漸減少，不得不走上企業經營、自給自足的道路。過去因任務特殊，故享有不少優遇，而最近來自制度化的壓力，似有將救國團變成為一普通社會運動團體的用心，尤其在政府委託辦理經費方面，時遭議會杯葛情事。特別是邇來校園地下活動日漸活躍，有心人頗有促使大學社團串連的企圖，以打破早先救國團在舉辦校際社團活動中一向享有的獨佔地位。此外，在可預見的將來，商業化的民間育樂設施將日漸發展，在青年育樂活動中將逐漸出現競爭的對象。

(三)組織規模的膨脹——一個人到了中年每為肥胖症所苦，機構的不斷擴充發展亦產生同樣的弊病。救國團由早先的兒童期，逐漸長大成人，體型漸變，目前事業機構龐雜，有各種附屬文化事業，育樂設施與活動中心亦遍佈全省各地，使得組織規模日趨膨脹，在經營管理上亦面臨挑戰。

(四)人事上的變異——救國團成立迄今，已有三十五年的歷史，早先追隨創辦人蔣主任經國先生的資深幹部，有不少已經退休，或已屆退休年齡，交棒的問題已經存在。我們相信，接棒的年輕幹



部，在能力上應不成問題，但薪火的承傳主要還是在於對團務工作理念承接，在理念上與觀念上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以維持救國團的風格<sup>⑮</sup>。

## 今後團務發展的方向

政府近一、兩年來推動開放政策，從解嚴到報禁、黨禁的逐步開放，特別是大陸探親的開放對社會大眾心理的影響，尤其是年輕人思想的震撼不言而喻。面對從權威化到自由化的轉型期，救國團在團務發展的政策導向方面，也面臨了新的課題，茲分述如下：

(一)設定對象的多樣化或重點化問題——前面提到服務對象多元化問題，救國團所照顧的主要對象究竟應像早期集中於學校青年，或者可擴大到不同層面，例如工廠青年、農村青年。此外，救國團活動的參加對象，各校在辦理報名時向以品學兼優者為優先，然而實際未升學而又未就業，在街上遊蕩、惹事生非的問題青年更需受到照顧，所以服務對象的開放性或重點性，有待政策上考慮。

(二)團務經營的專業化或義務化問題——救國團由於機構龐大，許多活動因人手不足常依靠義務幹部的協助。過去很多專職幹部在專業素養方面或有不足，但敬業精神、服務熱忱與奉獻意願却成為團的風格。但隨著事業機構的擴充，今後救國團亦需加強同仁的專業能力，以提升經營品質，這就涉及在選用人才時專業學識與服務熱誠孰重孰輕的問題，雖然兩者並不一定會有衝突，但正如中國大陸有「紅」與「專」的問題、「綠」（團務精神）與「專」（專業學識）也可能



成爲不易兼顧的難題。

(三)活動經費的自足化或補貼化問題——很多人認爲，救國團今後在活動收費方面，應維持自給自足的原則，以減少對政府協助的依賴。事實上並不盡然，因爲各國青年活動，特別是教育性的育樂活動一向依賴政府的大量津貼，否則不是走向商業化就是降低服務品質。救國團若干活動中心的建築設施因設置較早，已逐漸面臨更新或改建的問題，如欲維持自給自足，勢必提高收費，如此可能令人望而却步，而且必然改變服務方式，由原來的教育性質逐漸走上一般民間的商業化育樂活動，將得不償失！

(四)活動內容的教育化或休閒化問題——時下一般年輕人頗習於安逸，較偏喜舒適的休閒活動、教育意味較濃的活動反而不易獲得接納。但是我們亦清楚，今日的青年很需要工作倫理的陶冶，並培養刻苦耐勞的習性，此等習性在其日常舒適生活中已漸少見。救國團能否提供青少年學習有意義的工作經驗與生活教育，以補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之不足，亦受社會之關切。

(五)服務方式的平等化或差別化問題——過去救國團的活動一向一視同仁，採平等化的方式，只鼓勵普遍參與，並無所謂團員與非團員的分別。然而就培養幹部與發掘人才的角度，團的活動何嘗不能採取某種方式的差別化待遇，從中分級拔擢青年精英，培養其領導能力。國外社團對成員常分爲 Associate Member, Active Member, Fellow 等等，救國團亦可仿照，對學生參加活動採取一種積分普級的制度，使不同等級的團員在權利與義務上有所差別。此外，對於過去曾參加類似青年文化訪問團或重要活動成員的組訓培養，亦可側重差別化方式，加以辦理①⑥。



救國團主任李鍾桂針對以上的重大變化，展望未來，特提出下列五點因應的方向：

- (一)本團的精神、目標、宗旨絕不改變，但在活動的方式及內容上應當求新求變。
- (二)事業單位的服務工作必須專業化，服務項目要多元化，服務的設施要現代化，管理方式要科學化、企業化，以熱忱的奉獻來提昇服務品質。
- (三)健全團務工作與組織，加強專職幹部及義工訓練，重視研究發展，增加服務人員的相互交流，增進共識共信，使團務工作能學術化、專業化、制度化，來擴大本團的影響力，在羣衆中生根，產生主導的力量。
- (四)在人事運用上，積極地發掘人才加以培養、訓練以及推荐人才，來加速人事的新陳代謝，發揮薪火相傳的功能，期達到繼往開來的目標。
- (五)在辦理活動時，應配合解嚴後的情勢，兼顧傳統與創新，加強辦理戰鬥性、冒險性、刺激性，以及國際性的活動，來開拓海洋及山野的空間，增加比較性、批判性，乃至於啓發性的學術思想活動及反共愛國教育的活動<sup>①7</sup>。

## 三、青年自覺運動

英國青年曾高喊：「我們是憤怒的一代！」美國青年也吶喊：「我們是失落的一代！」但五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在「自覺運動」中鄭重表示，我們既不是「憤怒的一代」，也不是「失落的一



代」，更不是「頹廢的一代！」，我們是「腳踏實地的一代」，是「醒覺的一代」⑱。

## 運動的本質

青年自覺運動於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由台灣大學學生所發起，基本上是一個道德運動，用英文來說，我們可以叫它是一個 Crusade，因為它有兩個基本的目標——反崇洋與提高公德心，關於反崇洋的問題，是針對當時「來，來，來，來，來，來，去，去，去，去，去美國」的出洋鍍金風氣而發的。起因於留德學人俞叔平博士在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遊德觀感」的文章。法學家俞叔平於同年四月十日應台大融融社之請，作「遊德觀感」的專題演講，講稿由洪登科整理，並經俞本人核閱校正後，於四月二十六日刊載中央日報副刊上。該文將留學問題、德國大學生活、社會制度、職業教育及其迅速復興的因素，闡述甚詳。特別指陳德國之復興，在於青年學生以留在德國貢獻所學為榮之風氣，勉勵台大學生不應為了逃避責任與貪圖物質文明，滯留美國不歸。

關於提高公德心，則起因於一位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於五月十八日在中央副刊所發表的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筆名狄仁華的是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美國青年學者，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研究中國文化的目的是要獻身在中國傳播福音。一九五六年，當他由美國路德神學院畢業後，曾赴香港，在教會中實習兩年，並曾在香港珠海書院外文系任教，其間曾參加「四重唱」到台灣教會來訪問過。因為他受了中國「人情味」的感動，所以當一九五九年，他實習期



滿返國後，進了耶魯大學的東方語文研究所，專攻中國語文，俾畢生獻身於中國。後來他對深邃的中國文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又向中國教育部申請了兩年的獎學金，進入台灣大學研究中國歷史、哲學與文學<sup>①9</sup>。

狄仁華是在他台灣學業終了，即將束裝回國之際，將他在台大的感受，發抒為文字，指出中國人富有人情味但卻缺乏公德心。他列舉無數實例證實他的這個觀點，如不按秩序排隊，在禁烟區吸烟、考試作弊等等。他並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懇切希望中國青年帶動提高全民的公德心。

## 運動的發起與響應

兩篇文章刺激了久蟄的人心，掀起台大人慚愧的自省。五月二十日，在「人情味與公德心」刊佈後兩天，署部「一羣你的好同學」的發起人，在台大校園的各個角落，張貼出代表他們心聲的許多海報，有給同學們看的一封公開信和狄仁華的那篇「人情味與公德心」的剪報。他們希望台大學生在不開會、不空喊口號下，自動自發的掀起這項運動，擔負起帶動的責任，而「不作歷史的罪人！」「不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發起這項運動的台大學生，沒有在海報上署名，他們認為：「自覺並不一定要標榜自己，是在於每個學生自己。」

社會的支持和新聞媒體的重視，無疑地對運動產生了最大的激力。刊載過俞文與狄文的中央日報，首先以較大篇幅報導了自覺運動的新聞。五月二十二日，該報以頭版三分之一的篇幅刊出



了自覺運動的新聞和圖片，並且以「提高公德心」做爲當日社論的主題。隨後聯合報、中華日報、新生報、徵信新聞報、青年戰士報、英文中國日報、民族晚報、大華晚報等分別在社論、特寫與對聞報導、方塊文章中熱烈支持這個運動。中國廣播公司、台灣電視公司等亦播出有關這個運動的特別節目，警察廣播電台並邀請各學校的同學舉行空中座談會，中國電影製片廠還將自覺運動拍成新聞影片，在各電影院中上映，於是，原本只是台大學生的自覺運動走出台大校園，進入社會，引起廣大的回響，成爲中國青年的自覺運動。

於是，各大專院校紛紛響應，最早響應的學校是：政大、師大、成大、中興大學、淡江文理學院、中原理工學院、東吳大學、國立藝專、銘傳商專、台北工專、台北師專、世新、台北女師以及北一女、中山女中、建國中學、成功中學等。數十大學中學響應後，全省學校均紛起響應，並訂定自覺公約。台大學生自覺運動公約爲：(1)努力用功，熱愛國家；(2)建立公德心，培養崇高人格；(3)重視應有禮節；(4)嚴守信用、嚴守時間；(5)愛護榮譽、面對責任。其他院校亦多簽訂公約，服膺蔣中正總統「三自」、「五守」的昭示。「三自」是(1)自強；(2)自立；(3)自助。「五守」是：(1)守時；(2)守分；(3)守法；(4)守信；(5)守秘。台大校長錢思亮、文學院長沈剛伯、政治系主任黃祝貴、名教授曾約農、毛子水、世新校長成舍我、政大教授鄭震宇、孟十還等都曾接受報紙訪問，發表談話，對自覺運動表示支持與鼓勵。

由於運動的主旨明確，實踐性高，在運動的第一週就有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具體行動：五月二十四日，有一位「自覺」的社會青年，因爲過去曾以非學生身份託人購買學生月票兩



張，自覺應賠償公車管理處七十二元，乃將現款寄交中央日報，請求代轉。

二十五日，省立成功中學高初中部的應屆畢業生，為響應自覺運動，實行「榮譽制度」，考試時自動在黑板正中貼上「榮譽至上」、「榮譽第一」的紙條，考試時果然沒有作弊的情事發生，使該校校長深受感動。

二十七日，有二十幾位少年男女受「自覺運動」的感召，發覺以往的荒唐，紛紛向警察局表示懺悔與自新，保證以後實踐自覺運動，並好好做人。

在運動過程中，最有趣的莫過於小學生也參加了。五月二十四日，一羣西門國小的朋友在老師的陪同下，到中華路安全島旁澆花除草，以「培養公德心」<sup>②</sup>。

## 運動的沉寂

青年自覺運動，基本上是一個單純的、帶著民族主義色彩的道德重整運動。道德運動的實現本應以個人實踐為本的，要求的是個塑造自己的功夫，而不是大家成全一些英雄人物；是平平凡凡的，而不是轟轟烈烈的，所以這個運動經過一個月時間，隨著暑假的來臨，就由絢爛而歸於平淡了。檢討運動之所以很快歸於沉寂，據郭明彥的分析，主要有下列幾個重大原因：

(一)目標曖昧——自覺、自覺些什麼？自覺重新的人？自覺守秩序？自覺迎頭趕上別人？難道在這以前的青年人都是混蛋和糊塗蟲？而那些提倡自覺運動的人，並未指出到底自覺些什麼？只是在那裏喊口號、貼標語、寫文章，在「自覺運動」的自身上打轉，至於那最重要的「自覺運動」的客



體，則曖昧而不明確。「自覺運動」的目標，應該是「自覺於民族的靈性」（對個人言，即人格）。至於自覺於道德，自覺於守時，自覺於守法，自覺於自尊，則均為有關自覺的方法的末節而已。

(二)有運動而無中心——台灣大學雖為運動的發祥地，但並未能成為運動的中心。其理由如下：(1)發起者台大未能獲得全國青年普遍一致的歸向，因為他們在發起時，就帶有一種「我老大，我來發起，你們大家快跟我走」的陵轍之氣，結果在一般青年們的心理起了莫名的「拗意」。像在代表會上，有位非台大的代表即公然聲言，他們不用自覺，他們本身早已自覺，不像台大現在才需要自覺。這就是很好的證明。(2)沒有夠格的足資號召的領導人物。像五四運動，有胡適、陳獨秀等人為其前導。台大既已失去全國青年的歸向，復缺乏全國青年共同信仰的人物出面領導之，遂至萬緒無宗，各自運動，百流而無一匯，最後也就如風飄絮，各自紛飛了！

(三)缺乏雄厚的推動力量——僅有一批憑藉一股易散的血氣的青年參加此運動，而一些年歲稍高，學識經驗較豐富的人却倚老賣老，站在運動熱潮的河岸邊上點頭，袖手旁觀，成則稱好，敗則批評，甚至有不聞不問者<sup>②</sup>，任令自覺運動的熱流逐漸地冰涼！

除了這些重大因素外，運動開始不久馬上就到了期末考的時刻，接著又是漫長暑假的來臨，對於運動來說，人力資源的缺乏和時間上的中斷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青年自覺運動」代表台灣青年學生在靄霧迷茫中覺醒的努力。台大學生並出版了「新希望」來鼓吹支持此一運動；他們不以出風頭、唱高調為己足，更而埋頭致力於「科學與民主」的



介紹，致力於「中國現代化」的探討，致力於「再啓蒙」的工作。然而，他們畢竟熱誠有餘，能力不足，失落的心情也太過沉重。經過五十二年的暑假到五十二年的秋天，整個自覺運動在五分鐘熱度過後，大致已告冷卻，只留下「新希望」獨自苦撐，一直到五十四年初，隨著「自覺運動」代表刊物「新希望」的停刊，「自覺運動」也終於雲消霧散。

「青年自覺運動」雖然終歸失敗，但產生兩方面的影響，自消極而言，此次運動的不免於消散，使部份熱心的台大學生感到失望，使大多數台大學生產生無力感，於是他們更趨沉默，同時也加重了他們的失落感。從積極而言，這次運動確立了台大領導全國青年運動的觀念，潛在的加強了台大學生的使命感。

此外，當年的部份台大學生因自覺運動而結合，雖然這運動已告終了，但這些核心份子却一本初衷，繼續分途做他們的「再啓蒙」工作，因之有鄧維模所創辦的「大學雜誌」（民國五十七年），有張帝國在美國創刊的「大風季刊」，有林孝信的「科學月刊」、「兒童月刊」。他們把「自覺運動」的精神延續擴散，這對後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催生，多少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sup>②②</sup>。

## 四、保衛釣魚台運動

民國六十年代，以釣魚台運動為焦點，中國學生爆發了政府遷台以來最熱烈、最大規模的一



次青年愛國運動，這運動包括了海外中國學界與台灣的青年學生，十足表現了當代中國青年民族情懷波瀾壯闊的一面，不減五四當年！

## 保釣運動的歷史背景

任何運動都不可能是單一因素、偶發的，這種民族主義的激盪，自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

首先是國際外交挫敗的打擊。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中共的新「乒乓外交」活動，加上國際姑息主義逆流的影響，造成我國國際地位的震盪。外交上的挫折、聯合國代表權的危機、美國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等等，使得將近二十年平靜的台灣，開始受到考驗，人們開始關心台灣的命運、未來等問題。一向安於「象牙塔」裏，感受到「失落」的人，自然也無法逃避這個關係著自己命運的問題，特別是海外的中國青年，對於中國人的命運，感受特深。

其次，一九六〇年代代表美國學生的反越戰運動，對於這時期中國的學生運動也是一個刺激，無論在海內或在海外，中國學生確知「敦品勵學」，然而他們一向散漫而不團結，對於國事的態度，只有無可奈何的逃避。他們雖然嚮往「五四時代」的浪漫精神，卻淡忘了五四學生的民族主義情懷所呈現的團聚力量。直到民國六十年代，許多留美的中國學生親身體驗到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所表現的力量，而深受震撼。他們在無意中覺得，中國人只有團結，才能站起來。首先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留美學生，在運動初期所表現的團結，不能不歸功於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啓示。



再者，這時期中國學生民族主義之所以如此高昂，日本也是一個刺激的因素。首先是，日本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潛伏的軍國主義復活傾向，引起中國青年學生的懷疑，三島由紀夫所表現的右傾思想，是一個例子。在近代史上，日本可說一直是中國的深仇大敵，反日思想很容易激發，在一般人的腦海裏很難忘懷八年抗戰的血債。因此，當日本與中國爭執釣魚台列嶼的時候，人們就聯想到日本的侵略，不能忍受日本的「忘恩負義」。可見，民國六十年代中國學生反日情緒的熱烈，決非偶然，而是有其長遠的歷史背景的<sup>②③</sup>。

## 釣魚台問題的發生

要明瞭中國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必須先明白它的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

釣魚台列嶼在我國台灣島東北約一百餘海浬，距琉球八重山列島約二百海浬，距中國大陸約二百多海浬。該列嶼共大小八個島，而以釣魚台為最大。此島海拔三六九公尺，面積約零點零七平方公里，其他各島最小的只有零點二公里，由於缺乏淡水而且面積過小，故此列嶼並無人長期居住。

在地質學上，釣魚台列嶼位於「台灣海盆」地帶，亦即在我國東海地區的大陸礁層邊緣，是我國大陸土地及台灣島向海底的自然延伸。列嶼與琉球由於隔著「琉球海槽」，無礁層相聯，故在地理上與琉球羣島並無關聯。在氣候上，釣魚台列嶼與台灣北部海域屬同一季風走廊及黑潮走廊，故由台灣來此極為便利，而自琉球來此，則因逆風逆流，甚為困難。



釣魚台列嶼日人稱之爲「尖閣羣島」，自古即爲中琉海上航路的指標，最早見於我國明清兩朝冊封琉球諸特使的記載。中國特使記載及清初琉球學術著作中顯示，明嘉靖時便確認不屬於琉球，且自清初以後已刊於我國地圖中。在日本早期史乘及政府文獻上，似未見釣魚台列嶼或尖閣羣島的名稱，自歷史上言，日本對於釣魚台列嶼，絕非主權所有。直到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讓台灣，日本才將列嶼與台灣一同劃入其領土之中，不過，由於該列嶼是無人島，人們很少注意及之。

關於釣魚台列嶼的歸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西洋及日本學界都認爲其屬於台灣的一部份。例如：德、英等國的地圖都採用「花瓶島」、「釣魚嶼」等譯音，繪爲台灣的一部；而一九三九年大日本地理學會出版的「大日本府縣別地圖別並地名大鑑」，也都繪歸台灣本島。一直到二次大戰末期，美軍攻佔琉球，後來美國頒佈琉球地圖，才首次把釣魚台列嶼劃入琉球版圖中，當時，我國因顧慮東亞集體安全，而未表示抗議。此雖非表示承認列嶼屬琉球羣島，但由於當時未能及時確定對釣魚台的合法主權，這却造成後來主張對釣魚台主權時，法理上的困難。因爲，後來日本就是根據此，而主張其對釣魚台的主權。

事實上，美國當時並未在該地行有效的管轄權，我國人民常在該地活動，也並未受到干涉。後來的爭執，是因爲在該處附近海底發現油礦才引起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一個委員會在台北舉行會議，建議遠東各國探勘海底礦藏，中國政府根據這個建議，與日、韓、菲四國專家開始探勘我國台灣島以北以及閩浙



二省以東海域海底資源。據初步研究結果，發現該地區內海底，特別是釣魚台列嶼附近海底，有豐富油礦。一九六八年六月，日本又進行大規模探勘，認為油礦在釣魚台與赤尾嶼之間。這個消息引起中外廣泛的注意。

日本隨後便採取積極行動，想透過美國託管下的琉球當局，要求對「釣魚台列嶼」的「剩餘主權」，以圖指染油礦，這侵犯到中國的權益，遂引起雙方的爭執。

一九六五年五月，琉球當局在釣魚台列嶼上擅立碑界。一九七〇年七月，又在列嶼立中文石碑、木碑，謂該地為琉球領土，並無理驅逐我國在該地打撈沉船的人員。

其後，日本外相愛知揆一於八月十日聲明，「尖閣羣島」應屬日本，「中華民國政府任何片面主張對此羣島及其沿岸淺海區域之權利，是國際法所認為無效的。」日本議員川村並指出，中華民國政府最近已與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簽約，探測包括尖閣羣島水域在內的東中國海區域的石油儲存量。次日，我國外交部證實，日本駐華使館曾於月前向我國強烈抗議，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對該羣島之大陸礁層，不得作任何片面要求。」同時，美國亦發表坦白的言論，認為「尖閣羣島乃是琉球羣島的一部份，並將定期（按：一九七二年）歸還日本。」此外美國當局並繼續縱容琉球當局干擾我國漁民在釣魚台列嶼附近的活動，甚至還允許琉球當局擅自登陸釣魚台拔去我國國旗。至此，中日兩國間醞釀已久的中國大陸礁層海底礦權問題，乃告表面化。

中日雙方為釣魚台列嶼及周圍大陸礁層主權問題發生爭執以來，引起我國海內外各界的熱烈討論，一致促請政府堅守立場，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我國政府在發現釣魚台列嶼附近海底可能有油礦後，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發布聲明，主張中國「對於鄰接中華民國海岸，在領海以外之海床及底土所有天然資源，均得行使權利。」當時沒有任何國家提出抗議。日本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七月我國與美國海灣公司訂約後，才提出異議。

一九七〇年八月，我國外交部發表官方聲明，主張「根據國際法原則與一九五八年簽訂之大陸礁層公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台灣以北大陸礁層資源，有探勘及開採之權。」九月二十五日，行政院並表示，「我政府對該列嶼之正常權益，立場堅定，並決心全力維護。」此後，我國一再表示如上的立場，同時，我國朝野一再指責日本的強硬舉動，問題愈來愈趨熱烈。

以上便是釣魚台爭議的情形。在整個爭議的過程中，由於當時我國正面臨聯合國代表權的危機，為免日本採不利於我之行爲，政府儘量避免在釣魚台問題上刺激日本，再加上美國的態度明顯地袒袒日本，故政府雖有表面上的官方聲明，却拿不出實際的手段，在情勢上實居於劣勢，因之，態度上不免於軟弱。然而，這却引起海外中國學生的關心，他們深恐政府因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而犧牲釣魚台。這個刺激，促成海外中國學生的大聯合，導發七〇年代中國學生反日民族主義的「保衛釣魚台運動」<sup>②4</sup>。

## 保釣運動的展開

### (一) 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

釣魚台事件發生後，立即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的注意與關切，他們一致建議政府堅定立場，以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身處異地的海外中國人對於美國與日本的舉動，反應尤其熱烈，紛紛致函各報社、雜誌，表示他們的憤慨；留美的中國學生甚至聯名投書中央日報，要求政府為國家「保持國土之主權完整。」潛伏已久的民族主義熱情，漸漸激盪起來。在高昂的民族精神的推動下，二十多年來一直沉默的中國學生，終於掀起躍動著民族意識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 1. 海外學生保釣運動的發起

海外留學生基於對鄉土的熱愛，對於國內政治動態一向甚為關切，而基於民族感情，他們對於日本的態度相當痛恨。當他們在報刊上看到日本在釣魚台驅逐我國漁船、撕破我國國旗，而我國外交當局却表現非常軟弱之時，他們深怕政府會因聯合國席位的問題，而犧牲釣魚台的主權。因此，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留學生胡卜凱、沈平、李德怡等人在普林斯頓大學集合討論釣魚台事件，決定發起運動，希望激起留學生對國事的關心，並支持政府對國土的維護。幾乎在同一時，威斯康辛大學及史丹福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也討論到釣魚台問題。

普大釣魚台座談會以後，他們隨即在「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刊出「釣魚台問題專號」，並運用「科學月刊」在美國各地的聯絡網的連繫，以引起留學生對釣魚台的注意與討論，隨即分函各地，預定在翌年一月三十日在各地同時召開一個有關釣魚台的座談會。於是，普林斯頓大學首先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行傳單，呼籲海外的中國人再也不能沉默，不能低頭、不能斷送中國的領土。接著，紐約、芝加哥、華府、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學校相繼成立分會，紛紛舉辦座談會，宣言保衛中國對釣魚台的主權，抗議美、日兩國的無理行動。十二



月二十日，紐約區保釣分會發表宣言，聲明以下四點：

- (1) 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 (2) 全力保衛中國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
- (3) 反對美國褻袒佐藤政府的陰謀；
- (4) 主權未決前，拒絕任何國際開發行動。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討論會也發表聲明如下：

「我們認為釣魚台列嶼根據歷史、地理及政治的改革，是台灣省的一部份。最近日本意圖染指該島的主權，是軍國主義蠻橫作風的重演，而美國袒護日本的態度，是自私和對中國人民不友好的表現。

我們要求日本和美國政府立刻放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並希望兩國人民為維護正義，共同抗議其政府之無理行爲。

我們要嚴格地督促中華民國政府，勿忘作一個政府的責任，同時，我們也誓為抵抗外侮的前驅。

最後，我們呼籲所有的中國人不分彼此，不顧政治立場的異同，一致團結起來，去維護民族利益，採取行動，粉碎任何損害中國主權的企圖。」

於是，在民族意識的昂揚之下，海外中國留學生終於團結起來，在美國發動反日示威，為中國青年運動掀起了高潮。



## 2. 保釣示威運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賓州大學、康乃耳大學、塞拉古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代表，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座談會，決定在翌年一月三十日組隊到紐約示威遊行，紐約保釣分會隨即決定參加遊行，其目標為：

- (1) 鼓動美國輿論，爭取美國人民支持；
- (2) 打擊日本野心份子和國際陰謀份子；
- (3) 號召海內外同胞團結一致；
- (4) 督促政府堅定立場，確保領土主權完整。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西雅圖地區保釣分會亦發出示威遊行的通告，決定其遊行方式為

- (1) 和平示威——喚起輿論界注意；
- (2) 在日本領事館前發表宣言；
- (3) 路經中國領事館，表明海外同胞支持政府保衛領土的決心；
- (4) 遊行時將傳單散發給公眾。

同月二十六日，華府地區保釣分會亦決定參加三十日的抗議示威，並主張：(1) 日本必須撤除其具有我釣魚台主權之謬論；(2) 日本必須對拔除我中華民國國旗一事鄭重道歉；(3) 美國必須知曉我釣魚台根本不在琉球羣島託管範圍之內，美國無權將我釣魚台於一九七二年一併歸還日本。



全美六大地區的中國留學生經過有組織的聯繫商討之後，在「所有的中國人不分彼此，不顧政治立場的異同」的號召下，終於團結一致，起來為保衛釣魚台而奮鬥。一月二十九日西岸的舊金山、洛杉磯地區首先發動示威遊行，向日本領事館抗議示威。次日，紐約、華府、芝加哥、西雅圖等地同時舉行大大小小的抗議示威，真正顯示了全美中國留學生的大團結。

「保衛釣魚台！」

「釣魚台是我們的！」

「中國領土不容日本指染！」

「日本帝國主義者滾出釣魚台！」

「大東亞共榮圈不容重演！」

「我們抗議日本破壞中華民國領土！」

「我們的態度是：以德報怨，你們如何？」

「美國友人，支持我們。」

於是，抗議的學生們舉著上面各式各樣的標語，高喊著口號，高歌「滿江紅」，充滿著壯志豪情，一陣陣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行列走向各處日本領事館和日航辦事處，提出了強硬的抗議。

一月二十九、三十兩日的抗議遊行是個「歷史的轉捩點」，正如留學生在紐約示威大會上所說的：「同胞們，中國海外的同胞，一向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旅日的前輩們在六十年前另一個辛亥年，不惜拋頭顱、洒熱血，建立共和；旅法的前輩，宏音讜論，激起五四。今天我們旅



美的同胞，一定也能夠貫徹主張，確保中國領土釣魚台主權。同胞們！我們沉默太久了，我們忍氣吞聲太久了，我們不肯再低著頭了，我們不肯再受欺侮了！讓我們強調，中國的領土，再也不可被斷送！中國的主權，再也不可再喪失！」

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激盪了，一向沉靜冷漠的留美學界從此投入波瀾壯闊的保衛釣魚台民族大浪潮。

元月底的示威抗議帶來保釣運動的更大熱潮，保釣運動終於引起全世界中國人的注意。緊接著——

二月十二日，美國堪薩斯等大學留學生投書堅決支持保衛釣魚台，要求政府採取堅決行動，維護主權。

二月十四日，來自美東各校的表在哥倫比亞大學開會，決定擴大保釣組織，並進軍華府，向美、日兩國分別抗議。

二月十八、二十兩日，香港中國青年舉行抗議示威。

三月十六日，留美學界五千零二十三人上書蔣經國總統，請堅定立場，抵抗日本新侵略，並於主權未決前拒絕參加「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協議」。

這期間，留美學生討論釣運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繼「科學月刊」的釣魚台專輯之後，有「學聯通訊」的釣魚台專號、舊金山的「暢言」、密西根的「大漢天聲」、紐約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柏克萊的「戰報」，一下子出版了一百多種，真是琳瑯滿目，



多采多姿。

四月十日的抗議示威，為保釣運動創造了歷史的最高潮。早在二月中旬，美東的中國留學生就有進軍華府的構想。四月五日，留學生代表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召開「四、十遊行」的準備大會；四月七日，紐約保釣分會召開「四、十遊行」的糾察會議，預備到華府作進一步的抗議。恰在這時，美國國務院重新肯定將於一九七二年隨琉球歸還日本，於是在四月十日，有來自全美各地的中國留學生和僑胞約二千五百多人，齊集華盛頓憲法大道，抗議美國支持日本對釣魚台的主張，是日的抗議示威自下午一時起至六時結束，除了向美國國務院抗議外，並對日本大使館示威，還與中華民國大使館交涉。

在遊行過程中，羣情激動的留學生此起彼落地高喊著：

「為釣魚台而戰」、「我們需要正義」、「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制止陰謀」、「佐藤必須下台」等等口號。「釣魚台戰歌」、「保衛黃河」等歌曲唱出了他們的心聲，愛國保土的热情達於極點，民族意識的躍動亦熱烈激昂。且聽：

「滾滾狂濤，東海之遙，屹立著一羣美麗的小島。

釣魚台英勇地俯視著太平洋，

釣魚台捍衛著我們富饒的海疆。

風在吼，海在嘯，

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台寶島，



象徵著我們英勇不怕強暴。

滾滾狂濤，東海之遙，屹立著一羣美麗的小島。

釣魚台你帶給漁民多少歡笑，

釣魚台蘊存著我們無價的寶藏，

怒吼吧！釣魚台，

我們寸土必爭，誓死抵抗，

我們要藐視那東洋的強盜。」（釣魚台戰歌）<sup>②5</sup>

## （二）國內學生的保釣運動

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自然也引發在台灣在中國學生的共鳴，因而展開了一場民族主義熱潮的青年運動。

### 1. 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醞釀

台大學生注意釣魚台問題，始於中日爭端剛起之時，一九七〇年九月底，台大「大學新聞」刊載樂吾生的「看釣魚台的爭執」，簡單介紹釣魚台的地位與價值，中日爭執之起因與焦點，雙方要求的論證等；其後，一署名康義的台大人再度引證各方文獻，進一步探討釣魚台主權歸屬及其將來命運等問題，到了十二月，台大僑生甚至決定到日本大使館前示威，抗議日本的要求，後經學校疏導而暫告平息。

直接觸發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是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美國國務院的聲明：美國重新肯



定支持日本對釣魚台列嶼的主權要求。這一聲明，引起留美中國學生的第二次抗議示威，在其影響下，台大學生終於憤怒起來，他們要「為維護釣魚台主權而戰！」

最先起來發動的是台大僑生同學，也許因曾在海外居留的關係，使他們有海外中國留學生相似的心情，因而愛國保土的民族情懷也易於躍動。總之，台大的「保釣運動」是愛國僑生揭開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八時，香港德明校友會在台大校園貼出第一張抗議海報，聲明「釣魚台是我們的，我們堅決的抗議日本無理的要求、美國荒謬的決定，我們永遠支持政府！」台大校園隨即激動起來，台大僑生社及港澳同學會跟著散發大批海報，鄭重提出五點聲明：

(1) 釣魚台列嶼，無論就歷史上、地理上及法律上為中國領土台灣省不可分割之一部份的事實，已是不容置議！

(2) 堅定反對日本對該列嶼的無理掠奪！

(3) 嚴重抗議美國對該列嶼的主權擅作主張！

(4) 堅定支持我中華民國政府對維護該列嶼主權所採取的一切措施！

(5) 呼籲全球華僑響應中國留美學人學生的示威行動，誓為祖國政府後盾！

次日，台大學生代聯會隨即發出代表台大學生心聲的六點嚴正聲明：

(1) 我們堅決支持政府對釣魚台的堅定立場。

(2) 我們台大人誓為政府後盾。



- (3) 要求美國政府尊重我國主權。
- (4) 我們嚴正抗議美國政府的偏頗聲明。
- (5) 反對日本的無理要求。
- (6) 奉勸日本勿重蹈軍國主義的覆轍。

同時，各社團的抗議海報也紛紛推出，一致聲明擁護政府維護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在林林總總的抗議海報中，最能激發台大學生民族意識的，是「大學論壇社」從農推館側面屋頂上垂下來的巨幅海報，上面引用五四運動的宣言，寫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由此，五四時代學生的愛國情操與抗議精神，注入於台大學生的血液之中，民族主義情緒在台大學生心中沸騰，在這股激昂的民族意識推動下，保衛釣魚台運動逐漸進入熱烈的階段！

隨著抗議海報的熱情，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在四月中旬後，進入了行動的階段，這就是四月十四日台大及政大百餘位僑生所發動的抗議遊行。憤怒的僑生湧到日本大使館，抗議日本蓄意要求釣魚台主權。次日，台大、師大、政大、僑大先修班等校僑生再度聯合，舉行第二次抗議遊行，熱血填膺、慷慨激昂！

台大等校僑生的示威行動，把「保釣運動」帶入一個新的方向。從此以後，以台大為主的台灣大學生不但以文字來抗議，他們還要以行動來保衛釣魚台，把民族意識轉化為實際的力量，在



莊嚴的示威遊行中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

## 2. 運動的結合

在四月十五日以前，無論是海報的推出或抗議遊行的發動，雖然表現出激烈的民族意識，然而却没有統合團體和一致的行動。台大人的保釣行動未免顯得鬆散，維繫保釣運動的，只是那躍動的民族情感。

有鑒於組織的重要，台大學生乃推派代表，於四月二十日正式成立「保釣委員會」。「保釣委員會」成立後，於四月二十八日，發表三項聲明：

(1)對政府的呼籲：1. 堅定對共匪鬥爭信念；2. 重視青年愛國運動；3. 重視輿論作為治本的革新，團結海內外同胞一致對外。

(2)對同學的呼籲：1. 擁護政府；2. 予政府善意中肯的建議；3. 關心國事，共赴國難。

(3)我們的需要：1. 政府的誠意；2. 同學的熱誠；3. 對匪抗戰分子的高度警覺；4. 全國同胞的信心與決心。

隨即展開各項工作。

台大學生的保釣運動並不僅止於台大校園與台大學生本身，他們並不是單方面的表達他們的愛國情操，他們更進而把保釣運動宣揚出來，以爭取社會與政府當局的共鳴與支持。

甲、座談會與系列演講

(1)舉辦釣魚台座談會



四月二十日晚，假台大體育館舉行全校性的「釣魚台座談會」，邀請立法委員李文齋、謝仁釗、胡秋原、外交部發言人魏煜孫、國際文教處處長姚舜、政大國際法教授丘宏達等人發表意見，有千餘名台大學生參加。

(2) 四月二十一日，邀請外交部長周書楷、北美司司長錢復演講。

(3) 五月七日，邀請外交部常務次長蔡維屏，條約司司長國剛就當前重要外交問題發表演講。

這一系列的座談會、演講，顯示出台大學生對釣魚台的熱切關心，他們在情緒激動之餘，也能暫時冷靜下來思考問題，並透過與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的意見交換，更深入的了解釣魚台真象、社會反應以及政府態度。

#### 乙、抗議示威

在羣衆運動上，抗議示威是項突出的行動，它可以表現出羣衆的集體力量而產生很大的影響。前述台大等校僑生四、一四及四、一五兩次的抗議示威，對台灣青年學生的保釣行動有很大的啓發。

儘管海內外中國人的強烈抗議，終無法阻止美國、日本的擅自處分釣魚台列嶼。六月十四日，台大校園出現「六月十七日美國委交釣魚台」的海報，於是，台大學生的情緒再度激昂起來，他們感到「這是國恥，這個恥辱清清楚楚的刻劃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每一個不願受侮辱的中華兒女都在等待，等待一個發抒滿腔悲憤的時刻。」

六月十七日，這個他們等待的時刻終於到來！



在「台大保釣會」的策劃下，六月十七日上午八時，台大校園的傅鐘下集合了示威的負責人和糾察，各人均戴上識別的臂章，各式傳單、歌詞、口號、標語及旗幟亦均準備妥當。八時半，同學們分院結集，九時正，示威同學搭乘預先租好的車子，排開一列駛往美國大使館。

隊伍在美國大使館前集結完畢後，首由總指揮張台雄宣讀抗議書，隨後由洪三雄、陳沛健二位同學進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使館代表接受抗議書，並答應轉交給美國政府。館外的示威羣衆這時情緒激昂，在副總指揮陳立偉領導下，高呼著：

「保衛領土主權！」

「保衛釣魚台！」

「釣魚台是我們的！」

「反對美日陰謀！」

「中華民族不屈服！」

「中國人，站起來！」

「中國人站起來了！」

在美國大使館抗議完畢後，示威隊伍在國旗及各種標語的前導下，轉往日本大使館。遊行隊伍經由忠孝西路、中山北路，一路上散發「告全國同胞書」，引起許多同胞的響應與喝采，「八年抗戰，我們付出了無數軍民的生命，五十年台澎佔領，我們受盡了日本鐵蹄的蹂躪。」歷史上的仇恨，加深了中國人的憤怒，這種潛在的民族感情，使他們不知不覺的結合在一起。



十點四十分，示威羣衆到達日本大使館，仍由張台雄宣讀抗議書，抗議書指責日本：「聯合美國侵奪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釣魚台。」認爲日本的舉動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徵兆，這是『東亞共榮圈』把戲的重演。」警告日本政府：「不要重演亞洲人鬩牆的慘劇」，最後呼籲：「希望日本政府，不要逼得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不得不爲保衛其領土主權而奮戰，不要愚昧得非用中日兩國人民的鮮血來寫中日兩國的外交史不可！」學生羣衆雖然事前被叮囑不可以有激烈的口號，但是一想到八年抗戰，一想到台灣同胞的五十年亡國的慘痛，他們再也忍不住了，激昂的同學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日本鬼滾出去！」於是，「六、一七抗議」就在憤怒聲中結束。

六月十七日的學生保釣抗議示威，是台灣青年學生抗議運動的最高潮，也是保衛釣魚台列嶼的最後努力。就在這一天，美國與日本簽約，擅自處分釣魚台列嶼，我外交部雖發表聲明，表明堅定立場，美國國務院也聲明對釣魚台主權有待中日解決。然而，這並不能挽救釣魚台列嶼的命運，釣魚台列嶼歸日至是成爲定局。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美國正式把釣魚台交給日本，台大學生在冷靜的氣氛中，舉行了最後一次的保釣抗議，這就是五月十四日台大代聯會五位同學的靜坐抗議。次日，沉默已久的「台大保釣會」發表「忠告美國青年書」，吐露了「這一代青年的血淚心聲！」沒有示威，沒有抗議，台大學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就在這種淒清的氣氛下宣告落幕。五月二十二日，有感於一年來「無所作爲，有負全校之期望」的「台大保釣會」也宣布解散了<sup>②⑥</sup>。



## 保釣運動的回顧

「保衛釣魚台運動」起於留美學界，在極短的時間裏，超乎空間的距離，激起海內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在愛國保土的狂熱下一致對外，抗議示威遊行，討論座談研究，其發起之速，傳播之廣，無疑地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規模最宏大的一個羣衆運動。

在羣衆運動中，理性常是被蒙蔽的。上千人聚集在紐約，到日本領事館遊行。這千把人的遊行，美國人當然是一頭霧水，日本領事館更是不理不睬。在高昂的激情中，據曾參與其事的項武忠教授回憶：「我們竟把釣魚台的重要性放大了千萬倍，誰說那兒的藏油比沙烏地阿拉伯少，誰就挨罵。釣魚台好像是一盞明燈，我們這羣遊子則像是飛蛾一樣，紛紛向它撲上去」<sup>②7</sup>。

「保釣運動」本質上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一開始，可以說是一個不分黨派、不論政治立場的知識份子愛國運動，但不久即變質，政治氣息越來越濃，逐漸左右分化，相互對立。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它使許多原本毫不相識的留學生結合在一起，也使許多原本要好的朋友變得壁壘分明不相往來。據參加過釣運的沈君山教授回憶：「這一轉變，事實上並非中共派人從中操縱，而是參與運動的少數人，自作聰明地提出「認同中國」的問題，主張把「政治性」帶入整個運動」<sup>②8</sup>。

自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的示威遊行後，一小撮寄生保釣的親共份子，大搞左傾盲動主義，一面倒向中共，一切都是「毛是」，開始懷疑西方對中共的報導，而且相信毛澤東是「人民導師」



，社會主義祖國是「天堂」，歌頌「毛澤東思想下各民族自治區生活是美好幸福的」，開始唱毛歌（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跳秧歌，看「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因而激起反共愛國同學團結對抗的決心，也從此造成留美學界無可挽回的決裂，使此一自發純正的愛國運動從漸變而走向突變，並陷入了黑暗的深淵，而其成爲海外學界文化團結運動的一絲希望，也就從此完全破滅<sup>②9</sup>！

## 五、保釣後的青年運動

保釣運動之後，台灣的青年朋友們甦醒了。大多數人不再甘爲埋首沙中的駝鳥，他們開始對國事、天下事付出更大的關切。各大專院校的政治性討論會蔚爲學生活動的主要風氣。校內刊物和社會上的報章雜誌，也開始以大量的篇幅來討論我國的處境，以及未來的出路等問題。尤其在我代表權被排出聯合國（60、10）之後，這個趨勢更加明顯了。青年學子經過了這兩次淚的洗禮後，大多已經憬悟到，面對如此強烈的憂慮，唯有化悲憤爲鞭策自己、惕勵將來的無比力量，才是我們救亡圖存、開創新機的生路活口。

保釣期間及其後的青年運動，呈現多元面貌，表面上政治參與、社會服務與愛國運動三者合而爲一，同時並進，實則仍是民族主義情懷的餘響與實踐<sup>③0</sup>。茲分述如下：



## 問政熱潮

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問題，對青年的政治參與，可以說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論題，也引起相當熱烈的反響。以台大畢業生爲主角所創辦的「大學雜誌」，是繼「自由中國」、「文星」之後，在六十年代一份頗受知識青年矚目的雜誌，它倡導政治革新，要求政府吸收新血、開創新局、對中央民代改選的問題，也有熱烈而大胆的討論。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七日，台大法代會假台大體育館，舉辦一場「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邀請「大學雜誌」主編陳少廷與文化大學教授周道濟對辯。周道濟曾於同年五月在「東方雜誌」發表「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陳少廷閱後，對周道濟所提出的六種方案不表贊同，而在「大學雜誌」第四十六期（六十年十日）發表一篇題爲「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的文章，引起廣泛的注意，也促成了這次的辯論。

周道濟在辯論中，聲明他的第五、第六方案含有全面改選的意思，只是在方法上與陳少廷略有不同。他自稱對改選問題的看法是演進的，而非突進的，是考慮人、時、地等因素的；同時，更基於下面三個考慮：(1)儘可能尊重法統；(2)民主效率化，不能意氣用事；(3)對問題須將理論與實際融化。陳少廷除再重申他主張全面改選的理論基礎之外，又對周道濟的六個方案逐項批評，並駁斥周道濟的第五、第六方案和他的主張根本不同。他認爲全面改選並無困難，唯一的困難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中央民意代表在反對而已。總括而言，周道濟所標榜的是考慮事情的實際可行



性，陳少廷則一再重申法統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基本精神，不改選才是違反法統<sup>③1</sup>。

隨後又有「言論自由在台大<sup>③2</sup>」「民族主義在台大<sup>③3</sup>」等多項座談會，每場均座無虛席，情況熱烈，並引發社會間多次的論戰。

## 社會服務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八日，聯合報刊出由台大、師大、政大三校社團負責人二十三位置名的「我們的呼籲」一文，呼籲全國青年挺身而出，造成一次新的青年大結合，承担起救國家的責任。這篇聲明指出，國家面臨如此強烈的憂患，青年們要勇敢的走出封閉的自我世界，把民族的存亡連根救起。他們提出六點目標，做為今後奮進的方向：

呼籲青年的覺醒與自強。

籲請政府強化行政功能。

剷除剝削民衆的害民賊。

消滅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維護國權的獨立與完整。

他們並以「作為溝通政府與民間的橋樑」自期：憑著一股豪勇熱情，台大學生馬上以行動證明這個呼籲不僅是口號而已。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當天即邀集代聯會的幹部開會，決定組成一個「社會服務軍」，藉著這支服務軍，挖掘出當前最為迫切的社會問題，經解析整理後，呈送政



府，作為施政的參考<sup>34</sup>。「社會服務軍」後來改名「社會服務團」，其他各大專院校也紛紛響應，成立類似的服務團體，掀起青年學生社會服務行動熱潮。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台大代聯會主席謝復生繼續鼓吹社會服務運動，喊出了「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呼籲台大人每週奉獻兩小時於服務社會的工作上，則台大一萬三千名學生，每年就有百萬小時以上的時間為社會做一點事，其目的在「提供勞力於農村，並提倡衛生、康樂及家庭計劃之觀念於農村」。六十二年暑假，代聯會派出九個服務隊，分別到各地農村鄉間服務，服務內容包括整理環境衛生，推行家庭計劃與醫療康樂服務，服務對象以農民及都市社區國中青年為主。「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走進農村、山地、海邊，以服務做為參與的開始，顯現出台大人對社會廣泛關懷如參與的一面。

其後，台大的許多社團，不僅是「慈幼社」，即「登山社」、「台風社」、各校友會，甚至「論壇社」，都紛紛組織服務工作隊，一一投入社會服務的行列。其他如政大的「愛愛社」、「指南山地服務團」，輔大的「仁愛社」、「同舟社」和以服務勞工為主的「醒新社」的「敬業隊」，東海的「工作營」、「幼幼社」，淡江的「慈幼社」、「樸毅社」等各種社會服務性的社團也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sup>35</sup>。總之，以發掘社會問題、改革社會弊端為重點的社會服務工作，從最初少數的一羣代聯會幹部，到廣大的各大專院校社團，以無比鉅大的力量逐漸擴大。原本蟄伏於象牙塔的大學生，從此走出校門，以他們的學識和熱誠，奉獻出他們的心力，對社會展開有意義的各項服務活動。



## 愛國運動

### 1. 退出聯合國的義憤

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聯合國通過排我納匪案，我國毅然宣布退出聯合國。

全國青年對於聯合國大會竟然違背憲章，不顧正義，牽引匪偽政權人會而排除中華民國，同聲表示憤慨，掀起了澎湃的愛國熱潮，紛紛集會討論，發表宣言，反對國際勢利主義，支持政府革新團結，並決心獻身於建設國家及反共復國的神聖使命。

台大學生代聯會，於獲悉聯合國終於通過排我納匪案，我國決定退出聯合國以後，曾於二十七日集會討論，以「這是該醒的時候了」為題，發表聲明，鄭重指出「無論國際局勢對我們如何不利，我們堅信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出賣我們。中國的命運永遠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裏，除非我們自己放棄自己；否則，任何人都埋葬不了我們！」

一百多位剛回國服務的海外學人及留學生，於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參加行政院青年輔導會舉行的座談會時，共同表示了他們對我國退出聯合國的三點看法和五點主張。

三點看法是：

- (1) 親匪國家為虎作倀，助長侵略凶燄，今後世界將更無寧日。
- (2) 聯合國喪失締創宗旨與正義原則，重蹈當年國聯覆轍，等於自掘墳墓。
- (3) 聯合國收容共匪，無異吞下炸彈，終必自食惡果。



五點主張是：

(1) 一個沒有正義公理，自毀憲章的聯合國，實際上已喪失了存在的價值，我們擁護政府的政策，斷然退出聯合國。

(2) 大陸七億同胞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心向祖國，渴望救援。共匪是一羣叛亂份子，任何國際組織，以共匪代表中國，我們一定要反對到底。

(3) 多難興邦，我們誓決貢獻所學所能，參加祖國建設，使台灣基地成爲世界上反共的燈塔，自由的堡壘，幸福的象徵。

(4) 世局劇變，歷史有待我們創造，海內外炎黃子孫要緊密地團結在蔣總統周圍，奮力自強，打回大陸，完成中興復國大業。

(5) 我們堅決作政府後盾，積極開展外交工作，聯合友好國家，擴大反共陣營，爲伸張國際正義，維護世界自由安全而繼續奮鬥。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各學生社團負責人及班級代表二百多人於二十七日中午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發起「莊敬自強」運動，呼籲全國青年普遍響應，共赴國難<sup>③⑥</sup>。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亦由代聯會召集會議，一致認爲聯合國罔顧正義與公理，牽匪入會，此種可恥而向邪惡低頭的舉措，無異自敲喪鐘。他們表示，將遵照「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訓示，在思想上明辨是非，生活上刻苦自勵，勤勞節儉，行動上知行合一、篤行實踐，以實際行動來從事國家各種建設。



東吳大學師生，也在座談會通過決議：(1)擁護領袖，加速反攻；(2)建議政府起用新人，整飭風氣，改補選中央級民意代表，限制各級選舉活動方式與經費；(3)勤奮向學、充實自己。

中國市專師生，亦於週會中通過一項「莊教自強」運動綱要，由該校班級研討，貫徹推行。其運動綱要如下：(1)奉行我們的主義；(2)效忠我們的領袖；(3)熱愛我們的國家；(4)充實自己的學問；(5)鍛鍊自己的體能；(6)修養自己的品德；(7)不鬆懈、不苟安、不驕情；(8)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

中國文化學院也於是日下午舉行座談會，通過致全國軍民同胞電文，全文如下：「中央日報社請轉全國軍民同胞鈞鑒：此次聯合國非法決議通過排我納匪案，我全國同胞及世界正義人士，同申憤慨，特電聲明，本院全體師生，誓為政府後盾，支持政府，擁護總統，精誠團結，繼續為反攻復國大業而奮鬥」<sup>(37)</sup>。

全國上下，包括青年學生，因有這種「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奮鬥精神，故雖面臨退出聯合國的重大外交橫逆，但仍能屹立不搖，更形團結！

## 2. 中日斷交、斷航的悲憤

蔣中正總統為謀中日兩國與整個亞洲之安定和平大計，在開羅會議力主保存日本天皇制度，並於接受日本投降之後，採取以德報怨的政策，妥善遣返日俘二百餘萬人，我政府並放棄戰爭損害賠償的要求及派遣軍隊佔領日本的權利，使日本免於被分割，並得以迅速重建其國家。

不意中日和約簽訂（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後二十年，日本田中政府竟背信忘義，於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承認中共政權，並聲言中日和平條約及中日外交關係因此而告終止，我外交部乃於同日發表聲明，宣布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消息傳出，全國青年對於日本政府的忘恩負義行爲表示無比的憤慨。重慶時代的抗日浪潮，又在全省每一角落汹涌澎湃著。一名三十餘歲的青年，在二十九日晚上七時許，曾將一面日本國旗用墨水塗污，並書寫「抗戰到底，血債血還」的標語，日本駐華大使館門前抗議日本忘恩負義的媚匪行爲<sup>③⑧</sup>。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對日本宣布承認中共的荒謬舉動至表憤怒，當消息傳達時，反日標語紛紛出現。在政大附近張貼的標語，包括：「抵制日貨、不說日語、不映日片」、「莫忘國家仇恨，打倒日本軍國主義」、「血債血償，毋忘南京大屠殺」、「中華兒女齊怒吼，抗日之血莫白流」等<sup>③⑨</sup>。

台大代聯會本著「言論不足以喚醒民衆，行動將足以震起國魂」的原則，特鄭重發起「抵制日貨、愛用國貨」運動，盼望所有台大同學、所有大專學生、所有青年朋友，羣起響應，以身作則，進而號召海內外同胞，團結一致，敵愾同仇<sup>④①</sup>。

日本田中政府繼與中共建交後，復於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與中共簽訂所謂「航空協定」，並在中共壓力下，蔑視我國家尊嚴，且不顧事實正義，妄指華航班機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僅係華航「標誌」，不是中國國旗。

我外交部將爲此於四月二十日發表嚴正聲明，斷然宣布停止中日航線；並不再准許日本航機



飛來或飛越我國，日本飛機今後如敢於飛越我國飛航情報區或航空識別區，將依照不明飛行體處置，因此而發生之一切後果，均應由日本政府負完全之責任。中日航線終告斷絕。

在日本罔顧道義，與中共簽訂所謂「民航協定」，太平外相並發表有損我國尊嚴及權益的聲明後，全國大專院校師生莫不義憤填膺，紛紛發表宣言，並在校園內張貼巨幅「支持政府對中日航線採取停航政策」的海報。

全國大專院校教授一致認為，政府對中日航線採取斷航的決策，是一項明智而正確的決定，是維護國家尊嚴，保持民族利益的必要措施。台大、師大、政大等四十所大專院校全體學生亦一致通過宣言，堅決支持政府對中日航線的決策。他們表明三點態度：

- (1) 我們堅決支持我國政府為維護國家尊嚴、民族利益，毅然停止中日航線的決策。
- (2) 我們反對田中、太平政府對於大陸共匪的愚昧無知，並足以損害中日人民傳統友誼的行爲。
- (3) 我們必須呼籲日本正義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應正視當前世局，反對田中政府的媚匪意圖

④1。

### 3. 對美匪建交的怒吼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卡特政府不顧中美傳統友誼，突然宣佈自六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與中共建交，此一舉措對中華民國自是一重大衝擊。

當美匪「建交」的消息傳來，全國軍民學生羣情激憤，許多人聚集在美國大使館、美軍顧問團四周，齊聲譴責和抗議美國這種徒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不義行爲，並進入大使館，降下星條



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所幸，美匪「建交」的衝擊，經過二十四小時之後，國人所表現憤慨情緒，已經逐漸理智的冷靜下來。緊接著，大家已經把激昂的情緒，轉化為愛國家、愛民族的正面行動。「自強救國」捐款運動立刻風起雲湧的展開，不分地域、職業、老幼，不論軍、公、教、演藝人員、學生，以及工商界人士，都各盡所能，慷慨捐輸，匯成一股愛國的洪流。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由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領的一個代表團飛抵台北，為中美的未來關係，與我國政府進行磋商，尋求發展一個原則性的架構。美國代表團的到來，重新激起國人的憤慨。多達三萬人以上的大專學生和台北市民，在松山機場，以拳頭、怒吼、雞蛋、番茄，和種種可以拋擲的東西，歡迎他們。

是晚十點一刻，當美代表團的座車緩緩的駛出松山軍用機場大門時，三萬多台北大專院校的愛國學生，以及各團體、各職業的市民們一湧而上，衝開了警衛的防線，剎時，雞蛋、番茄、爛泥巴齊飛，砸在座車的玻璃上、車頂、引擎蓋上，發出「碰！碰！」的響聲。從機場到敦化北路路口，長達一公里多的沿途，滿佈羣衆，他們手上拿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高舉著抗議的標語和布條，不停的高唱愛國歌曲、高呼口號，情緒高昂。

「中華民國萬歲！」「Free, Free, Free, Keep Free China Free!」、「美國狗，滾蛋！」等高呼入雲的口號，「歷盡風霜他不怕，巍巍的大中華！」「領袖，領袖，偉大的領袖！」等響徹雲霄的愛國歌聲，混合著四處橫飛的雞蛋、番茄、漿糊、油漆，交織出一片壯觀的愛國示威行動。



一位政大的學生說：「我們要让美國人看看，中華民國是不容欺侮的④2！」  
松山機場數萬羣衆憤怒的吼聲，不僅表達了青年們對於美匪「建交」的抗議，也是對於美國光榮傳統之墮落的譴責，更是表明了中華民族不容輕侮，中華民國不受屈辱的凜然志節！

## 註釋

- ① 陳翠蓮，「台大一甲子，榮耀六十年」，台大六十週年校慶專題報導，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
- ②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卷七，下冊，頁三五八—九。
- ③ 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二版。
- ④ 中央日報，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四日，二版。
- ⑤ 蔣總統言論選集（對青年的訓示），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卅一日出版）。
- ⑥ 黃淑玲，「時代考驗救國團」，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四日，第十二版特別報導。
- ⑦ 史振鼎，「處非常時代，創非常事業」，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35週年團慶活動實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編印），頁三十四。
- ⑧ 同前註。
- ⑨ 「團務資料與工作成果展」，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35週年團慶活動實錄，頁八十五。



- ⑩ 郭爲藩，「團務工作的過去、現在、將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35週年團慶活動實錄，頁二十五。
- ⑪ 黃淑玲，「時代考驗救國團」。
- ⑫ 「玩，也要看人」，民生報，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四日，校園新聞版。
- ⑬ 史振鼎，前引文，同書，頁三十四～五。
- ⑭ 黃淑玲，「時代考驗救國團」。
- ⑮ 郭爲藩，前引文，同書，頁二十六～七。
- ⑯ 郭爲藩，前引文，同書，頁二十八～九。
- ⑰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35週年團慶活動實錄，頁五十二。
- ⑱ 鄭貞銘，「中國的青年覺醒了——如火如荼的青年自覺運動一」，中央日報，民國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四版。
- ⑲ 丘爲君等編，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龍田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上册，頁三十九～四十。
- ⑳ 同前註，上册，頁四十一～二。
- ㉑ 同前註，中册，頁三八一～二。
- ㉒ 同前註，上册，頁六七～八。
- ㉓ 同前註，上册，頁六八～九。



- ②④ 同前註，上册，頁七一—五。
- ②⑤ 同前註，上册，頁七五—八三。
- ②⑥ 同前註，上册，頁八五—一一〇。
- ②⑦ 項武忠，「釣運的片斷回憶並寄語青年朋友」，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日，人間副刊。
- ②⑧ 沈君山，「釣運的片斷回憶——走出年輕的青澀」，自由青年，七〇七期（民國七十七年七月），頁十八。
- ②⑨ 王永中，「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人與社會，六卷三期（民國六十七年八月），頁三二—三。
- ③⑩ 陳翠蓮，「台大一甲子，榮耀六十年」，台大60週年校慶專題報導③，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 ③⑪ 台灣學生運動，上册，頁一四九—五〇。
- ③⑫ 民國六十年十月十五日，法代會舉辦「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邀請台大訓導長張德溥、工學院長金祖年、法律系教授蘇俊雄、心理系楊國樞、外文系王文興、哲學系陳鼓應、王曉波等出席座談。陳鼓應建議設立台大「民主牆」或「自由牆」。陳氏並於次年元月於「大學雜誌」上刊出「開放學生運動」一文，引起中央日報連載「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署名「孤影」讀者投稿反對，並出刊單行本；繼而引起正反雙方強烈論戰。參閱 陳翠蓮，「台大一



甲子，榮耀六十年」，台大60週年校慶專題報導②，自立晚報，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③③ 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在台大」座談會，邀請陳鼓應、許信良等人主講。會中哲學所研究生馮滬祥抨擊陳鼓應等人「專門攻擊政府黑暗面」，陳則指責馮君為「職業學生」。哲學四錢永祥因在會中「言論荒謬中傷同學」，遭記大過處分。參閱 前註。

③④ 台灣學生運動，上册，頁一七七～八。

③⑤ 同前註，上册，頁一八二～六。

③⑥ 同前註，中册，頁五六七～七三。

③⑦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八日，三版。

③⑧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三版。

③⑨ 同前註，四版。

④⑩ 台灣學生運動，中册，頁六〇二～三。

④⑪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三版。

④⑫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八日報導；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報導。







# 第五篇

## 爭取自由民主的新時代

——大陸學運的回顧與展望



□ 著者簡介 □

葉明德，台灣屏東人，美國匹茲堡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文化大學兼任副教授。著有「香港政治制度及其改革問題」。



# 一、前言

中國大陸大學生參政行爲，係中共政權統治條件下的產物。和世界其他國家學生運動特徵一樣，大陸學生的行爲，經常反映其成人政治的狀態。學生政治是整個政體緊張程度之表象①。大陸學生大規模間政活動，分別出現於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迄六八年間、一九七八年底至七九年初、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底迄八七年初期間，及一九八九年四至六月期間等六個時期②。

爲瞭解不同時期中共政治特徵以及大陸學運興起之原因，本文將以大陸內外情勢（背景）、學生活動方式，及學生下場三方面爲基礎，分別記述六個時期之內，各代大陸大學生議政、問政的活動。實際而言，在前述六段時間之內，大陸社會因爲經濟困難暨社會問題之累積，先後呈現出相當程度的緊張狀態。亦因此，在這些時期之中，中共領導階層內部的政策辯論激烈，而且權力競爭也進入決定性的階段。反應敏銳的大陸學生暨知識份子也有機可乘，乘隙而起，蔚成學運，成爲中共「成人政治」另一項註腳。

在上述各個階段之中，大陸學運相關的資訊性質各具特色。五〇年代大陸學運實況報導較少，散佚而不具體；「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時期，大陸學生活動參伍錯綜，有待查考；七〇、八〇年代大陸學運報導較多，但多只涉及表象，關於這一代大學生心思態度真相，則須進一步探問。是故，基於這些有關大陸學運資訊的特徵，加上中共政權控制資訊傳播之嚴密，



本文敘事之根據不免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整體來講，本文仍具有補充大陸學運歷史不完備的功。資料方面，在五〇年代、「文革」時期及七〇年代末這一部分，筆者採用的材料是，大陸大學生、知識份子口述的實情<sup>③</sup>。利用這些口述資料，以與中共當局官方文件、和外界流傳刊行之書面報導，印證對照，應可對大陸學生在五七年，及「文革」時期之政治活動有進一步清晰的理解。第二部分，關於八〇年代大陸學運的敘述，本文則以新聞報導資訊為主，反覆印證，將八〇年代大陸學生議政行為理出初步的輪廓。將來若有可能的話，當再親身訪問八〇年代學運人士，以口述實況補充現有之文字報導。唯有如此，一方面廣泛運用文字報導，一方面親身訪問大陸學運人士，藉以驗證補充新聞資訊，則吾人或可對大陸青年學生運動史有較全面的瞭解。

## 二、一九五七—一九五七年大陸學運

### 大陸內外情勢

#### 1. 中共思想體系暨「運動」性質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兩百」政策）運動應該從毛澤東的思想體系及工作作風去瞭解。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各項運動都是毛澤東發起的；毛有軍隊、有權。軍隊就是權，權就是軍隊，就是真理。馬克斯主義（Marxism）說過：「政權的主要成份就是軍隊」。毛澤東不搞議會



鬥爭。他不點頭，運動就搞不起來。

毛澤東思想簡單地說，就是馬克斯主義加上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特別是法家韓非子，加起來形成的。毛澤東對中國歷史及法家知之甚詳，壞招全學到了。毛的棋很高，他的每一步棋都有多種目的，不是單一目標，毛的作風都有戰略考慮，想到全局，下的是高棋。

從歷史發展上看，毛未取得政權之前，曾在抗戰期間，在延安發表「新民主主義論」，這本著作很重要。在這本書中，毛澤東不敢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因為，蔣介石當時仍當權。毛在當年提「新民主主義論」，較能被「民盟」接受，也較能爭取到支持。在共產主義裏，它強調，每一個政黨都應該有一個綱領；一個政黨在任何一個時間提出的綱領，必須考慮到「羣衆接受的水平」，每一個綱領都不能脫離羣衆，而政黨的綱領不是永遠不變的。在共產黨社會裏，找不到「信用」兩個字的，因為，共產黨認為，形勢隨時在「變」，政黨的綱領隨著形勢的改變而改變。在共產黨的理解裏，政權的基礎在「變」當中，隨著形勢而變動不定，不要說五十年不變不可能，五個月不變也不可能。對香港的政策，中共說五十年不變，是爲了目前這種講法較容易被接受而已，不可能不變的。毛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按毛的講法，「新民主主義建設」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完成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已開始實施「社會主義建設」。

## 2. 政治暨社會情勢

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社會主義的建設先有一九四九至五〇年的「清匪反霸」運動；這個運動的軍事意義大，其目標是要消滅或繳械有武器及有作戰經驗的國民黨軍隊，並且繳械消滅有武器



的地主。

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間則有「肅反」運動，目標在於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清除蔣氏軍統及日本特務。對一般人則進行「查歷史」工作，挖探每個人的海外關係、宗教信仰，及與國民黨的關係，同時並「搞臭」反革命的人。肅反運動較具政治意義。

爾後，進行「土改」及「合作化」的農業政策，分田給貧農，再把農民的田地「合作化」，由「分工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把農民的地又收歸國有，經濟意味大。同時，也把工商業財產收歸國有，實施公私合營，也具有經濟意義。

在國際方面，蘇聯赫魯雪夫否定史達林這件事對中共非常重要。毛澤東在「聯共黨史」曾說，史達林是中共宗師。赫魯雪夫發表「秘密報告」，否定史達林，中共大為反感，也想應付此一局面，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兩篇文章。

### 3. 中共反智態度

中共仇視高知識份子至極。毛澤東在「北大」「紅樓」當圖書助理員時，陳獨秀、李大釗已是教授。大陸知識份子有小、中、大三種。大知識份子知識高，中共最顧忌。中、小學教員也有普遍影響，但他們「能量」不集中，高級知識份子則像是核能，像定時炸彈。

知識份子沒有土地、沒錢、沒有工廠，也沒有企業，只有「思想」，會在思想上發生作用，影響別人。土地、錢、工廠、企業都很具體，可以找出來處理、沒收或「重分」等。但思想在肚子裏，弄不出來。中共整風作法及「兩百政策」（此即陸定一具名寫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政策，其實這是毛澤東自己的意思），就像是中醫的治療方針之一樣，即採取「發表」方法來治療疾病。例如：小孩子患麻疹，西醫用打針或吃藥到身體內殺病毒，但是，中醫則設法把麻疹病毒逼發出來，再予以療治。

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黨」是個幌子，是社會問題，引蛇出洞；中共宣稱，全整黨員，不整黨外人士，以安黨外人士之心。當時，知識份子相信，毛講的話是「聖旨」，毛怎麼說，大家就怎麼信，絕對可信，由於中共三令五申莊嚴保證，因此，學科學的人相信，專搞政治有經驗的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潘光旦也都信了。

#### 4. 高等院校狀況

約在「肅反」及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同時，也進行「批臭」高等院校教授及行政人員。一九五二年也開始從事「院系調整」，改組高等教育組織，完全仿照蘇聯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組織改成「專科性」及「非專科性」大學兩個系統。專科性大學部分如工業大學、礦冶大學等，「非專科性大學」即所謂「綜合性大學」，主要以文、法、歷史等科系為主，是「不實用」科系之大學。高等院校大批翻譯蘇聯教科書，所有教本都採用蘇聯教本。而且，高等教育制度改組，組織調整，人事也因之更調，共產黨排除異己，結果黨員全到學校裏來了。

一九五〇年至五六年之間，經過六年整頓，整個社會面貌在改變，當時，大家真信共產黨，因為六年來共產黨有顯著成績，「大家赤心跟共產黨」，「對共產黨貼心極了！」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出「向科學進軍」口號，教師、學生勁頭足，學習氣氛好。同時，學習成績好即可入團，



當時，大家都想加入共青團，有位同學和家庭劃清界線而入團，另有一位同學甚至撕掉他父親給的股票，表示不屑「剝削」，因為股票是資本家（他父親）剝削來的。在此一時期，許多專家人黨，錢學森也在當時入黨。初、高中及大學生受人黨人團的誘惑，大家都爭取入團，但是，許多同學都覺得本人家庭分子有很多缺點，因此，同學們「祖宗三代」有歷史錯誤的，都自己揭發，拚命與「舊社會」有歷史錯誤的家人劃清界限。當時，學生大都支持共產黨，不敢跟共產黨正面衝突。

大約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開始批評胡適的「實用主義」。而且，「向科學進軍」措施會使知識份子掌權，脫離黨的控制，「上層建築」受到破壞「向科學進軍」便與黨的領導發生矛盾，知識份子也與黨領導發生矛盾。學生傾向於老師，「政治學習」也受輕視，黨領導便受到破壞。

## 學生活動方式

1. 一九五七年四月開始，中共積極推動「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措施。校園內教職員暨學生，大部份人都分別經由討論會、演講、辯論或大字報等方式，向「（中共）黨提意見」，捲入運動之中。

高等院校中，「政治學習」課一星期合計有兩個半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運動以後，「政治學習」時間增多，一星期有三分之一時間學「政治課」，搞「政治活動」。「政治學習」課主要在討論當前「問題」或「政策」，上「共產主義運動史」課程，並且要「表態」（發



表意見），或「搞社會活動」。

討論會由（中共）官方召開，點名邀請，有小會、中會、大會之分，同時進行。高等院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召開的會，找大教授談為「小會」。黨支部只抓老師，不管學生。老師開會討論的地方一定隱密，學生想去偷聽也聽不到，也不准聽。有些人有顧忌的話，官方也邀集些人到你家來開，公開保證「三不」，主動上門要你提意見。中共若不再動員，純粹「白專」的人是不會提意見的。討論會各搞各的，沒串連，各談各的，不跨行業，按各行業開座談會，教師不跟學生在一起。一般人的意見說得比較局部，意見都是個人行業有關的意見，沒有學生那麼大膽。開會時，大家的調子都跟報紙沒兩樣，私下調子就都不一樣。另外在開會時，也有極少數人是鬼靈精，簡直就是天才；一百個人當中還找不到一個。這些「天才」的方法是，別人「向黨提意見」，他却反過來批評自己，發言說：「黨支部書記幫助、關心我不夠，黨政治教育不夠，政治教育時間不夠，我的思想錯誤極了！」開會時，別的人批評（中共）黨，這些「天才」就燒冷竈、打圓場、拍「黨」的馬屁。這些「鬼靈精」大概想，說不定將來會有好處。結果，這些天才還真得了便宜；在「反右」運動開始以後，「向黨提意見」的人個個遭殃，提出「自打嘴巴」意見的「鬼靈精」都得了好處；中共給這些「天才」的評語記錄是：立場堅定，經得起大風大浪。

學生開始時，由（中共）黨團人員發動討論，後來熱鬧了，學生就自動自發開會、出海報、開辯論會。學生開會之初，黨委特別會以平常有意見、有抱怨的「落伍份子」為重點，激他們去表示意見。開會的人，人人都須表態，跑不掉。大多數同學全以黨頭子的調子發言，用相同的話



、相同的調子表示意見。同學們不少都認爲，共產黨的運動像是「釣魚」，想釣出話來，所以大家都少講。但是有些同學年紀輕，比較沒有框框，想到那就說到那。假如唱反調學生多的時候，黨團支部書記就會組織一些同學提高「思想水平」，把討論會搞成辯論，讓辯論繼續下去，沒法子的時候，只有戴帽子壓下去。

辯論會的形式有些是課後大家碰頭就辯論，「壁報」也是主要辯論形式。辯論題目由學生自訂。例如：有人以「先紅後專？或先專後紅？」爲題，也有學生的辯論題是，「蘇聯到底是援助或剝削我們（中國大陸）？抑或是以平等地位對待？」辯論時，中共在學校內的「團支部同學」會去翻報紙、找資料，互相辯論。有些同學有時則組成「調查隊」，到中共官方機構查資料；例如有關蘇聯援助中共或剝削的問題，學生們找出上海市官方的石油生產數字，也查出中蘇（共）合作開採石油分成（抽成）的比例，再以這些資料爲根據彼此辯論。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時期，「上海街上一灘灘人，站著就辯論起這來。當時，報紙很暢銷，每個人都提早去買報紙；郵電局報亭排隊買報紙的人特別多。」

2. 壁報、海報、大字報也是大陸學生活動主要方式。

中共發起「運動」期間，有些學校每天出校刊，每個系則大都有「簡報」，描寫「運動」發展的情形。「海報」內容比較簡單，只是公告一些演講的時間、地點與題目。有些同學彼此辯論之餘，亦會一起寫文章，貼在教室走廊或指定的地點，這叫做「壁報」。「壁報」與「大字報」近似，寫「大字報」通常是自發性的；少數「積極份子」爲了響應（中共）中央指示或政策，便



用毛筆寫心得。「大字報」主要貼在大飯廳前。

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開始，學校黨委會要學生寫「大字報」，催促你寫，不寫也不行。牙膏不擠，意見就出不來。當時，共黨內部已傳達指示，黨員不能寫大字報，也不能批評黨，但可以反擊。有些「大字報」內容較簡單，例如：有一張「大字報」畫的是兩份「蘇聯留學申請書」對照圖，其中一張成績都是5分（滿分），成份團員，政治表現好，但父親是「資本家」；另一張申請書申請人是「老粗」，貧農出國，結果是，「老粗」准出國。畫這一張「大字報」的同學身體瘦小，一邊貼一邊說：「向黨提意見」，後來這位學生被打成右派。另外，有兩位助教，廿三、四歲左右，兩人翻譯赫魯雪夫攻擊史達林報告全文，寫成「大字報」貼出來，後來，這兩位助教也被打成右派。

「大字報」貼出之後，總有一批一批人圍觀，有些學生專門跑到別個學校看大字報，同意就簽名在大字報上，當時似乎有「簽名風」。也有些學生抄大字報，這種抄大字報的人，一是有興趣，一是上級派來的。以「南京大學」為例，「南大」大字報欄，位置在城中心，不像「北大」在北平市郊。學生休息或逛城時，常到「南大」大字報欄看，有所感時，就用原子筆批在旁白。也有人晚上拿著手電筒，專挑「大字報」旁白的評論看。這些大字報迷，有些則專門傳遞消息，當時大家很熱衷看大字報。

五七年「鳴放」運動時期，「北大」理科與文科學生曾組織「百花學社」。發起人是數學系的張景中、楊陸，及中文系的張元勳。張景中曾拿著「百花學社」文集去印刷廠印，但印刷工人



不印。「百花學社」包含全「北大」各系的學生。後來，發起人下場都不好。張景中當年未滿二十歲，數學系天才，演講主張取消「政治課」，日後一直在新疆勞動，一九七八年之後，雖然已有廿年沒讀書，但偶而還發表文章；張景中現在已是個「老頭子」，專門研究幾何。「百花學社」另一個發起人張元勳，曾和另一位同學合寫一首詩：「是時候了！」一張大字報貼了一整片牆。和張元勳合作寫詩的這位同學，表現好，「寬大處理」；張元勳則被判刑十五年，下落不明，也許已槍決。另外一位積極學生譚天榮，是物理系學生，譚天榮寫的「大字報」談哲學，深奧難懂。

## 學生下場

一九五七年暑假前夕，隨「鳴放」運動湧現的學運，最後在中共「反右派」鬥爭壓制下落幕；學校教職員、研究生、大學生，凡介入學運者，陸續被劃定「右派」，受中共長期殘害與誅殺。

受訪人之一是右派。經過若干年的思索，他歸納出他被劃定「右派」的原因，可能有兩點：

1. 當年當研究生時，好幾回上政治課，常提一些問題為難主持人，會後還取笑人，得罪人太多；
2. 在校方黨書記強邀「向黨提意見」時，曾根據本身專長表示意見，認為，蘇聯科學趕不上美國的主要原因是，蘇聯科學偏重實用，且過早下定論。就因為這一點意見害一輩子；中共當局認為，蘇聯代表社會主義，美國是資本主義代表，因此，判定受訪人此項意見是「反黨言論」，在以



後該系全體研究生開會時，受訪人公開遭受批判，最後，受訪人也係在研究所同學全體會議之上，由共產黨當局宣佈爲「右派份子」。受訪人戴上「右派」帽子之後，仍如期寫完碩士論文，但已無法留在學校工作。一九五八年七月，中共展開另一次整風改造運動，目標是「拔掉白旗」及「方向不明的專家」；同時，基於「右派是人民的敵人，人民的大學不能培養右派」爲理由，「右派」份子紛紛被逐出學校，下放隔離、強迫勞動與改造思想。

中共當局對一般右派份子有五種處理法：1. 開除工職。一旦被開除工職，就等於被全國（大陸）所有單位開除，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勞改；期滿，再由勞改單位派工作；2. 保留工職，但不開除。除去勞動，只付生活費，當時（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只有十八元人民幣，比起同時期高等院校助教的工資五十六元，大概只夠吃飯；3. 降職。如原來是教員，便被改成工友，或改換工作種類；4. 減工資。依罪行大小及坦白程度減少工資，減低多少，沒有一定的比率；5. 只戴帽子，不減工資。另外，對學生右派份子的處理方法有四種：1. 開除學籍，也因此無法在外面找工作；2. 送去勞動；3. 留校察看；4. 免於處理，只戴帽子。以上規定看似單純，實際上，右派份子的遭遇比坐牢還可怕。

「戴帽子」與歐洲中古世紀教廷公開宣佈「破門」(ex-communication)一樣。教廷一旦公佈某人爲異教徒，便沒有人敢和他接觸，稱之爲「破門」。中古對右派份子的措施，便是將右派份子放在羣衆之中「孤立」起來。任何人不能對右派份子表示友好，遞煙、打招呼都不成，對自己不利，但是，對右派份子，任何人可以隨時隨地大聲問他：「你思想改造得怎麼樣？」右派



份子有些被遣送到遠地勞改，有些則留在原單位當作反面教育教材，一旦開會，就揪出來露面，拿來批判，有殺雞儆猴的意思。

右派份子調離單位去勞改，時間二至十年不等。中共明文規定「勞改」期間不能回家。一位受訪右派份子「勞改」時，碰上中共搞「大躍進」，沒飯吃，被整至吐血，沒看醫生，後來就好了。受訪人回憶當時的感覺是：「死跟活的差不多。」爾後，這名右派份子調回原單位，復職當助教，但繼續接受勞動改造。右派份子工作量比一般人多；普通助教一星期教課六小時，改一班的本子，右派份子一星期必須教課廿四小時，改三班本子。勞動改造期間，右派份子每天早上六點起床，掃走廊或掃廁所，廁所門上寫著：「右派份子×××負責」。上課前，得向學生宣佈：「我是右派份子」。這樣的話，學生就可跟你劃清界限，對你監督。有些右派份子課講得好，學生有些表示同情，少數學生還會偷偷跑來找右派份子談功課。

右派份子戴帽子時間長短不定，有些人只戴了二至四年帽子，有些右派份子（含學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才摘帽子，一戴廿多年。若干右派份子回憶說，剛摘帽子時挺高興的，可是實際上沒多大用。各單位「保衛科」的名單仍未除。「文革」時，紅衛兵抄去這些人的名單，列在黑名單上的右派份子，雖然摘了帽子，生命仍有危險。事實上，右派份子到了「文革」時期，又遭上另一次浩劫，死不少人。「文革」時期，中共官方重新界定「人民的階級敵人」包括「地富反壞右軍警政憲特」。「右」即表示一些摘掉帽子表現不好的右派份子。這種「規定」就不好了；學生若打死你，不賠命，他没罪，因為，他殺的是「人民的階級敵人」。另外，在「文革」時期，



學校裏有一陣子流行「寫條子」；「寫條子」就是說彙報別人的言論，或交條子寫自己的想法，「條子」遞上去越多，態度越好。有些摘了「右派份子」帽子的老師，擔心自己的言論被揭發上去太多，想起以往「反右」的可怕情景：老婆離婚、孩子不能上學、勞改、孤立或改造等等，這些「右派份子」老師怕極了，只好自殺，死不少人。另外有些右派份子則死撐著想看好戲；一位右派份子說：「我曾經也想自殺，心想，死比活著的好；你想，當任何其他人都不敢表示對你友好，那有多難過。但是，心裏仍不服氣，我想看這齣戲怎麼演下去，死了多遺憾！」

在一般知識份子當中，「右派份子」是上級定指標派定的，有一定比例，所以，下級必須商量定出右派，硬擠出誰是右派。在大學生之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大部份是才華高，能量大，想問題想得多的人，各系不一定有固定比例。以「北大」為例，當時的數學系、物理系有很多是天才型學生，聰明絕頂，立論精闢；其中，物理系一年級有一班差不多有一半被打成右派，後來「反右」時，只好找另外班級的學生合併來搞「反右」。這些「右派」學生有些當工人勞改廿年，光勞動沒書看，一九七七、七八年間，這些「天才型」學生有一部份又被吸收到大學重讀，成績仍然很好，並且開始寫論文。假如這些天才型學生不被打成「右派」，廿年來一直研究寫論文，則現在不成世界名人才怪；中共搞「反右」，真虧！五〇年代大陸知識份子幾乎已被趕盡殺絕。一般人對「右派份子」，心裏表示欽佩，但又看到他們的悲慘遭遇，勞改坐牢，所以，大多數人都選擇「白專」道路，對政治不表示意見。



## 三、「文革」時期大陸學運（一九六六—七六）

### 背景

#### 1. 「大躍進」政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赴莫斯科，意圖爭取國際共黨老大，爭了近廿天，「共產國際」仍以蘇聯爲首，毛澤東沒爭到領導權。失望之餘，毛覺得，大陸的經濟國防脆弱，必須把中國搞強起來。因此，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毛澤東就計劃一步登天，想把中國一下子搞起來，才有「三年超英、七年超美」的「大躍進」政策。

一九八五年開始推行「大躍進」政策時，中小學大多數學校停課，學生四處收破銅爛鐵，或拆下房子欄杆，在學校造石灰窯（或稱作「小土爐」）煉鋼，學校停課，有一學期幾乎沒考試。六〇年恢復正常上課之後，老師與學生仍須勞動。勞動的方式之中，一種是按專長「分散勞動」或「頂班勞動」，例如：化學專長的師生，在學校辦化學工廠；地質專長師生則外出從事地質研究。頂夜班工作者，有點心費。不出工的人必須有醫生證明。另一種勞動方式是「集中勞動」；集合師生，由學校黨的專職幹部帶頭「下鄉」勞動，大多在秋收期間實施，每年一至四星期不等。通常一個年級所有學生組成「大班」，由一名黨幹部負責，「大班」之下分成若「小組」，



由教師帶領。除了勞動之外，每天出工之前、收工後，或下雨天不能工作時，便由學生唱歌、演講、編戲或「對口辭」。白天在工作地點不時有廣播，鼓勵「力爭上游」，努力工作。有學生偷懶，或偷吃東西被檢舉出來，在晚上開會時，便須自我檢查、自我批評。學校師生「下鄉」勞動一直延續到一九六五年。

由於中共消息控制得很好，一般老百姓不太知道「大躍進」是中共政策的錯誤，對於中共一連串錯誤，也只有到國外才逐漸瞭解。一九六二年，在北京，有一項縣委書記以上所有中共幹部參加的「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曾在會上作自我檢討，劉少奇支持毛澤東這項檢討，但是周恩來則頂住說，「大躍進」政策是「國務院」應付的責任。其次，當時的傳播媒體與政治教育則強調說，一九五八至六一年「大躍進」的失敗、餓死人，是因為「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一方面是天災的破壞，一方面是蘇聯逼債造成的，而不是政策制定的錯誤。老百姓都相信了。

一九六三至六五年間，經濟面貌有改善，有一位受訪人母親被找回工廠作工。另一位受訪人指出，當時社會各方面面貌都有良好的改變，沒有特別富的人，也沒有特別窮的人。因此，幾年下來，老百姓相信，中共能糾正自己的錯誤，能夠領導人民渡過最難的難關，也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有了人民的支持，「文化大革命」才發動得起來。

## 2.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一九六四年開始，中共當局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的之一是整頓農村基層幹部，貫徹社會主義農村政策原則；另一目的則在於，要求學生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同），對



學生遊行思想改造。

「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一般由教師帶學生組成，下鄉之後，須住在「貧下中農」家，交飯錢，以免被農村幹部賄賂收買，或使農民忌諱不敢反映真實情況，達成不了任務。「工作隊」在白天，一起和農民勞動；傍晚，「工作隊」即分別「串門子」，到農民家閒談，查情況，瞭解農村幹部是否貪污或不法情事。有時候，農民不太願意談，以免「工作隊」走了，又被幹部報復。晚上，「工作隊」則常開會「湊情況」。

以大學生爲主的「工作隊」主要在於，調查揭發農村幹部或社員不法現象，農村幹部政治經濟思想是否清白。如搞「小自留地、作買賣」，都是資本主義作法，且不合法。其次，「工作隊」的權力很大，有些甚至大到可以「換班子」，改選「生產大隊」隊長。參加過「工作隊」的大學生有些則接管農村幹部的工作；他們批評農民傳統的種植方法，下令把坡地挖成「作物田」；也有的把「一年一作」的農田改爲「一年二作」，強迫不必「放冬水」，也因此破壞土植生態而不自知。另一位學生則把每天「評工計分」，改成一個月辦一次「評工計分」，影響農民工作意願。「工作隊」的學生除了幹部以外，有些學生還必須召開「鬥爭會」，搞「地主」；有一名學生回憶說，農村倖存的「地主」像狗一樣地低聲下氣，實在不忍心再對「地主」下手打踢，結果，他本人被批評成「對階級敵人有感情」。後來「公社」大隊長教他在「鬥爭會」上提高嗓門、拍桌子、踢椅子。兩天以後，這位學生受到表揚。

大學生下鄉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本身思想也有若干變化。1. 一般學生大都親身體會到



農民生活很苦。農民遠比城市生活苦好幾倍；有些學生有此經驗，長大出國再作比較，更加覺得「制度」好壞有問題；另外，有些學生經歷過農村生活之後，到後來「文革」末期實施「插隊落戶」（下鄉）政策時，不敢再到農村，因為，農村生活太苦，所做的事無聊極了！2. 學生也嚐到社會經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讓學生走出校門，接觸社會，也因此，學生變得比較老練。以前，學生在學校不敢談戀愛，學校會管；但在農村生活，年輕農民很小就談戀愛，經此影響，學生到農村放鬆開放一陣子，回學校以後，比較敢談戀愛；3. 一名原為「共青團」的大學生，算是骨幹分子，剛畢業，碰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調去農村幹文書、作記錄，檢查農村幹部工作，位高權重，威風一時，結果，從農村回來後，這名大學生認為，該校黨支部書記工作作風太壞，比農村幹部還差。而且，這名學生當時也非常相信毛澤東，認為，毛講的「依賴羣衆」最好。也因此，該名學生攻訐批評學校黨支部，黨支部也反過來把這位原已列為「吸收對象」的骨幹分子學生，說成是「叛徒」。校園內，學生與黨支部之間的矛盾已被挑起。這是毛澤東準備經由學生進行權力鬥爭的開端。

### 3. 中共領導階層權力鬥爭

毛澤東權術高，他是由上而下一步一步清掃障礙，發動「文革」，逐漸集大權於一身。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把黨內反對意見封住。至六〇年代中期，毛澤東先整下羅瑞卿，讓林彪出頭；再以楊尚昆在毛澤東辦公室裝竊聽器為由，整掉楊尚昆。同時，林彪則委託江青在「解放軍」部隊搞文藝工作，這是江青介入政治的開始。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毛



澤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義，任命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人爲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由彼等指揮「文化大革命」的進行。

前面提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原目的在於糾正農村基層幹部資本主義傾向之思想言行。到了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把「四清」帶到城市工廠及學校；選少數大學，及少數工廠做試點。「北大」就是試點之一。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派「中央理論小組」到「北大」，找上哲學系講師（哲學系總支部書記）聶元梓，於五月廿五日貼出大字報，批判「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北大」校長陸平，結果，「北大」本校分成「擁陸平」及「反陸平」兩派。當時，劉少奇在北平主持工作，毛澤東在杭州，不在北平。加上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過問，聶元梓爲首的「反陸平派」居下風。一九六六年五月廿五日至卅一日，兩派混戰七天，自動停課。一直到五月卅一日，康生打電話給毛澤東，向毛報告「大字報」張貼之後情形，毛指示，把這一張大字報交由「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第二天，六月一日，「人民日報」刊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自此，毛及「文革小組」把「文革」推到人民面前，同時，「北大」「反黨委（陸平）派」翻身佔上風。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改組「北京市委會」，撤銷彭真職務；劉少奇、鄧小平命自己人李雪峯爲第一書記，吳德爲第二書記。同時，劉、鄧亦任命張承先率領「文革工作組」到「北大」替代陸平，佯裝積極搞「文革」。進駐「北大」的「文革工作組」，人數多達一



百人，成員由軍人及工廠、國家機關抽調幹部組成，而以軍人幹部為主；例如，派到「北大」物理系的就是一名海軍軍官。「工作組」進駐「北大」，任務在於，主持「北大」文革各項活動。事實上，各大學學生積極分子，尚未等到「工作組」出面主持開會，或指示寫大字報；部分積極分子學生為求表現支持中共「中央」決策，已開始自動自發寫大字報，開會辯論。六月初開始，「北大」學生舖天蓋地貼大字報，揭發批判陸平。別的高等院校，也開始批評各校的黨委，甚至「北大」的學生，跑到清大，貼大字報批鬥清大黨委兼校長——蔣南翔。

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劉少奇、鄧小平在北平，仍然設法派「文革工作組」到各大學，想控制局面④。但到了七月中旬，情勢變了。七月十八日，「北大」地球物理系學生陳必陶宣稱，「要把運動推動向更高階段」，並且貼出一張六個人簽名寫成的「大字報」，對「文革工作組」提出批評，說他們把運動搞得死氣沉沉。寫「大字報」的六名學生當中，有一人為趙曉康，是趙性初的女兒。七月廿二日，江青、陳伯達親自率人到「北大」，找對「文革工作組」工作不滿意的學生座談，並連續於廿四、廿五日兩個晚上，在「北大」東操場召開「萬人大會」，中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全都參加，坐在台上，要大家「大辯論」，討論北大文革工作組的缺點。當時，「中央文革小組」顯然支持「反北大文革工作組」的意見。這項「萬人大會」的辯論錄音曾送交毛澤東；聽了該錄音之後，毛澤東在寫信回覆清大附中學生贈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時，曾公開稱贊北大學生彭小蒙（軍幹子弟）在「萬人大會」的發言；彭小蒙的發言，係站在反對劉、鄧「革命工作小組」的立場。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會中抨擊劉少奇派「文革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五十天，指責劉少奇的行徑類似「五四」時期的北洋軍閥。同一天，毛澤東親自貼出「砲打司令部」大字報，目的在於號召學生攻打劉少奇。八月四日，由江青、陳伯達領導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再度到「北大」，再開一項「萬人大會」，批判北大「文革工作組」，主張將之撤換。在這項「萬人大會」台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坐在一起，時任「國家主席」的朱德也出席，一個人坐得遠遠的。其實是，「中央文革小組」有意和朱德離遠一點。後來，學生要朱德說幾句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個個拍大腿表示不滿意及壞事。朱德泛泛地講了話，鼓勵「學生繼承革命傳統」，這種話其實並不重要，不痛不癢。「中央文革小組」到「北大」的目的在於，批判北大「文革工作組」，把它算成是劉少奇的罪狀。

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據說，此項「決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有過激烈的辯論；毛澤東、周恩來與林彪支持，劉少奇、鄧小平及朱德反對，另一位常委陳雲藉故生病不參加會議，不表態，後來，陳雲被逼表態，投票贊成毛周林，結果是，四比三，通過這項「決定」。當時此一傳言，係由「中央文革小組」接見羣衆講話時透露出來，再傳播出去；其目的在於，利用這些内幕消息爭取民衆注意，以贏得政治鬥爭有利形勢。學生大都密切注意，除了聽廣播為大道消息之外，也注意小道消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走到「中南海羣衆接待站（負責接受民衆上訪抗議的單位）」，公開講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革命進行到



底。」進一步給學生具體鼓舞起來。這時候，高等院校已停課，大學生開始成羣結伴「灑向社會」，乘火車到西安、重慶、武漢、上海、桂陽各地「點火」；批判各地大學院校黨委、各校「文革工作組」及各省市黨書記。同學們自己組織，約好一起走，穿軍裝、戴紅臂章，坐霸王車；「文革」開始時，同學們不都爲了「遊山玩水」，心裏想著是，虔誠地作上帝的使者，拯救被蒙蔽的人。大陸六〇年代的學生自此捲入另一次前景不明的運動⑤。

#### 4. 學生積極分子暨其心理

「文革」開始時，「學習成績」較差者幹勁大。由中共黨政軍單位調來上大學的「調幹分子」，年紀大，成績不好，受委屈，他們在「文革」前夕即率先響應，批判學校當局「修正主義」。另一些不完全憑成績入大學的工農子弟，在六二、六三年間中共提高教育質量時，遭到留級，覺得修正主義的教育政策專門使工農子弟留級，且造成工農子弟入學比例偏低，平常老師同學又看不起他們，心生抱怨，「文革」運動一起，這些同學立刻熱烈反應。另有一部分學生，平常被「政治輔導員」劃爲「政治落後分子」，或被黨委處分過，心裏早有一股氣，氣「政治輔導員」，「文革」來了，他們認爲有機可乘，便抓住機會攻擊黨委。相反的，有些優秀的學生最純潔，完全爲「革命」獻身，不像後來的「工人」都有動機。這一批優秀學生，對政治認識較清楚，一旦認爲何種政策好，便全心投入；「文革」開始時，這些優秀分子多少受到毛澤東著作若干「民主」話語吸引，以爲從此以後，人民的怨氣、恨意可以出，所以，「文革」活躍份子之中，也有優秀的學生。



學生積極分子當中，高幹子弟也不少。高幹子弟態度積極，主要因為家庭背景突出所致。特別是在北京，部分高幹子弟知道上面政治鬥爭情況，就起而呼應。其次，校園內的黨團幹部學生也很積極加入「文革」運動行列。一般而言，學生積極分子和校方都有對立的傾向，而且，學生與校園黨幹部也有一段距離。學生的印象認為，黨委搞運動時，總是一步一步來，陰沈而又穩健。「文革」初起時，學生們發現，校黨委跟平常一樣；學生積極分子摸不着他的底，也不知道校黨委在想什麼，要做什麼。

學生心理方面而言，「文革」開始時，學生從報紙上知道消息，大都熱烈擁護，真心支持，不懷疑（中共）中央的政策及共產黨的領導。學校師生都奉「毛語錄」為聖旨，老師拚命把「毛語錄」編入教材，誰能編排得天衣無縫，誰就最行。學生則大都活躍起來，都想跟隨毛澤東，爭取表現，做好「革命派」。當時，大家都十分擁護、十分積極，都想怎樣幹好革命行動，這一點都不假。對於學生積極支持「文革」的現象，一名受訪人認為，這完全是「社會效應」，學生當時似乎「沒什麼思想」。另一種解釋則認為，這可能是，中年人及青年學生一方面受黨團特權優待的誘惑，一方面又感到「不從即受懲罰」的威脅，因此，沒人敢頂撞中共系統，只好跟着大家走。

事實而言，部分不活躍的學生，思想分析能力弱，活動力小的學生，只在「文革」開始時，跟著起哄一陣子，便厭戰退出，成了「中間派」，這種同學不少。有些學生上大學以後，功課一忙，較沒時間關心政治，甚至還討厭政治活動。另外有些學生「家教」較嚴，不願多談政治，只



想多學習專業，努力建設。

## 5. 紅衛兵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下令，要各單位找定目標，把運動搞蓬勃起來。八、九月間，各中學、大學紛紛組織紅衛兵，把他們一批一批送出去，到北京「取經」，或下鄉「點火」。最初，「紅衛兵」係由各校「黨委」或「文革工作組」出面組織，以班級、學校或「校際」為單位，按人數，選代表組成「委員會」，以「委員會」作為紅衛兵組織之「核心」。校際則聯合組成「紅衛兵司令部」。上述以班級、學校或以「校際」為單位之組織方式，沒有一定的「由上而下」的規定，而係取決於個人的社會活動力；社會活動力弱的人，自然而然只找同班同學一起活動。社會活動力較強的人，則找同校同學，甚至找校外同學一起行動。「文革」初期，各校紅衛兵組織成立時，須向市委（或「文革工作組」）及「公安局」申請官章，成立手續正式且在「黨委」掌握之中。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發表「奪取號召」之後，「黨委」及原單位「工作組」靠邊站，學生就自動組織紅衛兵，自己用木刻方法或以臘紙油印本身組織名稱的條子（官章）。學生自動自發找朋友一起參加，取個名字，戴上臂章，就成為紅衛兵組織。各個組織存在時間久暫不定，學生來去自由，沒有強制性。

紅衛兵係由十二歲以上中學及大學生組成。原來亦計劃在中學成立「紅代會」，且在小學組成「紅小兵」。但是事實上，中小學生年紀小，理論水平不高，筆桿子能力弱，影響力小，起不



了什麼作用，後來就是大學生紅衛兵主宰整個局面。

「文革」之初，紅衛兵係由各校黨委、「文革工作組」，且須向各地「公安局」申請官章，同時，紅衛兵任務之一定為：批判「黑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因此，「文革」初期紅衛兵組織吸收成員時，都經過檢查成份這道手續，主要以「紅五類」家庭背景或「表現好」的學生為主，「黑五類份子」大都躲起來，不敢出面，也都不准加入紅衛兵組織。

中共黨政軍幹部辦公區及其眷屬住在一起，因此，中共高幹子弟同住了一個「大院」，比較容易組織，又有軍裝可穿，有現成皮帶可繫，較神氣。因此，「文革」初期，高幹子弟組織許多紅衛兵組織。爾後，高幹子弟父母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原來是「天之驕子」，一夜之間全完了。高幹子弟的紅衛兵組織，有的繼續留在北平，橫著幹，成了最兇狠的「暴力派」。北平地區紅衛兵組織情況較特殊，涉及高幹的權力鬥爭，其來有自。另外一些高幹子弟紅衛兵組織老子一垮，則一哄而散，高幹子弟四處逃匿，成了「逍遙派」。

紅衛兵組織成員，經常碰在一起討論。策劃行動的少數幾個人大都自稱為常委，有的稱為「勤務組」或「核心組」。這些名稱係參考中共革命經驗形成的。紅衛兵組織內部的分工不一致，隨每個人興趣意願去幹，不願幹就說不幹，也沒人管。主要的工作包括宣傳及對外連絡。

紅衛兵組織當中，高幹子弟關係好，有管道和各地黨政軍幹部連絡，又無缺點可暴露，較容易維持威信，因此，「文革」初期，高幹子弟很多成了紅衛兵頭頭。後來，黨政軍幹部個個垮下之後，在各項運動進行當中，表現好，理論講得頭頭是道，又能控制會場，便自然而然成爲「領



袖」。

一九六六年九至十月間，約有八十至一百萬名紅衛兵到北京。此一時期，各地皆設有「接待站」。到北京的紅衛兵，最初每人還發錢八角人民幣，可領到在北京使用的糧票。「接待站」也發紙和油印機，作為紅衛兵組織的宣傳工具。同時，中共領導人也十次檢閱紅衛兵。經此煽火，以紅衛兵稱號的學生，捲入「文革」，進行各種形式的活動。

## 學生活動方式

### 1. 抄家——「破四舊」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北平、上海等城市各單位及學校，開始找人組織起來，以協助特定家庭對象「破四舊」，進行抄家活動。抄家以「黑五類分子」家庭、有錢人，或平常進不去的深宅大院為主，由各地公安局、檢察部指令抄那幾戶人家，或由各「單位」自行選定抄家對象。

剛開始時，高、初中生由老師帶頭上門抄家，大學生則由「政治輔導員」帶頭抄。抄家時，由鑼鼓隊開導，拿著單位簽發的「勒令書」，貼在被抄家門口，勒令該戶人家在一定時間之前，把四舊的東西交到紅衛兵總部。有些人家保住一些值錢的東西，如金、銀、錢幣等，紅衛兵不滿意，便自己上門來抄。

抄收的東西包括金銀錢幣、手飾、古董、書籍、文件等，無具體的規定，全由抄家的學生（或同單位同事）決定。但是，大多數人家被抄之後，都會收到一張「收條」或「清單」。有些



被抄家的人，知道簽發「勒令條」的單位，當時就去該「單位」找回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大部份被抄家的人，則到了「文革」結束，一九七六年左右，才憑「收條」索回被抄的物品，有些人被抄去的金、銀、錢幣下落不明，便以官價折回現款。

抄家初起時，有一定的手續，學生也有一定的規矩，當時的紅衛兵也比較「文明」。不久，各「單位」、公安局、檢察部等也被沖垮之後，高、初中小孩子便亂來了，抄家也不必提申請，想到那一戶人家，紅衛兵就翻牆，或破門而入，找出一大堆舊東西，堆在院子裏，就灑油點火燒。有些紅衛兵抄到手飾、金條，便臂膀上掛滿手飾，用飯盒裝金條，不給「收條」，自行帶走。

和「抄家」同時進行，彼此分不開的活動是「破四舊」。鄉間中學進行「破四舊」活動時，由學生回家找些舊物品，集中在一起，放在大院子燒。在城市，「破四舊」的範圍比較廣泛；燙頭髮、小褲頭都用剪刀剪，街名及店名全換了名字，皮鞋、銀行存摺及明星照片都屬「四舊」，全遭火燒；穿高跟鞋、養花、養鳥都是「四舊」之內。甚至，有些學生夥同年輕工人衝進教堂「破四舊」，燒燬聖經、砸管風琴、挖地下室神父的墓。工人也用起重機鋸掉十字架。這些是後來亂了之後的事。

抄家、破四舊的活動，前後持續進行約一個月，後來就不了了之。整個活動之中，大學生比較「文明」，有時還出面保護古物，中學生紅衛兵不懂事，較常亂來。另外，大單位較按規矩行動，小單位則較亂來。整個「破四舊」活動，主要目的在於，破壞社會秩序，把社會搞混亂。



「抄家」行動則不只會造成被抄者物質的損失，在精神上，也會使被抄家的家庭有一種「人民的敵人」的氣氛。

## 2. 串連

與「破四舊」幾乎同時，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文革」中央號召「全國大串連」，鼓舞大學生殺向社會，到工廠、農村、機關、報社搞革命。農村地區中學生少，大學生更少，但要響應（中共）中央的指示，只好推選代表參加串連。農村地區選出參加串連的代表，不一定是黨員或團員，主要是外地公派至農村的教師，他們學習比較紮實，見識廣，說話靈，能說出一些小故事吸引年輕人，因此，（公社）上面便派任務給他們，要他們選定地點有計畫地「串連」，回來再打報告。農村以外的地方，大多數的情況是，一幫一幫十至廿名學生，自己找伴，或加入別人團體，坐汽車、火車或走路，到處亂走，只知道，坐車不要錢，到了別個地方有人接待。

學生「串連」的動機主要取決於1. 個人的選擇；2. 政治意識的強弱程度。一般動機大約如下：有些學生接到外地同學的來信，敏感起來，想到外面看看，便去「串連」；有些學生自感家庭成份不明，不得不表示積極性，也跑去北京「串連」；有些學生崇拜毛澤東，對毛澤東年輕經歷好奇，想親身體驗，鍛鍊自己，便步行「長征」，參加串連，到毛走過的地方走一走，這些地方包括井岡山、瑞金、長沙的「愛晚亭」（毛讀書的地方）、湖南醴陵附近之一家煤礦場等，學生替他們自己訂任務、訂路線，晚上有些人就露宿在外，鍛鍊一下。另外有些學生則有比較具體的政治意識，想藉著「串連」到政治落伍的地方「點火」；這表示由政治激化中心，擴散到較不積



極的地區，以推動政治活動，例如：北京到廣州稱爲「點火」，而廣州學生到北京則稱爲「取經」，即「學習經驗」之意，而廣州學生到縣城或鄉下，則也稱爲「點火」。學生持著不同的動機串連，到處亂走，各有自己的活動與目的地，但是比較具有政治特徵的活動，主要仍是所謂的「點火」與「取經」兩種。

大學生到政治不積極的地方，號召起來革命，叫做「點火」。有些學生以較溫和的方式「串連」到外地省市「點火」；他們自覺比較「文明」，只發表演說，介紹北京高校情形，貼「大字報」，並介紹（中共）中央「文革」的精神，號召同學起來革命，他們只盡到宣傳任務，不想捲入當地的政治鬥爭。

到過廣州「點火」的兩名「北大」學生，曾在一九六七年初，同「北大校文革」同學到廣州，和廣州大學生會合，住在廣州重工業廳招待所，在大廳打地鋪。這批串連到廣州的「北大」學生，成立「北大文革委駐廣州工作站」，以「北大校文革」名義，出「新北大」廣州版，八開型式、共四個版面；交由廣州「南方日報」社印刷，內容以政論爲主，批判廣州當地黨委，表明和廣州當地造反派聯合。這份廣州版「新北大」，在廿天之內出刊五期，印好之後，會有廣州當地中學生取出去賣，每份賣一分錢；賣得的錢，統一系列帳，帳目很清楚，一部分錢付給「南方日報」印刷廠及工人，也給中學生一點吃飯錢。不過，廣州中學生其實也志願幹點革命工作，想「無償幹革命」，「北大」來「串連」也還規矩，當時並沒有人在意這份「新北大」小報可掙多少錢。



學生串連外地「點火」的活動之中，也有更積極、具有政治鬥爭色彩的行動。有的學生到省委書記辦公室，要求省委接見，省委經驗豐富，由他底下的秘書推掉，但是每天都有不同團體的「紅衛兵」找省委，要求見面，省委書記也不會全部躲掉，省委仍選擇一些勢力大的紅衛兵學生見面。

學生見了「省委」，就質問「省委」：「你自己交待罪行？」或問：「你爲什麼不搞運動？」經過學生直截了當質問，「省委」馬上變爲被動，而學生成了主動，接著即可能展開批鬥。

質問「省委」或其他官員之後，學生就把質問的內容油印成「小報」，寄給外地的同學，或在當地散發。有些學生幹勁十足，來勁得很，連夜通宵寫稿，刻鋼版，印「小字報」；有時候用毛筆寫成斗大字的「大字報」，在串連當地街頭到處張貼。

筆者訪問的一位大學生回憶說：「有一次，他跟同學串連到外地，見到一家報社，心血來潮就一起竄進去，事先沒商量，進去幹什也沒譜。正好報社開討論會。『報社』他們自稱的『反對派』積極人士，看到紅衛兵學生進來，便立即邀請紅衛兵學生代表上台講話。大學生等一羣人便推一個人當代表，上台講一些空洞的話，表示支持報社的『革命造反派』，報社的人也跟著喊一些口號，附和說：『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被訪問的這名大學生事後想起來，覺得報社這些「造反派」積極人士，其實並不太敢大膽批鬥該「報社」黨的「當權派」，「報社」所謂的「造反派」只是裝樣子，應付應付而已。



當時「串連」的情況是，學生到處亂跑，廣州有不少學生，曾分批進到「軍區」，想揪出當時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調查該「軍區」支左錯誤；學生衝進「軍區」，便抬出幾個箱子擺起來，站上去演講，後來李一哲大字報三名作者之一的王正天，即曾在廣州軍區演講，批判黃永勝。

學生「串連」各地，實則在各地街上亂跑，到處一羣一羣人站著或坐著，有些人認為某一黨官是「修正派」，另一些學生認為不是，一言不和，當場就辯論起來。有些學生到了外地，有時也跟當地自稱「革命造反派」的學生團體結合在一起，到相關機構「奪權」。有一批來自北京的大學生，到了廣州之後，接受廣州一個「紅衛兵總部」接待，後來被分配去奪廣州「公安局」的權；這批北平來的大學生被派到「公安局」，看管一名接線生，不准這名「接線生」接特定的一個電話，就這樣看了三個多星期。

學生「串連」去「點火」之外，也有學生到北京「取經」；不少學生從農村或縣城，搭免費車到大城市大學校園看大字報，抄大字報。有名大學生正好碰上毛澤東檢閱「紅衛兵」。該項閱兵安排在北平西郊飛機場；所有「紅衛兵」學生凌晨四點起床，由市郊走到機場，一個一個跟著走，「紅衛兵」人數不少，有很多人的鞋子被踩掉，掛滿道路兩旁的樹上；在機場，學生站成一個一個方塊，毛澤東坐車子轉了幾次。除此之外，有一次，幾十萬名紅衛兵站滿「天安門」廣場，對著中南海廣播，要劉少奇出來回答問題，後來不了了之。

學生個別組成紅衛兵團體，串連各地，到處亂走，有些學生只是好玩好奇，隨意去「瞻仰祖國山河」，有些學生則也進行各項政治活動，進出黨委書記辦公室或「軍區」，膽子大了不少，



爲日後「武鬥」壯了膽。但也有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學生，跟著同學「串連」，怕暴露身份，受到攻擊，一路上不免擔驚受怕。由於「串連」期間汽車、火車極爲擁擠，只能站著，不能下車大小便，有些學生「串連」回家之後，因爲站太久，雙腳浮腫生了病。從一九六六年八月開始，學生到處串連，到十一、二月，天氣轉寒，凍著不少學生，造成傷亡，因此，中共中央文革叫停，並呼籲「復課鬧革命」，實則仍有部分學生遊走校外，進行不同形式的「革命」活動，而以「印材料」及召開批判鬥爭大會較普遍⑥。

### 3. 「印材料」

「文革」初期，大、中學生隨意組成紅衛兵團體，若有共同意願、有條件時，亦可印批判稿、出小報或以書籍型式印材料。

大、中學生組織的紅衛兵團體，若有共同意願辦報，又有紙張及印刷工具，就可辦自己願出的報。出報的條件需要紙張與印刷工具。「文革」剛開始時，需要白報紙，可以到省黨委登記取得紙張，且拿到「同意條」；憑著省黨委核發的「同意條」，可以拿到印刷工廠要求印。後來，有些「紅衛兵司令部」奪權成功，接管廣播電台或報紙，取得物資，即可自由調配使用，便編排東西，由廣播人員及印刷工人廣播或印製，宣傳自己的東西。

學生紅衛兵團體決定辦報，就一句話，分爲編輯、印刷、審稿，發通知給同學徵求稿件。有時候，有同學到外地，看到關於黨幹部的個人材料或「小道消息」，便記錄下來，寄回來作爲批判材料，或登在紅衛兵「小報」。文章編好之後，便去排版印製；找不到印刷工具時，便自己拿



到印刷廠，印刷廠工人若個人關係良好，持相同的觀點，便會幫忙印。紅衛兵「小報」題目自己隨意定。印好之後，就上街分發或賣出，不只在校內發，也散發到校外。一份「小報」賣四分錢左右，不一定賺錢，賺錢其實不是主要動機。紅衛兵組織出的「小報」，印刷份數自己決定，有些「小報」只印二至三千份。在廣州出版的一份「紅衛兵團報」，出了十二期，每一、二星期出刊一次。每次以鉛印方式，印一萬到兩萬份。

「文革」期間，學生須參加批判會，寫批判稿，一起集會討論「讀書無用論」、「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等題目，有些學生什麼也不懂，就抄報紙或請父母代筆。除了批判稿之外，「文革」開始時，各種偽造的「（中共）中央文件」全都出籠，各式各樣的謠言一大堆。有些學生私下搜集許多「小道消息」，自己閱讀。以上這些偽造的「（中共）中央文件」、批判稿，及「小道消息」有時則輯印成冊。

一名大學紅衛兵回憶說，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間，曾經搖筆桿子為毛澤東效命過的關鋒、戚本禹被鬥下台，他就覺得知識份子與大學生遲早會在「文革」犧牲掉，因此，這位大學生紅衛兵就暗中決定，躲開政治鬥爭漩渦，但也不能當「逍遙派」，還必須裝得關心「革命」事業，便選擇「印材料」這件事幹。

爲了避掉責任，保護自己，這名大學生紅衛兵編印的材料，主要係其他同學打、砸、搶或抄家到的所謂的中共「內部參考資料」。這些「內部參考資料」係從黨政幹部家抄家得到。曾經有兩個人也拿兩份「（中共）中央原始文件」給這名大學生，但被拒絕印。等到這兩份原件被油印



過之後，才再編入印製。受訪問的這名大學生紅衛兵爲避開日後別人找麻煩，專搜集人家油印稿，同時找另兩個學生編輯，不親自編寫。

爲了想瞭解毛澤東思想，這名大學生搜集不少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詩詞、傳記、內部講話及照片，編印「毛未公開的講話」及「學習文選」。這名大學生紅衛兵表示，他保存的油印資料比「毛澤東思想萬歲」還全，但他覺得，毛思想不太對。他搜集的油印資料，有些不利於毛的威望，例如：毛澤東曾經稱讚劉少奇爲好同志，毛也贊揚過赫魯雪夫，另外，毛澤東「正確處理矛盾」的內部講話，和後來公開發表的講話完全面目全非。此外，這名大學生亦負責主持編印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中共）中央首長之批評材料及他們的內部講話資料。

據這名大學生表示，他印過的東西，約在一百種上下，有些是主持，有時只是協助。每本在五百頁左右。每次印的冊子規模大，約在五干至兩萬本之間，用凸版紙印刷，有些是精裝本，用塑膠皮作封面，加燙金字。由於當時，「北京市委會」下令不准印非法刊物，而這名大學生紅衛兵也想趁機離開北京，不捲人是非，到外地看看「文革」情形，因此，以「印材料」爲由，扛著他的紅衛兵組織名號，到過內蒙古、山東、江蘇、浙江、湖北、廣東，及遼寧等地，那裏願意供紙張，願意印，就拿去印。印成的冊子，每本賣一元人民幣，賣書錢與材料錢大致平衡，沒賺到錢，兩袖清風。後來，這名大學生紅衛兵印製的油印本，可能損害毛澤東的形象，被同一學校「對立派」同學抄家、批鬥，罪名是：印毛澤東的黑材料⑦。

#### 4. 革命造反「點火大會」



「文革」時期，學生紅衛兵組織聯合開羣衆大會，公開審問批評中共黨政官員，叫做「批判鬥爭大會」，大陸學生通稱爲「革命造反點火大會」。這種聯合舉辦的「點火大會」，規模較大。另外，紅衛兵組織在所在「單位」，也經常辦批判大會，鬥爭本單位之黨政官員，但規模較小。

一旦某一紅衛兵團體決定開「點火大會」，通常即以電話通知大會時間地點。各個紅衛兵司令部便都派代表參加。在「革命造反點火大會」上，通知找來的當地省委及各級黨政官員，集合在一起，坐在低於「主席台」一階的審判席。紅衛兵頭頭則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大會。

在「點火大會」上，學生紅衛兵大都事先安排一些知道黨政官員生活內幕的紅衛兵上台演講；大都是高幹子弟，知道內情多，公審才可望有內容。三、五個人輪番上台演講，一一指出他們所知道的領導幹部的一些小毛病，有些同學講得很好，便立刻使大會騷動起來，讓大家都感覺到黨政官員「靈魂的骯髒」。

「點火大會」批判完了，參加「點火大會」的人便上街遊行，喊口號，到處貼口號標語，然後解散。這種「點火大會」具有煽動性，不定罪，不具有法律性，但有很大的煽動效果。雖然，黨政官員不會在「點火大會」上定罪，但是，黨政官員在大會上公開被揭露毛病、被批判，實際上已喪失了領導能力及領導權威。經過紅衛兵互相串連、互相學習、互相寄小字報，各地都如法炮製，開「點火大會」。

中共黨政官員參加「點火大會」被批判鬥爭之後，有時進一步被命令遊街示衆，稱爲「遊



鬥」或「遊街」；有時則被紅衛兵組織監禁看管。前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經在脖子上掛著「團中央頭號走資派」大牌子，在北京「中共青年團」眷村遊行示眾。另外，「文革」時期任廣東省委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也被抓著架到廣東「中山大學」，關在教室。由「中山大學」紅衛兵團體出面，在越秀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公審趙紫陽，批評趙紫陽玩女人，是劉少奇走狗。後來，因為趙紫陽當時也是廣州軍區政委，因此，廣州軍區派軍隊，接趙回去。趙紫陽被關了一星期。

「文革」初期，不少黨、政、軍官員為求自保或避風頭，常透過子女同學關係，與各個紅衛兵領袖連絡，或出席紅衛兵召開的「批判大會」表態。一名曾是紅衛兵的學生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表態」的涵義。這名紅衛兵參加過的一次「批判鬥爭大會」上，陳毅與周恩來坐在一起參加大會。台上的紅衛兵問陳毅大元帥：「自己交待罪行！」陳毅回答說：「好！請翻開『毛語錄』第三百七十八頁。」紅衛兵翻一翻說：「『毛語錄』沒有三百七十八頁。」陳毅說：「那裏沒有，你的還沒印上去！」陳毅接著說：「我讀給你聽；毛澤東說：『陳毅是好同志』。」紅衛兵大叫道：「『毛語錄』上没有。」陳毅指著周恩來說：「問周恩來好了！」周恩來點點頭，表示同意！台下嘩然，主席台上的紅衛兵眼見情勢，沒法子再批鬥陳毅，便轉話題，質問另外一些領導。在這項「批判大會」上，陳毅即表態，反對林彪，指責林彪沒印好「毛語錄」；同時，陳毅也算過了關。

在「批判鬥爭大會」上，上台的人無不積極地表現，不敢有點猶豫。一位受訪者回憶說，曾



經有一次在「萬人師生大會」上，有位女學生，平常並不起眼，但是，一下子跳到台上，對著鬥爭對象又踢、又打，十分認真，可能爲了爭取政治資本，以利入團入黨，也可能只是「表現」而已。另外有一次，有位先生被鬥爭，太太一上台，狠狠地打了個耳光，大家都覺得過份，算是演戲罷，回家還不是睡在一塊。

在個別學校或「單位」，學生紅衛兵組織也經常召開「批判鬥爭大會」。一般的情形是，學生紅衛兵組織成立之後，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批鬥各學校、「單位」領導成爲理所當然，各校的紅衛兵開始把黨幹部、校長及各系級教師一個一個揪出來，質問批判他們，只管問，不准答，把黨政領導、校長及教師弄成「被動」。接著，學生紅衛兵進一步把自己判斷的「修正派」黨政領導及教師，列冊爲「黑幫」，集中起來看管，住在學校，吃「定餐」，或掃廁所及做「體力勞動」，這就是當時通稱的「坐牛棚」；意思是指，只做「體力勞動」，不做「腦力勞動」，晚上仍可回家。有些「單位」執行「坐牛棚」較嚴；「單位」的紅衛兵把「靠邊站」的單位領導幹部、及其他地富反壞右等資產階級敵人一起管理，關在「單位」的地下室，類似坐監牢，而這些被關起來的「黑幫」人士，又都是所謂的「牛鬼蛇神」，因此，個別單位的這種牢房也叫做「坐牛棚」。

「黑幫」的教師、校長及單位領導「坐牛棚」，住在一起，由學生紅衛兵監督勞動、寫檢討，或隔離審查。基本上，「牛棚」係以每一工作「單位」爲單位，但是，「單位」之間的紅衛兵組織有聯繫。「黑幫」人士同時必須隨叫隨到接受羣衆批判與審訊。學生紅衛兵團體開羣衆大會



時，會去通知「黑幫」，找幾個人來接受羣衆批判。「黑幫」人士會派人去。在羣衆批判大會上，「黑幫」教師或黨政官員，脖子上大都掛個木牌子。有時候，紅衛兵嫌木牌子太輕，便要他們掛「鐵板牌子」。「鐵板牌子」上的鐵絲常陷到肉裏面去。同時，接受審訊的「黑幫」人士通常也戴著高帽子，或被處罰作「噴汽式飛機」，非常累。

### 5. 武鬥

武鬥就像打羣架；在學校就是學生打學生，在單位則係羣衆打羣衆。紅衛兵學生打鬥，起初爲觀點不同而辯論及反辯論（反駁），乃至佔樓，打砸對手的總部，爭奪地盤、及控制地盤；發展到後來，學生也有的爲了奪「印把子」（奪領導權）、及「進領導班子」，介入各「單位」羣衆的武鬥。

政治觀點之爭論逐步升級之鬥爭狀況，取決於個人或紅衛兵團體之政治觀點判斷。就判定「校黨委」是否爲「走資派」一事，有些同學找例子說明，如「校黨委」不重用「紅五類」子弟、重視分數、重用「資產階級」老師（牛鬼蛇神）等，學生便判定這一個「校黨委」爛掉了，必須砸掉打倒。這個時候，若有其他學生或紅衛兵組織提意見反駁，認爲「校黨委」不是「走資派」，不要對他們太殘忍，兩派觀點不同的學生就辯論、對立起來，互相指責對方。辯論越激烈，口沫橫飛，推扭打成一團，就演變成武鬥。

以「北大」爲例，一九六七年六月，「北大」校文革分裂爲「新北大公社」及「井崗山兵團」兩派羣衆組織。對聶元梓持不同的觀點。前者支持聶元梓，後一派抬出周培源、楊克明、陳



醒邁、謝紀康、侯漢清等七名教授爲兵團總部委員，對抗聶元梓。兩派互相抓對方的人逼供、整材料。「新北大公社」抓了一名屬於「井崗山兵團」、讀生物系的學生——樊立勤，嚴刑拷打，把樊姓學生腿打斷，要他招供「井崗山兵團」如何反對「中央文革」。「井崗山兵團」也抓一名學生「整材料」，但未拷打。雙方學生互相整材料，批判對方反「中央文革」，以求搞垮對方<sup>⑧</sup>。

在「北大」，「新北大公社」佔領四十四樓爲總部，人數較多，佔領校園大部分建築。「井崗山兵團」佔據第廿八、卅、卅二宿舍，還挖了地道連接各佔領的建築物。雙方學生除了辦「小報」抨擊對方之外，也分別成立「戰鬥隊」，雙方以高音喇叭干擾，並以長矛及強力彈弓攻防。此外，「北大」對峙的這兩派學生也分別與其他高等院校紅衛兵組織連絡。

學生武鬥初期，大都使用小木棍、木棒、石頭、未動用真刀真槍，直到後來，各地方解放軍部隊、工廠、「單位」也分成兩派批判鬥爭，及重整地方（或「單位」）領導班子——「革命委員會」時，少數學生紅衛兵介入其中，才有取得真槍實彈的機會。

一九六七年元月，毛澤東在背後撐腰的「中央文革」發出「奪權號召」<sup>⑨</sup>，這個時候，除了學校學生已經搞得熱烘烘之外，各廠、礦、單位及學校的「黨委書書記」全部「靠邊站」；每一個「單位」都分成兩派，且要求每個人要站隊，由「羣衆組成」掌權，支持「中央文革」與被批鬥爲反「文革」兩派人士必須批鬥。自此之後，大陸整個社會全捲入「文革」。另外，一九六七年元月，中共「中央文革」又要求各地方軍隊「支左」，即要求各地區部隊支持「革命羣衆」



（意即支持「中央文革」的羣衆組織；由各地部隊判定那些人「革命羣衆」）<sup>⑩</sup>。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部分積極的學生紅衛兵介入校外社會人士（成人）的政治鬥爭，甚至有學生取得真槍實彈。

也許爲了「支左」，有些地方的解放軍部隊，發槍給紅衛兵學生。此外，因爲各個廠、礦、單位都有「武裝部」（或稱「保險科」），又都必須表明支持「中央文革」的革命態度，因此，若干廠、礦、單位的「武裝部」有槍，就把槍枝、子彈，甚至機槍發給紅衛兵。一些紅衛兵則自己造土炸彈、或以匕首、皮帶作武器，另外也有學生進到廠、礦單位的「武裝部」，偷槍彈，或有的闖進地方軍區搶槍。有位紅衛兵即曾和同學硬闖入「廣州軍區」，搶了一百多條步槍，還帶走數挺輕機槍及手榴彈。進入此一時期，學生之間對峙打鬥狀況，亦增加較濃厚的暴力傾向<sup>⑪</sup>。

有些紅衛兵大權在握，有錢支用，可以管卡車、開卡車，就全副武裝，封鎖一個據點，不准組織外的其他人進出，裏面的人實槍實彈，焊鋼板，弄來拒馬及鐵條防守。紅衛兵頭頭則上北京，找「中央文革」相關領導人談判，向中央領導人提意見，表明對地方「革命委員會」人選的意見。事實而言，學生參加流血武鬥的情形較少；武鬥較激烈的地方，如上海、四川、湖北等地，學生紅衛兵介入者少。上海「柴油機工廠」工人保衛舊「市委」，與新成立的「革委會」對峙戰鬥，持續好幾個星期才平息下來。武鬥較激烈的四川，以產業軍（工人）爲主；四川山地秘密生產軍火、坦克、大砲開上街打，傷亡多，成都武鬥規模較大，有一些學生去四川欲探究竟，嚇了跑回來。



事實上，大約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以後，紅衛兵學生已經和社會上的派系爭鬥混在一起。學生在整個「文革」運動的地位已逐漸變成小角色，同時，毛澤東指使的「中央文革」也開始重組地方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紅衛兵團體的功能漸漸降低消失。

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部分紅衛兵團體成爲「革命派」，鬥垮原來的「黨委」，被任命爲「主任」，亦確實掌握地方一切大權，然而，這段期間，省市一級，亦都有一名由毛澤東、周恩來直接派一名「委員」，任命爲「革委會」委員。在這一段短暫時期，被任命爲「主任」的少數紅衛兵頭頭，其實仍經常和地方及中央軍政大頭會面，也彙報地方革命情況，則中央軍政領導應亦略知地方情形，而且，紅衛兵頭頭的彙報，或也可能影響「革委會」任命的人選。事實上，後來，毛澤東與周恩來大致任命「親毛」的軍政幹部爲各地「革委會」委員，紅衛兵學生頂多是副手，學生已降爲次要角色。

毛、周重建「革委會」期間，紅衛兵學生有支持中央任命「革委會」者，也有極左派學生則認爲，新成立的「革委會」，如同「文革」初期，壓制紅衛兵，故要（紅衛兵）自己幹革命，打倒「革委會」。後面這一派急進學生，其實是不滿足權力分配，不滿（學生）本身在「革委會」的副手地位。

針對各地紅衛兵團體武裝對峙局面，紅衛兵學生不滿「革委會」，及若干學生成立戰鬥隊等情況，周恩來漏夜接見各地方不同派別，分別召開黨政軍造反派聯席會議，協調分析，由各地方的代表簽協定，逐一地地區解決，以中央文件傳達下來。由於周恩來仍有威望，因此，地方上有



爭論、武裝對立的各「羣衆組織」（含紅衛兵）都上北京，由周恩來主持協調，最後大都簽協議與停火，並且撤銷據點，解散戰鬥隊，無條件上繳武器；不繳械者，即由武裝部隊包圍，強迫繳械。至此，紅衛兵團體上北京，既然接受周的調解談判，則紅衛兵學生勢必已成爲被動，不再像以前咤叱風雲。其實，中共「中央文革」已要求學生回學校，「復課鬧革命」，但是，學生回到學校，不僅已逐漸失去「革命」熱情，也沒法子正常上課。原因是，學校內部不統一，學校師生仍然分成兩派，甚至有些學校，各派各上自己的課，學習情緒低落。同時，當時學校「領導」權威已喪失，學校没人管，學生大部分各自運動、游泳，或「找對象」（鬥戀愛）。

大陸學生點起「文革」之火，沖擊整個大陸社會，從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六八年八月，短短兩年之間，年輕學生經歷前所未有的校外社會經驗，在上述各項學生活動之中，除了「串連」，有較多學生參予之外，其他如抄家、點火大會、批判鬥爭會、印材料、武鬥等五種活動，參加的學生其實並不多，而且有愈來愈少的趨勢。大致而言，「文革」初期，搞批判、整人的紅衛兵學生表現積極者，大概只有全體師生員工五分之一不到，到了後來，不少學生認爲，既然「走資派」已被打倒，爲什麼還自己打自己？羣衆打羣衆呢？於是，大部分學生就各自辦自己的事，才有所謂的「逍遙派」。特別在紅衛兵學生派別開始武鬥時，學校没人管，會也不開了，大多數學生便都趁機返鄉休假，武鬥稍平靜之後，才又回學校。因此，據估計，真正加入武鬥的學生，大概只有各校學生總數十分之一不到。

雖然，「文革」進入第三個年頭（一九六九），學生涉入「文革」活動已經少之又少，學生



也不再是主要主角。同時，學校亦無法恢復正常上課，但是，中共「中央文革」進行的「文革」還未叫停，學生開始轉為被動，成了「文革」革命的對象，一九六八年底之後，學生成成了「被革命」的箭靶子；毛澤東召來工人、軍人、農民進駐學校，強制管訓昔日曾為「革命闖將」的學生。

## 學生遭遇

### 1. 「工宣隊」管理

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北京市「革委會」派「工宣隊」（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到「清華大學」。據聞，「清大」學生領袖蒯大富扔手榴彈、開槍阻止「工宣隊」人員。於是，當晚，毛澤東澈夜召見聶元梓（北大）、韓愛晶（北航）、譚厚蘭（北師大）、王大賓（地質學院），及蒯大富等五名大學生領袖。毛澤東要求學生立即停止武鬥，並決定派「工宣隊」，由工人階級領導學生。自此以後，學生不再是「革命闖將」，而被列為「再教育對象」。

在農村地區，由老農民組成「貧宣隊」派到各學校。開「憶苦思甜會」，聽老農講舊社會如何壞，新社會如何好。辦野菜飯，大家一起吃，體驗舊社會的飯菜之後，再吃饅頭、肉食。老農不識字，背不了講稿，只好根據自己的經驗講故事，出了不少笑話。

在城市，則由工宣隊、「解放軍」代表，及羣衆組織（學生或工人組織）頭頭進駐「革委會」，進行「清理階級隊伍」任務。這種「革委會」組織完全沒有法律、制度，嚴刑逼供，打擊



面最大，除學生之外，倍受折磨的教職員幹部等「黑幫分子」繼續遭殃。每一個「單位」都自己設「革委會」，查歷史問題，私設公堂，自己審查人，自己關心。審查對象全關在自己設的監牢，白天勞動，晚上審查，一關若干年不等。以工人為主力的「工宣隊」管訓活動，由一九六九年持續進行到一九七四年左右，也是「文化大革命」重要的一部分。

進駐學校接管學校行政的「工宣隊」，傳說由老弱病殘、沒技術、怕影響生產力的小工人組成，每一支「工宣隊」配有一、二名軍人。軍人訓練學生基本教練及軍事動作。雖然，有些單位或學校之「工宣隊」以「解放軍」代表擔任「革委會」主任，「工宣隊」骨幹其實為工人。由於工人怕自己也被整，因此「工宣隊」工人格外兇狠，徹底執行各項「教育」任務。

「五一六通知」之後，紅衛兵當中，城市大學校的大學生較兇，還想繼續「鬧革命」，妄想一夜之間立即建立共產社會。這批「極左」學生亂了套，恣意誤指校長、領導幹部、老師為「黑幫份子」任意揪鬥。另一批學生則較溫和，保護校長等這些人，主張以緩慢辦法鬧革命。於是兩派學生互鬥不止。最後，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中共當局才叫「老工人」出面協調，教育學生青年停止互鬥。因為，只有「工人」經歷新舊社會，知道「新社會」比舊社會好。

原則上，「工宣隊」不支派，但是要進行「教育」工作，終究免不了要利用一部分學生鬥另一批學生。有些學校之中，先前「革命」最力的「造反派」最倒霉，挨整得很慘，因為，「保黨委派」仍有朋友在「解放軍」，關照一下，便可逃過。其次，在學校之中，勢力弱的學生團體頂不住，較容易被「工宣隊」沖垮瓦解，這些弱勢學生團體的頭頭就被「工宣隊」抓起來，成了



「工宣隊」壓制的對象。有些學生則依附「工宣隊」爲「太上皇」，成爲「新革命分子」。

「工宣隊」進駐學校，其實在於接管紅衛兵奪得的權力。大多數學生早上起床後，必須早請示、晚彙報，拿「紅寶書」跳忠字舞，表忠心。上課時，由老工人「憶苦思甜」，講以前如何被資本家迫害。「工宣隊」也小心選教材，怕被拉下台。學生不分男女吃的都是「憶苦飯」；主要是米糠加野菜、麥麩做成。爲了讓「憶苦飯」吃起來更苦，又怕學生拉肚子，也加上治腸疾用的「黃蓮素」在飯裏面。另外，也常全校開大會，由工人上台演講「憶苦」，並鬥爭曠課、耍流氓、幹小偷的學生。

進駐學校之後，「工宣隊」便成立核心小組，主持開會，確定「革命對象」，被列案「壞學生」或「反革命份子」的學生，中共中央不表態，這就表示，「工宣隊」的批鬥自然成爲「政治立案」。據估計，當時在學生當中，波及面約在百分之十至廿之間。「工宣隊」批鬥教育這些學生的方法兇狠，遠比「文革」初期，紅衛兵整老師還狠。通常，「工宣隊」列管的學生叫做「灰幫人士」（不是「黑幫份子」），平常關在學校自己設的牢房，隨時拉出來批鬥（當時，若干領導幹部、校長、黨委、老師仍未解放，有時也一起被揪出來整）。「灰幫」學生必須按時上下課，進「監督改造室」，聽訓話，或「入另冊」，即隔離在一個角落，交待材料。

被「工宣隊」定案爲「反革命份子」的學生，一部分關在學校大牢之中，一部分關進校外一般監獄。監獄時間一至兩年不等。平常，在學校勞動，由「工宣隊」在旁監視，掃廁所，挖土坑（爲了備戰）等各種工作不一。開「鬥爭大會」時，便由大牢之中抓出來提審，頸子上掛大木牌



，一站好幾個小時，頸子酸，腿發軟。審問這些學生，誰是後台，要認罪，否則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後來，這批挨整的學生通常就分批遣送下鄉下田，監督勞動，在鄉村，由各地「解放軍」監視「勞動改造」。

在學校，「工宣隊」整學生，也整「修正派」幹部。「工宣隊」主持會議，找部分學生揭發其他學生幹過的壞事，定罪批鬥，被打腫臉者，天天都有，不足為奇。曾經表明支持劉少奇或懷疑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學生被揪鬥，對林彪罪狀持懷疑態度，或學校幹部出身不明者，全都在「工宣隊」「內查外調」（調查人際關係）之列。

「工宣隊」搞的政治恐怖比以前「文革工作組」更厲害。學生們大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直接指揮的壓制行動，同時，報紙輿論也指責知識份子和學生，踩在最低賤的位置，因此，這種恐怖氣氛，讓學生覺得人生沒什麼指望。不少學生受不了，就吃安眠藥或跳樓自殺。鄧樸方就是當時跳樓而造成殘廢。「北大」在「文革工作組」時只自殺一個女生，「武鬥」時死兩個人，「工宣隊」進校以後，教授、學生被逼自殺者不下數十人。

## 2. 「上山下鄉」

中共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大學停止招生，不辦大學，大約一百五十萬初、高中生紅衛兵沒大學上，只好「上山下鄉」。「成份」好的初、高中生就加入「解放軍」，「成份」不好的學生只有下鄉。挨過整的學生，和成份不好的學生一樣遣派工作的地點較荒涼，工作性質也較差，而與「工宣隊」關係好的人，佔去較好的工作。



學生「上山下鄉」，不是分配工作，大致由學生志願。初高中生沒大學讀，只好「上山下鄉」。學生只要願意到鄉村，上級就發給兩百元人民幣為安家費。學生「下鄉」地點，大都取決於個人是否在該地有親戚，或有沒有同學一起去。有些學生則與女友一起去，圖個照應。學生「下鄉」工作，生活條件極差，有些初、高中生不發工資，只分點口糧，大部分仍靠家庭接濟。挨整而「下放」到農村「勞改」的學生不發工資。志願下鄉的學生可以拿到工資。其工資大約為一個工分。一級勞動力為六至十個工分。學生屬於三級勞動力，與殘廢者同一級，每天工資三角人民幣。口糧一天一斤米，配上幾片鹹蘿蔔。

文革期間，初、高中生、大學生積極參與，分別有不同的遭遇。其中以初高中生紅衛兵無大學可上，教育中斷，境遇較慘。

「工宣隊」進駐學校整學生而言，初期氣氛恐怖，但大約到了一九七〇年四、五月，就陸續解放學生，只說「入另冊」的學生有過錯，但不戴帽子。這些被「工宣隊」批鬥的學生，其實大都是「文革」初期積極活躍的人，他們落入「工宣隊」，被解放，重獲政治生命，又不「政治立案」，當然只有感恩了。

紅衛兵「上山下鄉」的結果，部分大學程度的紅衛兵際遇較幸運。一九七九至八一年之間，中共當局重開「研究所」，大約錄取兩萬名研究生，其中有百分之十後來還送出國。這使得「文革」時期輟學的大學肄業生紅衛兵，有了深造讀書的機會。另外，中共當局也對大學沒畢業的紅衛兵採取搶救措施；包括改變頭銜、提高待遇與大學畢業生拉平，以及舉辦考試與訓練班等補救



辦法。事實而言，鄉村農民一般也比較歡迎大學程度、「下鄉」的紅衛兵，因為，他們會寫、會算、會分析。相對的，中學生紅衛兵比較不幸，他們人不了大學，又無專長，而且大都不願意留在農村。一九七五年以後，中共當局管制城市人口鬆，不少下鄉青年跑回城市，成了「黑戶」或「待業青年」，這些人以中學生紅衛兵較多。其實，部分「下鄉」青年若在農村表現得好，也可以抽籤回城市，由吃農民糧到吃工人糧。也有些下鄉青年係由「幹部」推荐回城市「自學」或成爲「待業青年」。

### 3. 「紅衛兵」思想起變化

其他不少曾經當過「紅小兵」的青年也是「文革」受害人。小學沒學到什麼東西，算術、寫字都不會，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麼都不懂。「紅小兵」小孩子天生有衝動，「文革」運動瘋狂混亂，「造反有理」一句話，就給小孩子發洩衝動的機會；「紅小兵」小孩子不再有人給他們約束。因此，在「文革」時，學生表現的大都是獸性。但是等到「文革」結束，「紅小兵」長大，身體變得高大，腦子卻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社會怎樣在運作；就好像打完仗回來一樣，「紅小兵」迷迷糊糊投入「文革」之後，完全與社會脫節，不知社會爲何物。「紅小兵」或其他小青年，「衝動」已放出去了，再回過頭要管住他們，那是不太可能；而且，小青年本身也很難適應。一名當過「紅衛兵」的老師感慨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在教這些曾經是「紅小兵」的青年時，更覺得這些「紅小兵」也比他好不了一分；身高體大，腦筋空白一片，又適應不好，那才真是活受罪。



另外不少「紅衛兵」青年，則開始冷靜下來，開始想問題。紅衛兵開始懷疑，武鬥停了，爲什麼要用解放軍管學校？軍人干政本是反常的現象，軍人不懂教育，爲什麼又長期管下去呢？「文革」初期批判黨政幹部是「修正主義」，後來，連學生紅衛兵也被批判成「修正主義」，到底紅衛兵的對錯由誰決定呢？是不是由上面的「政策」決定的呢？有些紅衛兵骨幹份子其實是受到毛澤東一些「民主」的語句所吸引，以爲，跟毛澤東的政策，就可以打倒官僚，人民的怨氣、恨氣都可以出，所以，跟毛澤東跟得最緊，結果跟下去之後，官僚卻越來越多，社會也越來越亂。

紅衛兵青年帶著這些疑問，一部分人就厭倦，逍遙去了。有一部分紅衛兵帶著這些問題入監獄，認爲自己大概「理論」沒搞懂，便開始讀毛澤東、列寧的著作，還作筆記，才瞭解，毛澤東原來根本就是專政，不自由，也不民主。不少的紅衛兵學生，自此才開始思考，覺得受騙極深，心有不甘，便想從「理論」及中共的制度之中尋找答案，想重新摸出一條新的理論出路，這就引發起七〇年代大陸青年爭人權、爭民主的風潮。

## 四、七〇年代大陸學運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中共當局開始對紅衛兵青年實施「落實政策」，搶救大學生。下放勞改、坐監牢的學生陸續回城。自此之後十年之間，大陸「文革」一代青年開始反省，討回公道，到



最後，甚至向中共當局挑戰、批判。這幾年之間，大陸學生運動零散發生，蔚成鉅大風潮者較少。以下係「文革」一代青年反思若干重大事件之梗概。

## 背景說明

### 1. 「李一哲大字報」活動

「李一哲大字報」活動範圍主要在廣州。由李正夫、陳一陽、王希哲四人合寫大字報，批評中共當局缺乏民主與法制。其中，王希哲曾經是「文革」時期「廣州兵團報」常委之一。在「李一哲大字報」貼出前後，除了大字報之外，廣州地區學生有部份跑去海南島照相、調查冤案，並在廣州市街頭演講，油印傳單，訴說同學遭受的冤案。演講會也穿插辯論，與反對的人士辯論。演講會場同時要求捐紙張及捐錢。期間曾沿著廣州中山五路貼海報，遊行至廣東「省委會」，要求當時任廣東「省委會」政委趙紫陽接見，要求為被「解放軍」逼死的同學平反。

「李一哲大字報」活動，最後，聽說由紀登奎、李先念出面表態，將「李一哲大字報」定性為「反革命」。三位主持人及其他若干人被逮捕，人大牢及勞改。當時，被逮捕的青年約一百多人，受牽連者上千人，分別在各工廠、單位接受批判。一名學生曾參加「李一哲大字報」遊行活動，被便衣公安人員拍了照片，後來申請出國時，老帳翻出來，百般刁難，只好走後門關說，免去刑責，獲准出國。

### 2. 七六年「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大抵是青年工人、學生發起，民衆呼應聚集的一項民衆示威行動。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導火線集中於周恩來病死未受到正常禮遇這件事上。當時，有三點跡象顯示，周恩來被貶；1. 周恩來病重期間及臨死之前，毛澤東從未去探病房；2. 據傳，周恩來死後，中共中央曾傳達「中央文件」指示，不宜辦追悼會；3. 當時，「文匯報」發表「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文，曾指出，要批判（中共）「黨內大儒」，大家心裏明白，這是在批判周恩來。

七六年四月四日，北京、上海、南京一些青年連繫相約，同時到「天安門廣場」擺上上千個花圈。當天晚上，北京市民好奇去看，青年工人與學生便演講，解釋上述周恩來被貶的一些跡象。隔天（四月五日），北京地區不少工廠，由整廠工人扛著大花圈。從郊外走到「天安門廣場」擺上，朗讀詩或有的舉行誓師儀式，花圈上別上詩句。這一天，北京地區差不多每個單位都派人送花圈，花圈上有對聯。一些不滿的人士便在對聯上寫字批評（中共）當局。詩特別多。送花圈的人是各「單位」的人，不只是學生或青年。「天安門」廣場上，有些青年演講、教唱歌，一羣一羣人聚集圍觀。一些民衆則帶來「小白花」，別在花圈上。另外，也有若干部省級幹部以上使用的三牌座位的紅旗轎車駛進廣場，擺花圈，然後離開。四月五日這一天，北大則未組織學生去天安門廣場，「北大」和平常沒兩樣，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根據後來的追憶，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之中，大陸民衆想要表達的是，反對再繼續混亂下去，並希望周恩來鄧小平上來。另外，老百姓對江青也有看法，認為她不過是個戲子，反倒懷念起楊開慧，於是有人藉著罵江青罵到毛澤東身上。可惜，七六年「天安門」活動很快就壓了下來。



去。四月五日這一天，傳言王洪文曾有一項「內部傳達」，希望北京市民不要到廣場。同時，北京「市委會」及公安部也派宣傳車廣播，勸民衆離開，其中有幾部宣傳車被翻倒燒掉。

四月五日白天，中共當局派北京地區（首都）工人民兵，集結在「中山公園」及「勞動人民文化宮」。當晚十二點過後不久，突然，廣場探照燈大亮，工人民兵分成兩隊手拿大木棍及柳條，驅趕追打廣場上留下來約數千名「守靈」的青年與民衆，死傷人數不詳，被逮捕人數也未曾公佈，有不少被抓的人立刻遭秘密槍決。「工人民兵隊」之中也有白天參加示威，晚上再被派來鎮壓，他們也不滿。一般而言，「工民兵」大都不是正經人，他們大都是工廠不要的人，晚上才被派出來巡邏。在鎮壓行動之中，工人民兵也有死傷，後來在「五一」勞動節被表揚爲英雄。

擺在天安門廣場的大小花圈，中共連夜用卡車運走，並動用高壓消防車洗清貼在紀念碑上的詩。隔天，民衆去歷史博物館問駐守的「解放軍」花圈的下落，又是一場打鬥。後來，毛澤東找來一個華國鋒，去除鄧小平一切職務，並發起一項批鄧反右傾翻案運動。「天安門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 3. 社會暨校園風氣

一九七六至七八年之間，在大陸社會，有部分人覺得，當時的政治氣氛，有可能寫點東西，表示點意見。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爲，當時情勢應該暫時由老幹部收拾，不要再來一次大動亂。當時，有一些人提意見，主張大幅度改變整個政治制度。對於這些政治主張的人，不少人懷疑他



們是投機份子；不相信提這些政治主張的人上台之後，會真正去實行。大多數民衆不太能接受奇特的政治主張，只想休息。

一九七八年之後，中共當局恢復招收研究生，歷年畢業的大學生一起考，錄取人數少，很難考取，但是大多數青年莫不擠破頭努力自學以應考，相對的，對政治不太起勁。分析當時大學生熱衷考研究所的情況，其主要的的原因是，有些青年考試不是爲了考試，而是爲了要「考戶口」。因爲，當時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在農村工作，戶口在農村，假如考上城市大學的研究院，不僅本人的戶口可遷來城市，而且老婆小孩也全可遷到城市，成爲城市人口。

七八年以後進大學的小青年，有不少很實際，只重專業，對政治不感興趣。一位曾在四川一所高等院校擔任「學習」小組的大學生表示，他們「學習」小組開會時，主要談課業學習，有時也難免談政治，但是，若有人不高興，便打住不談。他的同學當中，有人會把北京同學的來信提出來報告，但是，大體上，都要等到（中共）「中央文件」下來，事情發生很久了，大家才知道怎麼一回事。對於「文革」時期發生的冤錯假案，有些學生則認爲，他們相信歷史，歷史會判斷的，自己不必去爭，自然會有正直的人去爭、去抱怨。也有一些學生坦白表示，將來的專業最緊要，不好好讀怎麼行，寫一篇文章，「上面」不聽，說了也沒用，何必浪費時間呢？

七八年前後，在社會、或在校園，雖然大多數民衆及學生「人心思定」，不想再亂下去，一般覺得，應該好好「搞建設」。但是，在學校裏面，對政治有興趣的人仍然熱烈談政治，人數比例佔得也不大，却也引起一陣子潮流。這些能量大的青年或學生當中，有不少是「高幹子弟」。



這些「高幹子弟」父母，大多在「林彪事件」之後平反復職，連帶的「高幹子弟」又冒出頭，開始有影響力。由於「高幹子弟」比較瞭解「上面」的情況，可接觸到「中央文件」或「內幕」資料，加上自己的父母一起一落，本身又到過農村轉了一圈回來，感受深刻。另外，「高幹子弟」文化水平高，喜思考，見聞也多。而且，「高幹子弟」和「上面」關係好，朋友網用上的話，可以找到印刷廠印品質好的東西。基於這些主、客觀條件，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學運」高潮期間，「高幹子弟」起了一些帶頭作用。

## 學生活動方式

一九七八年前後，中共執政者權力競爭劇烈，身受「文革」苦楚的大陸青年暨學生，紛紛趁機以不同的活動方式，向中共當局提看法。主要活動大致包括調查活動、傷痕文學、西單民主牆，及民刊活動等。

### 1. 調查活動暨「傷痕文學」

曾經在「文革」中期，被強制下鄉「勞改」的大中學生，自覺承受不平的待遇，因此，在七六年獲准回城市之後，又覺得政治氣氛稍微放鬆，可以表達一些意見，便邀昔日好友同學，潛回鄉村勞改農場搜集資料並拍照，作為申冤用途。例如，廣州地區學生，曾組成調查隊秘密到海南島拍照調查，把照片與事蹟，透過「大字報」出示大眾。同時，把同樣一份材料，交由一位同學，派他送到北京國務院周恩來辦公室；未料，這位信差學生在韶關車站掉了書包，材料被人撿去



送「公安局」，結果被扣。此外，也有同學根據個別的經驗，貼大字報申冤，或寫成文章報導，成爲中共官方所謂的「傷痕文學」，風行一時。

大體而言，「傷痕文學」的作者大都是知識份子、高幹的後代，以中文系、歷史系、經濟系佔多數，他們筆桿子強，參加過「文革」，下放農村，又回學校補讀，閱歷多，寫出來便是一籬筐的故事。題材方面，中文系學生提的是小說，經濟系學生便寫經濟文章，不全是政治性文章。所謂的「傷痕文學」作品，有一些是「朦朧詩」，有些是小說、也有版畫，但大多數很抽象，看起來屬於「意識流」，不知道他們想表現什麼。另外部分作品就很具體，所描寫的「勞改」農場生產隊長，比「地主」還壞。

## 2. 「大字報」風潮暨「民刊」活動

七八年末，中共當局不理睬北平「西單」民主牆大字報，也不禁止學生在西單牆前討論國事，引發起大字報風潮。西單民主牆這幫人基本上不全是學生，不少是「待業青年」。各大城市的「大字報」，質量低，大都屬於個人申冤，申訴「下鄉」政策的不滿。也有的大字報進一步探討冤錯假案」之根源，加上「紅衛兵」學生四處之遊歷與觀察，覺得共產制度頗有問題，便提「制度」的問題。

有些學生經歷過「文革」，對政治已感厭倦，即使坐車子經過西單民主牆，也沒想到要去看一看。特別是中年人，經歷不少政治風暴，更不敢介入政治，怕遺禍好幾代人，大多懶得去瞧一瞧大字報。儘管如此，仍有不少學生及青年擠著看大字報，文科學生尤其熱衷。不僅只看，還抄



大字報要點，甚至有些青年學生就在大字報前辯起來。爾後，抄大字報的人多，又有些人在人堆後面，看不到大字報，也需要大字報內容，便有人把不同的大字報編在一起散發或賣錢，與當時的民辦刊物（簡稱「民刊」）一起出現，在青年學生之間流傳。

七六年底、七七年初，各地出現大字報，中共當局並不禁止，暗示氣氛較寬鬆，一些青年與學生便出「民刊」。開始時，有些學生還到中共「省委」書記報告備案，但「省委」不准，也未拒絕，算是公開。到了後來（一九七九年），中共中央禁止之後，若「民刊」還繼續散發，則算是秘密出版，稱為「地下刊物」。例如：當時「北大」中文系辦了一些刊物，後來禁了，就未再出版。

「民刊」印製方法大都很簡陋。以「人民之聲」、「未來」兩種「民刊」為例，兩者係七八年底、七九年初，廣州最重要的「民刊」。主編之一是中學老師，假名印講義，向學校要到蠟紙。另一名主編是華南師院學生會主席，管宣傳，所以紙張不缺。「人民之聲」這份「民刊」就刻鋼板印製，出了五、六期。

另一份民刊——「未來」，也用刻鋼板方式印。通常，同學們在晚上到一個人家裏碰面，關起門，帶上窗子，然後在床板上架印刷機印，一次印一千份左右，印到蠟紙稀爛為止。牀板盡是油墨，家長有抱怨。「未來」印了四期，第五期難產，後來，廣東省委習仲召見主編，勒令停刊。

七八至七九年間，大陸流行的「民刊」與「文革」時期「紅衛兵」不盡相同。大體上，搞



「民刊」的人也大都幹過紅衛兵，是同一批積極份子，但是，事隔十年，昔日紅衛兵學生經過十年的考察及親身經驗，思想觀念已經不一樣。當初作紅衛兵、辦「紅衛兵報」的時候，青年學生忠於領袖，相信共產主義理想，希望共產主義純化、實現，近似一種清教徒的行爲。相反的，十多年之後，昔日的紅衛兵再辦民刊，已經不再把共產主義看作「烏托邦」理想，也不再相信共產黨絕對正確。「民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要求，走另一個方向。「民刊」要求，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多元化，社會上不應該只有一個聲音。其次，民刊和「紅衛兵報」不同的地方是，「民刊」係社會上極少數人辦的，不是普遍活動，因此被視爲標新立異，後來被禁之後，則被歸納爲「不同意見」之類別。相反的，「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報」在當時則爲普遍活動，安全、且被看作是光榮保險的事情。

對於七〇年代末期「民刊」盛極一時的現象，當時流傳著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爲，中共當局不禁「民刊」，是在搞「陽謀」老套，目的在於，「引蛇出洞」，再一棒子打死；另一種講法則認爲，中共上層有一批人想藉著「大民主」、「大字報」鬥倒華國鋒及汪東興。持後面一種看法的人握有一些證據。例如：當時著名的學生領袖王軍濤，曾經和當時中共「共青團」書記胡耀邦會面。另外，上海民刊主辦學生曾透露，中共中央團書記曾派人面報，表示支持。後來，中共中央「共青團」雖否認此事，可是，「民刊」負責人大都有警覺，也有管道證明這些來自「中央」的人的身份，因此，屬於中共「共青團」大致不假。儘管中共中央或有人在當初，想利用學生鼓動風潮以奪權，因此不禁止青年學生「民刊」活動，但是，一旦中共領導人達到目的，學生



「認識」與「行動」也偏離，則中共當局便開始反過來壓制學生。七〇年代末期的大陸學生運動，在中共當局一聲令下，立刻又歸於沈寂。

## 五、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

### 前言

一九八五年，中國大陸學生騷動接踵發生。這一年當中，學生騷動事件的報導超過十二起。比起同一年南韓、印度、希臘及美國大學生，大陸學生在政治上最爲積極<sup>⑫</sup>。事實而言，大陸大學生係中國社會最有教育的階層，他們對於一九七八年中共開始推動的大規模「經濟改革」措施勢必有所反應，特別是對於急遽的社會文化變遷得失亦會有看法。茲將八五年大陸學運概略記述於后，藉以探討新的一代大陸大學生接受正常高等教育之後，其看法或不滿行動是否有異於上幾代大學生？他們支持中共新政權的態度又爲何？

### 學運背景

一九八五年，大陸大學生首先抱怨校園生活設施簡陋，進而歸咎「經濟改革」措施成效不彰，無助於校園問題之解決。及至九月，中共當局開全國黨代表特別會議，激烈爭辯「經濟改革」



路線，大學生藉機表達對內政問題的不滿。同時，由於日本政府官員公開弔祭二次世界大戰侵華日軍將士，大陸學生民族情勢激盪，甚至有若干大學生有「反日」的具體表現。大體而言，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分別在年初、歲末掀高潮。

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翌年元月，北平地區數所大學發生學生抗議行動。八四年十二月中旬，「北大」有數百名學生手持火把，晚上遊行至校長公館，抗議學校食堂伙食太差、宿舍設備破舊、教學不良、教育改革緩慢。同時，他們也不滿宿舍晚間十一點熄燈的規定<sup>⑬</sup>。一九八五年元月中，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在該校食堂及緊臨建築物貼出五十多張「大字報」要求學校當局，按照長久的慣例在學校放假時，每月仍補貼每名學生人民幣十八元（約美金六元四角）<sup>⑭</sup>。「法政大學」全校約有百分之八十學生絕食，抗議惡劣的伙食與教學<sup>⑮</sup>。中央音樂學院學生也羣集抗議惡劣的伙食<sup>⑯</sup>。大學生張貼大字報攻擊批評學校當局。不滿的事情包括保守的教學法、獎學金過低、圖書館嚴重缺書及校舍等<sup>⑰</sup>。有些學生抗議上述這些校園問題之餘，進一步抱怨政府的補助趕不上食物漲價速度<sup>⑱</sup>。於是，大學生批評校園問題，擴大轉變矛頭，學生開始批判大陸整個經濟問題；校園問題的抗議，瀰漫擴大成向中共「經濟改革」質疑！

爲了平息大學生對校園問題的憤怒，中共主管教育的「教委會」主任何東昌，在一項高等院校校長暨主管會議上，要求各個高等院校要提供好的食堂，並且須定期檢查。在「教育改革」方面，何東昌則認爲，「教育改革」應包括減少必修課，提高教學素質，讓學生自習時間多一點<sup>⑲</sup>。何東昌這些談話，係中共當局對學生騷動不滿的唯一官方反應。自此之後，北平地區學生趨



於平靜。但是，一九八五年二月，遠在大陸西南方雲南省昆明農學院掀起一項暴力示威運動，抗議惡劣伙食及學校當局對言論自由的限制。由於學校當局絲毫不予理會，若干學生甚至燒燬三部校車，破壞學校設施。學校當局迫不得已，便召來昆明市公安警察，逮捕四十多名學生<sup>⑳</sup>。旋即，校園復歸平靜。

## 學運始末

一九八五年九月，大陸學運復燃。引發這次學運導火線可能與兩件事有關。七、八月間，中共方面大舉慶祝戰爭勝利四十週年<sup>㉑</sup>。但在日本方面，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則首度率員，到東京近郊「靖國社」（Yasukuni Shrine），向供奉在該處的兩百四十萬日軍陣亡將士（包括十四名一級戰犯）致祭<sup>㉒</sup>。就像猶裔美國人抗議雷根總統赴西德畢特堡（Bitburg）悼祭德軍陣亡將士一樣<sup>㉓</sup>。中國大陸學生，對日本首相這項政治行動亦深表不滿，逐漸在大陸大學生之間，蘊釀成反日情緒。此外，導致大陸學生不滿情緒的另一項事件則是，一九八五年九月中旬在中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領導人之間激烈的政策爭論。這亦吸引大陸學生對時政提出觀點<sup>㉔</sup>。

日本首相祭拜戰犯一事，發生於七、八月間，正值學生放暑假，留在校園的學生不多，加上又無適當時機，因此，大陸學生沒有立即的反應。及至九月十二日，「北大」若干學生才張貼大字報，要求中共當局將九月十八日訂為「國恥日」，藉以紀念四十多年前當天被日軍屠殺的數百



萬中國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擊瀋陽，屠殺無數中國人。

「北大」學生貼出這項大字報之後，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亦羣起響應，分別在校園張貼相同要求的大字報。同時，部分「北大」積極學生亦呼籲，在九月十八日這一天，到天安門廣場參加反日大示威。為疏解學生反日情緒，預防學生運動蔓延，北京公安警察授命進駐大學校園監控。九月十二日以後，進出北大校園須經由公安警察檢查核准才放行<sup>②5</sup>。儘管如此，九月十八日當天，仍有大批「北大」學生設法溜出校園，和其他大學的學生集合，前往「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數百名學生手持「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中曾根下台」、「抵制日貨」等標語遊行<sup>②6</sup>。示威學生當中，有學生當街演講，責罵中共官員「賣國求榮」，才會因此導致日貨傾銷，及日本的經濟侵略<sup>②7</sup>。有些學生則批評中共官員趁「經濟改革」良機貪污<sup>②8</sup>。這項示威持續數小時，警察站在一旁監視，未予陣壓。無傷亡報導。但是，根據日本新聞通訊社報導，事後約有上百名學生被捕<sup>②9</sup>。「北大」黨書記古平，後來在香港接受大公報訪問時，則否認有學生被逮捕。古平聲稱，參加校外遊行，或在校內張貼大字報的學生，沒有人被捕<sup>③0</sup>。

為平息學運，「北大」學校當局撕毀所有「反日」大字報，但是，憤怒的學生又連夜重新貼出大字報。九一八學運事件一直要到廿八日才平靜下來。九月廿八日，李鵬、胡啓立到「北大」和學生對談。在這項座談中，時任中共同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李鵬，聲稱，中共的外交政策並非一成不變，而有若干彈性運用的空間。此外，李鵬也承認，黨幹部之中，確實有少數人在與日本人生意往來之間拿回扣，有「不正之風」的現象。但是李鵬認為，「不正之風」本身並不意謂著，



「經濟改革」政策方針走錯方向。在政治方面，有學生提出「自由」的要求，李鵬則斷然否定；李鵬明白地指出，任何形式的民主與自由必須在憲法及法律範圍之內<sup>③①</sup>。旋即，北平地區大學生抗議活動暫告平靜。然而，在中共偽國慶（十月一日）前後，西安、成都及武漢地區大學生却聞風響應北平地區學運，也發起反日示威。

十月一日深夜，陝西省西安地區大學生數千人，舉著愛國、反日標語，沿西安市大街和平示威。途中，公安警察勸學生回學校，但是沒有學生中途離隊。遊行示威持續到隔天下午。十月二日這一天下午，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找來前中共駐日本大使符浩，由這位陝西人向示威學生講話。符浩一方面表示，很瞭解學生的愛國情操，但亦強調，中共與日本友誼重要；符浩認為，所謂日本向中國進行經濟侵略，其實是個「誤解」，希望學生理解<sup>③②</sup>。西安學生示威活動沒有傷亡。西安與稍早前北平學生反日示威，並未使中共、日本經濟交往中斷或停頓<sup>③③</sup>。就像北平、西安學生選擇適當時機從事愛國示威一樣，四川省成都地區的大學生，則選定十月十五日進行反日示威。十月十五日正好是美國副總統布希（George Bush）到成都主持美國領事館設立的前一天。此外，布希副總統也將於十六日到四川大學演講。十五日當天，先是數百名學生遊行經過成都地區若干學校，吸引數千名學生齊集市中心「人民廣場」。有些學生砸毀日本製收音機及錄音機，搗爛日產Toyota計程車，並將附近一家旅館旁的日製摩托車砸壞<sup>③④</sup>。四川省當局迅速採取行動弭平學生示威。不少示威學生被逮捕，拘留短暫時間釋回，其中有六名被送往勞改營。可是，中共新聞報導否認，該六名青年之中有學生包括在內<sup>③⑤</sup>。成都地區學生示威遊行驅散後，大陸



其他地區學生生活動再度暫告平息。但是，這仍不表示，大陸學生再無怨言或批評。

接著發生的一樁學生羣集活動的事件，說明了大陸大學生擅長揀選恰當的時機抒發不滿。這一次聚集活動發生於十一月廿日。這一天不是慶典，也不具特殊政治意義，只因為廿日當天，大陸女子排球隊勝過日本隊。藉著這樣一個時機，數百名大學生集合前往「天安門」廣場靜坐，以示慶祝。在公安警察監視之下，和平靜坐慶祝活動持續約半天，最後遭警察驅散，無意外發生<sup>③⑥</sup>。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大陸學生試圖在十二月九日發動學運，可惜功敗垂成。就中共當局而言，每年十二月九日（簡稱「一二·九」）係青年愛國精神的象徵。中共每年都在這一天大肆慶祝。其理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地區大學生曾經發起一項運動，抗議日本人在華北成立傀儡偽政權，並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外交政策公開，恢復公民自由權利。中共一向自詡肯定，認為該項學運係由中共領導發動<sup>③⑦</sup>。基於此，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前夕，北平地區部分大學生即策畫，在「一二·九」學運五十週年紀念日這一天，發動大陸各大學共同展開活動。少數的這些大學生提出「反官僚主義」、「反不正之風」、「反對賣國求榮」等口號，呼籲大學生在十二月九日一起行動<sup>③⑧</sup>。然而，由於中共當局在九日前後，採取若干措施，因此，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當天並無大規模學運發生。

中共當局大致採取以下密集的措施，化解大學生不滿的情緒。首先，在輿論宣傳方面，中共公佈毛澤東一九三九年評述「一二九事件」的演講詞；這篇演講旨在強調：知識份子倘若和「八



路軍」、游擊隊合作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事；並且暗示，在「一二九事件」此一歷史性重大運動中，共產黨起著「骨幹」功能<sup>39</sup>。同時，中共官方透過「共青團」在各校園的組織，由「共青團」員帶頭發起各項活動，諸如演講比賽、「交心談話」、歌唱競賽、報告會等，分別在大學集中的城市包括北平、武漢、上海、南京、瀋陽、西安舉行，以慶祝「一二九」學運屆滿五十週年<sup>40</sup>。其次，中共當局亦明令禁止學生持火把到日本大使館前遊行<sup>41</sup>，亦不准學生個別前往天安門廣場<sup>42</sup>。另外，中共各級黨政官員，也在「一二九」前夕，分赴各校說明「黨」的政策，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sup>43</sup>。學校方面，則由校方出面與地方當局討論改善食堂伙食、保證宿舍暖氣供煤及改善通學生交通等問題<sup>44</sup>。中共當局另一項措施則是，把工人與學生隔離，以便萬一學潮發生時，防止工人介入而助長學生運動聲勢。「工人日報」曾著文，要求所有工人堅決與所有危害穩定團結的現象鬥爭到底<sup>45</sup>。言外之意係指，工人應與學生運動保持距離。

由於中共當局採取以上措施，直到一九八五年底，大陸學生未再發起運動批評中共當局政策或反日。但是，部分少數民族大學生則以地方問題為訴求，上街請願。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廿三日，數百名就讀於「中央民族學院」的新疆維吾爾學生，遊行北平街頭，要求中共當局停止再在新疆地區進行核子試爆<sup>46</sup>。惟此項示威未再擴大，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至此暫告止息。

## 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之政治涵義

由以上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發展實況來看，八〇年代大學生較關注本身的福利，要求中共當



局改進教育措施，而他們間或表現出來的「反日」情緒，並非八五年大陸學生思潮主流，很可能只是學生用來掩護學運的藉口。

大抵而言，一九八五年這一年當中，大陸大學生較關心學校事務，要求中共當局予以改善。同時，部分同學則借題發揮，由「教育改革」不力，進一步批評中共當局「經濟改革」措施不當。這是八五年大陸大學生關心的主題。事實上，新一代大陸大學生心思已改變，不再以政治為注意焦點，而較著重於個人切身問題。一項針對北平、天津、瀋陽、大連等地十七所大學一七六二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五十六點零五受訪學生（九七四人）表示，最迫切需要「提高專業水平」<sup>④7</sup>。由此推斷，八五年大陸大學生藉機示威請願，要求改善學校教育設施，其來有自。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八〇年代大陸大學生雖然成長於中共當局改革經濟大環境之中，但是，八〇年代大學生似仍不滿中共當局。前引之抽樣調查資料中，當大學生被詢及，何者是優先要辦的「政治任務」時，百分之卅二·五受訪學生認為，「矯正（中共）黨的作風」應為最優先；另有百分之廿點三的受訪學生則表示，中共當局應加速「改革體制」，只有百分之六點二的學生主張，「實施民主與法制」為最優先「政治任務」<sup>④8</sup>。此項調查結果不必然顯示，八五年前後的大陸大學生不再追求「民主」，但是，該調查結果似已指出，一九八五年這一代大學生對中共黨政官員之工作態度普遍不滿意。

另一項關於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的政治性說法指出，這一年大陸學運與華國鋒反撲有關。此一講法認為，八五年大陸學運係由被罷黜的華國鋒背後策動所致。理由是，八五年學運當中，部



分學生對於中共日本之間經貿交往內幕細節瞭若指掌<sup>④9</sup>，這些學生可能是北平地區中共高幹子弟<sup>⑤0</sup>，是故，有人判斷，八五年學運似與中共高階層人士權力鬥爭有關。事實而言，上述證據似仍薄弱，不足以確定與中共領導階層權力角逐有關。而且，在八五年整個學運進展之中，反日情緒只偶而出現，瞬間即行消失。是故，所謂中共高幹藉抖露對日不公平經濟來往內幕以攻擊執政人士的說法，有待斟酌。

整體來看，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的型態，或可引用「匿名利益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作詮釋。「匿名利益團體」指的是，「未經組織的羣衆與騷動，不約而同地聚集響應，同時表達憤怒或抗議；瞬間發生，倏爾平息」<sup>⑤1</sup>。八五年這一代大陸大學生，已不是「文革」紅衛兵，不具備紅衛兵好鬥特徵。相對的，八五年一代大陸大學生，仍不理會中共黨政官員之「交心」說服，羣起走上街頭，為本身利益表達不滿。一九八五年大陸學運，大抵是，大學生同感到，其本身利益及願望無法滿足，從而一呼四應，不約而同走上街頭或在校園表達不滿，倏起倏滅；不僅整個學運毫無「組織」特徵，而且活動時間短而不連續。同時，大陸大學生也未曾要求，由學生自己管理校務，更未直接向中共當局爭取政治權力。是故，八五年大陸學運近似羣衆騷動，只局部反映出大陸政治與社會的病態，其對中共政治變遷的影響有限。

## 六三二式八五學運大剷學運



## 六、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

由於蘇聯領袖戈巴契夫（Gorbachev）訪問北京一事，吸引大量外國記者齊集北京，意外地得以將八九年四、五月間如火如荼進行的學運向大陸外的地區報導。目睹大陸學生在中共權力核心所在地——「天安門」前的政治活動，一幕幕進行目不暇給，或有時還令人百思不解。其實，八九年大陸學潮似仍與歷年來大陸學運雷同，其訴求的範圍、活動的方法，及中共的處置方式都有一定型態可尋。但是，八九年這次學運當中，大陸知識份子暨大學生聲氣相求，其一致朝向中共當局抗爭的激烈程度，以及最後中共武力鎮壓之極端反應，皆為中共統治大陸以來所僅見。基於此，本文擬以八九年學潮期間，大陸知識份子積極介入的特殊現象為重點，推尋彼等政治態度漸趨積極的原因，以便對八九年學運來龍去脈求得理解。另外，本文亦擬選擇八九年大陸學運特殊的事實略作詮釋，並列舉部分較具政治意義的影響作一說明，藉此或可對八九年大陸學運可能的歷史意義作出評斷。

### 緣起

#### 中共改變對待知識份子的措施

一九七八年之後，中共基於經濟改革政策，需要知識份子的能力與知識，因此，中共當局放



鬆對知識份子的控制，而這一代大陸知識份子亦比前人有稍好的工作環境，有較多的機會自由地思考與活動。這是近年來大陸知識份子思想活動活躍的主因之一。

爲了恢復經濟景氣，亦爲了爭取政治支持，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重新執政之後，放棄了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嚴厲控制甚至侮辱的作法，改而採用懷柔的措施統治知識份子。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期間，中共當局賦與大陸知識份子最卑微的社會地位，並以「臭老九」這個順口，容易傳播，具有輕視意義的俗語稱呼知識份子。事實上，在「文革」期間，大陸知識份子係生活在一個非常不安全的社會氣氛當中；知識份子本人及其子女成爲衆人批判的對象，是各項政治運動的目標，若遭傷害或謀殺，司法機構很少追究。直到一九七七年，鄧小平開始設法扭轉民衆對知識份子的鄙視態度；鄧小平公開指出，科學與技術是生產過程的一環，所以，知識份子係「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時，他也呼籲，要尊重科學、技術與知識<sup>⑤2</sup>。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亦一再解釋鄧小平對知識份子的觀點<sup>⑤3</sup>。除了營造有利於知識份子的社會氣氛之外，鄧小平遙控的中共政權亦從一九八〇年代初開始，不斷地要求各級黨幹部爲所管轄的知識份子平反「文革」遭受的冤屈，協助發還「文革」被沒收的財務，調配適合知識份子專長的工作，解決知識份子住屋問題、夫妻異地工作，及年輕知識份子娛樂等問題。

這些改善知識份子福利的措施，其實並非鄧小平的創見；這些措施早由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提議，但被擱置二十多年未曾實施<sup>⑤4</sup>。鄧小平恩待大陸知識份子的行動，並不表示他已信任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他的目的主要有二：一、將知識份子重新整合於大陸的社會力（Social



Forces) 當中，發揮知識力量，以改善大陸生產能力；二、爭取知識份子的政治支持，厚植鄧小平本人的權力資源；並鼓勵知識份子入黨，藉以提高共產黨本身的素質<sup>55</sup>。

以上中共採取的這些善待知識份子的辦法，主要起因於共產黨本身的政治考慮與經濟目標，老一代的知識份子並未完全釋懷；社會學者費孝通認為，中共當局尚未完全解決壓制人類思想的左傾作法<sup>56</sup>。但是，新一代的大陸知識份子可以說是，已生活在一個較正常的社會氣氛(Social Climate)，擁有社會民衆些許程度的尊重。這種社會氣氛有助於恢復中國知識份子為社會請命的傳統批判精神。一九七八年以來，大陸知識份子勇於批評中共政權的措施，並熱烈地反省中國社會的過去與未來，肇因於此。

#### 大陸知識界瀰漫自由思潮

一九七八年，傾鄧小平的中共理論界人士散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準」這樣一個「迷思」(Myth)<sup>57</sup>，批判當時執政者——華國鋒所謂的「兩個凡是」論<sup>58</sup>。「實踐檢驗真理」論的爭議起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持續七個多月，最後，鄧小平公開演講肯定說，這項討論「意義很大」，「越看越重要」；並主張，全「黨」上下「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sup>59</sup>。狹義而言，鄧小平暨其附從者此舉旨在，從華國鋒手中奪取「官方意識形態」之詮釋權，應是鄧小平同夥爭奪華國鋒執政權的第一步驟；但是，廣泛地講，此項「真理標準」問題的提出，則意外地對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性、永恆性，及其不可懷疑性質造成傷害，事實不僅如此，鄧小平還進一步鼓勵中共理論界人士針對「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



問題，找出具有一「指導」功能的答案<sup>60</sup>。另外，在文藝方面，鄧小平亦主張，文藝作家們在遵守「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原則下，其題材的選擇和表達方法，要「敢於創新」，避免單調刻板。同時，鄧小平認為，中共黨政幹部不宜再對文藝界人士的工作「橫加干涉」<sup>61</sup>。就鄧小平一夥人的政治利益而言，鄧氏「開放思想」的主張係用來，攻訐「四人幫」政權之精神桎梏及華國鋒政權的僵化政策，藉以重新塑造鄧小平本人的「合法統治權威」(Legitimacy)<sup>62</sup>。但是，對大陸知識份子來講，鄧小平等人的政治運用則意謂著，政治對思想的控制萎縮，亦就是說，大陸知識份子有較大的自由空間探索知識，思考問題。而且，中共統治當局也以較寬廣的尺度容忍知識產品。未幾，鄧小平復出，登臨正式的政治職位。這項政治變遷更進一步激勵這一代大陸知識份子「思想自由」的動機。自此之後，大陸知識界進一步勇往直前，互相砥礪，蘊釀成一波波壯闊的新思潮。

一九七八至八〇年間，中共當局陸續恢復閒置已久的理論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並舉辦若干次全國性質的研討會。這些研究機構與研討會主要目標在於，經過討論、研究，與出版，重新呈現「馬克斯主義」(Marxism)完整的資料，以便理論界人士能從「馬克斯主義」找出解說「現代化建設」的理論依據。在中共官方這種企圖與特許之下，大陸理論界人士的確對「馬克斯主義」的思想與歷史資料等加速度研討與出版<sup>63</sup>。但是，於此同時，與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目標不符的理論與思潮，也陸續出現，引起中共以「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為名一一反駁與壓制。這些可能危及中共合法統治權威的思潮，主要包括王若水、周揚提出的現實政



治、經濟、思想諸多偏離「馬克斯主義」原始理想的「異化」現象<sup>64</sup>，以及小說家白樺、葉文福等宣講「人性」的作品。

一九八〇代初期，中共展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其範圍雖只限於黨內，且其方法不採用「文革」時期流行的「羣衆運動」<sup>65</sup>，但是，這項中共官方發動的批評運動已再度壓抑大陸知識份子暨其作品；至少已使得跟隨，認同中共多年的中老年知識份子意興闌珊，不再願意爲中共理論的需要認真工作<sup>66</sup>。中共當局轉而要求中青年知識份子探索理論，並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指示哲學與「理論」研究方法改進之方向，引起大陸各省市理論工作者與社會科學研究人士之討論與反省<sup>67</sup>。自此之後數年間，新一代知識份子，如李洪林，嚴家其、于光遠、蘇紹智、于浩成、劉再復，及宋龍祥（筆名「馬丁」）等人陸續有機會在中共言論論壇發表意見，締造另一次百家爭鳴，自由的思潮。

中共「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壓制對象不多，範圍有限，持續時間亦短，著名知識份子當中，如「全國文聯」主席周揚，文藝界的徐遲、張笑天、徐敬亞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自己，「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副總編輯王若水亦遭牽連被撤職<sup>68</sup>。不久，因爲中共企圖繼續推動經濟改革，也可能因爲中共不願打擊外國商人的信心，因此，從一九八四年中開始，中共當局再度公開鼓勵知識界自由創造，和探討。一九八四年六月，中共官方雜誌——「紅旗」具名評論員的文章指出，大陸目前有些問題無法在馬克斯主義書本上找到答案，因此必須解放，轉變思想，才能談得上改革<sup>69</sup>。半年之後，中共「人民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又再度重申，馬列著作不能解決大陸當前



問題的觀點<sup>⑦〇</sup>。中共官方媒體這些觀點暗示出，中共傾向改革的領導人急於尋求合於經濟改革措施的思想根據，藉能責成各級黨政幹部切實執行各項改革措施。可惜，中共改革派人士找尋理論的渴望再度遭抑壓；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決定，推行一項「學習馬克斯主義」運動，旨在於促使黨政幹部瞭解，中共「現代化建設」並未偏離馬克斯學說，將來更不應脫離。同時，亦希望大家體會馬列著作與現實問題的差距，由此類差距的認識參酌「中國」社會的經驗，創造新理論，藉以「豐富」馬克斯主義<sup>⑦①</sup>。中共當局這項正式決定，無疑地，又一次封殺「改革派」人士上述稍微放鬆思想、言論控制之主張<sup>⑦②</sup>。

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一直未曾拋棄馬列主義暨毛澤東思想，且仍主張社會主義價值與目標；政治上，鄧氏則堅持列寧式政黨統治型態；於此同時，在經濟方面，爲了提高生產效率，鄧小平却亦主張，縮小「黨」「政」干預經濟活動的範圍，並允許片面，暫時採行利潤至上的資本主義經濟措施<sup>⑦③</sup>。

鄧小平所持的政策目標之中，其意識型態、政治兩方面的目標，與其經濟改革目的彼此抵觸衝突，容易顧此失彼，很難兼顧推行。若勉強區分的話，或許可以說「改革派」以經濟改革標的爲優先，對政治、意識形態較寬容，甚至主張調整以配合經濟改革目標之達成。相反地，「保守派」人士較重視政權性質，及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之純正，因此，爲了政治與意識形態考慮，「保守派」人士不惜放慢或擱置經濟改革措施。鄧小平大部分的講話大都兼顧「改革派」、「保守派」兩派人士的觀點，討好雙方，爭取支持，鞏固其領導權。鄧小平這種政策目標及其統御技巧



雖然可有效的維持政治穩定，但是，鄧小平政策目標左右兼而有之，旨意不明確，則替鄧氏執行政策的部屬便較難拿捏分寸，恰到好處，這是中共在兩年半之內接連撤換兩名「總書記」原因之一。

按胡耀邦體會鄧小平旨意的結果，胡耀邦努力擬加速推動經濟改革措施，因此，胡某進一步從一九八六年開始放鬆對思想界的控制，並重提調整政權性質之必要。亦因此，大陸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又有機會抒發其嚮往自由的理念

大陸老幾代知識份子自由思潮遭到「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沖擊，沉寂約五年，至一九八六年，大陸知識界又一次掀起空前的自由思潮，間接帶動大陸知識界暨大學校園熱絡的批評活力。

### 「政治體制改革」爭論

和以往一樣，一九八六年在大陸所以掀起「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主要仍是中共最高階層人士先提出。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鄧小平公開指出，「黨」內貪污的現象是政治體制造成的後果，若不改革政治體制，黨內「不正之風」便無法根除<sup>⑦④</sup>。七月底，鄧小平又一次主張「黨」與「政」應該分開，黨不要干預太多。改革能不能成功全看「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sup>⑦⑤</sup>。針對鄧小平這項講話，中共領導階層人士反應不一樣。一部分人持謹慎保留態度，另一些人則積極響應。

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在「中央黨校」的一項座談會上表示，希望理論工作者採用馬克斯列寧的立場、觀點，及方法調查研究，以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科學體系<sup>⑦⑥</sup>。此外，當時



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則明白表示，改革政治體系絕不能否定社會主義體制。姚依林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就像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之下，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去做<sup>⑦⑦</sup>。朱厚澤與姚依林的反應不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只是他們兩人的反應較謹慎。或許在中共官場上必須謹言慎行，才是保險的為官之道。

相反的，萬里、胡耀邦、王兆國則積極地提出不同的措施，響應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之一的萬里主張，黨與政府要改進決策過程，革命老幹部及新進幹部都應該學習新科技與管理方面的知識。各級幹部作決策時，應諮詢專家和有實務經驗的人，這是改革政治體制重要的一部分<sup>⑦⑧</sup>。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則在許多場合表示，「黨」與「政」權力過於集中<sup>⑦⑨</sup>。胡耀邦甚至更進一步要求所有黨員，重讀鄧小平一九八〇年發表的一篇演講：「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sup>⑧⑩</sup>。胡耀邦對鄧小平講話所作的這種反應，其實並無可非議。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王兆國則具體直陳，鄧小平八〇年這篇演講談的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於是，王兆國以之為基礎，提出六點完善政治體系的措施：權力下放制度化，加強法制工作以有效保證公民權，發展各級「人代會」在全國政治生活的角色，黨政分工，改革幹部制度以使中青年幹部擔任領導<sup>⑧①</sup>，及使用羣衆路線與選舉任用或升遷幹部等<sup>⑧②</sup>。王兆國的意見實與鄧小平觀點相差無幾，而且王氏的議論應可能已獲得胡耀邦的默許。換句話說，由上述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言論來看，一九八六年中期，中共當局似以「政治體制改革」為優先政策目標，亦因此，大陸知識界羣起發表「政治改革體制」相關的意見，應不足為怪。



上述中共領導人提出改革政治體制的構想旨在，使黨不再因循「文革」「政治掛帥」原則而肩負決定，及執行政策的責任；亦就是說，讓「黨」只負責決策，政策執行權歸還政府機構（The State）。這樣的「黨」「政」重新分工之下，「黨」的負擔減輕，黨部機構便可恢復黨的活動（「黨生活」），同時，黨組織亦可進行監督政府機構執行政策的功能，提高政府效率及效能，並防止腐化。中共領導人係由本身立場出發，為改善本身領導功能設想，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見。但是，相反地，大陸知識份子則由民衆的立場，以增進民衆政治權力為出發點，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

大陸知識份子倡議，人民個人應賦與個人自由；人民有權討論政治問題，批評政府而不受壓制。同時，大陸知識界亦主張，採用「一般的（資本主義體系）選舉體系、牽制與平衡體系、及民主，以實現民衆的利益」。另外，在「言論自由」方面，大陸新聞工作人士亦相偕提議，記者應擁有政治權利，不應因所撰寫的文稿而受傷害。新聞和批評應准予自由出版。人民亦可辦報，以造成多層次報業結構<sup>83</sup>。大陸知識份子這些議論似源自西方國家「自由民主」理論與「個人主義」觀念，而與上述中共部分領導人「政治體制改革」理念似屬南轅北轍。

除了政治體制改革意見之外，大陸知識界人士亦趁機重提「學術自由」的主張。例如：著名的大陸學者千家駒、羅大岡不約而同地指出，政治權力不應壓制或壟斷人類思想，政治權力亦不能限制人民討論公共政策<sup>84</sup>。

以上中共部分領導人士提出的改進政治分工意見，以及大陸知識界鼓吹的自由民主觀念，大



都僅具雛形，未改中共政權性質，但是，中共當局在八五年九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六中全會決定之中，却將這些討論近一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意見全部封殺，甚至連「政治體制」字眼亦未出現在全會「決議」之中<sup>85</sup>。儘管如此，這些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無疑地已進一步鼓舞大學校自由風氣，不僅醞釀成一九八六年底大陸學運，亦間接導致一九八九年學運知識份子與學生相結合的趨勢。

#### 大學生思潮暨一九八六年學運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大陸大學生習慣於較好的物質環境，及較少的政治約束，同時這段時期亦無強制要求人人參與的政治運動，是故，八〇年代末期的大陸大學生思想態度，與「文革」一代大學生比較，有其特殊之處。大致而言，受了政治經驗與社會經驗的影響，「文革」一代青年關心政治的態度呈現兩極化趨勢：若非極狂熱，就是極冷漠。但是，八〇年代以來的大學生思想較為複雜；除了偶而關心政治及社會事務之外，大多數的學生不諱言對「自我」的重視。按關心程度深淺，八〇年代末期大陸大學生最計較關注的問題依次為，個人生活事務（包括個人收入、學業、休閒生活，及人際關係等）、國際事務，和中共（國家）政治暨經濟改革事務<sup>86</sup>。大學生較喜愛私下做自己喜好的活動（包括文藝、運動，或自己到社會上活動）。相對地，對中共當局策劃的「共青團」活動或與團體一起參加的政治活動，大學生興趣缺乏<sup>87</sup>。以上調查的結果說明了，八〇年代大學生追求「自主」，實現「自我」的特徵。對於中共黨政官員的工作態度，八〇年代大學生和以往大學生一樣，大都不滿意且不信任<sup>88</sup>。由於畢業後的工作分配主要靠「關係」



，而非因學業成績高低決定工作之好壞，因此，大學生普遍缺乏學習動機，經常逃課，或提早到校外打工，以便佔住較好的工作職位<sup>⑧9</sup>。其次，另一項調查顯示，當代青年有不少人係經由與別人交談的途徑獲得消息（資訊）<sup>⑨0</sup>。由此可推知，青年人彼此的「橫向溝通」交談普遍且常見，益增加青年「次文化」形成的可能性。基於大學生普遍追求「自我」的風氣，却因中共當局改革不力，無法滿足個人願望，是故，大陸青年人大都心生不滿但亦無耐，加上青年之間交往比以往密切，因此，一遇意外事件發生，大陸學生很自然地會彼此聲援，容易釀成學潮。

一九八六年學運起自安徽省合肥「科技大學」<sup>⑨1</sup>。在中國歷史上，該大學不是學運蓬勃地區，但在八六年前後，「科技大學」似受中共中央青睞，准予採用較「民主」的方式試辦校務<sup>⑨2</sup>，同時，在該校擔任副校長的方勵之，更是身先士卒，極力鼓吹改革，造成該校濃厚的「自主」風氣。基於此，八六年十二月五日，「科技大學」學生率先集會，抗議該校學生居然無權提出「人代會」代表候選人。接著，在九日這一天，該校學生再度以日本一九三五年侵略中國週年為藉口，聚集示威，歷時大約三小時，結果，合肥當局屈從，將「人代會」代表的選舉延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舉行。安徽「科技大學」學生的行動，很快地引起其他校園大學生響應；武漢、上海、天津、南京、昆明、杭州、蘇州、廣州等十七個城市大學生陸續採取行動，其中以上海學潮規模最大，持續時間較長。全大陸一千零一十六所「高等院校」（中共對「大專院校」的稱呼）之中，至少約有一百五十所校園有所行動<sup>⑨3</sup>。中共官方的報導則估計，當時二十萬名大學生之中，參加學運的同學大約只有百分之二不到<sup>⑨4</sup>。儘管學生參加人數不多，但是，大陸大學集中於城市，學



生又很容易在校園內成羣結隊，因此，涉足示威遊行集會的學生總數固然不多，却有一定程度的聲勢。八六年大陸大學校園這些政治活動，雖不是八九年學運直接原因，但稱得上是八九年學運的暖身或先驅活動。同時，八六年學運亦可以說是，大陸大學自由氣氛的一環。

從大學生張貼的大字報內容，及示威遊行喊出的口號為依據，八六年學運之中，學生的訴求重心是，不滿中共黨政官僚之專制統治實況，期望改革政治<sup>95</sup>。大學生表達彼等對中共專制不滿的意見時，很自然地運用「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等抽象觀念以壯聲勢或作掩護。事實而言，大陸大學生對於「權力分配」、「牽制與平衡」等關於「民主」的具體制度可能仍不瞭解，而且，八六年學運期間亦未見學生提出。由此看來，八〇年代學生和上幾代大學生類似，對於西方「民主」觀念暨實施辦法所知有限<sup>96</sup>，這也許是中共有計劃地嚴密控制知識與資訊所致。另外一項學生的訴求是，要求中共當局不要將學生的政治活動判定為非法。因此，活動後期，學生轉而關注中共官方報紙的報導，而以「言論自由」作掩護。其實，大陸大學生真正在意的，希望中共當局不要歪曲學運實情，或宣佈學運為「反革命」，以免事後，學生遭受報復、懲罰，或在學業、未來就業（分配工作）上受到歧視<sup>97</sup>。當然，在學生組織羣眾運動時，為維持整個運動聲勢，因此對於報紙的不確實報導勢必更加不滿，無法忍受。

大體而言，八六年學運並無暴力傾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中共在上海的報紙曾報導，示威的大學生打傷警察，經學生抗議為不實報導之後，上海中共官員承認其為不實，並宣佈「撤銷當局在官方報紙上提出的指控」<sup>98</sup>。換言之，上海地區最大規模示威並無暴動行為。除此之外



，北京、合肥、杭州、廣州、深圳、昆明等城市大學生亦羣起響應，紛紛走出校外示威，造成各城市中心交通短暫阻塞，沒有暴力活動，各地警察亦只維持交通與遊行隊伍秩序，很少「干預」<sup>⑨⑨</sup>。由此看來，八六年學運之中，大陸大學生與中共當局兩方面的表現具有「和平」與「自制」的特徵。

八六年大陸學潮以上海、北平地區學生最積極，上海學生活動時間最持久。但是，中共這兩個城市的官員亦未採取警察武力壓制學生。當時擔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即曾向日本記者表示，不會用水龍頭對待上街遊行的學生<sup>⑩⑩</sup>。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則先於十二月十八日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學，和學生「對談」，勸學生不要到城中心遊行，以免防礙交通<sup>⑩①</sup>。十九日以後，江澤民本人和上海市政府官員，陸續接見示威學生代表並交談<sup>⑩②</sup>。廣州中山大學亦表示，上街遊行的學生返校後，「校方也不會歧視或給予什麼『特殊教育』」<sup>⑩③</sup>。此外，中共主管教育機構則亦公開表示，尊重學生遊行示威的「憲法」權<sup>⑩④</sup>。當然和以往一樣，中共當局也發動大學部分教授和學生規勸急進學生停止鬧事，回學校專心讀書<sup>⑩⑤</sup>，並辯稱「民主建設」係緩進過程，應該「從自我管理入手，學習民主，實踐民主」<sup>⑩⑥</sup>。

如上所述，中共當局自上而下率皆以和緩措施疏導學生不滿的情緒。更有意義的是，若干中共地方黨政機關甚至接受學生的要求，有所反應。例如：安徽合肥地區共黨機構增加該選區「人代會」候選人人數<sup>⑩⑦</sup>。另外，深圳市政府也協調「深圳大學」，暫緩實施該校按分數高低表現增減學費、住宿費的新修訂辦法。同時，成績不合格不得補考並須繳交補修學分費用的規定亦暫停



執行<sup>⑩</sup>。八六年學運過程前後，大陸大學生不僅髮膚絲毫未損，怨氣已出，而且亦迫使校方改善學校管理措施。中共地方機構對學生示威遊行所採取的緩和疏導措施，以及爾後對學生學校行政要求的有效具體反應，都是一九八六年大陸學潮迅速平息的主要原因。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八六年學運之中，大陸學生與中共官方機構抗爭，「對談」而有具體結果，這種政治經驗對大學生「政治社會化」而言頗具意義；很可能改變大陸大學生對中共政權的情感、支持態度，與評價，易導致大學生相信中共政權可以抗爭、商量。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當中，大陸學生要求與中共領導人「對談」，彼輩學生對中共當局之信任，似根源於八六年學運的經驗。

或許因為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真的對大陸知識份子與學生採取較放任的態度，因此，大陸學生並未因學潮而遭殃，但是，大學生的抗議、抱怨與表達政治意見的活動却給胡耀邦帶來麻煩，胡耀邦須為八六年學運付出政治代價。理由似很清楚：胡耀邦對知識份子與學生的觀念政策，和中共領導階層其他人不一樣。而且，胡耀邦已成爲少數。中共領導階層大多數人的觀點係認爲，「高等學校」已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侵襲，而按照他們的定義與判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心是否定黨的領導」<sup>⑩</sup>。很明顯的，中共領導階層大部分人的意見係認定，學運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與行動，目標在於脫離共產黨的領導或推翻中共政權。中共領導階層這種共識或許過度高估知識份子與學生的意圖，但是，這一點共同意見已使胡耀邦陷入孤立，成爲衆矢之的，最後，中共領導階層多數人作成決定，將學生的示威騷動歸咎於胡耀邦未能有效執行「黨」的政策方針，指責胡耀邦放縱「資產階級自由



化」思想流行泛濫於校園及知識界<sup>⑩</sup>。以此項指控為起點，再加上其他關於胡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規矩的罪名，胡耀邦被其他同僚趕下台<sup>⑪</sup>。胡耀邦撤職一事也許是中共領導階層人士政治文化的特徵之一，亦即是說，中共領導階層人士之間的競爭行爲，似乎很容易一呼四應成多數，圍剿攻擊某一個「個人」<sup>⑫</sup>。是不是唯有如此，其他領導人士才有機會搬家換位，爭取另一回合的仕進前途呢？中共領導階層同僚之間競爭活動暨規則又若何？這些似都是胡耀邦以其「總書記」之尊，瞬間跌落谷底一事引人思索的問題。總之，胡耀邦受八六年學運牽連而下台，可能只是中共領導人士之間爭奪權力的正常活動事例之一，不足為奇，然而，對八六年學運這一代大學生而言，中共對胡耀邦的懲治，即意謂著，對學生政治意見及政治活動的否定。至此，大陸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再度受到重挫，可想而知。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起自胡耀邦瘁世時機，可能只是大陸學生從事政治活動策略運用的考慮，但也未嘗不是大學生「兩害取其輕」，偏向胡耀邦加速改革理念的表現。

其次，八六年學運受牽累者又是知識份子。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三人被開除黨籍，另有六名著名知識份子被要求退黨，但是，王若水和蘇紹智公開表明拒退，名劇作家吳祖光亦公開指責，中共黨官任意「拿了一捆棍子，想打誰就打誰，難道就不該受黨紀國法的制裁<sup>⑬</sup>？」鄧小平懲治這些知識份子可能的動機是，迎合保守教條派人士的願望，以換取保守人士繼續支持鄧小平，趙紫陽主持的經濟甚或政治改革計劃。然而可預見的是，鄧小平這種犧牲知識份子以滿足「保守派」的權宜之計，已再度凌辱人文暨科技知識份子，並使留學外國的大陸留學生益加裹足不前



，不願回大陸。亦因此，鄧小平為政治理由打擊知識份子的作法，適足以反過來妨礙「現代化建設」的推動<sup>①④</sup>。更重要的是，這些著名知識份子敢於和中共爭執與計較，不僅已贏得大學生對校園教師、知識份子的尊敬，縮短學生與教師的距離，而且亦鼓舞大陸大學生勇於向中共當局批評、提意見。八九年大陸學潮過程中，教授、知識份子與學生之間相互聲援並非偶然，教授、知識份子、學生彼此影響支援的行為傾向，應係植根於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大陸學運。

## 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特徵

八九年學運特徵之一在於，知識份子、教授與學生兩方面互相聲援，彼此合作。這是中共統治大陸以來罕見的現象。先是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北平地區三十三名知識份子（包括教授、詩人、文學刊物主編、記者、研究員、劇作家、導演）起簽名支持方勵之一月六日「籲請釋放政治犯」函。這是大陸知識份子由中共統治以來第一次公開結合在一起，向中共施壓力，提要求的頭一樁實例。大陸知識份子此項果敢行動無疑地給予大學生極大的鼓舞。亦因此，大陸大學生便技巧地掌握胡耀邦猝逝的時機，走出校外表達政治意見，引發八九年大陸學潮。

八九年大陸學運自四月持續至六月為止，其間，北平地區知識份子陸續以「聲明」（如「五一六聲明」）、「宣言」（如「五，一七宣言」）、「呼籲」、「致中央公開信」等書面方法聲援學生行動，或亦組成隊伍團體參加學生的遊行，前後共計二十次之多<sup>①⑤</sup>。換言之，在短短60天不到的學潮期間，知識份子每三天就有一次聲援支持學生的行動。大陸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之間



聲氣相求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

然而，從知識份子書寫的意見及吶喊的口號來看，彼等對中共當局的批評較少，並未質疑中共政權的性質暨其政策，只偏重在中共政權與學生對峙衝突之中，試圖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的示威行動為合法，並希望中共領導人經由「人代會」出面化弭衝突，避免採用武力方法驅散示威學生。大體上，知識份子與學生的行為特徵近似；都只在於表示彼等對時局之願望、需求，及信仰（如相信中共領導人會接見對談），較具備「表達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的行為特徵。相對的，知識份子或大學生的活動，並非由某項具體長程的目標所導引而表現的所謂的「工具政治」行為（Instrumental Politics）<sup>①⑥</sup>。大陸知識份子或學生都未企圖直接與中共政權敵對，這種表現可能是中共統治條件之下不得不然的策略，並不能據此即草率推論，大陸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不具備「自由民主」的長程目標。事實而言，八九年學運之中，大陸知識份子暨大學生敢於要求與中共領導人「對談」，並提出「人權」普及全球人類的觀點<sup>①⑦</sup>，再明白地顯示，大陸知識份子學生們追求「自我」尊嚴暨「自主」權力的共同願望。

八九年大陸學運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特徵在於，學生與工人的關係。波蘭（Poland）「民主化」初步成功的原因之一取決於知識份子與工人聯盟（Solidarity）之密切合作。反觀大陸的例子，長久以來，大陸知識份子與工人之間，一直很少往來，彼此之間亦無相沿成習的橫的連繫與溝通。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主要是北平地區工人不滿當時中共施政所造成，學生參與響應者不多<sup>①⑧</sup>。時至一九八九年再起的「天安門事件」，大學生傾向獨攬指揮權，少有證據顯



示，北平地區工人分享示威遊行決策權，只有部分工人成羣結伴加入遊行，以示響應。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之間欠缺橫向連繫。事實上這亦是大陸學運特殊客觀條件之一，大陸學生或知識份子仍難完全掌握，遑論可予突破或思改進。原因之一是，知識份子學生與工人有「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雙方不搭調，溝通有障礙。而且，工人大都須養家畜子，有家庭負擔，較不太敢冒險參加抗議活動，深怕遭中共當局懲罰而失去工作；有些工人只在下工之後到「天安門」駐足旁觀，但有些工人則亦私下向外國記者透露同情學生<sup>①⑨</sup>。另一原因則是，中共當局刻意將工人與知識份子隔開分別控制所造成。中共在八九年六月四日屠城之後，立即分別於北平、上海、杭州、長沙、西安、武漢、濟南，及江西、南昌等城市逮捕各地設組織從事抗議活動的工人領導者，其所給予的罪名大致脫不開以暴力「打砸搶」這種中共慣用的莫須有控訴<sup>①⑩</sup>。依慣例，中共使用「打砸搶」的控訴，其用意之一在於欺瞞一般民衆，激起公憤，因此被中共當局按上這種罪名者，刑期長且多數立即公開處死示衆。正當外國新聞媒體專注於追蹤報導大陸學生遭中共壓制逮捕處分之際，大陸不少年輕工人可能早已草率地受公審而身首異處。大體而言，中共當局對工人的懲罰遠比處罰學生嚴厲，其用心即在於以酷刑嚇阻工人，禁止工人參加學生的政治活動。學生單獨從事政治活動而無工人支持，學生本身便較少經驗，亦較少機會取得可用的物資，如：油印機、白報紙、布條。同時，學生而無工人聲援（如罷工），則學生對中共政權的制衡或壓力自然微乎其微。中共這種嚴格禁止工人與學生橫向連繫的技巧，其實亦在於把知識份子暨學生孤立起來，以利處理。尤有甚者，中共當局在處理「天安門」屠城善後過程中，似有意進一步



拉攏農民及工人，以鞏固其統治權，並附帶地將知識份子暨學生再度孤立於中國大陸社會。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共亦展開整頓其「黨」組織的工作，其中有一項改弦更張的整頓方針較特殊，即如新任總書記江澤民所要求的：「我們要非常重視發展（作者按，即俗言『吸收』之意）產業工人入黨」<sup>(121)</sup>。同時，香港記者亦引述中共高層人士的話報導說，中共當局已改變過去偏重在知識份子遴選幹部的作法，今後「要注意從優秀工人中選拔幹部，重視在第一線工人中發展黨員」。中共內部流行的看法認為：「工人出身的，再加上有一定的文化，去當車間主任，就比大學生去當車間主任好得多。一個黨委書記，非得要大學畢業的去當，未必當得好，工人當中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工人之中有文化、有組織能力的，應該選拔優秀人才到管理機構、領導機構中來。現在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應該到基層或在勞動中鍛鍊一兩年，熟悉一下生產、熟悉一下羣衆，有了體會再上來」<sup>(122)</sup>。中共領導人士這種重「經驗」、輕「知識」，及突出工人階層的觀念，意謂著，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以來中共優待知識份子，及開門吸收知識份子入黨的措施將告中止<sup>(123)</sup>。事實而言，中共在嚴懲參與民運工人之餘，也同時重新恢復工人階級在社會的優勢地位，其目的即在於，藉此軟硬兼施的方法使工人就範，鞏固中共本身統治權，並將知識份子的社會資源減弱。

除了提高工人階層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之外，中共當局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也強調要「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和政權的建設」，以整頓渙散的農村黨組織，恢復廣大基層組織的戰鬥力<sup>(124)</sup>。中共這項整頓措施，其實即在於恢復「黨」對農村的控制，也是爲了中共統治權的鞏



固。大陸大學生與知識份子齊集在「天安門」前向中共領導人抗議，可能驚嚇了一些中共高官，却似乎尚未搖撼中共統治權。但這不是說，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對中共政治毫無影響，相反的，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可能遠比大陸歷次學生運動更具政治意義，已給未來中共政治變遷帶來不少變數。

## 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影響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八九年大陸學運植根於八六年學潮，亦因為中共善待知識份子以利「現代化建設」的政策所造成。雖然，從一九七八年起十年間，中共曾以「反精神污染」運動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約束知識份子的言行，但是大體而言，在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前，中共政權對待大陸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的容忍程度，無疑地頗為寬大。相對地，大陸知識界人士與大學生也大致對中共政權支持，或至少寄予希望，並非以敵對的態度詆毀中共政權，更無推翻中共政權企圖。這可從示威學生採取「絕食」方法及請求「對談」的行動獲得佐證<sup>(125)</sup>。然而，自中共追殺逮捕知識份子之後，這一代知識份子大學生和中共政權之間，十年以來的良好關係毀於一旦，大陸知識份子大學生大都完全對中共政權失去信心，毫無工作意願，特別是受打擊迫害較激烈的文藝界人士更明白表示出愛極生恨的憤怒：「在這種現狀底下，你能將你獻給誰呢？獻給誰是值得的呢？沒有你認為值得的就不要輕易『獻出』」<sup>(126)</sup>。毫無疑問的，八九年大陸學運以鮮血生命劃上休止符的事實，已完全防斬斷這一代知識份子對中共的向心與支持，對中共「現代化



建設」多少會有影響，但是，整體而言，尚不致於嚴重到造成中共各項改革措施之進行，中共還可栽培新的一代知識份子與大學生供作驅使。至於，流亡在世界各地的大陸不滿份子對中共政權產生影響的可能程度，主要以中共政權變化及留在大陸大學生的努力決定，同時亦要看海外大陸學生暨知識份子內部整合程度，及彼輩學子結合中共內外政治勢力效能而定。當然若再有一「意外事件」突發，且這一代或新一代知識份子大學生又一次趁機而起，則另一次波瀾壯闊的學運亦不無可能。唯一教人納悶的事實是，每一代大學生似乎仍是單槍獨鬥，大陸歷次（代）學運彼此之間一直欠缺「縱」的連繫與經驗的累積。

八九年大陸學運的另一項特殊影響即在於，促使大陸社會怨恨「具體化」，並激化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提前發生。中共經濟改革暨開放政策促成大陸知識界自由思潮而引發學運，反過來，學運則亦鼓舞城市居民對中共黨政官腐敗的不滿情緒具體渲洩出來。例如：北京市民即以駐足街道聲援學生表示彼等的意見。爾後，中共當局動武血腥鎮壓，無疑的，已使城市人民更加對中共政權離心離德，中共或可以捏造的事實報導欺騙農村地區，但是，民衆之間私自之間的口語傳播，勢必使大陸民衆瞭解「天安門」屠殺事件真相，對於中共政權合法統治權威（Legitimacy）業已釀成難以彌補的傷害，為日後中共政局不穩定埋下伏因。另一項八九年學運造成的影響則是，促成中共領導階層的分裂，而且使中共軍人「政治中立」的角色遭到破壞。雖然，目前中共內部暫已形成另一回合的「多數」（Majority）與「共識」，將趙紫陽等一組人開革，但是，改革開放政策與「列寧黨政」政治結構兩者之間衝突矛盾仍然存在，加上東歐共黨國家接二連三的政治民



主化變革的壓力，當今中共領導人要解決的不止是經濟問題，也須面對政治制度調適的壓力。更嚴重的事實則是，八九年學運持續時間長，加上中共當局處置失當，已使得大陸民衆和中共政權對立起來<sup>(127)</sup>，這亦係八九年大陸學運異於以往學運不同的特點，其歷史意義或即在此。

## 七、結語

學生運動是社會變遷訊息的反映。學運的訴求是民衆需求、願望及民衆不滿的縮影。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民衆有較多合法的途徑申訴需求，或表達不滿的情緒。這些合法自由表達意見的途徑包括選舉、示威、請願、罷工或自由競爭報業等。因此，在自由民主國家之中，學運常只是社會上小部分民衆表達政治意見的活動，牽涉面不大。但是，相反的，在極權政體之下，如中共，學生運動牽涉的社會問題層面往往很大。理由是，在極權統治的社會，絕大多數民衆平時極少有合法途徑申訴不滿或表明願望，故一旦有學運發生，所有民衆不滿的情緒便都趁機渲洩。

中國共產黨以黨的組織貫穿控制整個國家（The State）與社會（The Society），所有民間組織也在「黨」小組掌握之下運作，因此，大陸民衆幾乎完全沒有機會組織或「自主」活動。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嚴密控制的社會之中，或許只有大學生可伺機議政。其原因除了大學生勇於冒險、對社會弊端病態反應敏銳、嚮往理想社會遠景等青年心理特質之外，校園知識份子言行之感召，以及大學生脾胃相投、人數可觀、易在校園集結等客觀環境條件，也都是大陸學生運動間或



發生的主因。然而，嚴格地講，中共政權社會控制力一向具有一定的效能。是故，在中國大陸，學運興起的時機大都在中共政權社會控制力脆弱時期。亦就是說，當中共領導階層分裂鬥爭，或中共中央政治、經濟暨社會政策方針分歧時，學運即起。一九五七年前後、「文革」時期，及一九七八年底這三段時間，中共領導階層因權力的分配、政策的抉擇陷於分裂，整個黨組織因中樞無主、政策不明朗，暫時無法命令或干預社會大眾，知識份子暨學生便有較大的言論空間。設若如此，而且中共領導階層人士確實有分裂，則大陸學生是不是即時趁機而起呢？也就是說，大陸學運自動自發的程度為何呢？

由本文的敘述來看，大陸學運自動自發程度較少。四十年來，大陸歷次學運多少與中共領導人權力角逐有所牽連。由於青年人對社會不公平現象敏感，憧憬理想，社會經驗淺，容易為政治煽動（Political Demagoguery）吸引。基於此，部分中共領導人似有意運用學生、操縱學生團體，以學生作為輿論宣傳的工具，孤立政敵，爭奪權力。毛澤東、江青夫婦塑造「紅衛兵」作為「文革」先鋒，藉以毀謗劉少奇，重建本身權勢，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外，一九七八年前後，鄧小平暨其附從者——胡耀邦，似也曾故意放任學生公開批評「四人幫」及「文革」各項政策，作為「經濟改革」新政策的先聲，這也是一九七八年底學運活躍一時的條件之一。

由於中共政權具備「動員」（Mobilization）的特徵與制度，其控制社會能力有效，因此，談及大陸學運發起的原因，不宜忽略政治因素很可能介入學運。也就是說，大陸學運助因之一，可能是中共領導人動員操縱所致。但這也不是說，不同時代的大學生完全受制於中共，全然處於



被動。一九八五年，大陸大學生選擇九月十八日，計劃藉口反日，以表達彼等對經濟政策及校園設施的不滿，這些大學生走向街頭，並無中共當局有人在背後策動，這是大陸大學生自主表現之一。一九八九年大陸學運之緣起，主要也是大學生自發形成。雖然，在學運後期，確實有傾向趙紫陽的支持人士，曾聲援學生而批評李鵬，但是，整體而言，八九年大陸學運較具有學生自動自發的特徵。

由一九五七年、文革時期、一九七八年底，及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四次較大規模學生運動作一比較，四者相同的地方多於不同點。四次學潮之中，學生使用的傳播工具都以大字報、白布條及手刻鋼版印成的「小字報」為主，這主要係因為大陸物資缺乏所致。同時，中共平時教育學生，也常要求學生寫「批判稿」、心得報告或製作壁報（「牆報」），學生日久養成習慣，因此，一遇政治活動，大陸學生自然而然地採取這些方法表達意見或互相批評辯論。受到中共「政治社會化」影響，大陸學生在歷年來學運中所使用的傳播工具、傳播方法無分軒輊，這是大陸學潮相同點之一。

其次，在政治訴求方面，大陸歷次學潮期間，大陸學生大都只針對中共領導人暨施政缺失提出批評，並揭露社會弊病或個人冤曲，或最多引用抽象的「民主」、「人權」或「法治」的概念，表明學生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除此之外，大陸學生很少直接否定中共的統治權，也很少批評中共極權政體的「不自由」、「不民主」的特徵，更少有學生投入學運者曾企圖爭取執政權，或揚言推翻中共整個政權。換言之，大陸每一代大學生，大都係在適當的時機，偶然集合在一起，彼



此呼應，一起向中共政權表達不滿、批評，並提出心目中的理想社會，近似「表達政治」行爲傾向。相對的，從大陸學生的政治訴求來看，也很少有證據顯示，大陸學生曾提出具體的「民主政治」構想作目標，或以學運作爲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法，而且，大陸學生對民主的瞭解仍顯得粗糙模糊，這是大陸學運另一項共同的特徵。

由此來推斷，大陸學運深受中共政權控制系統所約束；不僅大陸大學生不容易獲知自由世界知識信息，而且，以中共控制之嚴厲，大陸學生基於策略運用之考慮，大抵不敢直接向中共統治權挑戰，這是大陸學生對民主認識較淺的原因，也是大陸學運性質先天上的限制。由於此一限制，加上中共政權在領導階層權力鬥爭決定之後，很快即能恢復其控制社會的效力，因此，大陸學運大致只能短暫地維持，較少能結合社會其他階層民衆，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倘若如此，中共具有充分的「社會控制」資源與能力，又擅長各項「政治社會化」措施，則大陸學運喚醒民衆自由民主意識的功能勢必有限。影響所及，中國大陸前途似顯得黯淡無光、遙遙無期。這樣的推論是否成立呢？其實不盡然。

大陸青年運動受中共統治條件的約束，有它一定的特徵及效果。但是，每一代大陸青年嚮往自由的天性流露無遺，這就中國大陸自由化、民主化的動力。事實上，以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爲例，大陸青年的民主觀念，已比上幾代青年成熟具體。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八九年學運當中，大陸青年的義舉已引發民衆的同情與支持。是故，在不久將來，若中共仍一意孤行、抗拒世界民主潮流，則大陸青年仍有可能再度鼓舞民主風潮，結合全民力量，一舉摧毀中共專制政權。



大陸青年運動屢仆屢起，深刻表現出中國人熱愛自由、反對專制的天性。大陸青年不僅是中國民主前途的原動力，也是中國民主前途必然成功的保證。

## 註釋

-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olitic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October 1966, PP.142-143.
- ② 中共習慣以公元（西元）紀事，本文沿用之。
- ③ 第一、二、三章取材資料，係筆者親自訪問大陸旅美留學生獲得之口述實情。本文第一、二及第三章，涵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九年，發生於大陸的學運史實。文中詞句及相關資料，全係大陸留學生口述實況，由筆者記錄形成。爲了後人研究對照驗證所需，僅將筆者親自訪問之過程、受訪人相關背景資料，及大陸留學生旅美地點列表如下頁，供作參考：
- ④ 參見「中共中央『關於撤回派往各級學校的『文革工作小組』的通令』（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共匪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台北：行政院國防部情報局，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頁六、七。
- ⑤ 關於紅衛兵前來北京學習，進行革命串連活動的細節規定，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各地革命師生前來北京參觀學習的通知』」，共匪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以下簡稱「文革文件彙編」），頁一三三、一三四。



被訪問大陸學人暨學生背景資料表：

背景類別 受訪人代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1	53	男	小資產	北京	雙百運動	研究所	2.0	Pittsburgh	1983
2	47	男	資本家	上海	雙百運動	研究所	2.5	Pittsburgh	1983
3	52	男	小資產	北京	雙百運動	研究所	2.5	Pittsburgh	1981
4	45	男	小資產	武漢	雙百運動	大學	1.0	Chicago	1982
5	54	男	小資產	上海	雙百運動	研究所	1.5	New York	1981
6	30	男	中貧農	西安	文革	大學	2.0	Pittsburgh	1983
7	40	男	小資產	北京	文革	大學	3.0	Pittsburgh	1982
8	43	男	資本家	上海	文革	大學	2.0	Pittsburgh	1980
9	35	男	烈屬	北京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0
10	40	男	小資產	南京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2
11	26	男	小資產	北京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3
12	25	男	烈屬	成都	文革	大學	0.5	Pittsburgh	1983
13	35	男	工人	哈爾濱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2
14	36	女	小資產	上海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1
15	37	男	小資產	青島	文革	大學	2.0	Pittsburgh	1982
16	30	女	富農	北京	文革	大學	1.0	Pittsburgh	1983
17	43	男	資本家	上海	文革	大學	2.0	Pittsburgh	1982
18	40	女	小資產	北京	文革	大學	2.0	Pittsburgh	1983
19	25	男	富農	成都	文革	大學	1.0	Pittsburgh	1983
20	30	男	小資產	不詳	民運	大學	2.0	San Francisco	1983
21	35	男	小資產	廣州	民運	大學	2.0	New York	1982
22	35	男	小資產	北京	民運	大學	2.0	New York	1981
23	30	男	不詳	廣州	民運	大學	2.0	New York	1982
24	25	男	中貧農	北京	民運	大學	2.0	New York	1982
25	34	男	小資產	北京	民運	大學	1.5	San Francisco	1981
26	45	男	小資產	廣州	文革	大學	1.5	Pittsburgh	1983
27	25	男	工人	北京	民運	研究所	0.5	Pittsburgh	1981
28	35	女	小資產	上海	民運	大學	1.5	Chicago	1981
29	35	男	烈屬	不詳	民運	大學	1.0	Chicago	1983

背景類別說明：

- 一、為「年齡」，以 1984 年訪問時間為準計算。
  - 二、為「性別」，以「男」「女」示之。
  - 三、代表「家庭背景」，分為「資本家」，「小資產階級」（教師、醫生、小生意人皆屬之），「富農」（包括「小地主」），「中貧農」，「烈屬」（中共革命烈士後裔）與「工人」。
  - 四、表示受訪人就讀大學（城市）所在地。
  - 五、代表受訪人曾參加過的「政治運動」名稱，分為 1957 年「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運動（簡稱「雙百」）；1966 至 68 年「文革」，及 1978 至 79 年的「民主運動」（簡稱「民運」）。
  - 六、代表「教育程度」。
  - 七、代表「訪問次數」，每一點等於 3 小時。例如，2.0 等於 6 小時。
  - 八、表示受訪人旅美地點。
  - 九、表示受訪人離開中國大陸年份。
- 本項訪問係在 1984 年進行，受訪者 29 人。



- ⑥ 中共「文革」中央通令紅衛兵停止串連時間及規定，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連問題的通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文革文件彙編，頁一三五—一三六；另參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文革文件彙編，頁一三九—一四〇。
- ⑦ 參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凡未公開發表過的毛匪照片和作品未經『中央』審查者一律不准翻印的通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文革文件彙編，頁四一—四二。由此一文件內容判斷，當時已有不少個人或集體，私自印發毛澤東個人的材料。
- ⑧ 「北大」學生對峙鬥爭實況，參閱江青，「在部分學校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七年元月廿二、廿三日），文革文件彙編，頁二五九—二六一。
- ⑨ 「關於『奪權鬥爭』與幹部問題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來傳達），文革文件彙編，頁一九二。
- ⑩ 參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羣衆的通知』（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文革文件彙編，頁五一—五二。
- ⑪ 參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質的命令』（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文革文件彙編，頁六四—六六。
- ⑫ 有關一九八五年南韓、印度、希臘、美國大學生學運事件，詳見「國際前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三、十四及廿六日；十一月廿日。



- ⑬ Jim Mann, "Beijing Student Unrest Taking a Political Tur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2-13, 1985. 吳昌Kuo-Sin, "Campus Demanding Academic Freedom," Hongkong Standard, March 5, 1985.
- ⑭ Jim Mann, 前揭文。
- ⑮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5, 1985, p.1
- ⑯ 中共問題資料週報，第一八七期，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頁九。
- ⑰ Julidn Baum, "China's Students Challenge Scandalous' Problems at Colleg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4, 1984, p. 10
- ⑱ 台北聯合報，一九八五年元月十四日，第一版，取材自一九八五年月十三日「法新社」北京電。
- ⑲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0, 1985, p.4
- ⑳ 中共問題資料週報，第一八七期，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頁一〇。
- ㉑ 慶祝活動詳如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第一版。
- ㉒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8, 1985, p.3
- ㉓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0, 1985, p.1
- ㉔ 在中共該項會議上，陳雲痛責「黨」的腐敗，詳見香港文匯報，九月廿四、廿七日；有關陳雲的經濟觀點、及他的政治角色，詳參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 151–156. 另參考 Eping Ehang and Kim Lem, “Chen Yun’s Rol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ian Affairs, Spring, 1985, pp. 41–45
- ②⑤ 爭鳴，第九十七期，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頁六、八。
- ②⑥ 同前註。另參註②④。
- ②⑦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1, 1985, p.3
- ②⑧ 同註②⑤。
- ②⑨ Kyodo News Agency, Peking, November 22, 1985. 取材自 Japan-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Eighties (日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頁一六，另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3, 1985, p.17
- ③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第二版；另見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五日，第二版。
- ③⑪ 爭鳴，第九十七期，頁八。
- ③⑫ 爭鳴，增訂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頁七；另見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1, 1985, p.3
- ③⑬ 一九八五年，日本是中共最大貿易夥伴；中共與日本一九八五年貿易總額計約一百六十億五千七百萬美元，詳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元月十三日，第三版。



- ③4 Julian Baum, "China Reins in Youth to Prevent Wave of Anti-Japanese Sentimen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3, 1985, p.14
- ③5 同前註。
- ③6 同註<sup>②9</sup>；有關於中共當局對此一事件的報導，參見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China, (以下簡稱 FBIS) December 5, 1985, A1
- ③7 關於當年中共人員介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學運」的細節暨活動概況，參閱 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88-95。另參考 Jessie G. Lutz, "December 9, 1935: Student Nationalism and th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4, August 1967。另參見「青年團史參考資料」，中國青年（半月刊），第一一〇三期，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
- ③8 爭鳴，增訂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頁三。另見 "Special Report", Hongkong Standard, December 9, 1985
- ③9 毛澤東這篇講詞全文見 FBIS, December 5, 1985, K12-K17。原文譯自 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第一版。事實而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潮發生時，若干共產黨員，如黃鎮、黃華、李暢等人確曾赴北平，與當時北平部分大學生接觸；除此之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學運」仍係由當時北平地區大學生自動發起，很少有證據證明，該項學潮係



- 由中共當局所策動，參見 John Israel and Donald Klein, *OP cit.*, pp. 87-136
- ④ 各地慶祝活動報導，詳見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第一版；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一版。· *FBI*S, December 9, 1985, K5-K6; *FBI*S, December 11, 1985, K8-K9; *The Japan Times*, November 21, 1985, p.3
- ④ 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第一版，取材自北京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 ④ 爭鳴，增訂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 ④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1985, p.4
- ④ 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九、十四、十五、廿五日報導。李鵬對改善學校伙食的演講，見光明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第一版。
- ④ 工人日報，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三日。
- ④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1985, A1, A7
- ④ 趙子祥、吳岩等人合著，「大學生的人生觀狀況和特點的研究——對十七所大學一七六二名的調查報告」，吉林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四年一月。
- ④ 同註④，頁一一八、一一九。
- ④ 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九十八期，頁一〇、一一。
- ④ 香港爭鳴月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增刊），頁三。



- ⑤1 Gabriel A. Almond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Comparative 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p. 172
- ⑤2 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八四—八六。
- ⑤3 「知識份子的問題」，共匪原始資料彙編，第四十五號，台北：國防部，一九八五年，頁四六—四七。
- ⑤4 Miltor D. Yeh, "The CCP's Policy Toward Intellectuals," Issues & Studies, Vol. 23, No. 1, January 1987, pp. 92-94。
- ⑤5 同註⑤4，pp. 99-106。
- ⑤6 羣言，第一期，一九八八年一月，頁一。
- ⑤7 葉明德，「大陸知識份子參政行為分析——以「實踐檢驗真理」爭論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卅一卷，第五期，頁一七。
- ⑤8 兩個凡是指的是，華國鋒政權揭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詳見「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紅旗，一九七七年三月，頁一八。
- ⑤9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頁一六五—一六七。
- ⑥0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鄧小平文選，頁一六五—一六七。



- ⑥1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文選，頁一八二—一八五。
- ⑥2 葉明德，前揭文，頁一七。
- ⑥3 陳璋津，回向馬克斯：中共的馬克斯主義重建，自印，民國七十八年二月，頁卅六—五十一。
- ⑥4 王若水，「談談異化問題」，共匪原始資料彙編，第卅七號，下冊，頁七六五—七六八。
- ⑥5 共匪原始資料彙編，第卅七號，頁三，頁八八九。另見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五日，第一版，胡喬木表示的觀點。
- ⑥6 吳黎平，「社會科學戰線要加強對我國現實問題的研究」，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廿七日，第五版。
- ⑥7 陳璋津，前揭書，頁八〇—八二。
- ⑥8 引自註⑥7，頁七六。
- ⑥9 「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紅旗，一九八四年六月，頁一九。
- ⑦0 「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頁一。
- ⑦1 「有關『學習馬克斯主義』運動對大陸『理論界』之沖擊與涵義」，參見，陳璋津，前揭書，頁九八—一〇六。
- ⑦2 玄默，大陸知識份子民主思潮與活動，台北：光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二。
- ⑦3 同註⑨，頁一五二—一五四。



- ⑦④ 鄧小平，「關於端正黨風會議」上講話，取材自陳宇震，「中共經濟改革對政治制度之衝擊」，中國大陸研究，第廿九卷，第四期，一九八六年十月，頁一八。
- ⑦⑤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China, (以下簡稱 FBIS) · August 6, 1986, K1, from Jiefang Ribao, August 1, 1986, p. 1.
- ⑦⑥ FBIS, July 23, 1986, K4, 取材自瞭望，第廿九期，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頁一。
- ⑦⑦ FBIS, August 5, 1986, K17, 取材自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第一版。
- ⑦⑧ FBIS, August 14, 1986, K22-K33, from Xinhua (New China News Agency), Beijing, August 14, 1986。
- ⑦⑨ 例如：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二日，第三版。
- ⑧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第二版。
- ⑧⑪ 紅旗，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第十七期，頁六、十五。
- ⑧⑫ FBIS, September 2, 1986, K3-K4, from Zhongguo Xinwen She (China News Agency), August 31, 1986。
- ⑧⑬ Milton D. Yeh,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Mainland China," in Shao-chuan Leng ed., Changes in China: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pp. 101-102。
- ⑧⑭ 羣言，第八期，一九八六年八月，頁一二、一三、頁一五。



- ⑧5 Milton D. Yeh, *Op City*, p.107。
- ⑧6 張結鳳，「學潮與大學生心態」，香港百姓（半月刊），第一九一期，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頁一四；另見 Stanley Rosen, "Youth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8th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June 1989, p.7。
- ⑧7 Stanley Rosen, *Ibid.*, p.10
- ⑧8 同前註，頁一五。
- ⑧9 朱文濤，「令人深思的校園『新潮』——關於大學生厭學的現狀和思考」，社會，一九八八年八月，頁九—一〇；另參考，石磊，「權力『關係網』充斥校園——大學生無心向學不滿現實」，香港百姓（半月刊），第一九一期，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頁一八。
- ⑨0 Stanley Rosen, *Op City*, p.9。
- ⑨1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四日晚，天津大學生曾與非洲留學生打架，詳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第一版。五月卅一日，北平也發生兩名疑似學生的青年，凌辱一名摩洛哥留學生暨其女友，詳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九日，第二版。
- ⑨2 光明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第一版。
- ⑨3 台北中央日報，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第一版。
- ⑨4 人民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第一版。
- ⑨5 近期大陸高校學潮事件中學生張貼大小字報彙編，台北：行政院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一九八



七年二月。

- ⑨6 Julia Kwong, "The 1986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China: A Democratic Movement?" *Asian Survey*, Vol.28, No. 9, Sep., 1988, p. 977, 980。
- ⑨7 *Ibid.*, p. 979。
- ⑨8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第一版。
- ⑨9 各城市大學生示威情形，詳見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版；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二版；香港大公報，十二月廿、廿四日，第一或二版。
- ⑩0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三日，第二版。
- ⑩1 「新華社上海廿一日電」，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二日，第二版。
- ⑩2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一日，第一版；十二月廿二日，第二版，及十二月廿五日，第一版。
- ⑩3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第二版。
- ⑩4 「新華社北京廿日電」，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一日，第一版。
- ⑩5 「中國新聞社北京廿四日電」，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第一版。
- ⑩6 「新華社北京十八日電」，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第二版。
- ⑩7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二版。
- ⑩8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二版；另見香港文匯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十八日，第二版。

- ⑩ 「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一九八七）四號，一九八七年一月廿八日。

- ⑪ 「薄一波同志關於黨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議情況向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摘要）」，中發（一九八七）三號。

- ⑫ 同前註。

- ⑬ David G. Goodman,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Power, Policy and Proces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y 1989, p. 442.

- ⑭ 「中共再向知識份子開刀」，中共問題資料週刊，第二七七期，一九八七年八月廿四日，頁四七—四九。

- ⑮ Merle Goldman, "China's Myopic Purge of Intellectual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1987.

- ⑯ 有關大陸知識份子各項具體行動，參見孫桐，「赤色恐怖下的大陸知識份子」，匪情研究，第卅二卷，第八期，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廿五日，頁卅六—四二。

- ⑰ 「表達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 指的是，一種行爲或一種傾向，旨在表達感受、需求、願望及信仰。在社會學及社會人類學上，「表達政治」意指，文化要素、行爲模式、角色制度之表達。事實上，這也仍在於，象徵性地直接表達人的感受、需求、願望及信仰。其所



表達的感受、需求、願望及信仰，係社會成員所共有及所應共有。「表達政治」也適用於宗教的禮儀及其他政治的儀式，如慶典、藝術及風俗。Talcott Parsons 將「表達政治」與「工具政治」(Instrumental Politics) 作成對立的觀念。「工具政治」並非直接表達感受、需求、願望或信仰，而只是一種企圖達到遠程目標的行為取向(Orientation)。此一定義取材自 R. Klima, *Lexikon zur Soziologie*,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8, P.216f。承蒙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吳東野先生提供本項德文資料，謹此致謝。

①①⑦ 例如，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于浩成、嚴家其、戴晴等人為首的一批大陸知識份子，就「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發表一份聯署倡議書，其中有一點指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人類文明的寶貴成果……反對藉口由『中國國情』而拒絕這些文明。」參見孫桐，前揭文，頁卅七。

①①⑧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一日、廿日重刊關於「天安門事件」真相之報導。

①①⑨ 美國「美聯社」(AP)廿五日電，台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第十版；香港明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六日；另外，大連地區工人也表示，「大連工人多數置身事外」，見「路透社」(Rauter)十二日大連電」，台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七版。

①②⑩ 大陸各地廣播電台報導逮捕工人的實況，參見姚競之，「中共血腥鎮壓『民運』暴行激起公憤」，共黨問題研究，第十五卷，第九期，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五日，頁一一—一六。

①②⑪ 江澤民，「在全國組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七日，



第一版。

①22 張沐，「鄧小平最近重提卸職全退，江與澤分掌黨和國家軍職」，香港鏡報（月刊），第十期，一九八九年十月，頁卅七。

①23 中共吸收知識份子入黨的細節，參見註③，頁

①24 江澤民，「在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講話，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日，第四版。

①25 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吾爾開希的女朋友劉燕受訪問表示，「絕食」動機之一仍在於，對中共「黨」存有盼望的情緒，詳見，薛曉光，「劉燕——蒙古姑娘心有委屈」，台北聯合報，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二日，第三版；此外，曾在「文革」被鬥爭下放過的大陸知識份子蘇煒則表示，有一種對「祖國」難以割捨的歸屬感，所以，他在留學之後仍然回大陸，詳見台北中華日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第十五版。

①26 張欣欣，「第十封信——十億人民裝孫子」，台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廿一日，第卅一版。此外，關於大陸知識界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遭中共壓制的情形側面報導，詳參，張欣欣，「六·四後北京的來信：無言不相對」，台北中國時報，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第卅一版。

①27 根據中共「人民公安報」（People's Public Security）報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貴州農民也曾組織團體，並有攻擊「公安組織」、橋樑、切電話線等武裝暴力行動，「日本『共同社』（Kyodo）十月卅日北京電」，FBIS，October 30, 1989, PP. 35-36.







■ 嵩山叢書②9 ■

## 近代中國青年運動史

---

總校訂／李雲漢

著者／李國祁、呂芳上、蘇啓明  
陳三井、葉明德

---

發行人／劉欽繹

出版者／嵩山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六號十樓

電話／(02)3814421 · (02)3117016

郵撥／0164066-6

---

印刷者／正昇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0(民國79)年7月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第2141號

---



精裝本：定價3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國家圖書館



001129495

